
总主编 刘绪贻 杨生茂

美国通史

第3卷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世纪末

本卷主编 丁则民

人民出版社





VOL.1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585-1775

VOL.2 THE INDEPENDENCE AND THE BEGINNING OF PROSPE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1775-1860

VOL.3 AMERICAN CIVIL WAR AND GILDED AGE 1861-THE LATE YEARS OF THE 19TH CENTURY

VOL.4 THE RISE AND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898-1929

VOL.5 THE AGE OF FRANKLIN D.ROOSEVELT 1929-1945

VOL.6 POST WW II AMERICAN HISTORY 1945-2000

美国通史

总主编 刘绪贻 杨生茂

第3卷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世纪末

著者 丁则民（本卷主编） 黄仁伟 王旭等

人民出版社

美国通史

总主编（按姓氏笔划）　刘绪贻　杨生茂
策划/编审　邓蜀生

第一卷　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著　　者　李剑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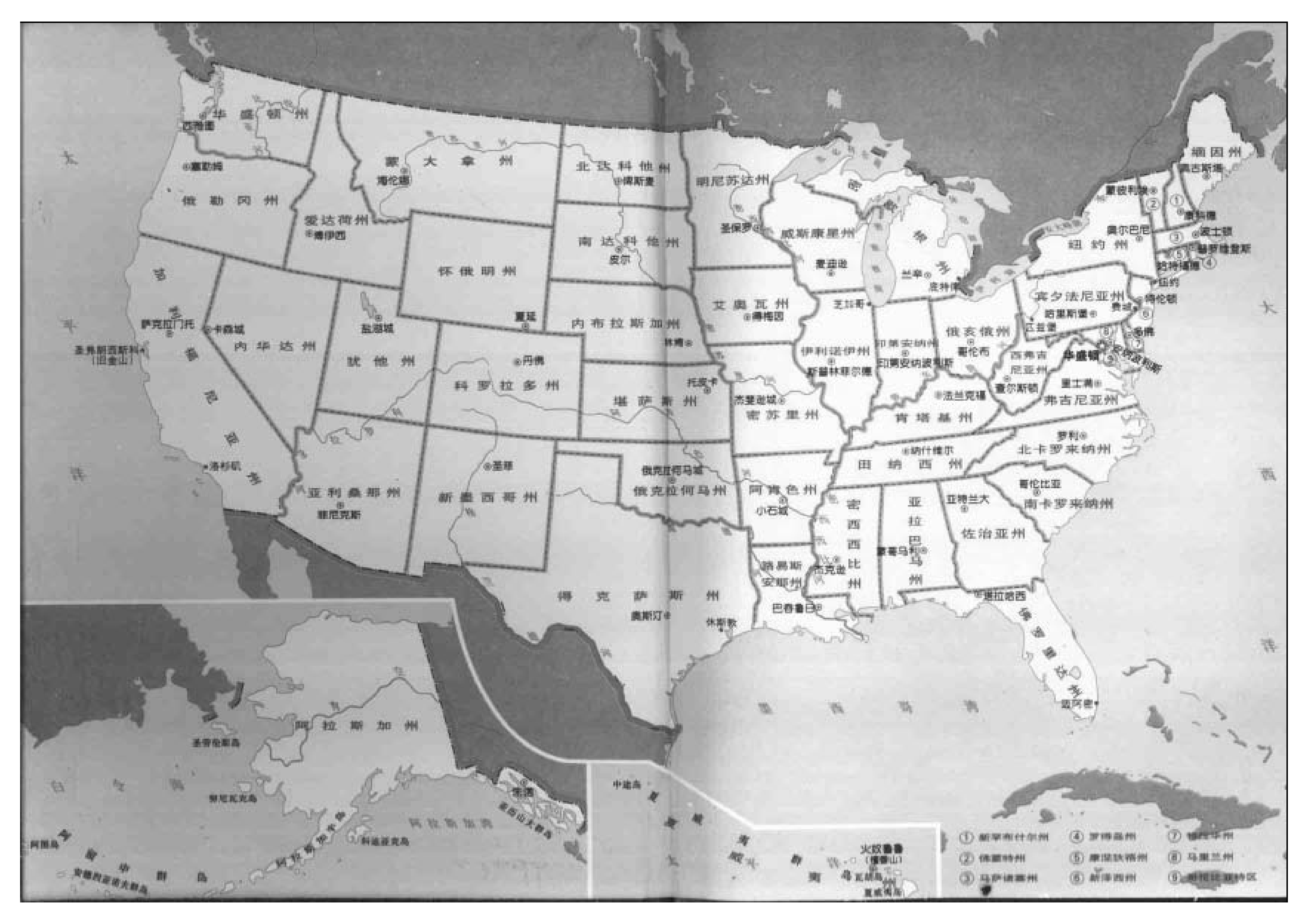
第二卷　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1775－1860
著　　者　张友伦（本卷主编）　陆镜生　李　青等

第三卷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世纪末
著　　者　丁则民（本卷主编）　黄仁伟　王　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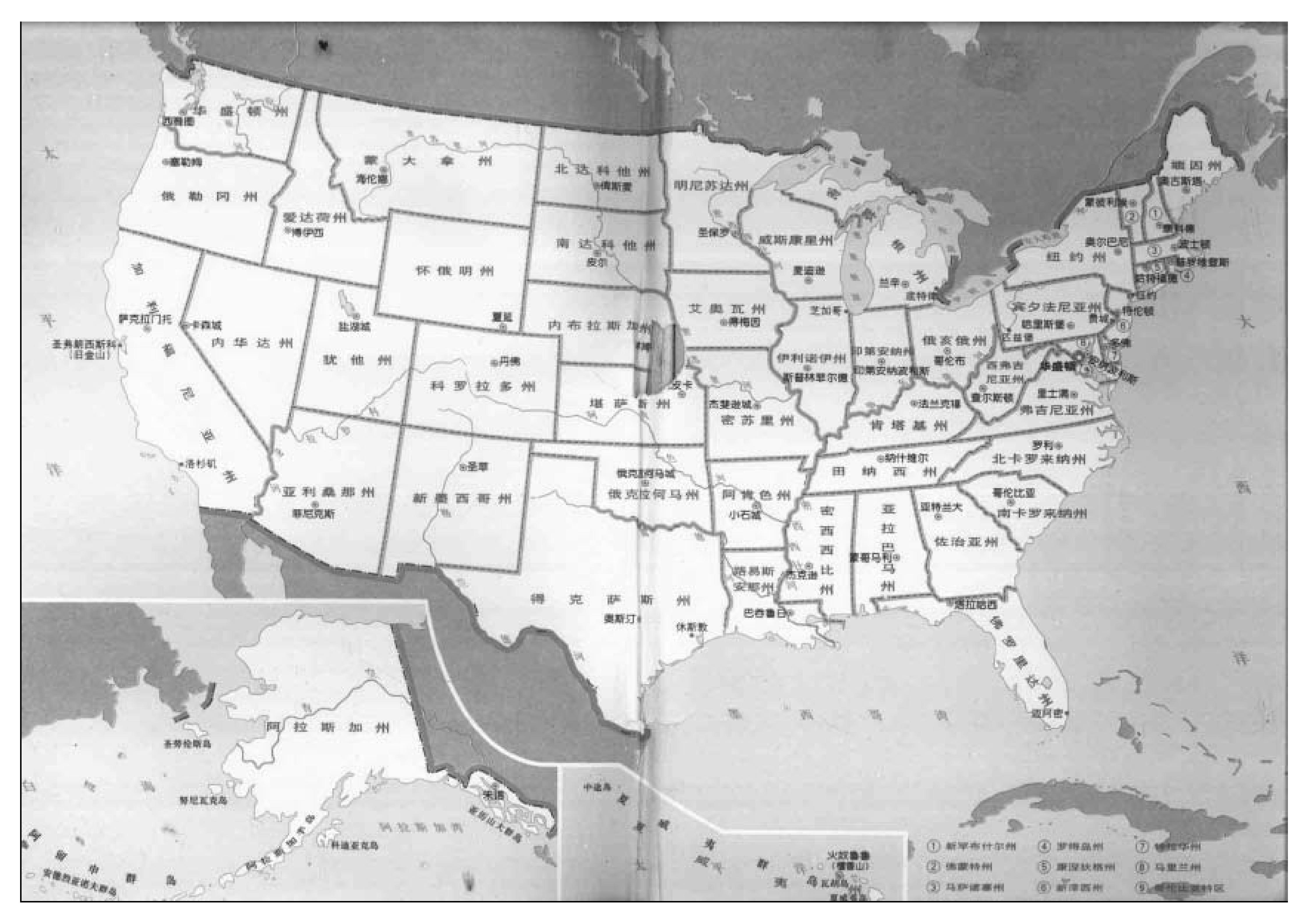
第四卷　崛起和扩张的年代　1898－1929
著　　者　余志森（本卷主编）　王春来（本卷副主编）
王锦瑭　陆甦颖　陈　晓

第五卷　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著　　者　刘绪贻　李存训

第六卷　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著　　者　刘绪贻（本卷主编）　韩　铁　李存训



华盛顿州
西雅图
蒙大拿州
海伦娜
北达科他州
俾斯麦
明尼苏达州
圣保罗
缅因州
俄勒冈州
爱达荷州
博伊西
南达科他州
皮尔
威斯康星州
密歇根州
兰辛
底特律
纽约州
奥尔巴尼
波士顿
怀俄明州
夏延
内布拉斯加州
林肯
艾奥瓦州
得梅因
芝加哥
宾夕法尼亚州
哈里斯堡
匹兹堡
费城
特伦顿
纽约
加利福尼亚州
萨克拉门托
圣弗朗西斯科
(旧金山)
洛杉矶
内华达州
卡森城
犹他州
盐湖城
科罗拉多州
丹佛
堪萨斯州
托皮卡
伊利诺伊州
斯普林菲尔德
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波利斯
俄亥俄州
哥伦布
西弗吉尼亚州
查尔斯顿
华盛顿
安纳波利斯
里士满
弗吉尼亚州
密苏里州
杰斐逊城
肯塔基州
法兰克福
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
北卡罗来纳州
罗利
亚利桑那州
菲尼克斯
新墨西哥州
圣菲
俄克拉何马州
俄克拉何马城
阿肯色州
小石城
密西西比州
杰克逊
亚拉巴马州
蒙哥马利
佐治亚州
亚特兰大
南卡罗来纳州
哥伦比亚
得克萨斯州
奥斯汀
休斯敦
路易斯安那州
巴吞鲁日
塔拉哈西
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
阿拉斯加州
朱诺
中途岛
火奴鲁鲁
(檀香山)
① 新罕布什尔州
② 佛蒙特州
④ 罗得岛州
⑥ 新泽西州
⑧ 马里兰州



华盛顿州
西雅图
塞勒姆
俄勒冈州
爱达荷州
博伊西
蒙大拿州
海伦娜
怀俄明州
夏延
北达科他州
俾斯麦
南达科他州
皮尔
内布拉斯加州
林肯
堪萨斯州
托皮卡
明尼苏达州
圣保罗
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
艾奥瓦州
得梅因
伊利诺伊州
斯普林菲尔德
芝加哥
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波利斯
俄亥俄州
哥伦布
兰辛
底特律
密苏里州
杰斐逊城
肯塔基州
法兰克福
西弗吉尼亚州
查尔斯顿
弗吉尼亚州
里士满
华盛顿
安纳波利斯
宾夕法尼亚州
哈里斯堡
匹兹堡
费城
特伦顿
多佛
纽约州
奥尔巴尼
纽约
蒙彼利埃
康科德
波士顿
普罗维登斯
哈特福德
缅因州
奥古斯塔
加利福尼亚州
萨克拉门托
旧金山
洛杉矶
内华达州
卡森城
犹他州
盐湖城
科罗拉多州
丹佛
亚利桑那州
菲尼克斯
新墨西哥州
圣菲
俄克拉何马州
俄克拉何马城
得克萨斯州
奥斯汀
休斯敦
阿肯色州
小石城
路易斯安那州
巴吞鲁日
密西西比州
杰克逊
亚拉巴马州
蒙哥马利
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
佐治亚州
亚特兰大
南卡罗来纳州
哥伦比亚
北卡罗来纳州
罗利
佛罗里达州
塔拉哈西
迈阿密
阿拉斯加州
朱诺
中途岛
① 新罕布什尔州
② 佛蒙特州
③ 马萨诸塞州
④ 罗得岛州
⑤ 康涅狄格州
⑥ 新泽西州
⑧ 马里兰州

编者说明

本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写内战开始以来直至19世纪末美国历史。全书除引言外，共11章。引言和第4、5章由丁则民撰写，第1章由汪仪撰写，第2章由田锡国撰写，第3章由游恒撰写，第6章由黄仁伟撰写，第7章由卞历南撰写，第8章由徐玮撰写，第9章由王旭撰写，第10章由王贵正撰写，第11章由黄勃撰写。

本书附录是在分主编指导下与黄仁伟组织下，分工合作编制的，其中大事记由邹桂芬、曹学昌编写，参考书目与部分专有名词中英对照表由邹桂芬编辑，历史图片和地图由黄仁伟和曹学昌选定、绘制，索引由邹桂芬、曹学昌和胡锦山共同编制。

全书初稿脱稿后，杨生茂、刘绪贻两位主编进行统稿工作，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这部丛书的编写原则和两主编的要求，分主编在黄仁伟和王旭协助下，经过反复研究，作了必要的修改和增删，进行了较细致的文字加工。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南开大学冯承柏同志和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同志仔细阅读了3章试写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同志对编书工

作，不断给予关心、督促并提出很好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朱庭光、张椿年等同志曾给予大力支持和赞助；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和友人如 John R. Moore、James B. Murphy、Harry Ammon 和 William G. Crowell 等先生热情关怀本书的写作，帮助我们掌握美国的美国史研究最新动态及成果，不断赠给我们新书。我们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新闻文化处不断赠给我们美国出版的新书，谨表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便我们改进。

1989 年 4 月

由于本卷主编丁则民教授于 2001 年年初病逝，由他的博士弟子、现厦门大学教授王旭写了一篇后记，作为对本书的补充及对丁则民教授的怀念。其他内容未作改动。

2002 年 3 月

引　言

本书写的是从内战爆发到19世纪末的美国历史，主要阐述“镀金时代”美国的发展变化。它是近代美国向现代美国转变的历史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两个历史性转变带动下，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为20世纪现代美国奠定了基础。

美国内战是北部与南部两种社会制度——即自由雇佣劳动制度与奴隶制度之间矛盾斗争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内战爆发后，美国广大人民在以林肯为首的共和党领导下，经过4年艰苦、英勇的斗争，终于赢得了军事胜利，摧毁了南部奴隶制度，扫除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内战结束后，对如何重建南部政治、经济结构以解决南部各州重返联邦的问题以及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应有的权利和地位的问题，联邦政府内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共和党激进派同约翰逊总统的保守、倒退的重建纲领展开了剧烈斗争，终于取得了对南部重建的领导权，使重建按照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意志，以较为民主的方式在南部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改革，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共和党激

进派在稳固地控制联邦政权后，就逐渐放弃了在南部的进一步改革。重建以极不彻底、妥协的方式而告终。它既没有为“解放了的”黑人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切实保证他们运用宪法第十四条和十五条修正案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尽管如此，南部重建毕竟凭借政治、法律手段巩固了内战所带来的历史性转变，基本上消除了种植园奴隶制度和奴隶主阶级寡头专政，把南部纳入全国统一市场，为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

随着重建的展开，美国历史进入了“镀金时代”，这个时代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美国工业迅速发展，走向集中、垄断，垄断资本主义在国内市场上逐渐居于优势，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基础；第二，联邦政权不再为两个利益对立的统治集团所分享，而是为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所独揽；第三，南部走上了缓慢而痛苦的“普鲁士式”发展道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美国闭塞的落后的地区。

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期间，美国资本主义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广度方面，突出表现于西部的开拓与移民洪流的涌入。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西部是土地辽阔、资源富庶的地区，它的开发为美国工业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原料和巨大的市场，从而为美国提供了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优越的发展条件。西部交通运输的发展、特别是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为移民大军的西去和扩大国内市场开辟了道路。源源不断的移民洪流为西部开拓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西部工农业的巨大发展。

与这种广度发展同步进行的是美国资本主义关系的深度发展，即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内战后，全国市场的空前扩大、西部开发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革命的刺激和联邦政府的积极扶植政策，都推动着资本在全国各地寻找有利可图的场

所；与此同时，各个资本集团也展开空前剧烈的竞争。在工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下，企业规模结构在股份资本的基础上，由小型分散的独立企业，通过普尔、托拉斯和控股公司等形式的联合和兼并，发展成为少数巨型的垄断企业，最后导致银行与工业的融合以及金融资本的形成。垄断制的建立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扬弃和局部质变，它使生产进一步社会化，横向和纵向的联合把社会经济的各部门结合为一个整体；它使大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日益分离；它使工业资本越来越依赖银行资本，从而形成无所不在的金融寡头统治。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适应了这一时期美国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在1893年爆发了19世纪美国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

在美国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它的城市化也进入了鼎盛时期。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城市的普遍兴起，经过水陆交通线的联结，逐渐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城市网。它既促进了工业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的形成，也使北部、南部与西部聚合为全国统一市场，因而加速了美国工业化的进程。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已由原来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实现了“新”、“旧”资本主义的交替[①]，成为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典型国家。

随着“新”、“旧”资本主义的交替，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资本家、工人和农场主三个大集团的内部分化趋势日益增强：与“旧”资本主义相一致的旧阶层不断衰落，而随“新”资本主义产生的新阶层却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内

---

① 即列宁所说的“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被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新资本主义所替代”，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2卷，第210页。

部逐渐分化为垄断资产阶级、旧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垄断就是"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1] 因此，垄断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内其他阶层的矛盾、特别是同保持独立经营的企业主、即旧中产阶级的矛盾加深了。新中产阶级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发展起来的，他们受雇于垄断资本的大企业，但却掌握企业大部分的管理权，其主要职能就是帮助垄断资产阶级"用一切科学办法榨取血汗"。[2]

农场主阶级在美国社会阶级结构中原占有重要的地位和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在生产商品化过程中，他们受到国际国内市场的巨大冲击和垄断资本的控制，除少数上升为大农场主外，一部分成为失去经营自主权的租佃农场主，大部分因丧失生产资料而沦为农业工人。为了维护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农场主集团及其领导下的农民进行了长达30年之久反对垄断资本控制和掠夺的斗争，但仍无法摆脱其地位日益下降的厄运。

由于生产技术基础的变革和垄断企业的出现，美国工人阶级构成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首先，在熟练工人的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非熟练工人开始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集中在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垄断企业。其次，白领工人阶层的形成及其数量迅速增长，是垄断企业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重要体现。在19世纪后期，白领工人还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不创造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的实现是经由他们完成的。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他们也日益直接进入生产过程，成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者。第三，工人贵族阶层的扩大，这个阶层的社会基础是熟练工人和

---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卷，第831页。

② 列宁："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8卷，第594—595页。

监工。他们为垄断资本家的高工资政策所收买，在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方面都“资产阶级化”了，从而成为垄断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在19世纪末，“劳联”之所以从维护熟练工人狭隘利益的行业工会组织蜕变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就表明了工人贵族充当代理人的作用。

向垄断过渡时期，美国社会流动的频繁对阶级结构的变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社会流动表现为人口在地域间的横向流动和社会各阶层间的纵向流动。西进运动导致大量移民西去，从而使人口重心不断向西部移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批人口流向城市。向垄断过渡则加速了社会各阶层的上下流动。在19世纪后期，有相当一批富豪发迹于社会中下层，中下层之间的对流也较为普遍。东北部垄断资本向中西部迅速扩展，造成了这个地区农场主大批破产，其中一部分为谋求生计流向东部工业地区，另一部分则不得不移往更远的西部寻求新的活动场所。这就形成了巨大的横向对流。这种横向流动与纵向流动相结合，使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更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

这一时期，涌入美国的移民洪流既大大加速了原有的社会流动，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引起了美国排外主义情绪的增长。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新移民”超过来自西欧和北欧各国的“老移民”，逐渐居于压倒的多数。“新移民”来美国前原属生活贫困、教育文化程度低下的阶层，且不能讲英语。他们的大量入境引起了土生美国人的疑虑和工会组织的恐惧，但却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欢迎。前者要求限制“新移民”入境，而后者的代言人却坚持自由移民政策，断言限制移民入境，势将发生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从而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他们之所以坚持自由移民政策，主要是因为“新移民”能为大企业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而且比重不断增加的非

熟练工人。

在限制移民入境的呼声日增形势下，美国排外主义者把限制矛头首先针对来自东方的华人，导致1882年国会通过第一个限制移民入境的法案，即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接着便是针对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新移民”。在排外主义组织不断鼓动下，国会于1896—1917年期间连续四次通过以识字为基础的“文化测验”法案，企图限制“新移民”入境，但均为美国三届总统所否决。他们在否决该法案时，虽都标榜美国应是“欧洲被压迫者的庇护所”，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服从于垄断资本集团的意志，以适应大企业不断用移民补充非熟练工人的需要。

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时期，美国的两党政治及其内外政策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时期，美国的政治特征就是保守主义和腐朽之风。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虽然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富，但也带来了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贫富悬殊的鸿沟加深、城乡对立加剧以及腐朽之风盛行等等。垄断资本横行无忌，更加剧了社会经济矛盾，导致工人斗争、农民运动以及各种改革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汇成一股波澜壮阔的巨流，而它的斗争锋芒主要是指向垄断资本集团的。为了应付日趋高涨的工农运动，美国统治集团除采用暴力镇压的方法外，也采用“自由主义的”方法，即“趋向于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方法。[①] 统治集团之所以改变策略，采用“改良、让步”的方法，或是交替使用两种方法，固然是由这一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但往往也是由于社会压力的结果。“新”、“旧”资本主义交替中，原有的结构已不适应新的社会冲突，出现严重

---

①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6卷，第349页。

的“动乱”。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使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得到保证，从市、州到联邦的各级政府都逐渐地采用下层改革派的纲领和要求，部分地调整统治政策，以适应历史的发展趋势。

首先，在国家机器和政治制度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缓慢而重要的改革，主要表现于联邦权力日益加强和州权逐渐削弱、旨在消除党派分赃制的文官制度改革以及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等等。其次，在政党方面，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差别日趋缩小，它们已从内战前两种经济制度的政治代表转变为垄断资产阶级不同集团的政策执行者。再次，重新轮流执政的两大党日益僵化保守，对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所产生的问题提不出相应的对策，只是在第三党运动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才不得不从自由放任政策向国家干预政策转变，尽管这种干预政策尚处于萌芽阶段。更为重要的变化是联邦政府开始直接同垄断资本结合，逐渐把对内对外政策都纳入与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相一致的轨道。

随着“边疆的消失”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美国统治集团大力鼓励商品输出，扩大对外贸易，日益走上了向海外扩张的道路，先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拉丁美洲进行了侵略扩张，以夺取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与此同时，它积极调整政府的军事机构，增拨军费建造新型的海军舰队，以增强远洋的作战能力，为重新瓜分世界作好准备。

内战后，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带动下，美国教育文化事业也有了蓬勃的发展。普遍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并为工农业和其他建设事业提供了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联邦政府大力支持下，高等教育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它在吸收欧洲各国大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美国大学的组织结构、培养目标和

课程设置等都进行了改革，从而培养了美国工业化进程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

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对美国思想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促使各种社会思潮应运而生，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为美国文学家和艺术家展示了一个新的广阔的创作天地。这一切使美利坚民族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美国涌现了一批遐迩闻名、影响深远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代表人物，如哲学家亨利·詹姆斯、文学巨擘马克·吐温和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 特纳等。此外，许多美国文学家和艺术家也在吸收欧洲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美国的实际，创作出许多反映美国现实、具有民族特色的著作和艺术品，从而为近代世界文化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

目　　录

第一章

美国内战
(1861—1865年)

19世纪中叶，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在北部迅速发展。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也在不断扩展。到50年代，这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北部自由雇佣劳动制度与南部奴隶制度之间的一场决战，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内战期间，美国的资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制定和贯彻了资产阶级的各项政治、经济的政策。资产阶级的正义斗争不仅得到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而且也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了资产阶级政权，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北部资产阶级的胜利，在美国历史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扫除了奴隶制度这一美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使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很快跃入世界先进行列。因此，美国内战也被誉为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节 内战的序幕与开端

〔1860年总统竞选运动〕 1860年的总统大选是一场四方竞选运动。共和党推选阿伯拉罕·林肯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则

因南北两派意见相悖而分裂。北部民主党提名斯蒂芬·道格拉斯为总统候选人,南部民主党则提名约翰·布雷肯里奇为总统候选人。而由老辉格党、一无所知派等组成的立宪联邦党推出了约翰·贝尔。

共和党在这次竞选中提出了比较符合时代潮流的政治纲领,又成功地开展组织动员,获得了工人、农民的广泛支持,一直处于优势地位。5月,共和党在芝加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政纲重申反对向各领地扩展奴隶制,但不干涉各州的奴隶制;强调实行国内改革、保护关税和宅地法;并提出了言论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身自由的资产阶级政治口号。这个纲领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不仅赢得了东北部工业区的拥护,而且使中西部农业区的广大德裔美国人也倒向了共和党。当时的旅美马克思主义者魏德迈等人也认为,共和党的政治纲领具有进步意义。他们号召各地工人支持林肯当选。

然而,无论是南派或北派的民主党都坚持维护奴隶制,他们虚构出解放黑奴将会出现种种可怕情景,煽动人民反对林肯和敌视黑人情绪。南部民主党甚至采用恫吓手段,扬言如果林肯当选,南部各州就退出联邦。但是,由于民主党南北分裂,竞争力量大为削弱。而立宪联邦党企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激烈竞争中走一条中间道路。他们除了提出维护宪法和联邦以及实施法律以外,没有提出任何其政治原则,故影响平平。

1860年11月6日举行大选。结果林肯获得了18个自由州中17个州的多数票。虽然他未得到南部10个蓄奴州的任何选票,却拥有选举人团的大多数选票。于是,林肯以绝对优势战胜了所有对手,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地域色彩的一次选举。

〔南部诸州脱离联邦〕　林肯的当选在南部奴隶主中引起

了极大的不满和恐惧。南卡罗来纳的一位奴隶主政客夫人在日记中写道："刺激是巨大的。"南部到处笼罩着绝望和沮丧的气氛。[①] 在查尔斯顿和孟菲斯等地，分离分子将此看作是分裂联邦的时机，掀起了好战的叫嚣。

南卡罗来纳州首先"发难"，于12月20日宣布脱离联邦。接着在1861年1月中，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等州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均以压倒票数通过了脱离法令。2月1日，得克萨斯州亦以166票比7票宣布退出联邦。4日，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提议下，来自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和南卡罗来纳六州的代表，集会于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8日，大会宣布成立"美利坚诸州同盟"，简称"南部同盟"。翌日，42名代表推举杰斐逊·戴维斯为南部同盟的临时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为副总统，并通过了一个仓促草就的临时宪法。这部宪法顽固坚持奴隶制度，规定"不许通过……任何否认或损害对黑人的占有权"的法律[②]；并公然宣称各州可以"主权和独立的资格"采取行动，获得新的领土，扩张奴隶制度。

南部奴隶主竭力为自己的分裂行径作辩护，声称："分离不同于单纯的革命权利，而是符合宪法的。"[③] 他们强调各州不仅有权不服从违宪的法律，而且享有对国会法令的"废止权"。认为"联邦是各州间契约的产物，因此签订契约的各州是对侵犯其权利的合法裁判人。"[④] 他们甚至说，因为"分离权"也属州权

---

① 佩奇·史密斯：《战火的考验》，纽约1982年，第27页。

② 艾·柯万：《南部同盟社会政治史文献》，纽约1959年，第30页。

③ 亨利·莫里森、塞缪尔·康马杰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上卷，第800页。

④ 理查德·莫里斯：《美国历史百科全书》，纽约1976年，第200—201页。

范畴，而州权本身是得到宪法承认的，所以分离无可置疑地符合宪法。

南部奴隶主阶级的这些理论显然是诡辩。但是，1787 年制定的宪法本身就是州权派与中央集权派妥协的产物，它在联邦权利与州权的关系和界限等问题上，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些含糊措辞，给南部分裂主义者留下了可乘之隙。然而，联邦宪法毕竟是全国的根本大法，是国家主权的体现。联邦宪法固然承认各州保留某些权利，并且联邦政府不能任意干涉这些权利。即使如此，这些州权仍然是非主权性的。南部奴隶主把州权扩大为主权加以行使，并进而脱离联邦，从根本上违背了联邦宪法。联邦宪法明文规定："本宪法所授予的各项立法权，均属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未经国会同意，任何州不得……与他州或外国缔结协定或契约，亦不得进行战争"[①] 因此，南部奴隶主分裂联邦另建南部同盟，并私立宪法，实际上已把自己置于与联邦宪法全然对立的地位，因而完全是非法的叛逆行为。

〔北部各阶层对南部脱离的反应〕　南部七州脱离联邦后，北部的反应是十分复杂的。共和党激进派及工人、农民中坚定的奴隶制反对者，坚决主张对南部奴隶主的叛乱行径进行严厉的镇压。1861 年 1 月 29 日，激进派领袖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时严正指出，南部诸州脱离联邦是叛国行动，必须严惩不贷。在匹兹堡、费城等城市，工人们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他们高举"联邦是国家的基石"的大标语，愤怒声讨南部奴隶主的叛乱行径。北部自由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也慷慨激昂地呼吁：现在已经到了必须用剑、步枪、火药和弹丸去坚决粉碎奴隶主叛乱的时候了，舍此不能保全联邦。

---

① 埃·V·米切尔：《美国政治百科全书》，纽约 1946 年，第 72、77 页。

北部民主党人却在很大程度上同情叛乱，其右翼“铜头蛇”分子但愿林肯总统和共和党被各种困难压垮。他们煽动反战情绪，甚至鼓动叛乱。各边界蓄奴州虽然没有立即参加叛乱，却也不积极支持联邦和林肯总统，采取观望态度。威廉·加里森、温德尔·菲里普斯等废奴主义者天真地认为，只要让南部脱离联邦就可以解决奴隶制问题。因此，他们一味鼓吹让南部奴隶主和平地走开。共和党保守派即大资产阶级只想到自己的政治、经济权益，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保全刚刚获得的统治地位，而不是奴隶制存废的问题。他们担心收不回南部奴隶主所欠的2.11亿美元的巨额债务，[1] 故极力主张同南部妥协，甚至联名上书，要求国会出面斡旋。

林肯正是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出任总统的。1861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职并发表演说。他阐述了面对当时重大政治争端所持的观点和政策。林肯指出：“从一般法律和宪法的角度来看，各州组成的联邦是永久性的。”因此，“任何一个州都不能单凭自己的动议合法地退出联邦；任何为此通过的决议和法令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他还重申共和党无意干涉蓄奴州的奴隶制度。最后，他要求南部分离分子不要发动内战，“政府将不会攻击你们，只要你们自己不做侵略者，冲突就不会发生。”他的这篇演说中心思想就是维护联邦统一。他强调“就自然条件来说，我们是不能分离的。我们既不能把各个区域各自搬开，也不能在它们之间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城墙。”[2] 林肯的这一积极思想与他对南部奴隶主的迁就，表现出他的政策的两重性。

〔萨姆特陷落与内战开端〕　林肯宣誓就职的当天，就接

---

① 卡尔·桑德堡：《战争年代的林肯》，纽约1939年，第一卷，第261—262页。

② 菲力普·斯特恩：《林肯的生平与著作》，纽约1940年，第467页。

到萨姆特要塞联邦驻军司令罗伯特·安德森少校送来的紧急报告，他们已经被叛军团团包围，粮食储备仅够维持一个月，如果得不到接济，他们只得放弃要塞。萨姆特是当时南卡罗来纳州内惟一未被叛军当局占领的联邦要塞。1861 年 3 月 3 日，南部叛乱当局任命皮埃尔·博雷加德为查尔斯顿驻军司令，并下令包围萨姆特要塞。尽管这个要塞的战略价值不大，但如果容忍南部叛军轻易将它占领，就必然使联邦原则受到致命的损害。

3 月 9 日，林肯召集第一次会议商量对策。会上，7 名成员中竟有 5 人反对接济要塞。南部叛乱分子不断向林肯政府施加压力，叫嚣："让你们总统试试向萨姆特增援吧，战争的警钟将响彻南部的每一个山头和河谷。"[①] 3 月末，林肯又连续两天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对策，但会上赞成与反对的意见仍相持不下。林肯权衡利弊，决心正面解决这个问题。会后他立即向陆军部长下令：组织远征部队，务必于 4 月 6 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去解救萨姆特要塞。

消息传到蒙哥马利，杰弗逊·戴维斯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下令进攻萨姆特要塞。4 月 10 日，南部同盟的陆军部长雷鲁瓦·沃克通知博雷加德，立即要求联邦军队撤出要塞。12 日上午 4 时 30 分，叛军终于向萨姆特要塞射出了内战的第一颗炮弹。炮击持续 33 个小时。14 日下午，安德森少校率领守军，举旗擂鼓，撤出要塞。历时四年的美国内战由此开始。

第二节　林肯政府为恢复联邦统一而战

〔南北双方战争目的与力量对比〕　战幕拉开后，南部奴

---

① 卡尔·桑德堡：《林肯传》，三联书店中译本 1978 年，第 167—168 页。

隶主仍旧声称：同盟诸州脱离联邦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的权利，促进自己的福利，捍卫州权。事实上，南部奴隶主不惜孤注一掷的真正目的乃是为了维护和扩展奴隶制度。他们甚至扬言要为了建立一个“大奴隶制共和国”而进行军事征战。因此，就其性质言，南部奴隶主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北部资产阶级宣布战争的最高目的是恢复联邦的统一。这一战争目的完全反映了刚刚控制联邦政府的北部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他们希望有一个统一的联邦、稳定的局势，以便在限制奴隶制进一步扩展的条件下，加速发展资本主义。因此他们不能容忍分裂。正如芝加哥《论坛报》所说：“北部没有一个党派会同意国家领土、国家军备、国家档案或国家宝藏分裂。”① 林肯也明确指出：“这场斗争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② 北部的战争目的无疑具有进步性。

在战略上，北方应采取果断行动，主动进攻南部。但是，在战争初期北部未能实施正确战略，在战场上一再处于被动地位。南部在战略上采取先发制人、速战速决的策略，他们抢先进攻华盛顿，企图在士气上压倒对方。但是，南部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国内的基本形势，导致其战略失误。他们一味进攻，反而使自己日趋被动，最终陷于绝境。

双方的基本力量对比亦十分悬殊。北部的实力占压倒优势。它拥有全国 34 个州中的 23 个州，占全国领土面积的 3/4。北部自由人口近2,200 万；而南部自由人口仅 545 万，加上奴隶 352 万，人口仅近 900 万。③ 北部拥有美国几乎所有钢铁、军火和绝

---

① 艾伦·内文斯：《为联邦而战》，纽约 1959 年，第 1 卷，第 26 页。

② 斯特恩：前引书，第 719 页。

③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 817 页。

大部分纺织、皮革等工业，仅纽约一个州的工业产值就4倍于南部所有分离州的总产值。[1] 北部还拥有铁路网和许多干线，总长度为22,000英里；南部铁路线仅9,000英里，而且不成网络[2]。北部还掌握着联邦政权，可以依靠政府力量解决战时财政问题；而南部原来就负债累累、缺乏资金，战争更使之财政拮据以至焦头烂额的地步。

南部也拥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南部的奴隶主寡头政治比北部的民主政治更易于迅速地集结力量，转入战时行动。南部人崇尚戎马生涯，故拥有比北部更多资历较长、经验丰富的军事人才。且南部叛乱蓄谋已久，早已聚积大量武装力量。南部还有很长的海岸线，便于突破北部的经济封锁。最后，战争在南部土地上进行，使同盟占有地利之便。由于上述因素的作用，尽管在总的力量对比上南部劣于北部，在某些具体力量对比上却优于北部，故在战争初期南部一度取得某些优势。

〔1861年战局——北部失利〕　萨姆特要塞的炮声揭开了内战序幕后，北部人民群情激昂。他们强烈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向奴隶制发起进攻。1861年4月15日，林肯发布命令招募75,000名志愿兵服役3个月。5月3日，林肯又下令征召42,000名志愿兵服役3年。北部人民立即热烈响应，纷纷要求参军。印第安纳的一名刚过16岁的青年对其父亲说："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士兵。我们的祖先建立起这个联邦，我们要从毁灭中拯救它。"[3] 仅两个多月，联邦政府就征召到310,000人，约3倍于原来要求的数额。而第一批志愿兵服役仅3个月的期限就反映出北方缺乏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819页。

②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0—241页。

③ 史密斯：前引书，第53页。

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

6月29日，林肯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作战问题。欧文·麦克道尔将军提出，由他率领一支3万人的军队，去攻击布尔河附近的马纳萨斯联轨站上由博雷加德率领的22,000名同盟军。7月18日，麦克道尔率军渡过波托马克河，抵达森特维尔。战争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迅速出击，但是麦克道尔却没有这样做。他过于小心，只派丹尼尔·泰勒带领一支小部队前去侦察，结果与同盟军遭遇接火，暴露了进攻方向。南军约瑟夫·约翰斯顿立即率部乘火车增援博雷加德。直到这时，麦克道尔仍未抢先出击。

7月21日拂晓，麦克道尔发起进攻。他原计划在石桥佯攻，主力迂回到西北实施围歼。石桥佯攻受挫，反而引起豪斯高地激战。托马斯·杰克逊指挥的同盟军像“石壁”一样挡住了联邦军的猛攻。下午，同盟军柯比·史密斯率部9千人赶来增援，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联邦军转入撤退。但由于联邦军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撤退变成了大溃退。

布尔河战役（又称马纳萨斯战役）失败消息传到华盛顿后，北部上下为之震惊，人们称这一天为“黑暗的星期一”。失败使3个月内结束战争的论调销声匿迹。林肯政府从这次失败中汲取教训，准备长期斗争。相反，南部却以这次小胜自吹自擂。

布尔河战败后，林肯立即召见乔治·麦克莱伦，授权他指挥华盛顿军区，命令他重建波托马克军团，使之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麦克莱伦毕业于西点军校，他生性傲慢、自负且野心勃勃，虽熟谙军事理论，却无多少实战经验，尤其对于与战争紧密联系的各种因素缺乏洞察力。他只是由于在西弗吉尼亚曾轻易取胜而名噪一时。麦克莱伦上任后，把波托马克军团扩充到16万人。此后一连数月，只是操练部队、制定计划，却从未把计划付诸实施。他幻想通过充足的军事准备，对里士满实行一次胜利进

攻以结束战争，因此他采取拖延战略。

麦克莱伦长时间按兵不动，引起了舆论的不满。在林肯政府的频频督促下，他才勉强采取行动。10月下旬，他令查尔斯·斯通将军率部越过波托马克河去进行侦察。但斯通早已暗中投敌，将部署告知南军。10月21日，爱德华·贝克上校率小分队执行任务，遭南军伏击。贝克率部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击溃。贝克等48名官兵阵亡，伤158人，被俘和失踪714人。

麦克莱伦不切实际的战略和无所作为的军事指挥，使联邦军队在波托马克河主战场上再遭重创。当时联邦政府尚未找到更合适的军事人才，而麦克莱伦在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又较符合林肯的稳健政策，故仍受到重用。11月，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退休，麦克莱伦又被擢升为陆军总司令。

〔海军行动与北部对南部的封锁〕　1861年联邦的军事战果主要来自海军方面。南部同盟成立后，联邦海军中许多来自南部的军官纷纷离职南下，但他们却未能把军舰带走。南部同盟只得依靠征用和改装商船、拖轮等，拼凑成自己的海军。4月17日，戴维斯宣布允许南部武装船只劫夺联邦船只。到1861年底，同盟海军共捕夺了58艘船只，其中15艘是在密西西比河上夺得的。

在戴维斯鼓动南部劫捕联邦船只后两天，林肯就宣布对南部各港口实行封锁，并任命吉迪恩·韦尔斯为海军部长。但在战争初期，联邦海军实际上只拥有8,800人和42艘可供海战的船只。而南部海岸线长达12,000英里，散布着185个大大小小的港口和商埠。因此，严密封锁南部各港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南部真正具有战略价值的港口却不多，从弗吉尼亚的查尔斯角到密西西比河口的海岸线上，与铁路相连的重要港口仅9个即纽波特纽斯、诺福克、维尔明顿、查尔斯顿、萨凡纳、布兰斯维克、

彭萨科拉、莫比亚和新奥尔良等 。联邦海军采取了重点封锁的方针。

韦尔斯上任后，立即下令购买或租借船只扩建海军；同时把大西洋舰队分成北、南两个中队，分别交由戈茨鲍洛夫和亨利·杜邦两位将军指挥。到 1861 年 7 月底，联邦海军已封锁了南部七、八个重要口岸，部署了四支分舰队。重点封锁的第一年已收到显著效果，南部各港口进出船只总数比内战爆发前的一年减少 80%。①

1861 年夏，联邦海军又开始在南部各重要港口附近建立基地。8 月，海军配合陆军一举攻克了北卡罗来纳海岸的哈特勒斯堡垒。11 月，杜邦将军率舰队攻克南卡罗来纳罗耶尔港外重要战略基地希尔顿赫德。这次胜利为联邦军队扩大战果提供了有利的战略地位。

〔弗里蒙特与奴隶制问题〕　　内战爆发后，北部资产阶级集团对奴隶制存废问题仍存在着尖锐争论。激进派主张“战争应该以废除奴隶制为目标”②，认为只有消灭奴隶制度，资本主义才能得到迅速、自由的发展。而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派，却强调实业界“不能忍受一场长期的、胜负莫测的、令人厌倦的争斗”③，要求与南部同盟妥协；并且以美国宪法为借口，主张对南部奴隶主采取宽大政策，反对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和没收其财产。

在战场上这一斗争反映为如何处置逃亡奴隶问题。保守派强调严格执行逃奴法，将一切逃亡奴隶遣返南部。激进派却主张在

---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 843 页。
② 桑德堡：《战争年代的林肯》，纽约 1939 年，第 1 卷，第 564 页。
③ 桑德堡：前引书，第 217 页。

战场上收容逃奴，并将他们解放为自由人。弗吉尼亚门罗要塞驻军司令本杰明·巴勒特是最早收容逃奴的北部将领。林肯在内心里是反对奴隶制，但他过于求稳，对巴特勒的做法并未公开支持。

1861 年夏，联邦军与同盟军在密苏里州展开激烈争夺战。约翰·弗里蒙特将军率部作战，攻势凌厉，战绩显赫。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特别是密苏里州内与联邦为敌的武装奴隶主，弗里蒙特在 8 月 30 日发布公告，宣称密苏里全境戒严，凡在联邦军队防线以北被捕获的“持有武器者”一律交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有罪者一律枪决。”并宣布凡持武器反对联邦、或在战场上与南军合作者，其动产和不动产一律没收，其奴隶释为自由人。[①]

弗里蒙特的这一措施的革命意义在于，它首次以解放奴隶对奴隶主施加威胁。这一旗帜鲜明的措施，立即成为北部保守派与激进派斗争的焦点。激进派为弗里蒙特的伟大气魄欢呼，把他宣布的解放奴隶原则看作是“天上降下来的甘露”，因为“这些原则提供了消灭奴隶制的方法。”[②] 保守派却表示极力反对，他们以边界蓄奴州将会转向南部同盟相威胁，要求林肯立即撤销这一命令。林肯也有这种担心，采纳了保守派的意见。9 月 2 日，他得到正式文本后，立即致函弗里蒙特，要求他修改解放奴隶的命令，以便同这年夏天国会通过的《没收法案》协调起来。弗里蒙特拒绝修改命令。保守派和边界蓄奴州的奴隶主乘机继续向林肯施加压力。9 月 11 日，林肯宣布取消弗里蒙特的命令。10 月 24 日，又免除了弗里蒙特西部战区司令的职务。林肯的这一做法挫伤了北部人民反对奴隶制的革命热情，是他在内战前期所犯的一

---

① 桑德堡：《战争年代的林肯》，第 205—206 页。

② T. 威廉斯：《林肯与激进派》，麦迪逊 1941 年，第 271 页。

个重大错误。

〔南部对外政策的基点〕　南部奴隶主阶级敢于分裂联邦、发动内战，还因为它深信自己能够得到欧洲列强的全力支持和援助。他们把棉花看作是吸引欧洲列强干涉美国内战的一张王牌。南部诸州的棉花生产在内战前的五、六十年代确实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英、法等国棉纺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1850 年至 1860 年间英国所用棉花 80%来自美国[①]。南部奴隶主由此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欧洲列强有求于棉花，南部也就变得不可战胜了，他们手里掌握着的"那根小小的、细弱的棉绒，……能够把世界绞死"[②]。他们一旦停止棉花供应，整个欧洲纺织机的轮子将无法转动。欧洲列强为了自身的利益必将全力支持南部。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詹姆斯·哈蒙特傲慢地说："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敢对棉花开战。棉花就是王。"[③]

南部同盟把棉花当作赌注，以此争取欧洲列强的支援。他们派出代表去欧洲游说，不仅争取欧洲列强的政治支持和财政援助，还鼓励欧洲列强对内战进行直接武装干涉。

其实，南部奴隶主只是不切实际地夸大了棉花的作用。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棉花虽有一定的作用，但决不能成为各国决定政策的惟一因素。何况 1861 年上半年，英国市场的棉花并不短缺，相反有 50%棉花供过于求。而且英国已可从埃及和印度进口棉花，南部棉花作用更为降低。既然英、法等国不存在失去棉花的威胁，也就没有干涉美国内战的紧迫感了。

而且，南北战争期间，欧洲不但摆脱了对南部棉花的依赖，

---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 847 页。

②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 847 页。

③ E.M.库尔特：《美利坚南部诸州同盟：1861—1865 年》，得克萨斯 1950 年，第 184—185 页。

却因粮食歉收反而增加了对北部谷物的依赖程度。英国从美国进口的小麦从1860年的1,700万蒲式耳猛增到1862年的6，200万蒲式耳[①]。其他农产品进口也有所增加。结果“称王的不是棉花，而是小麦”[②] 了。南部奴隶主在棉花问题上的短浅目光，导致他们确定对外政策基本点的错误，最终只能是自食其果。

〔北部争取欧洲中立政策的成功〕　　美国内战的爆发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英法及欧洲各国对内战进程极为关注。欧洲各国人民对联邦的事业给予很大的同情，“他们把南部看作是反动封建政治的象征，而把北部看作是民主与进步政治的象征。”[③] 因此大多数人深信，“联邦的胜利将证明民主制度完全正确，而联邦的毁灭则将成为民主制度的致命伤。”[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密切注视美国内战的动态，并及时撰文系统地阐述美国内战的起因及其性质，号召欧洲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北部的正义事业。

欧洲各列强的统治集团却对南部同盟公开表示同情，他们本能地意识到联邦政府的胜利，将助长欧洲民主运动的发展，从而危及他们在自己国土上的统治。他们对美国北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也怀有莫大的恐惧。因此他们更愿看到美国分裂，甚至希望南部战胜北部，使美国不能在经济上成为欧洲的竞争对手而只能沦于附庸地位。

英国一方面在经济上、军事物质上尽可能援助南部同盟，同时在政治上也公开承认南部同盟为交战国一方，在事实上承认南部同盟为独立的国家。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从1861年起对墨西哥

---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848页。
②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848页。
③ 史密斯：前引书，第191页。
④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845页。

进行干涉，企图乘机染指拉美。西班牙和奥地利也对南部同盟表示了更多的好感和支持，西班牙甚至派出军队协助拿破仑三世干涉墨西哥。总之，欧洲列强大体上站在南部同盟一边。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力正显示出强大的活力。同时，林肯政府一再强调北部进行战争只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并派出外交使团到欧洲各国进行广泛活动。一方面奉劝欧洲各国政府采取中立立场，另一方面积极谋求欧洲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正是这种有利于北部正义事业的强大国际舆论的出现，使欧洲列强不敢贸然行事。

正当北部在战场上失利的1861年下半年，发生了“特仑特号事件”，英国几乎找到干涉美国内战的借口。11月7日，英国邮船“特仑特号”驶离哈瓦那，载着两名南部同盟的代表詹姆斯·梅森和约翰·斯利德尔，前往英国购买武器和订造战舰。翌日，该船被联邦战舰“圣亚新托号”拦截，两名南部代表被捕。消息传到伦敦，英国统治集团为之大哗。他们要求联邦立即释放南部代表，并就这一行动作出道歉和赔偿，否则将诉诸战争。同时立即在加拿大增兵10,000人。

在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际，林肯表现得十分沉着。他深知联邦在此时不可能同时打两个战争。为了集中力量镇压南部奴隶主的叛乱活动，只有暂时向英国让步，以避免英美战争的发生。于是，他下令释放梅森和斯利德尔。同时，林肯明确表示：虽然“这是一个难以吞咽的苦药丸，但我感到宽慰的是，我相信英国在这件事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等到我们顺利地结束这场战争之后，我们将会变得非常强大，以至我们能对英国使我们蒙受的种种难堪和它算总账。”[1]

---

① 桑德堡：《战争年代的林肯》，第1卷，第368页。

第三节　联邦军队的胜利进军

〔1862年战局——战事交错〕　1862年2月，格兰特将军在田纳西州指挥了一次援助俄亥俄联邦守军的牵制行动。格兰特大军在炮舰配合下，仅半月时间就夺占了田纳西河上的亨利堡和坎伯兰河上的道纳尔逊堡，联邦军队实际上控制了田纳西州。随后，格兰特大军又沿着田纳西河向匹兹堡兰丁进军。4月6日，格兰特部在西洛再次击败南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西部战场上进一步扩大了战果。同时，巴特勒部在南部战场上，与达维德·法拉格特的舰只配合，于5月11日攻克南部最大的贸易中心和港口新奥尔良。

东部战场上，麦克莱伦虽拥兵十万，仍按兵不动。林肯气愤地撤其陆军总司令之职，仅让他指挥波托马克军团。迫于这种局面，麦克莱伦才开始行动。他制定一个取道约克半岛向里士满实行包抄的计划，并吹嘘“十天内我将进入里士满”。他的计划实际上不可能成功，因为半岛上土质湿软，极不适合带有庞大辎重的大部队的军事行动。

4月初，麦克莱伦部登陆约克半岛。由于路途泥泞，行进十分缓慢，直到5月中才逼进里士满。31日，麦克莱伦在里士满城外“白橡林”同约翰斯顿交战，未分胜负。之后连日阴雨，麦克莱伦决定等待天晴，以发挥其火炮优势，再向里士满发起总攻。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已对此察觉，决定先发制人。

罗伯特·李自知兵力不足，难以支撑旷日消耗，故调兵形成局部优势，于6月26日向麦克莱伦右翼发起攻击。由于托马斯·杰克逊指挥失当，这次攻势受挫。但麦克莱伦却估计南军有10万兵力，匆匆后撤，据阵以待。27日，杰克逊率南军再度向麦

克莱伦的防线正面突击。当夜幕降临时，北军防线被突破。南军全力追击，联邦波托马克军团9万多人顿时溃不成军。“七日战役”中，北军折兵16,000人，攻占里士满计划尽付东流。麦克莱伦的失败，在于他不了解北部进行战争的正义性因而缺乏作战热情，所以未采取以快制胜的战术。南部同盟虽在这次战役中取得了保卫里士满的战略胜利，但为此付出了2万兵力，损失很重。

半岛战役后，罗伯特·李乘胜北上，渡过波托马克河，进入马里兰，欲向纵深突击，以威胁联邦心脏地区。林肯令麦克莱伦前往应战。9月13日，麦克莱伦缴获罗伯特·李关于详述作战方案的191号特别命令，南军意向因而全部暴露。北军迅速抢占两军之间的制高点，李担心南军遭到分割，急忙将分散的各部集中到安提塔姆附近。17日晨，两军对阵，在3英里长的战线上展开战斗。北军兵力为南军2倍。双方列队擂鼓前进，迎面开火。北军火炮优势再度发挥作用，南军死伤惨重。李无法承受巨大损失，18日大败而去。在此关键时刻，昏庸的麦克莱伦竟未追击，使南军安然逃脱。麦克莱伦的严重失职使北部舆论大为愤慨。10月6日，林肯命令他立即渡过波托马克河追赶敌军。但麦克莱伦寻找借口拖延行动。11月7日，林肯终于解除了麦克莱伦对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权。

〔1862年的革命立法〕　随着内战的深入，联邦政府在1862年通过一系列革命立法。

2月25日，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禁止使用军队捕捉及引渡逃亡奴隶的法案，明令“凡违反此规定的任何军官均予免职处分。”[1] 3月10日，参议院也以压倒多数通过这项法案。该法

[1] 威廉·麦克唐纳：《合众国历史法规选1861—1898年》，纽约1922年，第31—32页。

案推动更多的奴隶投奔北方，从而给本来人力不足的南部以沉重打击。

4月16日，国会又通过在哥伦比亚特区禁止黑人奴隶制的法案。这是个局部解放奴隶的措施，它规定由政府以每人300美元的价格赎买所有奴隶，然后一律给以自由。该法案又提出：被解放的奴隶由政府提供旅费移居利比里亚或海地[①]。该法案虽只涉及首都地区，且具有种族歧视的色彩，但对于推进战争形势仍具有积极意义。

5月20日，林肯终于签署了北部人民久已为之奋斗的“宅地法”。该法案规定：凡身为家长，或年满21岁的合众国公民，或决定依照合众国入籍法的规定填写志愿入籍声明书，同时未曾持械反抗合众国政府者，自1863年1月1日起，只需交纳10美元登记费，即可领得160英亩国有土地；在此土地上耕种5年后即可领取土地执照而成为所有者。“宅地法”是1862年国会立法中最具有进步意义的法律，它的颁布不仅堵塞了奴隶制向西扩张的道路，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而且争取到西部人民对北部的广泛支持，更有利于联邦军队在西部战场转入反攻。

6月19日，国会通过的法案，宣布在各准州及未来一切新领地上废除奴隶制，确定黑人子女有受教育权，但对赔偿奴隶主问题未列专门条款。[②] 这项法案进一步限制了奴隶制发展。

7月14日，参议院通过“西弗吉尼亚加入联邦法案”，宣布在接纳西弗吉尼亚加入联邦的同时，在该州有步骤地废除奴隶制；在1863年7月4日后出生的黑奴子女一律为自由人。[③] 这项

---

① 威廉·麦克唐纳：《合众国历史法规选1861—1898年》，纽约1922年，第35—39页。

②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42—43页。

③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56—58页。

局部解放奴隶的法律到12月才告生效。

7月17日，国会通过“没收法案”。规定凡被宣布犯有叛国罪的叛乱者，应处死刑，但可改判5年徒刑或罚金10,000美元；叛乱者的所有动产与不动产均予没收，其奴隶则解放为自由人；授权总统可使用奴隶去镇压叛乱。[1] 这意味着打破了黑人不得参军的旧法规。该法案未规定解放奴隶的具体程序，其实际效用很低。同一天，还通过了“民兵法案”，规定凡逃入联邦军队并为之服务的叛乱者之奴隶，其本人及家属均成为自由人。

1862年国会立法虽然大多是因军事需要而采取的局部解放奴隶措施，有些法律并未得到实际的执行，但其积极意义仍应充分肯定。因为“所有这些法律都在起着打击、削弱、侵蚀、蚕食奴隶制的作用，它们把奴隶制的法律屏障炸开了一道道缺口，逐渐破坏着奴隶制生存的支柱和堡垒。”[2]

〔林肯与《解放宣言》〕　林肯作为个人一直是反对奴隶制的。他始终认为“奴隶制是建立在非正义和错误政策之上的”。[3] 但是，作为总统，制定具体政策时，他却十分谨慎。他坦诚地表明：“我天生是反对奴隶制度的，……然而我从不认为总统职位赋予我的权力是无限的，是可以使我按照自己的判断和感情采取官方行动的。”[4] 但是，“当解决奴隶制的时机到来时，我确信我一定会尽我的职责，哪怕付出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5]

早在1860年总统竞选时，林肯就在共和党政纲中提出不再给奴隶制一寸新的土地。在他当选后，立即面临着南部奴隶主分

---

① 麦克唐纳，前引书，第48—53页。

② 桑德堡：《战争年代的林肯》，第1卷，第578页。

③ R.N.柯伦特：《人所不知的林肯》，纽约1958年，第216页。

④ 斯特恩：前引书，第807页。

⑤ 桑德堡：《战争年代的林肯》，第1卷，第572页。

裂联邦的严峻局面。在这紧要历史关头，社会各阶级的态度极为复杂。林肯处在矛盾冲突的漩涡中心，既受制于大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压力，又担心边界州倒向南部同盟。为此他只提出了维护联邦统一的共同目标，尽可能地团结各种力量共同对敌。随着形势变化，到 1862 年 3 月林肯才提出逐步有偿地解放奴隶的方针。虽然这一方针仍较温和，反映了试图通过和平改良方式解决奴隶制问题的意图，但它的锋芒毕竟是指向奴隶制本身。到 1862 年 6 月，林肯已明确表示，解决奴隶制问题“时刻来到了，它使我感到奴隶制必须死亡，以便国家能够生存。”[①] 7 月，林肯已公开宣称，他将发表“解放宣言”。只是由于半岛战役的失利，他未能将决心付诸实施，又重提战争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摧毁奴隶制。9 月，安提塔姆战役的重大胜利，使林肯终于获得了发布“解放宣言”的机会。9 月 22 日，林肯在内阁会议上宣读了他早已多次修改的“初步解放宣言”草稿，并于 9 月 24 日将“初步解放宣言”公布于世。

“初步解放宣言”首先宣布：在未参加叛乱的四个边界州中，将实行逐步地有偿地解放奴隶的措施。接着宣布：自 1863 年 1 月 1 日起，凡当时仍在叛乱的任何一个州或地区，其境内所有奴隶都应永远获得自由。“初步解放宣言”的发表，在美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应。废奴派领袖威廉·加里森热情地欢呼：宣言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的重要性和善行也使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②] 另一位废奴派人士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兴奋地说：“我们欢呼我们活到召回这正义的时刻了，……哦，‘永远自由’！长期受奴役的千百万人，……你们解放的时刻指日可

---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 867 页。

② 史密斯：前引书，第 292 页。

待了。”[1]

1863年1月1日，林肯正式颁发“解放宣言”。北部人民为此受到极大鼓舞；广大自由黑人更是欢呼雀跃。南部黑人奴隶也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大批逃往北部。南部奴隶主则为之暴跳如雷，谩骂“解放宣言”是“美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骇人听闻的政治罪行，最愚蠢的政治错误”。[2] 欧洲列强也对“解放宣言”报以辱骂和讽刺。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热情支持和欢呼“解放宣言”的发表，英国工人还致信林肯，表达对“解放宣言”的真挚赞美。

“解放宣言”发表后，武装黑人的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广大黑人踊跃参军，战斗激情十分高昂。一位黑人在群众集会上说：“如果我们不参加战斗，就是背叛了上帝、背叛了祖国、背叛了种族、背叛了我们自己。”[3] 到1863年10月，在北部8个州和南部7个州已建立起58个黑人团队，黑人士兵达37,482人。他们充满了对奴隶制憎恨的怒火，战斗顽强，成为一支勇不可挡的力量。

“解放宣言”是联邦建立后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但它仍然存在着许多缺陷。首先，它还不是一个全面解放奴隶的法令，仅对叛乱州有效。再次，它对边界蓄奴州的奴隶制并无具体措施，使之依然合法存在。

〔1863年战局——优势转向北方〕　麦克莱伦被解除波托马克军团司令的职务后，由安布罗斯·伯恩塞德接任，伯恩塞德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攻取里士满，而不是对准罗伯特·李所率领的南军主力。结果是使罗伯特·李得以集中力量来对付他。1862年

---

① 史密斯：前引书，第292页。

② 桑德堡：《战争年代的林肯》，第2卷，第20页。

③ 史密斯：前引书，第313页。

12月13日，伯恩塞德在弗雷里克斯堡战役中被罗伯特·李击败。伯恩塞德因此被革职，改由约瑟夫·胡克将军接任。胡克上任后，继续错误地执行进攻里士满的计划，结果在昌斯勒维尔战役中又一次惨败在罗伯特·李手下。尽管南军赢得了这次战役，却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损失兵力12,821人，“石壁将军”杰克逊亦阵亡。昌斯勒维尔之战是南部同盟在内战中获胜的最后一次战役。此后的战场形势发生变化，优势逐渐转向联邦军队。

罗伯特·李决定在北部开辟战场，他认为只要在北部打一场决定性的胜仗，欧洲列强就会承认南部独立。1863年6月3日，李率军73,000人进军宾夕法尼亚。胡克提议以攻击里士满来对抗罗伯特·李的入侵。林肯否定了这个提议，确定攻击目标应是李军，而不是里士满。但是胡克却以辞职相抗，林肯立即委派乔治·米德接替胡克，令其寻敌作战。南北两军互相探测、捕捉战机。结果于6月30日在葛底斯堡发生遭遇，双方立即交火，终于演成了内战中著名的葛底斯堡大会战。

7月1日，双方正式列阵开战。罗伯特·李认为南军后勤供应不足，应采取主动进攻战术。南军向联邦军防线连续猛攻3日，仍未奏效。3日，南军炮火猛轰联邦军阵地，直至弹药几乎用尽，战场上一片沉寂。南军以为对方火炮已被摧毁，乃以3个师15,000余人发起冲锋。当他们进入开阔地时，联邦军炮火突然轰鸣，南军被密集的炮弹炸得尸横遍野。罗伯特·李再也不能承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只得下令撤退。林肯令米德抓紧追击，力争全歼。但是米德追击不力，李军又一次得以逃脱。

葛底斯堡战役双方损失都十分惨重。李军兵力损失1/3，联邦军队也伤亡23,049人。尽管如此，这次战役对北部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成为内战的转折点，从此南部不得不放弃其进攻战术而转入战略防御。

为了祭奠在这次战役中英勇献身的将士英灵，林肯于11月19日来到葛底斯堡战场，在典礼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他高度赞扬了阵亡将士们为联邦的正义事业捐躯的崇高精神，并勉励人们为完成阵亡将士们未竟事业继续顽强战斗下去，以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存下去。

正当罗伯特·李在葛底斯堡遭到惨败时，在西部战场上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南部同盟的头上。格兰特将军攻克了密西西比河上的重要据点维克斯堡，使联邦军队控制了整条密西西比河，南部同盟的脊椎被拦腰劈为两段。南部同盟再也不能从西部地区得到所需要的粮食和肉类供应，也无法用得克萨斯的棉花向欧洲换取它所需要的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两次大捷，使欧洲列强认识到南部独立已完全不可能，南部同盟陷入彻底孤立。

〔谢尔曼“向海洋进军”〕　1863年秋季，战争的重心已转移到西部战区。格兰特受林肯之命前往田纳西州，指挥查塔努加战役。11月，联邦军一举攻克查塔努加，为进军佐治亚创造了条件。1864年初，格兰特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为了彻底摧毁南部同盟的经济力量，格兰特指示威廉·谢尔曼打到敌方内线去，消灭南军有生力量并破坏其作战资源。

1864年5月，谢尔曼部放弃大部分辎重装备，轻装从查塔努加出发，向佐治亚纵深推进。南军约翰斯顿部企图以设防拖延战术，来阻挡谢尔曼的进军。但谢尔曼也一改以往猛打猛冲的作法，转为迂回作战、绕敌前进，使约翰斯顿不得不撤出阵地，且战且退。约翰斯顿的后退引起戴维斯的不满，改由约翰·胡德接替约翰斯顿。胡德遵戴维斯之命，向谢尔曼连连发动进攻，均遭失败。胡德只得退据亚特兰大。8月底，谢尔曼切断了亚特兰大的铁路线，胡德失去给养而无法困守。9月2日，南部最大的铁

路枢纽和工业城市亚特兰大被联邦军占领。

谢尔曼部休整两个月后，精选62，000名士兵，不带给养，直插南部腹地。11月16日，开始了以萨凡纳为目标的300英里“向海洋进军”。这是一次旨在摧毁敌人后方经济力量和士气的伟大进军。谢尔曼大军横扫佐治亚，所到之处，烧毁存粮，杀死牲畜，捣毁厂房机器，拆除铁路桥梁，无限制征用车辆，意在毁掉一切有用之物。这次破坏性大扫荡，在南部引起极大恐慌。奴隶主们闻风丧胆，纷纷携家逃离。而广大奴隶则把谢尔曼大军视为解放者，表现出无比热烈的情感。据谢尔曼回忆：“黑人们简直快乐得发狂了。他们只要听到我的名字，就都围住我的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高呼和祈祷……”[①] 许多黑人索性跟随谢尔曼大军前进，他们相信这就是走向解放。

谢尔曼向海洋进军几乎未遇有力的抵抗，沿途只是与奴隶主小股武装发生零星战斗，而在华盛顿却有一个多月不知谢尔曼的去向，林肯极为焦虑不安。12月22日，联邦政府终于接到谢尔曼送给“阿伯拉罕大叔和家乡人民的一份很好的圣诞礼物”——谢尔曼大军占领了萨凡纳。“向海洋进军”胜利完成。这在经济上、精神上给南部同盟以决定性打击。南部的重要交通线陷于瘫痪；佐治亚州作为南部主要工业基地遭到毁灭性破坏，使南部同盟的物质缺乏进一步加重。南军再也无法得到充分的粮食供应，士气越发低落，民心动摇。所有这些因素都加速了南部同盟的最终崩溃。

第四节　在战线的后方

〔联邦政府促进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　1860年林肯

---

① 史密斯：前引书，第542页。

当选为总统以后，长期被南部奴隶主占据的总统职位终于转到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手中。特别是内战爆发后，随着南部诸州脱离联邦，一系列有利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逐渐付诸实施。

1861年3月，国会顺利地通过了两年前就已提出的莫里尔关税法。接着国会在1864年又制定了进一步把进口税率提高到47%的关税法，有的项目税率达到100%。实行这些措施既能增加联邦的财政收入，以应付战争开支；又能防止欧洲商品对美国的倾销，从而保证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立发展。

1862年，国会通过的"宅地法"，是实现资产阶级土地纲领的重要步骤，它不仅使奴隶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复存在，而且加速了西部开发，促进了原料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扩大，推行了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1862年7月，国会通过成立"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法案，责成由这两个公司负责修筑横贯大陆的铁路。为了鼓励私营公司向铁路投资，联邦实行补贴制度。在平原地区修筑每英里铁路补助16,000美元，丘陵地区每英里补助32,000美元，山区每英里补助48,000美元。① 铁路公司可无偿地取得铁路两侧20英里内的土地，并有权使用国有土地上的木材、石料等。政府还给予铁路公司特殊的银行信贷条件，颁发特许证，允许铁路享有长期或短期免税特权。由此兴起了修筑铁路热潮。

1863年2月，国会通过"国民经济体系法案"，以整顿银行业的混乱，提供全国通货，并保证政府债券获得稳定的市场。内战开始时，美国共有银行1,562家，分别持有29个州颁发的许可

---

① 福克纳：《美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4年，下卷，第154页。

证，享受五花八门的权利和特权，发行各种流通证券不下7,000种，此外还有5,000种伪钞。[①] 这种情况对资本主义发展显然不利。实行“国民银行法”后，各州立银行相互竞争而造成的币制混乱局面得到相应的控制，保证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金融环境。

1864年7月，国会又通过了“移民法”，并成立一个移民局专管移民事务。该法制定了若干鼓励移民来美定居的条款，如刚到达美国而未加人美国籍者，不能被强制服兵役。“移民法”的实行，使美国获得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仅60年代人境移民就达230万人。“移民法”与“宅地法”互为补充，把吸引移民和开发西部结合起来，既提供了工业赖以发展的原料和劳动力，又扩展了西部的粮仓作用。

此外，联邦政府还采取了开展技术革命、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教育事业等政策。这些政策“为迅速的工业增长奠定了法律基础”[②]，同时保证了联邦取得内战胜利的物质基础。

〔战时北部经济高涨与向西部扩张〕　装备和后勤供应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战双方的军力。对战时物质的需求大大刺激了北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862年后出现了战时经济繁荣。

在工业方面，军械军火、冶铁、毛纺、服装、制鞋、铁路、石油等得到迅速发展。新的工业也不断兴建。仅费城一地，1862年至1864年新建工厂180座。新的技术发明层出不穷。1860年颁发的专利证书为4,363个，到1866年已达8,874个，翻了一番。[③] 铁产量从1861年的73万吨增到1863年的近95万吨。由于

---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上卷，第891页。

② 韦·M·格韦尔：《美国的文明——美国历史》，纽约1957年，第294页。

③ 沃·詹宁斯：《合众国经济进步史》，纽约1926年，第420页。

棉花短缺引起毛纺业兴旺，羊毛消耗量从1860年的8,533万磅骤增至1864年的2.14亿磅[①]。石油增长更为惊人，1859年仅84,000加仑，到1862年已达1.28亿加仑。此外，肉类、炼乳、罐头、蔬菜等食品也应时而兴，发展极快。繁荣的战时工业保证了北部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

在农业方面，也出现了高涨局面。1862年，小麦产量达到了1.77亿蒲式耳的高峰。内战中，北部向欧洲出口粮食的价值达3.3亿美元。这对于促使欧洲保持中立立场起了很大作用。同期的猪肉加工和羊毛产量分别增长了一倍和两倍。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农业机械的不断改进。其中最重要的如麦考密克收割机、阿特金斯自卸收割机、马什联合收割机以及皮特脱粒机等都在内战期间得到广泛使用和不断改进。农业机械既节省了大批劳动力，从而保证了前线的兵员，又使农作物收成不因宕误季节而减产。因此，当时就有人说“战争是麦考密克收割机打赢的。”[②]

早在内战前，加利福尼亚出现的淘金热已给远西部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形成了科罗拉多、达科他、内华达、爱达荷、俄勒冈等领地，有的发展成为州。1862年“宅地法”实施后，又一次激起涌向西部的人流。在整个内战时期，横越大平原前往西部去务农和淘金者多达30万人。

战时经济高涨及向西部扩张，加速了社会财富的集中过程，资本家由此获得了空前的利润。康涅狄格州的一家军火工厂在1862年的红利为30%；新英格兰一些毛纺织厂接受大量政府订货，分红率也达到10%至40%。[③] 联邦政府为了进行战争共发行

---

① A.M.西蒙斯：《美国历史中的社会力量》，纽约1926年，第276页。

② 西蒙斯：前引书，第278页。

③ 菲特和里斯：《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81年，第339页。

公债 28.46 亿美元[①]，银行资本家利用公债投机获得巨大利益，仅杰伊·库克获利就达2,000 万美元[②]。一些企业主利用政府定货之机以劣充好而牟取暴利。军火商哈里斯向政府出售劣质枪，一次就赚得 65 万美元；阿穆尔在一次猪肉买卖中就净挣 200 万美元。还有人甚至与南部进行棉花和武器的走私贸易，或从事海外奴隶贸易。战争中许多企业主和办事人员投机发迹，有些成了百万富翁。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古尔德、库克等超级富翁的财产基础都是在内战中建立起来的。

〔*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及其斗争*〕　　内战期间，联邦政府为了应付战争的庞大开支，采用增加赋税、发行公债和法定纸币等手段大力筹集军费。征税名目繁多，范围甚广，除了对铁路收入、各种交通工具、制造品和银行存款征税外，还对各种生活用品征收消费税，对提货单、保险单、支票及其他证券征收印花税。政府发行公债的利率高达 7%，劳动人民无力购买，大获其利的还是富人。政府发行的绿背纸币不断贬值，造成商品价格急剧上涨，大大超过了劳动者名义工资的增长幅度，1860 年到 1865 年间实际工资下降了 30%[③]。

工人家庭陷入极端贫困之中，他们提出的惟一要求只是物价与工资的平衡。联邦对此未作任何努力，资本家为了聚敛财富，根本不考虑工人的合理要求。工人们只得为了改善基本生活条件而进行罢工斗争。1863 年起，罢工在许多城市展开。仅 1864 年就有约 20 万人参加了各种工会组织[④]。工人运动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大为震惊，各州政府采取了镇压措施来为资本家效劳。

---

①② 比尔德夫妇：《美国文明的兴起》，纽约 1927 年，第 2 卷，第 600 页。

③ 路易斯·M·哈克：《美国传统的形成》，哥伦比亚大学 1947 年，第 2 卷，第 585 页。

④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三联书店中译本 1956 年，第 1 卷，第 518 页。

在这种形势下，亲奴隶主的“铜头蛇”势力又活跃起来。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工人利益的积极维护者，到处活动，大肆进行反战宣传，说什么让战争继续下去，只会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甚至挑拨说，林肯颁布“解放宣言”是以牺牲白人利益去改善黑人地位的。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蒙骗了部分落后工人。但是大多数工人不仅没有轻信谣言，而且与“铜头蛇”进行了坚决斗争。同时，联邦政府也采取镇压措施，严厉打击“铜头蛇”的反革命活动。

1863年3月3日，国会通过了“征兵法”，规定政府将直接征召士兵，凡身体健全，年龄在20岁至45岁的男子均有服兵役的义务；同时规定，只需缴纳300美元，或雇人替换，即可豁免当兵义务。这实际上是只征穷人不征富人的规定。然而，“征兵法”是美国军事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把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每个适龄男子公民都负有这种法律义务。同时，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政府要把战斗进行到底的决心，故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到1863年底北部兵力已达918,000人[①]，充分体现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炽热的爱国热忱。

〔战时南部的状况〕　内战促进了北部经济，而对南部则完全相反。内战期间的南部经济陷于困境，逐步走向崩溃。这是南部自身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南部是个巨大的农业区，主要依靠生产棉花、烟草等大宗商品农作物，同北部和欧洲进行贸易交换，从而获取它所需要的工业制成品来维持经济运转；甚至连所需粮食，也得大量来自俄亥俄河以北各州。过分依赖对外贸易成为其致命弱点。内战爆发后，北部对南部实行严密封锁，切断了南部棉花和烟草的出路，使南部既不能从北部市场也无法从欧洲

① 内文斯：前引书，第2卷，第466页。

市场换取各种必需物品。原来就薄弱的南部工业都转入了军工生产，使南部经济更趋萎缩。

战时南部经济的最大困难是财力不足。南部同盟为了应付繁浩的开支，从 1861 年 3 月起发行小额有息纸币和公债券，此后又一再扩大发行，仅在 1861 年就发行了公债券和纸币各 1 亿美元，到 1864 年底，其纸币流通量已达 20 多亿美元。这造成纸币大幅度贬值，1863 年 3 月，需 60 美元纸币才能兑换 1 美元金币。[①] 经济不景气使公债券难以推销。南部同盟只得实行强硬的重税政策，向南部人民征收所得税、职业税、制酒税和农产品税等。1863 年对农产品征收的税率已是 10%。南部还低价强行征购人民的粮食、马匹、车辆等物资。这些作法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更使南部物资日益枯竭。

粮食匮乏是战时南部的又一大困难。由于粮食进口来源断绝，南部各州不得不大量限制棉花生产而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如阿肯色州限定每个劳动力只生产两包棉花，南卡罗来纳州规定每个劳动力只种 1 英亩棉花，亚拉巴马州对超过棉花生产限额者征收超产税[②]。尽管如此，由于奴隶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加上联邦军队不断向南推进，南部的粮食生产水平难以提高。同时，南部运输工具短缺与破旧，进一步加重了南部粮食供应与分配的失调现象。南军在前线往往由于粮食供应不足而贻误战机，影响战局发展。

兵源日趋枯竭也使南部难以继续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南部同盟为得到兵员补充，1862 年 4 月颁布了征兵法，规定在南部实行义务兵制。在 9 月又补充了豁免奴隶主兵役的条款。这一做

---

① W.E. 伍德沃德：《新编美国史》，纽约 1938 年，第 539 页。

② 查尔斯·A·科尔：《不可抑制的冲突》，纽约 1934 年，第 384 页。

法在南部引起普遍的不满。下层人民纷纷逃避征兵，士兵开小差者日益增多，还多次发生抗征兵役的冲突。南部同盟为了惩处拒不当兵者，悍然停止"人身保护法"，但仍未奏效。据估计，仅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逃避兵役者达15万人之多；在整个内战期间，南军中开小差的士兵也有20万人[①]。南部同盟实力不断衰颓。

南部黑人奴隶的反抗斗争也成为南部同盟的一大心腹之患。战争爆发后，奴隶主将更重的生产负担压在奴隶身上，激起奴隶们的反抗。"解放宣言"发表后，广大奴隶深受鼓舞，斗争更加激烈。有的奴隶举行暴动，有的逃奴从隐蔽所袭击奴隶主。据统计，内战期间，至少发生25次黑人起义或密谋[②]，大约有50万奴隶逃往北部[③]。南部同盟采取种种恐怖手段来制止奴隶反抗或逃亡，他们烧死、绞死起义奴隶，枪击或砍杀逃亡奴隶，把奴隶迁往"安全"地带严加控制。黑人的反抗斗争对南部同盟的最后瓦解起了重大作用。

战时的南部充满了不可克服的危机。生产落后，经济衰退，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财力、物力、人力日趋枯竭，这些内部因素也决定了南部同盟的失败。

第五节　南部同盟的崩溃和内战的结束

〔1864年的总统选举〕　1864年总统选举是在战争状态下进行的，受到激烈的政治斗争及战争形势的影响，呈现出十分复

① 科尔：前引书，第294、298页。
② 刘祚昌：《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58页。
③ 刘祚昌：《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61页。

杂的局面。

当年6月，共和党继续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但因前线状况不佳，格兰特在荒野—冷港战役中无所建树，谢尔曼在亚特兰大前线不断受阻，林肯本人在关于战后南部重建问题上，与激进派发生分歧，在共和派内部产生了一个反对林肯的运动。一个名叫约翰·福布斯的大资本家攻击林肯说："林肯是一个衰弱的总统，他缺乏活力、决心、果敢，由于这些原因，国家受了苦难"[①]。他提出让萨蒙·蔡斯替换林肯当总统候选人。而蔡斯本人也辞去了内阁职务，与一些反对林肯的人结成同盟。一些激进派人士也因林肯否定他们的重建建议而攻击林肯"蓄意侵犯人民的立法权限"，到处鼓动人们重新考虑林肯的候选人资格[②]。

共和党的内部分歧给民主党创造了机会。他们大肆进行反战宣传，煽动对黑人的种族仇恨和对战时物价上涨的不满，并对林肯大肆诋毁。他们甚至提名麦克莱伦为总统候选人。形势变得对林肯很不利，连一些最坚定拥护林肯的人也劝林肯以议和求得妥协，以便争取再度当选总统。但是，林肯坚决否定了这一建议，他认为这种行动无异于投降。

随着前线战局的变化，政治形势渐渐变得对林肯有利。南部同盟总统戴维斯顽固坚持分裂联邦的立场，拒绝议和。这使共和党内反对派和北部民主党人的反战宣传失去了依据和市场。9月10日，谢尔曼在亚特兰大前线连连报捷，又进一步增强了林肯在竞选中的地位。11月8日，林肯终于战胜麦克莱伦，再度当选为总统。

---

① 史密斯：前引书，第516页。

② 史密斯：前引书，第521—523页。

林肯当选后，立即吁请国会考虑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把解放奴隶的措施以宪法形式确定下来。他在12月致国会的咨文中，明确表示了他本人在解放奴隶问题上坚定态度。他说："在我继续留在目前的地位时，我不打算撤回或修改'解放宣言'，也不会把根据这个宣言或国会的任何法案而获得自由的任何人送回去重新当奴隶。"① 为了使修正案在国会获得2/3的多数票，林肯做了大量工作。1865年1月1日，众议院进行最后表决，终于以119票对56票通过。年末，第十三条修正案获得3/4以上州的批准而正式生效。万恶的奴隶制终于被埋葬了。国会还在1865年2月通过了成立自由民局的法案，由该局承担安置管理已获得解放的黑人的职责。

〔南部同盟的最终失败及其原因〕　　内战的进程证实了林肯的预言："戴维斯不可能自愿地重新接受联邦，我们也不可能自愿地放弃联邦。"② 尽管南部同盟在战场上仍顽强抵抗，企图取得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地位；但形势对南军越来越不利。1865年2月，谢尔曼大军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他们从萨凡纳北上，准备横扫南、北卡罗来纳，在敌后打一场经济破坏战，然后在弗吉尼亚与格兰特大军会师。谢尔曼部的恐怖政策，使南部奴隶主胆战心惊，望风披靡。17日，谢尔曼进占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次日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查尔斯顿。3月16日，约翰斯顿试图在北卡罗来纳拦截谢尔曼部，两次受挫。4月中旬，谢尔曼攻克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胜利完成了第三次大进军。

与此同时，格兰特大军在波托马克河战区也不断取得新战果。1865年3月中旬，格兰特的115,000大军已把罗伯特·李的

---

① 斯特恩：前引书，第834页。

②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925页。

54,000人围困在彼得斯堡。南军作最后抵抗，仍无法招架联邦军的强大攻势，不得不于4月2日撤出彼得斯堡。里士满陷入一片混乱，奴隶主们纷纷携眷逃窜。4月3日，联邦军队终于开进了被叛乱集团盘踞近4年的里士满。

罗伯特·李试图与约翰斯顿会合后继续顽抗，但前后都被联邦军堵住。4月8日，罗伯特·李的残部在距里士满80英里的阿波马托克斯小村被7万联邦军队包围。这支残军仅3万人，弹尽粮绝，完全丧失抵抗力量。罗伯特·李见大势已去，遂于4月9日向格兰特投降。这意味南北战争的军事对抗基本结束。至5月末，南军最后一支部队在新奥尔良投降。内战终于以北部彻底胜利而告终。

历时4年的内战以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他们从此巩固地掌握了联邦政权，合众国的完整性得以保存，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奴隶制度被扫除，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美国工业在30年内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南部同盟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南部奴隶主阶级逆历史潮流而动，无论在人心所向，还是在物质基础方面，都不能与北部相匹敌。南部的奴隶主寡头政治难以形成卓有成效的政治机构，更缺乏精明睿智的政治家。南部军事将领是一些视野狭窄的旧军人，不了解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更不善于采用先进的参谋体制和战争手段。所有这些不利因素本质上是南部的反动社会制度所造成的。

〔林肯被刺及对林肯的历史评价〕　罗伯特·李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后的第三天，林肯发表了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他重申了对南部重建问题的意见和政策，其主导思想就是要对失败的南部采取宽大的政策。他提出南部只要有10%的白人举行忠诚宣誓并组成州政府，即可重新加入联邦。林肯甚至拒绝逮捕

内战元凶戴维斯及其内阁成员，并主张不要迫害或杀害过去的敌人。

然而，失败的南部奴隶主并没有对林肯的宽容表示感激。相反，他们因失败而仇恨倍增。1865 年 4 月 14 日，林肯召开了他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决定取消对南部的封锁。当晚，林肯偕夫人来到福特剧院，参加庆祝胜利的晚会。当林肯走向包厢时，在场的一千多名观众起立热烈鼓掌和欢呼。就在林肯观看演出时，一个顽固支持南部叛乱事业的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混进了林肯的包厢，在背后向林肯射出了罪恶的子弹。翌日清晨，林肯在邻近剧院的一家私人寓所内与世长辞。陆军部长斯坦顿以极端悲痛的心情说："他现在是属于所有时代的人物了。"

林肯逝世在国内外引起巨大悲痛和震动。150 万人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林肯的遗容，自动出来致哀的人达 700 多万。许多国家的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也纷纷举行哀悼仪式，发表演讲和宣言，表达对林肯的敬仰和怀念，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吊唁信中也对林肯作了崇高的评价。

林肯受到如此广泛的崇敬与赞美，确实当之无愧。他在美国自由劳动制度与奴隶制度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领导美国人民进行一场维护进步与统一的斗争，平息了奴隶主的叛乱，消灭了奴隶制度，推动了美国社会的发展。

林肯坚持奉行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倡导"民有、民治、民享"，其思想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光辉。他坚定不移地反对奴隶制度，"解放宣言"这一废除奴隶制的历史文献，已永远同林肯的名字联在一起了。

林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伟大的政治家品质。他不仅善于审时度势，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政策；而且能倾听人民的意见，从而在内战中能调动各方面力量，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逐步

引导斗争走向胜利。

林肯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他勤奋好学、谦虚诚实、克己奉公、平易近人等优秀品质，博得人们的普遍尊重和敬仰。

林肯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不可避免地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例如，他反对奴隶制度，但最初不愿无条件地解放黑人，最终也未从经济上给奴隶以彻底解放，还打算将“解放了”的黑人送往国外。尽管如此，在内战时期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林肯为达到革命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顺应了历史潮流，不失为一位建树甚丰的伟人。总之，他以其杰出的历史贡献，在美国历史上，直与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齐名。

第 二 章

南部的重建

内战摧毁了奴隶制，美国历史进入重建时期。重建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南部各州如何返回联邦，实现统一；二是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应有的权利和地位是什么。

林肯遇刺身亡后，继任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推行了一套更为宽大的重建纲领。南部各州（除得克萨斯外）据此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基础上建立起由南部同盟旧官员控制的州政府。这种保守政策遭到共和党激进派和人民的坚决反对。1867 年 3 月，国会通过激进重建纲领，对南部各州实行军事管制，进而建立民主政权，并实施一系列民主改革。然而，北部资产阶级地位的日益稳固导致共和党妥协倾向加强，加之两党在全国范围内势均力敌的局面再度形成，结果造成 1877 年南、北妥协。重建遂以牺牲黑人利益、民主党在南部重新执政而告终。

重建后南部农业中盛行的谷物分成制和工业经济的畸形发展，使南部对北部垄断资本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并在不同程度上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重建后，种族势力也再度抬头。南部各州相继制订一系列法律，致使黑人选举权名存实亡。种族隔离也日趋严重，使黑人的处境雪上加霜。在寻求黑人的出路的斗争

中，塔斯克基运动所倡导的黑人自救路线独树一帜，颇有声势。但种族问题仍然是南部一大痼疾。

第一节　约翰逊重建纲领及其实践

〔林肯重建计划与韦德—戴维斯法案〕　内战后期，共和党内各派已开始考虑对战后南部各州的处理和改造问题。保守派认为，只要南部各州停止分裂和叛乱，废除奴隶制，服从宪法并承认联邦统一，即可恢复其在联邦中的合法地位。激进派则认为，南部各州发动叛乱，已自绝于联邦，丧失了“州”的地位；应作为被征服的省份加以管制，对其主要头目和骨干分子应严厉惩办；必须剥夺叛乱分子的选举权，保证黑人选举权，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州政权方可加入联邦。

林肯作为整个北部资产阶级的代表，始终坚持他对解决南北冲突的一贯立场，即以最大限度的宽容来取得南北和解、恢复联邦统一。1863年12月8日，林肯发表《重建与大赦宣言》，提出了他的南部重建纲领。其中包括三个要点：其一是除了南部同盟重要官员和重要军官(陆军上校、海军上尉以上者)、叛乱中罪行严重者和联邦政府军队的叛离者外，其他参与叛乱者在宣誓效忠联邦并承认废除奴隶制后，即可获总统大赦，并恢复其除奴隶外的一切财产权。其二，宣誓效忠的人数不少于1860年的10%时，即可举行选举，产生新的州政府和参加国会两院的议员。其三，新的州政府只要撤销分离决议，承认联邦统一并废除奴隶制度，即可恢复在联邦的平等地位和正常关系。根据这个纲领，大多数叛乱者都将得到赦免并获得政治权利；奴隶主的财产基本上得到保存；而广大黑人既未获得土地也没有选举权，仍处在听任宰割的地位。

林肯重建计划在路易斯安那、阿肯色、田纳西等州付诸实施后，立即遭到激进派的坚决抵制和反对。1864年5月至7月，国会众参两院先后通过激进派重建法案即韦德—戴维斯法案。该法案比林肯重建纲领前进了一步。它提出南部各叛乱州不存在合法政府；各州进行效忠宣誓、组成新政府，制定新宪法的选民基础必须是多数而不是10%；剥夺南部同盟旧官员的选举权和土地所有权。但是，这个法案同样没有赋予黑人以选举权和土地所有权。即使如此，林肯依然否决了这一法案。法案的起草者本杰明·韦德和众议员戴维斯立即发表联合声明，指责林肯是侵犯人民立法权的"独裁者"。同时，国会拒不承认路易斯安那等州政府的合法性，不许它们的代表进入国会。于是，总统与国会在重建问题上的斗争日趋明朗化。由于战争尚未结束，共和党又面临着1864年选举，这场斗争暂时地平息了。

〔约翰逊及其南部重建纲领〕　1865年4月15日，即林肯遇刺身亡的当天，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宣誓就任总统。约翰逊原是田纳西州的政治活动家，曾任国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代表南部小农的利益，呼吁废除奴隶主寡头政治。内战爆发后，他站在反对叛乱、维护联邦统一的立场上，成为南部叛乱州惟一忠于联邦的参议员。约翰逊曾多次主张严惩叛乱分子，没收并出售他们的大地产。他的立场赢得北部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1864年被林肯挑选为副总统。当时激进派也把改变林肯重建计划的希望寄托在约翰逊身上，甚至认为由他继任总统是"一件意外的幸事"[①]。然而，约翰逊反对奴隶主寡头政治的出发点，只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南部小农的利益。内战结束后，美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约翰逊却看不到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联

---

① J.G. 兰德尔和戴维·唐纳德：《内战与重建》，波士顿1961年，第568页。

邦权力日益集中的必然趋势，依然墨守19世纪初杰斐逊—杰克逊“以农立国”的旧传统，幻想恢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同时，约翰逊保留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认为黑人地位提高是对白人小农的威胁。因此，他不惜以牺牲黑人利益与战败的南部种植园主谋求和解。

1865年5月29日，约翰逊公开发表《大赦宣言》。宣布按照林肯的《重建与大赦宣言》，除了不予赦免的14种人外，一切直接或间接参加叛乱者概予赦免，并恢复其除奴隶之外的一切财产权。《大赦宣言》与林肯重建计划有着明显的继承性。不同之处在于，它不赦免拥有纳税财产2万美元以上的叛乱者；同时，它赋予总统以特赦权，对于不在大赦之列者，提出特别申请后，总统有权予以特赦。这说明约翰逊的重建政策比林肯的更为宽大。事实上，约翰逊几乎宽恕了绝大部分南部叛乱者。《大赦宣言》发表后，提出特赦要求的人约有15,000，其中获得总统特赦者竟达13,500人，占申请总数的90%。而在被特赦的总人数中，纳税财产在2万美元以上者又达50%。可见，约翰逊关于不予特赦的14种人的规定只是纸上文章。尤其是，约翰逊在一项指示中明确提出，对于“有罪的黑人”一个也不予赦免；而各州的制宪大会代表则应完全由白人选出[1]。这表明约翰逊对黑人怀有强烈的憎恨和敌对情绪。

约翰逊为了避免国会干预，利用1865年国会休会期间加紧推行其重建纲领。在《大赦宣言》发表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先后发表了有关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密西西比、得克萨斯、亚拉巴马和佛罗里达7个州的重建宣言，并任命了各州的临时州长（其他4个南部州已在林肯任内得到承认）。各州也积极执行

---

① 佩奇·史密斯：前引书，第669—670页。

约翰逊的重建纲领。到1865年末，这些州在根本不让黑人参与的情况下，产生了州宪法、议会和政府，选出其参加国会的参众议员。这些州政府和立法机构基本上操纵在南部同盟旧官员和种植园主手中。它们选出的国会议员中，包括原南部同盟的副总统1人，将军4人，上校5人，内阁成员6人，国会议员58人。[①]南部同盟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原关押在狱，获特赦4个月后，即被佐治亚州选为联邦国会参议员。这些事实证明，约翰逊的重建计划"几乎是根据前南部同盟各州所坚持的条件重新接纳它们进入联邦。"[②]

南部各州新宪法虽然宣布撤销"脱离法案"，废除奴隶制度。但在批准联邦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时，许多州都迟疑不决或提出各种保留条件，试图否认黑人的平等权利和国会关于黑人政治地位的立法权限。在第39届国会开幕前，仅亚拉巴马，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4个州批准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南卡罗来纳还附带声明说：国会关于黑人政治地位的任何立法企图都是违宪的。其他一些州也对此提出保留条件。而密西西比州在修正案生效前一直未予批准。

〔"黑人法典"和三K党〕　约翰逊重建纲领在南部各州的实施，一度造成南部政治出现倒退和反动。逃亡的种植园主纷纷返回故地，夺取被黑人分掉的土地，向政府索取被没收的财产。到1867年2月，联邦政府退还给种植园主的地产和其他财产总值达20亿美元。各州在批准第十三条修正案的同时，都先后制订了以战前奴隶法典为蓝本的"黑人法典"。"黑人法典"以限制黑人自由和民主权利，达到继续保持白人对黑人种族统治的

---

① W.A.杜波依斯：《美国黑人的重建》，纽约1917年，第260—261页。

② 史密斯：前引书，第670页。

目的。在政治方面，黑人没有选举权、参政权和陪审权，也无权出庭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在经济方面，黑人不得拥有土地，无权自由选择职业和从事独立的经济活动，只能根据合同继续在种植园主的土地上从事强制性劳动；黑人在合同期满前不得擅自离去，否则将因“流浪罪”而遭拘捕，并为种植园主提供无偿劳动。在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利方面，黑人无权自由迁徙和选择居住地点，有些州还专门划定了黑人居住区，并实行特别通行证制度；严禁黑人与白人通婚，违者将被判“重罪”或受到终身监禁。在这方面的隔离规定，此后又演变为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劳法”[1]。

在黑人居多数的各州，“黑人法典”更为严酷。南卡罗来纳州“黑人法典”规定，黑人除根据劳动合同在种植园的土地上从事耕作外，一律不准从事医务、艺术、工商业及其他行业或职业。有的州甚至规定，黑人不得随意接近白人，也不得以表情、语言和行为“侮辱”白人；而雇主则有权对黑人实行体罚和鞭笞。失业黑人游民随时可能遭到罚款或监禁的惩处。

“黑人法典”在实际上否定了黑人的解放，拒不承认黑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使种植园主能够继续奴役黑人。它用法律手段把黑人束缚在种植园的土地上，为种植园保证了廉价劳动力。“黑人法典”不是一种临时性的过渡措施，而是种植园主妄图长期奴役黑人的永久性措施。

南部各州在制定“黑人法典”的同时，还纵容白人种族主义者建立各种恐怖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三K党[2]。三K党最早出现在1866年夏，由原南部同盟6名退伍军官在田纳西州的普拉

---

① “吉姆·克劳法”是19世纪末南部各州制定的种族隔离法的总称，参看本章第四节。

② 三K党是英文Ku Klux Klan的缩写，原是希腊文“党派”之意。

斯基所建立。不久即扩展到亚拉巴马、南、北卡罗来纳及其他南部各州，成为美国历史上活动最广泛、手段最残酷的恐怖组织，也是南部民主党所支持的半军事组织。三K党有一套自上到下的严密组织系统，其骨干分子大多是前同盟官兵，他们怀着复仇的心理，采用种种手段，企图迫使已获解放的黑人就范。

在约翰逊任内，三K党和南部反动势力迫害、杀戮黑人和激进派的事件屡见不鲜。1866年4月，孟菲斯发生黑人与当地警察的冲突，白人暴徒借机向黑人居住区发动疯狂袭击。在持续3天的烧杀劫掠中，46名黑人被杀，80多人受伤，9家黑人住房和12所学校被焚毁，价值10万美元的黑人财产被付之一炬。[1]同年7月，在新奥尔良发生一起更为骇人听闻的残杀黑人事件。当地黑人和激进派举行反对“黑人法典”的群众大会，突然遭到由前同盟将军谢里夫率领的大批白人暴徒袭击，与会群众“像猎物一样地遭到屠杀”，结果48人死亡，160多人受伤[2]。南部其他地方也不断发生类似的流血事件。

南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力恐怖，激起广大黑人和北部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不断向约翰逊政府告急，要求惩处恐怖组织，保护黑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约翰逊政府对这些呼吁置之不理，对三K党恐怖活动也无动于衷。约翰逊的这种为虎作伥态度，使南部反动势力气焰更为嚣张。重建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第二节　激进派反对约翰逊重建纲领的斗争

〔南部黑人争取基本权利的斗争〕　以民主方式满足黑人

---

① 史密斯：前引书，第707页。
② 史密斯：前引书，第708页。

的土地要求，不仅是保证黑人基本权利的前提，也是南部民主改革的关键。1865年国会通过立法建立的“自由民局”，归陆军部领导，原定期限为内战结束后一年为止，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救济、安置和监护黑人与白人难民，向黑人出租无主土地。但是，这个机构根本无力解决黑人的土地问题。因归它管理的土地总数仅10万英亩，而且有一部分用来资助铁路公司及其他土地投机者。因此，刚刚获得人身解放的黑人，只有通过自己的斗争来取得土地和其他权利。

1865年秋以后，各地黑人普遍拒绝与种植园主签订劳动合同。在一部分激进派的鼓动下，他们要求每人分到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南部各州不断发生自发占地事件以至小规模武装冲突。在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附近，数千名黑人在内战中自发分掉了逃亡奴隶主的土地，并在当地定居下来。1865年夏，这部分黑人举行代表大会，要求政府承认他们对业已分得土地的所有权。他们还积极准备进行武装斗争，结果被政府镇压下去。

当时黑人斗争的另一个突出事例，就是南卡罗来纳州埃狄斯托海岛上黑人保卫土地的斗争。1865年1月谢尔曼将军曾发布战地命令，将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沿海岛屿定为黑人自由民居住区；每户黑人可分得被没收、被弃置的耕地40英亩。由此在沿海岛屿与沿岸30英里之内定居的黑人约有4万名。约翰逊重建纲领实施后，逃亡奴隶主纷纷返回原地，要求黑人退还土地。黑人们决心保卫已分得的土地，要求联邦政府承认黑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并且使用一切可能得到的武器将自己武装起来。约翰逊总统竟不支持黑人的正当要求，却派自由民局局长奥利弗·霍华德随同两个大种植园主来到埃狄斯托海岛，向黑人讨还土地。种植园主的无理要求遭到黑人的严词拒绝，一位黑人领袖要他们

"回到查尔斯顿去……用自己的劳动谋生"[1]。此后，武装起来的黑人两次赶走前来海岛帮助种植园主索还土地的部队，海岛形势的尖锐化，使政府不得不派遣联邦军队去控制局势。国会激进派也曾多次提出没收大地产、将土地分给黑人的方案，但终未得到共和党的多数支持。其原因在北部资产阶级害怕没收种植园土地会影响北部私有制的稳定，从而危及其自身利益；为数不少的共和党人已成为南部的大土地所有者。史蒂文斯、萨姆纳等人曾多次呼吁，仍无济于事。同时，由于海岛黑人誓死不肯放弃已获得的土地，国会只得在1866年7月通过法案延长自由民局的存在期限并扩大其权限。尽管约翰逊一再否决，国会还是通过了解决海岛土地纠纷的妥协方案。根据此方案，联邦政府确认黑人在该地区已占土地的所有权；以低价向被剥夺土地所有权的黑人出售公有土地，或者黑人以先租后购的方式得到土地；在黑人收割之前，种植园主不得收回土地。该法案是重建时期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最民主方案，它是海岛黑人为保卫土地所有权而勇敢斗争的结果。

南部黑人还展开了反对约翰逊重建纲领和种族压迫政策的斗争。1865年至1867年间，他们广泛举行集会、递交请愿书等，揭露和控诉南部各州歧视压迫黑人、特别是三K党迫害黑人的严重罪行。在1865年11月南卡罗来纳州黑人代表会议交国会的备忘录中，强烈抗议"黑人法典"的出笼，要求全面维护黑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正当权益。它要求给黑人以平等的选举权，保证黑人享有就学、信教、办报、集会以及参加陪审团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享有自由出卖劳动力及从事农业、商业、贸易等各种经济活动的权利[2]。1866年初，黑人领袖道格拉斯代表

---

① 詹姆斯·艾伦：《美国改造时期》，纽约1937年，第61页。

② 艾伦：前引书，第228—229页。

20个州的黑人会见约翰逊，强烈要求给黑人以选举权。但是约翰逊总统借口防止“种族战争”，拒绝了黑人的正当要求。

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黑人争取权利的斗争取得了成效。《大赦宣言》发布后，里士满的旧官员大批恢复原职。他们颁发黑人特别通行证，并下令关闭刚刚办起的黑人学校。1866年7月，里士满黑人集会抗议当局的反动政策，并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抨击了当局的倒行逆施。在黑人的顽强斗争之下，里士满市长被迫下台，某些压迫黑人的法律亦被取消。这次斗争在各地黑人争取民主权利的浪潮中十分突出，因而影响亦很广泛。

有些州的黑人在联邦军队黑人团队的帮助下，建立了以退伍士兵为核心的黑人民兵组织，同三K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经常给三K党恐怖组织以报复性打击。但这时期黑人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和平的合法斗争，个别地区的武装斗争仅仅是合法斗争的补充形式。

〔国会激进派的力量增长〕　在南部重建问题上，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分成三个政治派别：保守派、激进派和温和派。

保守派主要是那些与南部种植园经济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商业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畏惧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担心自己在南部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因此，他们支持约翰逊的重建纲领，谋求与南部种植园主的和解。

激进派则是新兴的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1]。在政治上，他们要求维护共和党人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在经济上要求奉行

---

①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是宾夕法尼亚的钢铁制造商，与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有密切联系。罗斯科·康克林（第十四条修正案起草人之一）是银行家和金融集团的律师。本杰明·韦德同西部制造商和羊毛厂主有密切联系。查尔斯·萨姆纳则是纺织工业和公债券持有者利益的代表。参见肯尼恩·M·斯坦普：《重建时期，1865—1877年》，纽约1965年，第95—96页。

保护主义的高关税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保护制造商和公债持有者的利益。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把选举权给予南部黑人并得到他们的选票支持，才能削弱民主党人的政治势力，防止他们在国会中东山再起；进而保证共和党有效地控制联邦政权，推行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的政策。史蒂文斯警告说，没有黑人的选举权，南部的低关税政策将卷土重来。萨姆纳则说得更明确，认为黑人是推行激进派政策最可靠的保证，因而要利用他们。[①] 可见，激进派之所以主张赋予黑人选举权，固然出于民主信念，而这种信念的真正出发点并不仅仅是为了黑人的权利，而是牵涉到北部资本的自身利益。

温和派是介于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一个不稳定集团。他们既担心南部民主党人与北部民主党人联合而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又不愿意恶化同约翰逊总统的关系。故在许多问题上取折中、调和的立场。由于这是当时国会中最大的一个派别，所以他们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约翰逊刚开始推行其重建纲领时，激进派在国会中仍是少数。仅仅有史蒂文斯、萨姆纳和韦德等少数人意识到这个纲领的危害性及同约翰逊斗争的重要性。而大多数共和党人（包括许多激进派人士）对约翰逊总统仍抱有幻想，在激进派与总统斗争时，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温和派领袖卡尔·舒尔茨在要求约翰逊承认黑人应获选举权的同时，又劝萨姆纳等人不要与总统决裂。甚至连激进派人士约翰·福布斯也表示充分相信约翰逊，认为他仇恨奴隶主贵族统治，不会允许寡头政治重新复活并支配政权。[②] 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议员核心小组还竭力主张总统和国会

---

① 斯坦普：前引书，第96页。

② 同上书，第84页。

“双方放弃各自的极端主张”，一致制定温和的长期性重建措施。上述情况说明，在重建问题上，激进派还未能控制国会的多数。直到 1866 年 2 月，约翰逊否决了关于延长自由民局存在期限的法案时，国会还无法取得 2/3 的多数票来驳回总统的否决。

然而，约翰逊的重建纲领导致南部政治形势逆转，特别是制定“黑人法典”、否决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以及三 K 党的猖狂进攻等恶性事件的出现，使国会多数共和党人开始向激进派靠拢，从而改变了国会的力量对比。他们认识到，重新执政的南部各州民主党人，根本不肯承认内战的结局和黑人的解放；而约翰逊的重建纲领只能助长南部形势恶化，进而导致民主党人重新取得联邦政权。约翰逊在政治上的狭隘固执，性格上的刚愎自用，也引起了温和派共和党人的反感。一些有影响的温和派代表人物莱曼·特朗布尔、约翰·谢尔曼等，也认为约翰逊背叛了他们。约翰逊甚至歇斯底里地对激进派进行人身攻击，结果是适得其反，使自己空前地孤立起来。1866 年国会选举中，激进派取得决定性胜利，稳固地掌握了两院的 2/3 多数票。

〔公民权利法案与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1865 年 12 月 4 日，第 39 届国会正式召开。这时南部各州按照约翰逊重建政策选出的代表已在叩击国会的大门。但是，由于激进派和温和派的抵制，国会参众两院均拒绝接纳南部代表。在史蒂文斯的倡导和温和派的支持下，12 月 26 日，由 9 名众议员和 6 名参议员组成国会联合重建委员会，其主席是威廉·弗森登，但真正起领导作用的是史蒂文斯。委员会的任务是对南部政治局势和各州的重建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就南部各州选出的国会议员进入国会等问题提出报告。名义上这是一个咨询机构，实际上是国会领导重建工作的核心组织。保守派吉迪恩·韦尔斯称之为激进派的“中央

理事会”。[1] 同时，国会还作出一项重要决议，强调重建的领导职责属于国会的权限，而不在总统职权范围之内；总统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是临时性的。国会的上述措施不仅挫败了约翰逊立即接纳南部各州重返联邦的计划，否认了南部各州政府的合法性，而且使约翰逊失去了控制重建工作的领导权。

针对南部诸州剥夺黑人权利的“黑人法典”，参议员特朗布尔在 1866 年 1 月提出了公民权利法案。法案规定，除了不纳税的印第安人以外，合众国所有合法居住者，不论其种族、肤色和居住地点，亦不论是否曾为奴隶，一律被认为美国及其所在州的公民，并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任何州和任何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法律、命令、惯例等为借口来剥夺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凡违反该法案者均属犯罪行为，应受到罚款或监禁。政府有权在必要时使用武装力量来保证法案的实施。经过一系列激烈辩论，国会两院终于在 3 月 14 日通过该法案。约翰逊总统借口法案“偏袒”黑人，“侵犯州权”和干涉劳资关系而加以否决。但是国会在 4 月 9 日又以 2/3 多数驳回了总统的否决。这就为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制定铺平了道路。

在公民权利法案的基础上,4 月 30 日史蒂文斯以联合重建委员会的名义在众议院提出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国会两院经过一个多月的辩论,于 6 月 13 日通过修正案,交与各州批准。最后通过的修正案删去了原草案中关于无条件地、普遍地赋予南部黑人选举权的要求,但在总体上仍体现了公民权利法案的基本精神。

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的所有合法居住者都是美国公民，各州不得制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的特权与豁免权之法律,也不得剥夺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各州在国会的众议

---

① 杜马·马隆编：《美国传记词典》，纽约 1961 年，第 5 卷，第 85 页。

员名额根据其人口进行分配;剥夺部分叛乱者的参政权;宣布南部同盟和各州的战争债务无效,也不得因丧失奴隶而付与奴隶主任何补偿。修正案实际上对南部的政治重建作了总的政策规定。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不仅对重建具有重要意义，且对美国此后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作用。首先，修正案未对黑人选举权作出无条件的规定，却在第二款中含有另一层语义即南部各州如宁愿减少在国会中的代表名额，即可合法地剥夺黑人选举权。同时各州的所谓“正当法律程序”，为剥夺黑人的其他权利留下了一条“合法的”后路。其次，修正案对所保护对象的用辞不是“任何公民”而是“任何人”，这既可被解释为“自然人”，也可是“法人”。因此这项条款后来被司法机构用作保护垄断企业的法律依据，因为任何一个公司都是“法人”。事后，修正案起草人之一、众议员约翰·宾厄姆在国会演讲中直言不讳地承认使用这一措辞的目的就是为了铁路公司的利益。[①] 因此，这项表面上保护南部黑人生命财产的条款，却成了大公司的护身符。1868 年至 1912 年，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判处的 604 个案例中，有关公司法人的达 312 件，而涉及黑人权利的仅 28 件，其中的 22 件判决不利于黑人。

即使如此，约翰逊总统仍然抵制修正案，并怂恿南部各州拒绝批准。除了激进派共和党人控制的田纳西州以外，南部各州以得克萨斯首先发难，先后作出决议否决第十四条修正案，直至 1868 年实行南部军管后才予以批准。

〔激进派重建纲领的产生〕　1866 年国会选举后，激进派稳固地掌握了两院的 2/3 多数。1867 年 2 月，史蒂文斯以重建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第一个激进派重建方案，旋即在众议院通过，

① 比尔德夫妇：前引书，第 2 卷，第 111—112 页。

但在参议院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激进派被迫作出让步后，才于 3 月初获得通过。此方案主要内容是：否认除田纳西州以外的南部各州政府的合法性；将南部 10 州分为 5 个军区，实行军管，在合法政府建立前，由军区司令执掌行政与司法权；剥夺一切叛乱分子的选举权和参政权；由不受种族、肤色和过去社会地位限制的选民选举产生制宪代表大会，以合众国宪法为依据制定或修改州宪法；各州根据新的州宪法产生议会和州政府，在州议会批准第十四条修正案，州宪法获得国会承认以后，即可派代表出席国会参众两院，军管遂告结束。

同一天，国会还通过了官职任期法案和军队指挥权法，旨在限制总统权力、保证重建方案的实行。前者规定，未经参议院同意，总统无权罢免在参议院赞同下已任命的政府文职官员（包括内阁成员），也不得擅自任命新官员；否则总统即被认为犯有“重罪”。在此前，宪法并未明确规定政府官员的任免权限，而根据惯例总统可享有任免权。激进派提出这项法案，是为了防止总统破坏激进派重建，尤其是保护惟一支持激进派的内阁成员、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军队指挥权法案规定，总统不经过陆军上将（当时是尤利塞斯·格兰特），无权向军队直接发布命令和指示；未经参议院同意，亦无权罢免或停止陆军上将的职务。这项法案进一步架空了总统，以至取消了宪法赋予总统作为陆海军统帅所享有指挥军队的权力。这两个法案与第一个重建法案配套，为实行南部军管准备了条件。

第一个重建法案是激进派共和党人在南部进行民主重建的纲领性文件。它较严格地限制了南部叛乱者的选举权和参政权，同时无条件地承认了黑人的政治权利，在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广大黑人中得到了热烈的拥护。而约翰逊对这个法案的否决，以及国会以 2/3 多数推翻总统否决，说明激进派与总统间的矛盾无法获

得妥协。

第一个重建法案缺乏方法、步骤上的具体规定，所以国会又先后通过三个补充性的重建法案。1867 年 3 月，第二个重建法案规定，各州军管当局首先进行选民登记和宣誓，在多数选民赞同的基础上，召开制宪大会并通过州宪法。同年 7 月，第三个重建法案规定由选民登记官审查和确定选民资格；各州临时政府必须服从军管当局和国会的最高权威；军区司令有权罢免不效忠联邦的州级官员。1868 年 3 月，第四个重建法案规定，南部各州新宪法只要得到实际参加投票人数的多数票支持即可生效。上述补充法案都曾遭到约翰逊总统的否决，国会又都以 2/3 多数再次通过。

1867—1868 年国会制定的一系列重建法案及其他有关补充法，全面确定了激进派共和党人的重建纲领及具体计划。它们标志着激进派在与总统的斗争中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映了整个阶级力量对比中，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居于优势地位。而南部的白人小农势力单薄、软弱无力；种植园主尚无东山再起的条件。于是，整个局势控制在激进派手中，它的重建法案因而得以迅速推行。

〔激进派弹劾约翰逊总统〕　约翰逊总统对激进派重建纲领及其补充法案极为不满。他认为这些法案均属违宪，应诉诸最高法院，并采取反击措施。

1867 年 6 月，约翰逊不顾军队指挥权法的规定，直接向南部 5 个军区发布旨在削弱司令官权力的命令，以加强各州政府权力。接着又陆续解除或调离了所有同情和支持激进派的军区司令。例如，他以自己的追随者、南部同盟的同情者温菲尔德·汉考克接替了菲里普·谢里登，后者在任第五军区司令时深得民心。

1867 年 8 月，约翰逊无视官职任期法，下令“停止”惟一

支持激进派的内阁成员、陆军部长斯坦顿的职务。斯坦顿在萨姆纳等人支持下拒绝离职。约翰逊则坚持由格兰特担任临时陆军部长。12月，约翰逊将任免陆军部长的决定送交国会。参议院在1868年1月正式拒绝了约翰逊总统的决定。格兰特此时看到形势突变，也改变了支持约翰逊的态度，立即把陆军部长职务重新交给了斯坦顿。约翰逊对格兰特的这一行为极不满，双方关系急剧恶化，格兰特遂倒向了激进派。约翰逊不甘失败。1868年2月，他再次任命洛伦佐·托马斯少将为临时陆军部长。托马斯受命强行接管陆军部，斯坦顿拒不离职，约翰逊控制陆军部的计划亦告失败。

约翰逊无视国会立法，尤其是两次无端下令免除斯坦顿的行动，极大地激怒了大多数共和党议员。因此，准备对约翰逊发动弹劾。约翰逊对此表示蔑视，并且在其年度咨文中宣布，他"将不得不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且将不顾一切后果地维护这种权利"。[①] 在这种形势下，众议院于1868年2月24日以126对47的压倒多数票决定立即发动对约翰逊的弹劾，并组成了以史蒂文斯为首的七人委员会。3月初，众议院通过该委员会提出的弹劾文件，其中列举了11项罪状，主要是蓄意违反"官职任期法"，罢免斯坦顿职务；对抗人民意志，反对国会重建工作等等。

3月5日，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萨蒙·蔡斯主持下，参议院开始审理弹劾案。审理过程历时两个多月，以司法部长亨利·斯坦伯利为首的4位著名律师为约翰逊总统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他们提出两个主要论点：其一，官职任期法禁止总统免职的内阁成员是由现任总统任内所任命的官员，而斯坦顿是由前任总统林肯任命的，故不在官职任期法的有效范围内，有关条款不适用于

① 斯坦普：前引书，第149页。

约翰逊。[1] 其二，官职任期法本身是否合乎宪法仍未经最高法院裁决，因而不能根据此法来指控约翰逊违宪。[2] 5 月 16 日和 26 日，参议院对弹劾案进行两次表决，票数为 35 票对 19 票，[3] 因差一票不足法定的 2/3 多数，约翰逊被宣告无罪。

激进派对总统的弹劾虽未成功，却借机扩大了影响，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为共和党在 1868 年总统竞选中获胜提供了有利地位。参议院对约翰逊的审理尚未结束，共和党就召开了全国大会，提出以民主重建为核心的政纲，并提名内战中成绩显赫的尤利塞斯·格兰特为总统候选人。7 月 4 日，民主党召开全国大会。其政纲中公然反对民主重建，主张在南部恢复白人统治。大会提名在内战中曾与"铜头蛇"联系密切的前纽约州州长霍勒肖·西摩为总统候选人。但是，格兰特轻易地在竞选中击败西摩，当选为美国第 18 任总统，并于 1869 年 3 月 4 日宣誓就职。

第三节　共和党激进派的南部重建

〔南部军事管制与民主政权的建立〕　1867 年 3 月，南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根据重建法案规定，南部 10 个叛乱州被划为五个军区。其中第一军区辖弗吉尼亚；第二军区辖南、北卡罗来纳；第三军区辖佐治亚、亚拉巴马和佛罗里达；第四军区辖密西西比和阿肯色；第五军区辖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每一军区由总统任命一名军区司令，负责所辖州的选举和组建新政府等各项事务。

---

①② 史密斯：前引书，第 784—785 页。

③ 斯坦普：前引书，第 153 页。

在南部推行激进派重建政策的是由三部分力量构成的暂时联盟。他们是“自备毡囊者”、黑人和“孱崽子”。“自备毡囊者”是来自北部的共和党人，代表着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构成了南部共和党的核心。刚刚获得解放的南部黑人是激进派重建的主要社会基础。所谓“孱崽子”，是南部叛乱者对贫穷白人小农的蔑称。这部分白人小农在内战期间反对分离，战后又愿意接受阿波马托克斯的结局，并支持激进派的重建纲领。[1]

在南部，同样存在着反对激进派重建的强大力量。这就是种植园主、民主党人和约翰逊时期的州政府。他们以软硬兼施的手段来破坏重建。有的假装支持黑人选举权，把自己打扮成黑人的朋友，诱使黑人投民主党的票，破坏离间黑人与共和党的关系。有的则以解雇相威胁，目的也是为了控制黑人的选票或阻止他们参加选举。更有甚者，三K党及其他恐怖组织采取暴力、私刑等手段来阻止黑人参加和支持激进派重建，因而凶杀恐怖事件屡有发生。

广大黑人为了维护自己的选举权，同种植园主和白人种族主义者展开了坚决斗争。各州黑人普遍举行群众大会，支持激进派重建纲领，要求获得平等的民主权利。例如，亚拉巴马州的黑人代表大会发表了“告亚拉巴马人民书”，要求享有选举权，取消种族隔离，并坚定地宣布支持共和党及其重建纲领。[2] 其他地方的黑人也在种植园、市镇、投票处以及十字路口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各州军管当局采取措施以保证重建的顺利进行。他们免除了6名州长和大批中下层行政官员的职务；以军事法庭代替了原来

---

① 约翰·H·富兰克林：《内战后的重建》，芝加哥1961年，第98页。

② 艾伦：前引书，第236—238页。

的州法庭。军管当局还对各种恐怖活动进行了镇压，对一切用解雇、恫吓、暴力等手段干涉或阻止黑人选举的行为，都作为犯罪加以惩处。为了保证黑人有机会参加选民登记和投票，有的军区还延长了登记和选举期限，延长时间多达一个月。

经过激烈斗争，南部各州在 1867 年 10 月先后完成了选民登记程序。登记的黑人选民达 70 多万人，白人选民为 66 万余人。在南卡罗来纳、亚拉巴马、佛罗里达、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等州，大多数黑人都积极参加了选民登记。有相当数量的黑人被选入制宪代表大会，参加建立州政权的工作。但黑人代表占多数的只有南卡罗来纳，达 61%。路易斯安那的黑人代表约占半数。其他各州黑人代表都明显地居少数。从整个南部看，10 个州的黑人代表约占代表总数的 25.8%，表明黑人参政权仍不充分。尽管黑人代表和共和党代表共同占有了代表大会的多数席位，但民主党和保守派进入大会的人数仍然不少。

到 1868 年 5 月，除了得克萨斯州，其他各州都完成了制定宪法的工作。各州新宪法体现了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和激进派重建法案的精神，一方面肯定黑人享有选举权和参政权；另一方面则剥夺了南部叛乱分子的选举权和出任公职的资格。有的州宪法还扩大妇女民主权利、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建立民兵组织，以保证民主重建的顺利进行。各州宪法都无例外地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没有剥夺种植园主的大地产，亦未给黑人分配土地。但它们仍不失为民主重建的决定性步骤。

到 1869 年末，南部 10 州选出了州议会、行政官员及参加国会的参、众议员，各州政府先后宣告成立。在批准州宪法和联邦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之后，各州选出的参、众议员相继被接纳进入国会。到 1870 年 3 月，南部各州在联邦中的平等地位与正常关系终于得到恢复，重返联邦的程序遂告完成。

〔南部各州的民主改革〕　　南部各州民主政权成立以后，立即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民主改革工作。

其一，确认黑人的平等权利，实行民主政治。根据新的州宪法，各州先后废除“黑人法典”，颁布“公民权利法”，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黑人的平等权利。许多州还改革了地方政权和司法制度，各级行政和司法官员均由选举产生，并建立了陪审制度和巡回法庭，承认黑人的参政权与陪审权。虽然各州政府和司法机关中都有一定数量的黑人参政，但是政权仍然掌握在白人手中。各州制定的民权法案也未得到认真实施，黑人仍然遭受着严重的种族歧视。

其二，进行土地和税制改革。南部一些州议会通过了实行有限土地改革的立法。以南卡罗来纳为例，在1868年至1869年间，该州议会通过法案，建立土地委员会，以公款购地，然后分成25—100英亩的小地块，以低价售予黑人和无地白人，为此共拨出贷款50万美元。到1871年，该州由此建立的小农场已近2,000个。

南部各州为了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需在财政上筹措资金，由此进行了税制改革。内战前南部对种植园主征收的土地税非常轻微。一个中等工商业者的纳税额约为种植园主的5—6倍。税制改革后，种植园主的土地税额大幅度增加；工商业者的纳税额大大削减；而一部分下层贫民的纳税义务得以免除。南卡罗来纳的每英亩土地税，从内战时的15美分提高到改革后的15美元。1870年，南部11州的纳税财产总值不及1860年的一半，但所缴税款却超过1860年的4倍。[①] 许多无力完税的种植园主不得不将土地充公抵税或低价出售，由此地价急剧下跌。南部各州的地价下跌幅度达50%—70%。密西西比州的种植园主出卖土地

① E·默顿·库尔特：《重建时期的南部》，路易斯安那1947年，第155—156页。

64万英亩[1]，南卡罗来纳种植园主因欠税而被充公的土地近27万英亩。这些土地中有一部分被分配或出售给黑人，形成了一些独立的黑人小农。

其三，奖励工商业，资助铁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密西西比州颁布了数百份公司特许状，还通过法案规定：免除利润不足4%的工商企业的纳税义务。各州拨出大量款项和土地资助铁路公司。每修筑一英里铁路，州政府就补贴16,000美元。佐治亚州为布伦瑞克—奥尔巴尼铁路提供了600万美元的债券。南部州政府的奖励工商业政策，刺激了北方资本对南部投资的积极性，促进了南部经济发展，同时也给投机者们以巧取豪夺之机，形成了一批暴发户。

其四，改革教育制度，开办免费公立学校。内战前奴隶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南部黑人文盲率达95%以上。南部各州民主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为黑人和贫穷白人提供免费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时期的南部教育经费主要来自自由民局和北方的宗教团体。自由民局的教育经费逐年增加，1865年为27万美元，1870年已近100万美元。教会所提供的教育捐助也近157万美元。南部政府以此创办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等各类学校。广大黑人也积极筹措资金，自力兴办学校。1866年至1870年的黑人办学经费达78万余美元，黑人儿童入学人数成倍增加。[2]

其五，医治战争创伤，兴办慈善事业。面对严重的战争创伤和普遍贫困的局面，南部各州政府拨出大笔资金修复铁路，架设桥梁，恢复和开办医院、孤儿院和救济机构等公用事业，为黑人

---

① 艾伦：前引书，第142页。

② 杜波依斯：前引书，第648页。

和下层白人提供社会福利服务。

激进派领导的南部重建，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运动。尽管改革的进展很不平衡，有些措施流于形式，但它对南部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重建时期的贪污舞弊现象〕　南部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各州政府除了提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外，还通过大量发行公债来吸收资金。1868—1874 年间，佛罗里达发行的公债额增加达 10 倍，从 52 万美元增至 560 万美元。整个南部在 1872 年的公债总额已达 1.32 亿美元。[①] 对于百废待举的南部来说，发行大量公债是必要的。但是，当时一批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乘机假借改革之名挥霍公款，利用各种手段中饱私囊，在南部政界形成腐败之风。例如，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亨利·沃摩思的年薪为 8,000 美元，而在其任职四年内竟捞取了 50 万美元。还有一个州长盗卖自由民局的供应品，大量侵吞公物公款。佛罗里达的税务官员竟私分税款 50 万美元。[②]

贪污舞弊之风严重损害了南部民主政权的形象，民主党人和保守派得到了攻击民主改革的口实。他们以“反对贪污”为名，攻击所谓“黑人统治”。保守派共和党人、《纽约论坛报》的詹姆斯·派克考察了南卡罗来纳后，大肆渲染该州政府的每一个成员都卷入了贪污舞弊的丑闻。一时间，反对南部改革的势力顿然抬头。事实上，腐败之风并非南部重建所独有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全国性社会现象，而且北方在这方面更甚。联邦政府和各州立法机构几乎都与铁路公司及形形色色的贪污集团联系密切。如纽约市特威德集团案、费城煤气公司麦克梅内斯集团贪污案、联合太平洋铁路“莫比利尔公司案”及“威士忌酒集团案”，都牵涉到许多

①② 斯坦普：前引书，第 174—176 页。

政界要员。美国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分析了这种腐败现象,认为是南北"两个地区、两个党派和两个种族莫不皆然。"①

重建时期南部出现腐败现象,还有其特殊原因。首先,内战后南部处于大变动时期,旧结构已崩溃,新结构尚未健全。尤其是政府机构从寡头政治迅速转变为民主政治,同时不健全的民主制又伴随着军事管制,这一系列变动不可避免地产生混乱,给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机。其次,在激进派重建过程中,北部政客和投机分子纷纷南下,出现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这些人利用南部的混乱,大发横财。其三,少数贫苦的白人和黑人进入南部政权后,很快被腐朽之风所侵蚀,卷入了争赃夺利的漩涡。其四,这时美国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经济上的疯狂竞争导致不择手段地拉拢政治代理人。南部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只是镀金时代美国的一个侧面。因此,不能把南部的腐败现象简单地归咎于民主重建和黑人参政。更不能以此来否定整个激进派重建的进步历史作用。

〔黑人在南部重建中的作用〕　广大黑人是激进派重建和南部民主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早在内战时期,忠于联邦的北部黑人和支持他们的白人就已建立了联邦派同盟会。随着联邦军队的作战进程,该组织也于 1863 年进入了南部,并得到迅速发展。激进派重建时期,联邦派同盟会已成为相当广泛的全国性组织。它在纽约和各州首府分别设有全国大委员会和州委员会,还在南部各选区设基层委员会,仅在弗吉尼亚就有 800 个分支机构。到 1867 年,同盟会在南部各地已有 50 万会员。② 它的基层组织还组

---

① 约翰·H·富兰克林:《内战后的重建》,芝加哥 1961 年,第 149 页。

② 威廉·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三联书店中译本 1961 年,第 348 页。

建了黑人民兵连队，经常举行集会和游行，同南部民主党和三K党进行了有效的斗争。1868年以后，同盟会基层组织和黑人民兵连队在南部民主改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在保卫民主宪法和黑人选举权等方面，其作用是州政府和联邦军队所不能代替的，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三K党恐怖活动的消极影响。

南卡罗来纳是南部惟一黑人占多数的州（黑人占人口的60%以上），因而也是黑人参政比例数最大、作用最突出的一个州。黑人在该州制宪代表大会上表现卓著，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污蔑黑人愚昧、没有参政能力的谬论。例如，黑人代表贝弗利·纳什在演说中指出：对选举活动，黑人可能一开始“没有准备”、“还不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我们迟早能学会履行我们的职责。”[①] 一些黑人领袖被选入州议会和州政府担任要职。大部分黑人参政者都工作勤奋，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黑人代表在南卡罗来纳州众议院居多数，但参议院为白人所控制。白人还担任了州长等主要职务。可见，即使在这个黑人参政较为广泛、民主改革较为深入的州，也从未出现所谓“黑人统治”的局面。

在佐治亚州议会中，黑人代表为了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868年6月，佐治亚州被接纳进入联邦，军管结束。9月，该州议会就通过了驱逐黑人议员的决议。对此形势，黑人议员领袖亨利·特纳一面在议会中强烈谴责民主党人和保守势力的非法行径，为黑人参政权进行有力辩护；另一方面，他召集82个县136名黑人代表举行会议，对州议会的非法活动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要求国会出面干预和纠正这种活动。他们的

① 富兰克林：前引书，第87页。

斗争得到国会的有力支持。国会决定，在佐治亚州议会恢复黑人合法席位之前，拒绝接纳该州参议员进入国会。但佐治亚州议会公开对抗国会，不仅没有恢复黑人议员的合法席位，而且还于翌年否决了联邦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国会只得重新恢复军事管制，决定该州在批准第十五条修正案以前不得重返联邦。新的军区司令取消了24名民主党议员的资格。重新组成的州议会站在激进派一边，恢复黑人议员的合法席位，批准第十五条修正案；还通过了妇女选举法、监狱改革法等民主立法。佐治亚州经过激烈的反复，终于在1870年7月重返联邦。

黑人的重建斗争也存在着局限性。他们没有力量和条件建立自己的政党，只得尾随于北部。他们的斗争尚处于自发阶段，多数黑人刚由奴隶转变为自由民，思想上仍未得到充分的解放；加上他们的文化素养差，政治训练少，因而难以进行全面、持久的政治斗争。黑人以其相当薄弱的政治经验和物质条件，同盘根错节的白人种族主义势力和根深蒂固的南部民主党较量，在当时不具备获胜的可能。这也是重建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南部力量对比的变化〕　到19世纪70年代初，由内战开始的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北部资产阶级不仅牢固地掌握了联邦政权，重新实现了联邦统一；而且摧毁了南部奴隶制经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建立了关税壁垒和稳定的货币制度。这种形势导致了共和党内妥协思潮的增长。不少共和党人对南部重建和黑人命运已不感兴趣，但愿尽快结束这场无休止的斗争，即使牺牲黑人利益也无关紧要。当时的《民族》周刊反映了这种妥协思潮："每一个共和党人都已经变得对各州的军事管制十分憎恶，并且完全相

信，不应由国家派士兵去维持一个不能支持自己的州政府。”[①]

在妥协思潮日益滋长的情况下，共和党参议员舒尔茨和本杰明·布朗首先在密苏里州发起自由派共和党运动。许多有影响的激进派共和党人，如霍勒斯·格里利、查尔斯·亚当斯、萨姆纳等，都先后脱离了正统共和党而转入了自由派。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应把更多精力用于国内经济建设，不应纠缠于旷日持久的南部斗争。自由派中多是行政官员，他们对国会滥用权力也感到不满。1872 年总统选举给自由派共和党以独树一帜的机会。他们在辛辛那提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独立的竞选纲领和总统候选人霍勒斯·格里利。自由派的主要政纲是大赦南部叛乱者，结束军管，改革文官制度，承认黑人选举权。民主党为瓦解共和党阵营，也全力支持自由派共和党人。于是，民主党和自由派共和党在政治上暂时结成了联盟。

民主党一方面利用共和党分裂来补充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因国会于 1872 年 5 月通过的大赦法案而开始恢复元气。根据大赦法案，原来被剥夺出任公职资格的 15 万南部叛乱者中，有 14 万 5 千人重新获得这种资格，其中包括南部同盟副总统斯蒂芬斯和韦德·汉普德将军等人。民主党在南部各州的力量也有所增长。联邦和州政府对工商业的保护政策使农业遭受损失，因此，引起南部白人小农的不满。他们逐渐脱离共和党，转向民主党。相当一部分黑人也对联邦政府的妥协举动感到失望，又经常受到三 K 党的威胁，对共和党的热情亦大大降低。南部各州的“自备毡囊者”处境日益孤立。

南部民主党利用上述形势，在各州展开夺取州政权的活动。他们抓住政府中的贪污舞弊问题大肆破坏民主政权的声誉，谩骂

---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 989 页。

激进派共和党人，企图在舆论上占据优势。同时，大力怂恿三 K 党加剧恐怖活动。仅 1869 年至 1870 年，得克萨斯州就发生1,500 起杀害黑人事件。有些三 K 党组织与前同盟退伍官兵勾结，企图直接以暴力夺取政权。南卡罗来纳的三 K 党暴徒甚至在 1870 年 10 月占领了劳伦斯。各州向联邦政府频频告急。

由于南部反动势力的猖獗，黑人参加选举的机会大大减少，大批黑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而黑人选举权是“共和党控制南部的关键。”① 国会为了保护黑人选举权，于 1869 年 2 月通过了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明确规定：联邦或任何州均不得以种族、肤色或以前的奴隶身份为借口而剥夺联邦公民的选举权，并授权国会可以通过立法强制执行该修正案。为此国会于 1870 年和 1871 年先后通过两个“强制法案”，规定凡企图剥夺任何公民选举权者，须处以 500 美元罚款或一年以下徒刑；总统在必要时可动用军队以保护公民选举权；总统和国会选举必须在联邦法院监督下进行。1871 年 4 月，国会通过“三 K 党法案”，授权总统在必要时实行人身保护法，并使用武装力量镇压三 K 党的暴行和骚乱。但在共和党的妥协思潮逐渐占据上风的情况下，第十五条修正案及有关法案都停留在纸面上而未得到真正的执行。广大黑人失去了联邦政府强有力的保护，以致南部民主政权的基础大为削弱。加上两大党内部构成的变化，1872 年以后，南部的政治力量对比已对民主政权越来越不利，激进派重建已成为强弩之末。

〔民主政权失败与海斯—蒂尔登妥协〕　联邦政府的软弱退让，使南部民主党一再得逞，形势终于急转直下。佐治亚和北卡罗来纳的民主党首先于 1870 年控制了州议会，旋又掌握了州

① 福斯特：前引书，第 328 页。

政权。其他各州民主党也在此后数年中，利用合法与非法手段相继夺得州政权。到 1875 年末，仍保持在激进派共和党手中的仅有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 3 个州，即使这 3 个州的民主政权也已裂隙丛生、很不稳固。

1876 年大选临近时，格兰特政府所暴露的种种丑闻和民主党在南部诸州的重新执政，使形势变得对民主党十分有利，从而出现了内战以来第一次两党势均力敌的局面。共和党提出的竞选政纲是继续执行内战以来通过的各项宪法修正案、保护黑人选举权及其他公民权利、实行保护关税，并以俄亥俄州州长拉瑟福德·海斯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政纲的主要点是取消激进派重建、反对贪污、降低关税，它的总统候选人是纽约州州长塞缪尔·蒂尔登。初步计算竞选结果，蒂尔顿所得普通选票超过海斯 25 万张，但是，迟到的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俄勒冈 4 个州的选举人票全归海斯。于是海斯以选举人票 185 对 184 的 1 票之差险胜蒂尔顿。

民主党对此结果表示强烈反对，声言要发动向首都华盛顿的进军。然而，南部民主党人权衡利弊后，认为如果接受海斯为总统，很可能使海斯撤走联邦军队、结束对南部的军管；相反，如果蒂尔登出任总统，他绝不敢结束在南部的军事统治。所以，民主党决定以放弃总统职位来同共和党达成政治交易。事实正如他们所预料的。共和党也不愿意为南部黑人而放弃总统职位。于是，两大党的代表达成一项秘密交易，即民主党同意把总统职位交给海斯，以换取共和党在海斯就职后即从南卡罗来纳等三个州撤军、修筑横贯南部的大铁路等许诺。这就形成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海斯—蒂尔登妥协”。

海斯就职后，立即从南卡罗来纳等三个南部州撤出联邦驻军，并将这三个州政权让给了民主党人。至此，民主党重新掌握

了南部各州的政权，重建以南北双方妥协而告终。

重建的这种结局，虽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南部未曾出现所谓的奴隶主复辟，但大多数黑人并未得到土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仍受着严重的歧视，因而重建并未完成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此后，南部走上了一条极为缓慢而痛苦的发展道路。

第四节 重建后的南部

〔南部农业经济与谷物分成制〕 在重建过程中，南部的大土地所有制并未遭到彻底摧毁，除一些土地被来自北方的土地投机商和军官所占有外，大部分土地仍保留在旧种植园主手中。这些种植园主，虽仍保留着大地产，但失去了作为劳动力的奴隶，同时由于战争对南部经济的破坏，又缺乏资金雇佣劳动力；而“解放了”的奴隶在获得人身自由后，没有得到土地，也无力购买生产资料，无法成为独立小农或雇佣工人。于是，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黑人或贫穷白人，租佃制成为南部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

租佃制的形式较为复杂，大体上有现金租佃制和谷物分成制。在现金租佃制中，佃户除租种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外，其他生产资料一概自备，秋收时交纳现金或部分收成作为地租。这种佃农可称为租佃农场主，他们虽受商业资本的盘剥，但独立性较强，与典型的资本主义租佃制没有多大差别。但这部分人数较少，在租佃制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谷物分成制。在南部 390 万黑人中，就有 85.6%是谷物分成农。

在谷物分成制中，又有分成制佃农和分成制雇农两种形式。分成制佃农没有土地，只拥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如种籽、农具

等。地租是收获后按一定比例以实物交纳，一般占全部收成的1/4或1/3。大部分黑人都是这种分成制佃农。分成制雇农处境更为艰难。他们往往一无所有。一切生产资料都由土地所有者提供，按其条件从事耕作。秋收时把收成的一半或2/3交给地主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这些谷物分成制佃农和谷物分成制雇农都一无例外地受着大种植园主和北部银行家、高利贷商人的层层盘剥。大批种植园主向北部贷款，然后再以赊销供应生产和生活资料等方式向佃农发放高利贷。他们往往高价贷出这些物品，低价折算农民的收成。佃农若无法偿还，旧债的本息则全部划为新的本金。所以，佃农一旦接受贷款便债台高筑，常无力自拔。种植园主为了把佃农束缚在土地上，勒索债款，便怂恿各州政府先后颁布法律，把佃户中断合同的行为定为犯罪。如1895年佐治亚州通过“流浪法”，对无雇主的劳动者罚款1千美元或判处6至12个月的监禁。这样，只要欠债，佃农事实上就被束缚在种植园主的土地上，不得不以劳役形式偿债，从而形成较残酷的劳役偿债制。负债佃农不仅被迫以全部劳动所得来偿付所欠的债务，受到残酷的剥削，而且在生产和生活上受制于债主，失去了经济独立性。甚至有时一个种植园主可将这种债权转让给另一种植园主，而债务人也就随之被转让了。

所以，谷物分成制一方面具有新的资本主义租佃关系，反映了奴隶占有制向资本主义农业结构的过渡；另一方面，这种过渡又是建立在对佃农的残酷剥夺之上的，带有浓厚的奴隶制残余。这就致使南部农业走上了缓慢而痛苦的“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南部种植园主同北部工业——金融资本

的联系不断加强，成为资产阶级化的种植园主阶层。[①] 原来的奴隶也逐渐演变为新的佃农阶层，即具有不完全人身自由、不完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同时也有大批贫穷白人沦为分成制佃农。他们在种植园主的严格控制之下，并未摆脱对土地的依赖，不易成为自由的工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讲，谷物分成制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南部农业，以至整个南部经济的发展。

谷物分成制的盛行，维系了单一经济作物的农业经济，从另一方面束缚了南部经济发展。重建时期至 19 世纪末，棉花在国际市场上仍是有利可图的作物。北部金融资本当然不甘放弃这一"摇钱树"，力求扩展棉花种植业；仰仗北部提供贷款和资金又习惯于经营植棉业的南部种植园主完全听命于北部，对此并无异议。直接生产者分成农，在金融资本与种植园主的双重控制下，当然别无选择。结果，南部的单一经济作物种植的局面依然如故。1860 年时棉花号称为"王"，到 1890 年，这一趋势仍有增无已。[②] 这种现象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南部更加深了对北部资本的依赖。致使"纽约的金融家们仍在影响南部农业经济的重大决策方面起着左右局势的作用。"[③] 然而，更严重的后果是，这种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严重妨碍了农业技术改造和多样化经济的产生。劳动力密集型的耕作方式、简单的手工劳动、土地的小块经营，仍是南部农业经济的典型特征。整个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与活力，致使南部经济仍远远落在全国后面。1880 到 1900 年间，南部的人均收入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51%。[④]

---

① J.M. 维纳："1869 至 1955 年美国南部的经济结构"，《美国历史评论》，1979 年 10 月号。

② 格伦·波特主编：前引书，第 1005 页。

③ 劳伦森·拉森：《南部城市的兴起》，肯塔基 1965 年，第 79 页。

④ 格伦·波特主编：前引书，第 1003 页。

〔种族歧视的加剧与吉姆·克劳制〕　联邦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曾明确规定了黑人的公民权与选举权。但自 1877 年妥协、民主党在南部占据优势后，保守势力再度抬头，黑人权利面临得而复失的危险。而北部共和党入主白宫后，主要注意力转向如何保障他们在南部的工商业利益，对黑人权利已无心关注，致使黑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南部保守势力的第一个目标便是黑人的选举权。在这一方面，最高法院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早在 1876 年，最高法院就借口 1870 年的强制法违宪，予以取消，进而宣称，联邦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并未保证公民有选举权，而只是保证公民不得因种族、肤色或先前的奴隶地位而受歧视的权利。在这里，最高法院实际上是在暗示：此问题不属最高法院管辖范围，各州可自行处理之。

这种做法迎合了种族主义者和保守势力的需要。他们更加放肆地施展种种手法，处心积虑地设法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如在选举时，他们往往把投票地点设在远离黑人居住区的地方，或是在沿途制造障碍。在选票上也大做文章，或以假充真，或有意地发放种类多得难以选择的票以混淆黑人选民的分辨力。监票人也与之串通一气。再加上暴力恫吓等手段，致使很多社区黑人无法正常投票，黑人选举权几乎名存实亡。

黑人不甘于这种状况，不断起而反抗，八、九十年代，很多黑人群众参加了蓬勃兴起的农民联盟及其后的人民党运动。同时出现一些黑人自己的组织，如黑人劳动骑士团、全国有色农民联盟等。然而，在当时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这些组织所取得的成就不大。也有很多黑人采用消极的反抗形式，如 1879 年，黑人不顾当局禁令，大批移往西部，主要是堪萨斯，约有6,000 到

25,000人之多，史称“黑人大迁徙”。[①] 有的则移居到北部或南部城市，但境遇并没有实质性改善。

黑人的反抗斗争不断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更加疯狂的报复。1890年，密西西比州的制宪会议通过一条关于选举权的州宪法修正案，要求选民交纳2美元的人头税、并接受文化测验，合格者方可进行选民登记。这一规定将大量黑人排斥在选举大门之外。据参加该会议的惟一黑人代表艾赛亚·T·蒙哥马利分析，这种规定将会剥夺123,000名黑人的选举权，而白人只有11,000人失去选举权。[②] 这样，该宪法修正案有效地规避了联邦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实质上剥夺了所有黑人的选民权。[③] 这一修正案开了一个罪恶的先例，南部其他各州纷起效尤。1895年南卡罗来纳州通过类似的宪法修正案时，还附加了两年居住期和300美元财产的限制。1898年路易斯安那州更是别出心裁地制订了一项“祖父条款”，规定凡在1867年前享有选举权的成年男子及其后代得以免除教育、财产及纳税的限制而行使投票权，否则无权参加选举。很显然，1867年时没有任何一名黑人在路易斯安那州享有选举权，因而这等于将黑人从选民名册上一笔勾销，剩下的自然都是白人了。这就根本否定了联邦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随后，南部各州又通过一些限制黑人选举权的立法。

黑人的选举权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1896年时的路易斯安那州曾有130,344名黑人注册参加选举，到1900年，即新的州宪法实施仅两年，只有5,320名黑人见于选举名册。[④] 在密西西比

---

① 威廉·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三联书店中译本1960年，第393页。

② 约翰·H·富兰克林：《从奴隶制到自由》，纽约，1980年，第263—264页。

③ 内森·I. 哈金斯等编：《美国人经历中的关键问题》，纽约，1971年，第85页。

④ 约翰·富兰克林：前引书，第266页。

州，大约每17个黑人中仅有1人有选举资格。总之，在南部各州，黑人选民数量普遍下降了。

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同时，种族隔离的作法也在南部各州蔓延开来。最早制订此类法律的是田纳西州。1870年该州曾通过法律禁止种族间通婚。5年后，更进一步制订了第一个“吉姆·克劳”法，[①] 在火车和公共交通中实行隔离。1881年，该州再次制订铁路运输中的“吉姆·克劳”法，规定铁路公司要给黑人另设车厢，黑人必须在指定的车厢就座，不得进入白人车厢。及至1883年最高法院宣布1875年公民权利法案违宪后，更助长了这种气焰。1885年南部大多数州又都制订了在公立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进而很多州连饭店、酒吧和影剧院等公共场所也开始实行隔离。1891年，佐治亚州又率先制订了电车上的隔离法，使黑人在市内交通中也受到了限制。

到1896年，在“普莱塞控弗格森”一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竟以“分离但平等”原则对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制给予了法律上的正式承认。从此，黑人身上又多了一层枷锁。种族隔离制不仅使南部政治处于反动状况，而且阻碍美国社会进步近一个世纪之久。

〔布克·华盛顿与塔斯克基运动〕　在一个种族主义猖獗、黑人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南部社会，黑人的真正出路何在？为此，广大黑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斗争。其中，除直接的反抗斗争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布克·华盛顿与塔斯克基运动的兴起。

布克·华盛顿于1856年生于弗吉尼亚州富兰克林郡的一个奴

---

① “吉姆·克劳”相传是1835年左右的一黑人流行歌曲名，后转为歧视黑人的蔑称。

隶家庭。曾就读于汉普顿学院。在院长塞缪尔·阿姆斯特朗的影响下，他深信通过职业教育和体力劳动，黑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就可以得到改善和提高。怀着这样一种信念，1881 年，他在亚拉巴马州办起了一座生机勃勃的塔斯克基师范工业学院，开始了塔斯克基运动。

华盛顿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上层社会的“地盘非常广阔”。对于黑人来说，只要在经济上富裕起来，就可以跻身于上层社会。那么，怎样才能在经济上富裕起来，他主张通过职业教育，掌握实用技术，这样，“一个人只要能做一点世界上需要做的事情，终究会腾达起来，不论他属于哪一个种族。”① 因此，他主张应教授黑人农业知识和手工艺，并有步骤地发展黑人的商业机构，对历史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可不加考虑。至于当时存在的对黑人的歧视，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黑人的无能和愚昧所致。黑人对此不应进行斗争，甚至对私刑也应采取忍让态度，因为顺从比反抗对黑人更有利，要培养“忍耐性格”。他公开主张放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毫无成功希望的政治斗争和民权斗争，转而致力于个人经济地位的改善和提高，通过这种自助的道路，总有一天白人会改变种族偏见，黑人将获得充分的公民权。华盛顿接受了交纳人头税和文化测验的选举权利，只不过强调这些措施应当公正地同时施用于白人和黑人。②

1895 年，华盛顿在亚特兰大棉业展览会上发表一篇著名演说，由此而引起全国重视。他在这篇演说中，提出“就地汲水”的号召。他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只船停泊在南美洲海岸，船上淡水已尽，船员们只好把水桶投入海中碰碰运气。结果，在

---

① 福斯特：前引书，第 445 页。

② 约翰·富兰克林：前引书，第 276 页。

原来以为只有咸水的地方汲起了亚马逊河的清水，全船人员幸免于难。根据这个道理，黑人不必枉费精力向非洲移民或与白人相抗衡，而是尽量利用现有条件改善与白人的关系，委曲求全，以获得自身地位的改善。此故事的另一含义是，南部白人统治阶层也要就地汲水，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黑人劳力，而不必去吸引万里之外的欧洲移民。

这篇演说立即受到北部和南部资产阶级的一致喝彩。而对黑人来说，在南部种族恐怖主义的笼罩下，演说中提出的主张实际上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一线希望和出路，因之也受到欢迎。此后，华盛顿在社会中声望不断增大，成为当时黑人运动中最显赫的人物，塔斯克基运动也以其独特的指导与示范作用而风靡一时。很多黑人，特别是塔斯克基附近的黑人农民学习农业技艺，从中确实受益不浅。[①] 在华盛顿的影响下，黑人从事专门技艺及商业的日益增多，到 19 世纪末，"黑人已从事了难以计数的各种类型与规模的商业。"[②] 1900 年，华盛顿召集黑人企业家在波士顿组成"全国黑人企业联盟"，并当选为主席，更加壮大了塔斯克基运动的声势。进入 20 世纪后，这一运动仍方兴未艾。

布克·华盛顿的崛起与塔斯克基运动的日益兴盛是南部重建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当时，南部种族主义猖獗，黑人处于无权的被统治地位，采用暴力斗争极其困难，而且收效并不理想。而华盛顿默认黑人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屈从地位，确实换取了南部白人的宽容和北部大资产阶级的资助和支持。这就使得他的纲领是当时惟一能够使白人、南部白人和黑人这三方面都能接受的方案。

然而，华盛顿的言行也充满矛盾，并非始终一致。他除以妥

---

① 约翰·富兰克林：前引书，第 282 页。

② 约翰·富兰克林：前引书，第 286 页。

协、放弃政治斗争为主要倾向的公开生活外，还有暗中支持民权运动的另一方面。如“他暗中以金钱支持并部署了一系列反对‘祖父条款’，反对取消黑人的陪审权，反对火车上的种族隔离以及反对劳役偿债制的斗争。”① 另外，他在私下里还有许多排挤其他黑人领袖，惟塔斯克基运动独尊、党同伐异的举动。因此，华盛顿的个性极其复杂。在当时紧张的种族关系中，他小心翼翼地推行他的委曲求全的黑人路线。

〔铁路的铺设与工业的初步发展〕　南部的社会环境虽差，但那里丰富的矿藏及林木资源、大量廉价劳动力、有利可图的植棉业等对北部投资者仍有较强的吸引力，南部各州也相应地降低税率以吸引外资，因而，80年代后，大批北部企业家、投机商人等涌入南部，或铺设铁路、或采掘矿藏、或利用当地资源开业设厂。

铁路铺设的进展最为明显。内战期间，南部铁路曾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战争结束时，仅存的万余英里铁路也多半残缺不全，难于使用。然而，到1890年，新旧铁路加在一起，即达27，655英里。其中，仅1880至1890年这10年，铁路里程就增加了135%。到19世纪末，南部已形成一个完整的铁路网，连结了所有的主要城镇。

铁路网的不断完善，为南部经济注入了活力。各种大宗农作物得以外运，从前因交通不便而难以开采的铁路、煤矿也由此获得了生机，田纳西、弗吉尼亚、亚拉巴马等州的富矿区日益兴隆。大批林木也被源源采伐。1880年至1890年这10年间，南部林业产值扩大10多倍。毗邻墨西哥湾的5个州木材销售量由1，300万美元猛增到7，300万美元。铁路的铺设，还刺激了南部

① L.哈尔兰："布克·华盛顿传记透视"，载于《美国历史评论》1970年10月刊。

的钢铁冶炼工业。原植根于千里棉田之中的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几年之内就转变成为南部生铁基地。号称“南部的匹茨堡”。

棉花加工与纺织业，本来集中在东北部。重建以后大批投资于此行业的企业家将工厂迁到南部，在植棉区就地加工，以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结果在植棉带出现了大批棉纺业专业城镇。尤其在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从而导致北部棉纺业的衰落。棉纺业南移。与此同时，烟草加工业也兴盛起来。1880 年引进的卷烟机，降低了劳动成本，加速了这一行业的发展。1890 年，著名企业家及发明家布坎南·杜克兼并南部 5 家大烟草公司，组成美国烟草公司，垄断了全国香烟生产的一半以上。

上述各个方面的进展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内战前的南部城市，大部分以商业活动为主，这时已转变为工业城镇，同时，原有的大中城市进一步扩大，如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等都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到 1900 年，南部已有 5 个人口在 10 万以上的大城市[①]。

尽管有这些令人瞩目的进展，从总体上说，南部仍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以工厂的数量和资本为例，南部到 1900 年仍未超过它在 1860 年时在全国所占的比重[②]。城市化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况且，南部工业基本以加工业为主，呈畸形发展。所生产的各种半成品都要到北部进行最后加工，而这一道工序恰恰赢利最多。因此，一位统计署官员评论说，尽管制造业和采矿业有了一些进展，但南部工业仍处于摇篮时期。[③] 由于铁路与工业的大部

① 劳伦斯·拉森：前引书，第 163 页。

② 查尔斯·M·多拉尔等编：《变革时代：美国简史》，纽约 1980 年版，第 360 页。

③ 劳伦斯·拉森：前引书，第 144 页。

分资本来自北部，这些工交企业的发展势必加深南部对北部经济的依赖。如到90年代，南部的铁路已基本为北部资本集团所控制。于是南部工业与南部农业一样，也纳入了北部垄断资本控制的统一轨道。

第 三 章

经济高速度发展与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内战后，北部工业资产阶级掌握联邦政权，统一的全国资本主义市场向纵深进一步发展，各种鼓励工业的积极措施与第二次科技革命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工业化进程。19世纪最后30年的美国经济呈现出罕见的高速度发展。60年代初美国仍未摆脱对欧洲的经济依附，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到90年代末美国已拥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其工业产值跃居世界首位。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促使企业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小型分散的独立企业开始向集约化的联合生产体制转变。剧烈的竞争和企业合并，引起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在美国特定的社会、自然环境和市场条件的作用之下，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一直处于较为顺利的过程中，从而使美国垄断资本较早地确立并由低级向较高层次不断发展。19世纪末美国的历史性转变为20世纪初现代美国经济的基本模式奠定了基础，并为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内在逻辑。

第一节　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的联邦政策〕　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在内战

中执掌联邦政权，摆脱以往南部种植园主集团的羁绊，开始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政策。内战结束后，联邦政府进一步发展这些政策，在各方面扶植工业、金融业和商业，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了充分发展的环境。

众所周知的“宅地法”曾使西部农场主获得了数量可观的自由土地，创造了美国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模式。同时这项法令也是内战后鼓励美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来自东部的铁路公司和土地投机公司依仗政府的赠予和雄厚资本，获得大量无偿和廉价土地，然后转手高价零售。由此赚取的巨额资金又转化为铁路投资，或向远西部矿业和东北部制造业转移。于是，“宅地法”在利用广大的西部土地来收集社会游资、吸引外国资金方面起了不可多得的作用。另一方面，西部形成大批宅地农业主，既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粮食和原料，又大大开拓了美国国内市场。可见，“宅地法”对内战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不容低估。

内战期间联邦政府颁布的“国民银行体系法”对19世纪末的美国金融体制一体化起了重要作用。内战前，各地滥设州立银行和私立银行，造成通货紊乱、金融不稳、储蓄缺乏保障。联邦政府为了动员社会资金支持巨额战费，规定各银行须以其资本的1/3认购政府公债券，方可得到国会颁发的国民银行营业执照，而后发行相当于认购债券价值90%的国民银行券，并保持资本的25%为现金储备。该法执行后，州银行纷纷转变为国民银行，1865年领取执照的国民银行已达1,294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75%①。国民银行体系使“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通货”②。内战后，联邦政府继续整顿金融体制，实行紧缩银根的

① 罗伯特·C·普兹：《美国经济史》，德赖登出版社，1982年，第323页。

② 格伦·波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纽约1980年，第1卷，第78页。

硬币政策和金本位制。尽管这有损于债务人利益，但对于美国形成稳定的金融市场，吸引外国资本的投入和加速美国银行资本走向集中起了重要作用。1869年以后，资本积累率以每10年45%至60%的幅度递增，相当于人口增长率的2至3倍[①]。外国资本对美国的投入也从1869年的15亿美元上升到1897年的34亿美元[②]。因此，联邦政府的金融政策部分解决了内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为工业和交通业的高速度发展创造了又一重要前提。

内战前曾引起长期争端的关税问题，在内战中以“莫里尔关税法”而告一段落。联邦政府在1860年以后把关税率从20%逐步提高到50%，并长期保持高关税壁垒，减少欧洲工业制成品的打入和竞争，保证美国工业占领国内市场。对内则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禁止各州间的贸易障碍，鼓励商品在国内畅行并展开竞争。联邦的内外贸易政策使美国的商品输出实力增强，1875年以前外贸多为逆差，1879年以后转为顺差为主。同时在外贸构成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上升，农产品和原料的比重下降。正是在这种较好的国内市场条件下，美国工业能够相当完整地建立自己的体系，摆脱对欧洲工业品的依赖状况。

联邦政府促进经济的另一项重要政策是鼓励移民。1864年移民法通过后到1900年，进入美国的移民总数为1,300万，平均每年37万[③]。许多铁路公司和大企业直接在欧洲设办事处招募移民，以吸引足够的劳动力。移民中以16岁至44岁的壮年男性为多，为美国的劳动大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补充。移民的蜂拥而

---

① H.N.沙伊贝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本，第38页。

② 《美国历史统计》，纽约1975年，第869页。

③ 《美国历史统计》，前引书，第112页。

至，加上每10年20%以上的自然人口增长率，使美国人口从1860年的3,150万增至1900年的7,600万，超过了当时欧洲主要大国。人口密度在同时期从每平方英里10人增至20人。[1] 美国国内市场的潜在容量和对外经济扩展能力也由此大为增强。正如恩格斯在1882年所预言的，移民"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2]

联邦政府对这个时期的工业技术发展给予很大关注，特别是以专利制度来保证新技术和发明创造的推广。内战后，联邦政府签发的技术专利特许证逐年增多。1880至1900年间，签发的专利总数每年保持在15,000件至25,000件。同时，美国政府还注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积极吸引外国发明家来美国申请专利。自1883年至1900年，每年给外国人签发的专利证在1,200件以上，占专利总数的4%—5%。而且美国专利局坚持专利的创新性、高水平和实用性，实行严格审查，保证了公布的专利质量较高、较稳定。长期实行专利制度的结果是使美国工业不仅跟上了欧洲技术发展的步伐，而且在许多领域迅速取得了领先地位。

总之，内战后的联邦政府真正展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制造业报告》中所描绘的蓝图，给工业资本主义在市场、资金、资源、劳动力和技术诸方面创造了比当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要优越的有利条件。

〔科学技术的突破与广泛应用〕　内战后，美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是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加快。尤其是以电力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崛起，使美国在19世纪末完成

---

① 《美国历史统计》，前引书，第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0页。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同时，率先进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内战后美国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匮乏所造成的劳动力成本较高，促使美国资本家尽可能地采用节省劳力、降低成本的新技术。同时，美国工业较英、法等国起步晚，可以直接借鉴别国发展技术的经验教训，尽量少走弯路；加上美国中西部以远的各地区都是新开发的，没有陈旧设备作为包袱和障碍，不存在英国工业所具有的严重的技术更新问题。根据当时世界经济形势，美国必须以跳跃式的发展才能打入国际市场，并防止欧洲产品侵人美国国内市场。还应指出的是，美利坚民族具有积极进取、讲求实效的精神，他们较少受传统束缚，在文化心态上易于接受新科学技术。

19 世纪末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吸收欧洲已有的基础理论成就，广泛展开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工艺技术的发明更新。电力技术在美国最先得到应用和推广就是这种特点的典型表现，其中的杰出人物就是托马斯·爱迪生、乔治·威斯汀豪斯和亚历山大·贝尔。

爱迪生自幼酷爱钻研，经常突发奇想。1869 年，他以发明自动计票机所得 4 万美元酬金，创办了爱迪生公司。1876 年又在新泽西州的门洛帕克建立实验室。爱迪生以惊人的智慧和罕见的毅力，进行1,300 余次实验，终于在 1879 年 10 月 21 日研制成世界上第一只白炽电灯泡。接着，他开始改进照明系统，包括发电机、馈电线和配电系统。在此基础上，1882 年 9 月第一座中心发电站在纽约建成。美国成为电力工业的故乡。

爱迪生没有解决电流电压不足的输送距离问题，这个障碍是由 1886 年建立的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突破的。该公司在布法罗首先建立商业性的交流电灯工厂，购买了由南斯拉夫工程师尼科洛·特斯拉发明的交流发电机专利并严密控制达十余年之久，最终解决了交直流互变和高低压互变等应用技术问题。在 1892 年

的芝加哥博览会上展出了1,000马力发电机，达到当时发电功率最大的水平。到90年代末，美国的重要城市都建立了发电厂，大企业已普遍使用电能作为动力。电力技术的突破加速了美国工业化的进程，使之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过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英法等国。此外，电的使用亦渗入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导致城市生活中有轨电车的出现和电风扇、电动缝纫机等家用电器的发明，从而改变了社会文化的面貌。

电力革命带动了通讯手段的巨大变革，美国在电话和无线电通讯的应用和推广方面亦相当领先。美籍苏格兰人亚历山大·贝尔在这方面具有独到的贡献。1876年3月10日，贝尔及其助手托马斯·华生首次试验成功世界上第一部实用电话机，并在美国独立百周年费城博览会上引起国际轰动。翌年3月，波士顿的E·霍姆斯制成第一部电话交换机，使电话传递得以系统化。1880年3月贝尔电话公司成立，它以贝尔的各项专利为基础，大规模发展美国电话事业。当年就生产电话机47,900部，1890年达到227,900部，1900年更增到855,900部，美国成为世界上电话使用最为普及的国家。到19世纪末，无线电通讯也迅速从实验室走向了实用。意大利人曼彻斯·G·马可尼在1894至1896年间试验成功无线电通讯。1899年他被美国海军部聘为舰艇无线电设计师。同年又成立马可尼无线电公司，转入大批量生产无线电设备。通讯手段的突破把美国经济联结为更加紧密的整体，加速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同时，也为文化生活的多样化提供了丰富的来源。

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具有领先地位的汽车制造技术，在美国也是后来居上。1893年9月21日，杜里埃兄弟在吸收欧洲汽车技术的基础上，试制成功美国第一辆单汽缸内燃机汽车。这辆汽车外型奇特，车轮是木制的，车厢安有双人座椅和黄铜罩的煤油

车灯。当它首次行驶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大街上时，引来了无数人的好奇目光。同年，亨利·福特制成时速为25英里的汽车。紧随其后埃尔伍德·海恩斯和阿布尔森兄弟试制的汽车相继问世。在这些试制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美国汽车工业的雏型。

19世纪末美国能够在新技术的突破和推广方面取得如此成效，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实行多轨制的科技研究。政府基本上不插手研究工作，但给予资助和协调，主要由大学、企业集团和民间团体直接从事研究。例如，1875年康涅狄格州威斯莱阳大学在州政府和农业界的资助下，建成美国第一座农业实验站，对当地农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州纷纷仿效康涅狄格的经验建立起一批农业实验站。许多大公司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所，它们不再单纯依赖私人发明家的成果转让，而是高薪雇佣专家进行集体研究，为公司提供更加质优价廉、能迅速占领市场的产品。贝尔电话公司、柯达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都拥有竞争力很强的实验研究机构。还有许多民间团体和私人对科技研究和传播进行资助。英国化学家詹姆斯·史密森捐赠巨款在华盛顿建立史密森博物馆即突出例子。正是由于科学技术通过多种渠道进入社会生产，美国企业界得以出现跳跃式发展，并由此形成企业－大学－政府三者协调科研的模式和传统。

〔工业化的深入发展〕　　工业化发展不仅表现在新技术的突破和渗透方面，而且是各工业部门在生产规模和技术构成方面的质和量的进展。因此，这个时期美国工业革命不再是简单重复英国走过的道路，而是在十分广阔和深刻的层次上实现工业生产力结构的变革。

19世纪最后40年间美国工业的发展速度极为惊人。1860年它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居工业生产第4位，还不足英国工业总产值的1/2。到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已跃居世界首位，占世界

工业总产值的1/3弱，打破了英国工业的垄断地位。在这30余年间，美国工业增长率始终保持在4%至5%之间，在当时资本主义强国中首屈一指。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其年增长率为1.4%至1.7%；70年代人均产值531美元，到1900年已达到1,000美元。[①] 如果考虑到这个时期美国很高的人口增长率和移民人口，那么在30年内做到人均产值翻一番，也应承认是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标志。

工业化的直接后果是国民经济结构中工业与农业的比重发生根本变化。首先是制造业产值大幅度增长，其指数从1860年到1899年增长了6倍（从16增到100）。由此引起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开始下降。1884年美国工业比重在国民经济中第一次超过农业，[②] 美国开始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同时，制造业内部结构也发生变化，轻工业比重逐年下降，重工业上升。

工业化在各个部门的纵深发展也是相当迅速的，主要表现在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和新工艺技术的采用。在钢铁业中，自1863年底特律的沃德炼铁厂首先采用先进的贝塞麦炼钢法（即酸性转炉炼钢法）以后，各企业纷纷淘汰内战前用鼓风炼钢的陈旧工艺，转采新法。由此降低了炼钢成本，钢产量迅速上升。1868年，美国又引进了西门子·马丁炼钢法（即敞炉炼钢法），用这种方法炼出的钢较有韧性，适合制造机车锅炉的钢板。到90年代，苏必利尔湖富铁矿开发和高炉质量的提高，使马丁炼钢法进一步流行。随着新工艺的普及，美国的钢产量从1875年的不足40万吨上升到1900年的1,000万吨[③]。此外，大型高炉、

---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224页。

②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488—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14页。

③ 《美国历史统计》，第693页。

采矿电铲、卷扬机、大吊车、轧钢水压机等设备投入使用，使钢铁业的生产流程基本实现机械化。

钢产量的激增引起机器制造业的质变，一系列大型机械都以钢代铁，开始由本国工业生产。自动六角转塔车床、电动机、发电机、蒸汽机、建筑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内燃机等等都开始转向大批量生产。机械工业的投资也从1879年的2.4亿美元增至1899年的9.24亿美元[①]。机器制造业规模经济的联合化和专业化，又为零部件的标准化创造了条件。机械修配业和连续生产工艺都随之兴起。机器制造业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部分，它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连锁反应。

石油工业是19世纪末美国最为突出的新兴部门。1859年，埃德温·德雷克上校在宾夕法尼亚的泰勒斯维尔打出第一口油井后，“黑色黄金热”旋即风靡美国。整个60年代，原油开采企业从64个猛增到2,300多个，产值从200万美元跃至1,800万美元[②]。到60年代末，炼油业产量达到520万桶，其中出口27万桶，占当时美国出口价值的第4位[③]。70年代以后，石油业开始大量采用分馏和裂化提炼法，加速了炼油工业部门的自动化。同时，大规模铺设输油管道、扩大石油副产品种类，使石油工业向着多种经营的综合部门转变。到1900年，原油产量已近1亿桶，其中300万桶以上供出口。

各工业部门的产量提高刺激了对动力和燃料的需求。1870年制造业使用的动力总量为240万马力，1890年达600万马力；其中水动力不足1/4，蒸汽动力占3/4强[④]。在燃料方面，煤炭燃

---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684页。
② 《美国历史统计》，第580页。
③ 艾达·塔贝尔：《美孚石油公司史》，纽约1963年，第21页。
④ H.N.沙伊贝等：前引书，第40—41页。

料所占比重急剧上升，取代了木炭而成为主要燃料（1865年以前木炭占工业燃料的81%）。煤产量在1860年仅1,800万吨，到1899年煤产量已达2.3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1/3并跃居第一。

传统的轻工业部门如食品业、纺织业、成衣业、木材加工、印刷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较突出的是食品加工业。由于冷藏运输工具的发明和机械装配线的采用，肉类加工在芝加哥等地得到迅速发展，罐头食品开始在市场上行销顺畅。制糖业、榨油业、酿造业等因采用新的精炼和蒸馏工艺而使产量成倍增长。面粉业在采用“匈牙利碾磨法”（将数个钢磨辊用钢轴连结）后，能够大量加工小麦，使面粉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商品。服装、制鞋业也开始采用机械动力和流水作业，生产成本下降4/5。轻工业部门的巨额利润为其他工业部门提供了资金和市场，同时也基本满足了当时激增的美国人口的消费需求。

由于美国各地的自然资源条件不同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个时期工业发展的地域性特点也相当明显。在大湖区形成以钢铁业、机械业为主的制造业带。在密西西比河中游的伊利诺伊、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和密苏里则形成食品加工业带，其中芝加哥的肉类加工和农机制造，明尼阿波利斯的面粉加工业和圣路易斯的谷类加工都相当发达。中西部地区在1890年制造业比重方面已超过新英格兰地区，成为仅次于大西洋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地区，[①] 由此加速了美国经济重心的西移，1850至1890年间约向西移动225英里[②]。中西部制造业带更接近原料产地和市场，且居于腹地，铁路网发达，新企业较多，故在发展速度上

---

① 哈维·珀洛夫等：《地域、资源和经济增长》，内布拉斯加1960年，第152—153页。

② 福克纳：前引书，下册，第53页。

能快于东北部。东北部制造业带则以轻纺工业、造船业及外贸业为主，受海外市场影响较大。两大制造业带的形成，使19世纪末美国的全国市场更加一体化了。另一方面，地域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也十分突出。直到1880年，南部的制造业和采矿业产值仅1亿美元，只相当于北部的1/20。[①] 远西部和太平洋沿岸诸州尚在开创时期，工业化水平更低。上述地域特点说明，尽管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向纵深发展，但在其他地区仍有广大空间有待开发，即后人所谓20世纪的"工业边疆"。

〔交通业、通讯业的重大变革〕　促使全国市场进一步联结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另一重大因素就是19世纪末美国运输和通讯事业的突飞猛进。其核心部分就是铁路运输的巨大发展。全国铁路网总里程从1870年的5.3万英里上升到1900年的近20万英里，超过当时欧洲铁路里程的总和，相当于当时世界铁路总长的1/3。铁路建筑吸收了美国工业的很大部分生产能力，并带动了各部门的加速运转。美国经济史学界根据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19世纪末的铁路是当时经济生活中最重大的革新和原动力；铁路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和企业活动。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70年代以前，美国铁路大部分集中于北部，铁路网极不完整，缺乏复线和中间枢纽站，且轨距宽窄不一，各种型号达数十种。70年代以后，铁路进入大发展时期。1869年5月10日，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峰接轨，标志着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铁路正式建成，把西海岸与东海岸连接了起来。此后不久，大北铁路、北太平洋铁路、圣菲铁路和南太平洋铁路陆续筑成，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全国铁路网。在其他技

---

① 哈罗德·G·瓦特：《走向工业成熟》，康涅狄格1975年，第39页。

术设施方面，铁路也采用了许多更新措施。例如，以钢轨取代铁轨提高了路轨的耐久性和载重量，使用大功率机车和重型车辆提高了火车的运载能力，还有空气制动阀、自动接车器和连续信号系统提高了铁路运行安全系数。因此，铁路运输量急剧增长。1882年至1900年铁路客运量从2.89亿人次增到5.77亿人次，翻了一番；货运量也增加了2倍。[①] 铁路运输能力基本上同整个经济增长保持平衡。

政府对铁路的鼓励措施主要是进行土地赠予。从1850年至1871年，联邦政府赠予铁路的土地达1.75亿英亩，铁路实际得到土地约1.3亿英亩。同时，政府还给铁路公司以优惠贷款，共约6,500万美元，这些贷款刺激了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对美国铁路的资本投入。即使在当时的高关税政策下，政府仍对进口路轨实行免税。这些措施保证了主要铁路干线的建成。例如中央太平洋铁路投资的1/4和联合太平洋铁路的1/3投资均来自赠予土地的价值。由于西部铁路与土地联系在一起，铁路也很快成为向西移民和运出农产品的主要渠道，由此赢得的巨额利润往往又转变为对铁路的再投资，铁路投资总额亦随之不断增加，到1894年已达100亿美元[②]，成为当时美国经济中资本投入最多的部分。

铁路同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关系越紧密，陷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程度也越深。由于铁路重复铺设过多，造成营运不足、成本上升；互相竞争导致运价下跌；加上掺水股票使资本周转极不正常；每当危机到来时，铁路受到打击最早、最重。1893年危机中全国1/4以上的铁路宣告破产。纽约金融界乘机大肆兼并。

---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428—431页。

② 《美国历史统计》，第738页。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4个大集团初步形成。其中由J.P.摩根、詹姆斯·希尔和范德比尔特组成的集团实力最为雄厚，控制铁路里程约8万英里。库恩—罗比公司和爱德华·H·哈里曼组成的集团控制了25,000英里铁路里程和拥有5万英里铁路的大部分股票，位居第二。其三是古尔德家族集团，控制里程约17,000英里。第四个集团是罗德艾兰集团拥有15,000英里铁路线。这4个集团掌握着全国铁路总收入的85%。各集团之间通过股权渗透、兼任董事、普尔联营等方式，使各铁路公司盘根错节地交叉在一起。

其他运输业虽然不及铁路发展迅猛，但也各有其特殊的发展方式。内河运输在这个时期较为萧条，密西西比流域的航运大部分尚未开发。东北部的运河系统亦过于陈旧，不适合大批量运输。仅五大湖流域水运还较繁忙，主要以驳船运输笨重物品和煤铁矿石，其运量从1865年的67万吨上升到1890年的100万吨。由于大湖地区的水运费用仅为铁路的2/5左右，故这一地区的水运在20世纪仍呈上升趋势。这个时期美国海上运输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船队来承担，只是沿海贸易保持由美国船队承运，其船舶吨位总和逐年上升，1890年达到340万吨。尽管如此，美国到90年代也开始加紧远洋轮的建造，建立起4个可生产万吨级海轮的大型船厂，为日后的大规模远洋贸易打下基础。其他陆上运输工具以输油管道发展最快，到90年代末，已建成油管约1万英里。市内交通则出现了地下铁道、高架铁路、有轨电车等。这些运输手段补充了铁路运输的不足，构成了更广更深的全国运输网络。

运输系统的巨大发展使邮政、通讯事业相得益彰。从1863年后城市居民开始实行自由邮递制度，到1896年这项制度已普及到大部分乡村。国会在1872年先后立法规定新的邮政分类和

优惠邮件制度，报纸和印刷品均在优惠之列。报纸成为传递商业消息的最重要工具，1880 年至 1900 年间的报纸发行量增加了 5 倍。随着电话、电报等通讯手段的发展和普及，19 世纪末美国已有初具规模的电报、电话网络。1856 年成立的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经过 30 年竞争，购买了 575 家电报公司的所有权，在 1886 年确立了在电报业的统治地位，建立起较完整的全国电报系统。1876 年成立的贝尔电话公司后来居上，它购买了几乎每个县的电话特许权。到 1880 年它所经营的电话线已达 300 万英里，并在 90 年代建立起遍及整个美国的贝尔电话系统，其作用超过了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电话在美国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迅速普及，1880 年每千人仅拥有一台电话机，到 1900 年已达每千人 18 台。通讯事业的巨大变革使工商业活动得到充分信息，周转加快；使巨大的企业集团能做出集中决策并分散经营；使铁路远距离运行受到更完备的监控；使政党斗争变幻更加莫测，政府对各地出现的紧急事件能作出更迅速的反应；还使人们能在大陆的各端之间保持联系，从而加速了社会流动性。总之，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变革使 19 世纪末的美国跨入了现代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门槛。

第二节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向垄断过渡的市场条件〕　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出现，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基本前提。然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还必须获得有利的市场环境。19 世纪末的美国正是具备了流通领域的各种变化条件，使商品和金融的运转渠道最终汇集到少数资本集团之中。

首先是工业化形成的城市群和制造业带，为生产集中创造了

有利条件。1880年，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和大湖区集中了全国制造业的4/5和城市人口的3/4。这部分工业心脏地区吸收着最大量的农产品和原料，并依靠铁路网把产品输送到全国各地方市场。制造业带内各企业短兵相接，竞争加剧，有利于少数占据生产优势的大企业形成垄断地位。同时，地区的专业化更为部门经济垄断化提供前提。例如，位于苏必利尔湖富铁矿和宾夕法尼亚无烟煤矿之间的匹兹堡，就成为当时独一无二的钢铁工业中心，并由此产生了强大的"美钢"体系。处在西部盛产谷物和肉类的大平原与东北工业区的粮食主要消费市场之间的芝加哥，则迅速兴起独占鳌头的食品加工业和农机制造业。克利夫兰落在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大油田中心地带，从而成为石油巨头"美孚"的发迹地。所有这些，都证明美国的生产力布局特别易于形成高度的垄断组织。

其次，因大批量商品生产而使流通方式发生变革，也为垄断企业深入市场结构的深层，控制整个社会的消费创造条件。19世纪末美国已形成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连结的商品销售网，中心城市为外围市场的商品进行仓储、批发、结算和装运。旧的直接出售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现象逐渐减少，代之以直接与大企业集团挂钩的百货商店、联号商店、邮购商店以及它们下属的零售商店。强大的商品洪流在各方面推动下摧垮小企业的陈旧流通方式。例如新颖的商标、大规模的广告、耐用消费品的赊销方式以及顾客自选自购等等，对资本雄厚的大企业无疑是强有力的刺激。在生产领域内，开始形成专业范围内联合的批发商集团，他们为企业承销商品、代购原料、供应零部件、开辟市场以及向零售商扩大信贷等等。专业化批发商促使企业将资本更集中于生产领域而较少地搁置在流通领域中。而且采用新技术的大企业可以不断降低批发价，迫使落后的同行们屈服。商业广告费用在

1867年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左右，到1904年已上升到3.4%[①]，这个水平一直保持至今。这说明激烈的市场竞争最终为垄断企业打开了道路。

其三，交通运输条件空前发展也是垄断企业打破地域隔阂，确立其全国性优势的保证。在内战前，美国的贸易格局大致是货流顺着密西西比河由北向南、沿着伊利运河和五大湖由东向西而进。但是80年代全国铁路网的建成完全打破了这个单向的格局。货物已能够向任何方向运输，支配货流的已不是地区需要，而是经济利益了。在某个部门占据优势的企业打败了临近地区的竞争对手后，可以利用铁路向存在着其他对手的较远地区倾销，直至确立完全的垄断地位。美孚石油公司在这方面是最为突出的。某些势均力敌的大企业各自勾结不同的铁路集团，展开残酷的“运价战”。结果是加速了铁路的合并和大企业之间的联合。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的中心城市几乎都成为少数垄断企业争夺的目标，并且最终形成了适合于市场条件的垄断体系。直到本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体系才发生变化。

其四，技术市场同样是孕育着垄断组织的温床。19世纪末技术革新和发明层出不穷，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日益扩大的技术市场。因美国政府的专利保护制度，促使企业必须以高价抢购最为有利可图的新技术。许多大公司依仗其雄厚资金收买某个部门的全部或绝大部分专利，从而在实际上消除任何对手竞争的可能。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原来的贝尔电话公司）等垄断组织，几乎都是依靠专利垄断发展起来的。尽管在新技术工业中形成垄断的现象较为普遍，但是在传统

---

① 丹尼尔·波普：《全国广告业的发展，1865—1920》，载《经济史季刊》1974年，第295—296页。

工业部门中亦发生类似现象。如联合制鞋机械公司通过各种手段取得该行业的所有技术专利权，从而控制了制鞋工业的全部生产。技术优势与资本优势就是如此转化的。

有利于垄断形成的市场条件还有阻止外国商品竞争的高关税政策和廉价而丰富的农产品及原料市场等。所有这些都为美国垄断资本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资本的加速积累和集中〕　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带来资本的加速积累和集中，由此构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厚基础。资本积累的规模决定了资本集中的程度。内战后美国经济正体现了这种积累规模大、速度快的特点。

1865年以后美国的社会资本积累率以每10年增加45%至60%的速度上升，相当于人口增长速度的2至3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资本积累价值：1869年为1,120美元，到1899年达3,250美元，大大超过人口平均产值[1]。这些数字说明在这30年中投资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就生产投入要素的指数来看，从1860年到1900年间，劳动力增长1.5倍，土地增长1.5倍，国民生产净值增长4倍，而资本增长达7倍[2]。远远超过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规模。资本积累的主要成分是固定资本即生产资料的增长。因此，高积累率首先是促使资本流向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即基础工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较快形成资本密集型的垄断企业。

在制造业部门中，资本积累总额在1869—1881年间是240亿美元，在1882—1901年间约为600亿美元。这巨额资本主要来源

---

① 西蒙·库兹涅茨：《美国经济中的资本：它的形成和积累》，普林斯顿1961年，第64—65页。

② 苏珊·李与彼得·帕塞尔：《美国经济史的一种新观点》，纽约1979年，第268页。

有内战中获取暴利的商业资本，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工业资本，利用存款进行投资贷款的银行资本以及政府提供的拨款和津贴。外国资本也积极投入美国制造业。1865—1898年间，外国投资者控制的美国债券和股票已达34亿美元。丰富的投资来源与高积累率相结合，使工业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内战前美国的投资额近百万美元的企业寥若晨星。但到1900年，资本额在百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已比比皆是。它们占企业总数的0.9%；却占工人数量的25%和工业产值的38%，表明这类大企业在19世纪末已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①] 以钢铁工业为例，在1870年钢铁厂平均投资额只有15万美元，但到1905年已增至150万美元，其中居垄断地位的美国钢铁公司的投资额已达14亿美元[②]。制造业中其他重工业部门的企业投资规模也大致相同。

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仅仅依靠某家独立企业的资本力量是无法进行的。为了动员和筹措各方面的资金来源，股份公司成为内战后工业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股份公司具有迅速膨胀资本的功能，在资本集中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它“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③] 内战后的铁路公司正是这种“巨大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④] 铁路公司为了吸收尽可能多的资金，采用了小额票面股票、持有者承担有限责任、利率根据面额大小而浮动、给予保险的优先股票等等股票经营和运转方式，使股份公司

---

① 菲特与里斯：前引书，第462页。

② 同上。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87页。

④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7页。

的资本集中速度大为加快。随着铁路狂潮的兴起，铁路公司又进一步采用比股票更吸引投资者的债券发行，持有人的权益更加得到保证。到70年代，主要铁路公司的资本都在1,000万美元以上，中央太平洋、巴尔的摩—俄亥俄、纽约—伊利等铁路公司都超过2,000万美元。[①] 其资本集中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工业部门。到1883年，各铁路公司的名义资本总计已达75亿美元。[②] 尽管其中约有20亿是资本估值过高的掺水股票，这样大规模的资本积聚仍是当时所罕见的。80年代各工业部门也纷纷组成股份公司，加速了工业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到1899年，股份公司的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产值的2/3，成为美国工业生产的主体。[③] 股份公司从内部结构到数量的变化和发展，为企业合并、过渡到垄断提供了现成的资本集中手段。

此外，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也为企业资本积累和集中提供尽可能的有利环境。从1872年开始，国会完全取消了所得税。这时正是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进入大发展的时期。取消所得税就意味着以各种证券形式进行周转的资本不对社会和国家承担任何义务。银行和工业资本在整整40年间（至1913年重新实行所得税）完全在竞争、联合、投机和吞并的市场调节中走向了集中。相反，联邦政府以关税、土地税和商品税为主要财源，向内战和重建时期购买国债的大资本归还本息27.558亿美元，[④] 有力地加强了东北部大资本的竞争优势，且使社会财富更快地积聚到大亨寡头手中。内战后的联邦货币政策特别有利于东北部银行资本。它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过剩通货在广大西部、南部货币匮乏的地区

① 格伦·波特：《1860—1910年大企业的兴起》，纽约1973年，第32页。

②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419页。

③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463页。

④ 《美国历史统计》，第720—721页。

发放贷款、从事抵押，由此获得巨额利润。经过增值的货币双向流动，又转向银行对工业的投资与贷款，在一个更大范围的循环中实现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因此，“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向垄断。”[①]

总之，资本的积累、积聚和集中是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关键因素，它与前述有关的市场条件相结合，为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部分质变开辟了道路。

〔简单协定、普尔和托拉斯〕　主要生产部门内若干个大企业的并存，形成尖锐的对峙和竞争。70年代至80年代，大企业之间的价格战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有时双方削价竞争以致难以承受其巨大损失。例如，从芝加哥到纽约当时的每车皮标准运费为110美元，但在“运费战”中降至仅5美元，甚至低到1美元。许多中小企业在这种残酷倾轧中破产倒闭，少数势均力敌的大企业不得不实行暂时妥协以避免同归于尽的后果。它们通过各种协定或联合的方式来防止过分的价格竞争，保持一定的市场秩序和利润水平。70年代以前的简单协定主要是限制各企业的产量和规定共同价格。这些协定大多是口头默契而缺乏法律约束力，其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极为明显。尽管这种协定一度盛行，但由于参与者们随时背弃，残酷的市场竞争有增无已。因此，它就很快被成文的普尔协定所取代。

普尔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垄断组织，其形式也相当繁多不一。从规定产量、价格或划分销售市场，到设立总经销机构，各种流通领域的垄断方式都包括其中。最初是铁路公司采用普尔来控制运价，接着在黄铜业、制盐业、制绳业、煤炭业、酿酒业等部门相继出现。其中以密歇根食盐协会最为典型。70年代初，全美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40页。

国共有66个盐业公司，互相展开剧烈竞争，每桶食盐销售价猛跌到1至0.5美元。为了制止价格进一步下降，各公司在1876年组建了密歇根食盐协会。其成员公司组成了19人的总经销机构，控制全国食盐销售量的85%。[1] 各成员公司在生产方面仍保持独立，但在销售领域则完全服从于总经销机构，实际上协会已具有辛迪加性质。钢铁业也盛行普尔。1887年成立的钢轨普尔垄断全国钢轨销售的90%以上。[2] 钢轨普尔规定其成员公司的产量，销售价格则由各方协商达成默契。这种普尔具有卡特尔性质，其他工业部门中也较为常见。

各种普尔的共同特征是在流通领域的集中和控制，是走向垄断的重要步骤。但普尔是不同企业在特定条件下的松散联合；一旦条件发生变化，这种松散的利益结合即顷刻瓦解，有关企业可以自由退出或任意违反协议而不受惩处。普尔的市场控制是以牺牲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利益为基础的，因而激起社会中下层的强烈不满。而且普尔恰恰触犯了美国关于禁止商品贸易中实行限制性行为的习惯法。1887年州际贸易法明文规定铁路普尔为非法行为。这样就使很不稳定的普尔更加失去法律的保护屏障。到80年代末，除了一些短期普尔以外，大公司一般放弃了这种合并形式。

美国的企业联合形式的第二步就是托拉斯的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托拉斯是各企业通过财产托管人而将所有权合并的垄断组织，而不是泛指一切垄断组织或联合企业、大公司。这种在生产集中的基础上形成的高级垄断组织形式首先由美孚石油公司创立。1882年，美孚石油公司采用“财产托管人”的古老形式建

---

① 范·海斯：《集中与控制》，纽约1921年，第65页。

② 埃利奥斯·琼斯：《美国托拉斯问题》，纽约1928年，第9页。

立了美孚托拉斯。美孚在石油生产的各部分（除原油开采）自成系统，并控制了全国炼油、副产品加工及输油管运输的90%以上。整个美孚托拉斯由40家公司所组成，全体股东推举9名托管人组成董事会，然后将各公司的财产转移到董事会名下，各股东凭托管证按照股份比例在利润总额中获得其应得份额。美孚托拉斯拥有24家公司的全部股份和16家公司的部分股份，发行股票价值7,000万美元，9名托管人拥有其中4,660万美元股票，占股票总额的66%。美孚逐步健全托拉斯组织机构，在董事会下设行政委员会、协调委员会以及专门职能部门组成的办事机构。托拉斯的出现，为企业合并并确立其垄断地位找到一种合法的组织形式，从而在其他工业部门也相继出现托拉斯组织。如棉籽油托拉斯（1884年）、亚麻籽油托拉斯（1885年）、威士忌酒托拉斯、铅制品托拉斯、制糖业托拉斯（均1887年）等等纷纷建立。1887—1897年间资本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大公司共86个，其中20多家大公司垄断了所在部门的生产与销售。这些托拉斯大多出现在加工工业、从事消费品生产的部门，这成为早期垄断组织的一个特点。

列宁指出："美国托拉斯是帝国主义经济或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表现。"[①] 托拉斯是资本积聚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是生产集中并走向垄断在生产关系上的直接体现。托拉斯适应了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其内部组织结构的系统化和计划化为联合企业的运转提供了机制。然而，托拉斯所带来的社会财富更加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加剧了社会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并加深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由此引起了资本主义向着部分质变的新阶段发展。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5页。

〔企业合并高潮与控股公司〕　19世纪末的美国企业合并进展迅速，在主要工业部门的产量增长与企业数按反比递减。例如，钢铁工业在1870—1905年间产量增加了9倍，企业数却减少了2/3。1880—1905年造船吨位增加1倍，而造船厂减少了1/2。[①] 农机制造业在1860—1905年产值增加5倍之多，工厂数减少了1,500多家。这些都说明生产集中必然伴随着企业合并高潮的到来。

美国垄断组织的发展主要通过纵向合并和横向合并两种趋向进行的。纵向合并是从控制部门内的生产加工过程开始，继而控制其原料来源及销售市场。纵向联合对于专业化企业的流水线生产和有计划分配原料资源十分有利。横向合并是某个或几个大企业将同一产品或相近产品的生产加以控制，进而对该产品销售实行垄断价格。事实上的合并过程往往是纵横交错的，但由于各工业部门生产性质不同，其合并过程则以某种趋向为主。

肉类加工业是纵向合并的突出例子。70年代以前肉类加工的各生产工序包括牲畜屠宰、鲜肉处理、包装都是由许多小公司分别完成。这些小企业虽大多集中在芝加哥，但销售市场主要在东北部城市。生产分散和运输损耗造成很高的生产成本。1878年古斯塔夫斯·斯威夫特建立将各工序联合为一个过程的大公司，他在中西部牧业带建立大型屠宰厂，就地购买和屠宰牲畜；然后用公司的冷藏车把已加工的肉类运往东北部城市；同时在各大城市建立大型冷藏库加以贮存。在此基础上公司又与各地零售商联合经销，从而大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安德鲁·卡内基公司是纵向合并的又一典型例子。70至80年代，卡内基一方面大力投资于新技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控制铁矿石、煤炭和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470页。

焦炭等原材料，并建立起公司所属的运输船队和专用铁路线，从而在钢铁工业中最早形成完整的生产体系，使匹兹堡迅速成为钢铁工业的中心。

如果说生产过程本身要求企业实现各种形式的合并，那么周期的经济危机则大大加快了合并的步伐，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催化剂。1893 年经济危机就是美国垄断组织发展史上的重要界标。这次危机以金融混乱为起点，使大批资本不足的中小企业纷纷破产，企业合并进入了高潮。这次企业合并高潮从 1893 年持续到 1904 年，其间所组成的托拉斯组织 350 个以上，破产企业达数万个。拉尔夫·纳尔逊认为这次合并高潮中“几乎有一半企业被吞并了，并且有十分之七的合并资本都属于在市场上取得领导地位的那些合并者所占有。”[①] 经过这次合并高潮，大约有 3,000 个企业的 68.127 亿美元资本被合并到垄断组织之中。[②] 至此，美国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已相当深刻地表现出来了。经济危机只不过是将 19 世纪最后 30 年新旧结构交替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激化，并转变为新结构的基础。

在这次合并高潮中垄断组织不仅在量的方面发展迅速，而且在质的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即出现了垄断组织的更高形式控股公司。当时的合并方式一是大公司将其他公司的股票与财产全部收买，另一则是采取控股公司，这较之完全收买方式更有利于资本积聚和集中。控股公司是由母子公司组成金字塔式的系统组织。母公司只要掌握子公司一定比例的股票份额，即可获得对子公司的控制权；子公司又以此来控制孙公司。但在经营管理方面，子

① 拉尔夫·勒·纳尔逊：《美国工业的合并运动，1895—1956 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第 102 页。

② 拉尔夫·勒·纳尔逊：《美国工业的合并运动，1895—1956 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第 37 页。

公司仍保持相对独立。新泽西州最先对控股公司给予法律保护。1888—1896年该州为了吸引各大公司的投资，多次修改立法以保证控股公司的合法地位。于是，许多垄断组织纷纷在新泽西州办理营业执照。仅在1899—1901年间，新泽西州每年签发的公司营业执照就达2,172份[1]。西弗吉尼亚、特拉华、缅因等州也如此效法。垄断组织由此逃避了反托拉斯法的限制，更加无所顾忌地开展各种企业合并。1,000万、5,000万以至1亿美元资本的大公司遍布美国各工业部门。

在创建控股公司的过程中，美孚石油公司在1899年率先从托拉斯变为控股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即当代的埃克森石油公司前身）。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形。母公司控制着41个子公司的股份，子公司又控制着70个孙公司，孙公司还拥有自己的下属公司和企业。[2] 原来托拉斯的财产托管证被取消，资本集中程度大为增强。其生产过程的整体性也进一步提高，石油生产、储存、运输、销售各环节之间形成有机的紧密联合。母公司以决策权为中心，而子公司则保持独立经营的灵活性，改变了以往托拉斯过分集权的弊病。控股公司改变了董事会集所有者和管理者于一身的状况，扩大了经理—管理阶层，建立起“集中化和部门职能化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控股公司的结构比托拉斯更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其垄断程度也更高，因而是一种较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企业合并高潮扩大了证券交易市场的作用。1893年危机后，证券交易从经营政府公债和铁路股票转向以工业证券投机为主。

---

① 拉尔夫·海迪夫妇：《大企业的先驱，1882—1911年》，匹兹堡1968年，第309页。

② 拉尔夫·海迪夫妇：《大企业的先驱，1882—1911年》，匹兹堡1968年，第312页。

大约有3/5的合并企业股票在当时进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公司发行巨额证券以吸引资本，从而使金融界越来越渗透到工业资本之中。银行参与工业有价证券的投机交易和公司改组，成为证券市场的中心。另一方面投资银行在这时期蓬勃兴起，作为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的中介人，通过代销证券控制企业，从而加速了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的融合。J.P.摩根就是在这种融合过程中成为美国最大财团的首领。他控制的商业银行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拥有雄厚的金融实力，以此为基础对钢铁、造船、电气、农机、铁路等部门进行巨额投资，控制了许多垄断企业的股份，从而形成美国第一个大财团。约翰·洛克菲勒的美孚集团也在90年代打入金融界，他通过詹姆斯·斯蒂尔曼控制了花旗银行，进而向其他工业部门和铁路投资，形成当时美国的另一个金融中心。

总之，1893年危机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全面形成，现代美国经济的模式已具雏型。

〔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资产阶级内部分化为垄断资产阶级、旧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三个层次，它们既互相分离又互相结合。以此为轴心，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对流和变动。

19世纪末垄断资产阶级已控制了美国经济的命脉。他们凭借其在生产领域的支配地位，占有着与其人口比例极不相称的社会财富。当时的百万富翁家庭不到全国家庭总数的1%，但其个人收入却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0%以上。据1892年的统计，这些百万富翁中约有1，300名从事商业、投资业和银行业；600多名在制造业中，200多名在交通运输业；此外还有400多名在采矿、木材和石油业[1]。大约有100余个超级富翁平均拥有财富在2,500

① 康马杰等：前引书，第2卷，第362页。

万美元以上。最为富有的寡头仅 10 人，其财富都在 1 亿美元以上。垄断资本家吸收着全国红利收入的 2/3 和利息收入 1/2，说明他们是食利者阶层的主体。反映出这个阶级的生存基础和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垄断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急剧分野，是这个时期整个社会阶级结构最主要的变化。

曾经有过"黄金时代"的美国中产阶级地位急速下降。他们所赖以存在的旧生产方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更无力抵御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和垄断企业的残酷倾轧。在 1873 年和 1893 年的两次经济危机中，中小企业破产总数达 411,908家。[①] 然而，独立企业在数量上仍占企业总数的 90% 以上。旧中产阶级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厄运，只得改变其活动方式。其中一部分保留着企业所有权，但在原料和市场等方面不断被垄断企业所控制，逐步成为附属于大企业的专业化协作企业。另一部分被兼并的独立企业主则失去对工厂的控制权，成为股票持有人而分得少部分红利。尽管如此，旧中产阶级地位仍极不稳定，或者由于其"局外性质"成为大财团转嫁危机的牺牲品，或者由于股票行情大幅度浮动而变得身无分文。虽然旧中产阶级也具有向工人榨取剩余价值的本质，但他们也力图通过国家权力来改变垄断资本造成的严重弊端，以改良主义来缓和社会矛盾。在没落之中提出某些进步的要求，是旧中产阶级两重性的特征。

与旧中产阶级相反，"新中产阶级"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这个阶层本身并不拥有企业所有权，他们受雇于垄断资本的大企业；但是他们掌握着一大部分企业管理权，并成为"集体资本家"各层次之间的纽带。控股公司和联合企业的多层

---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 912—913 页。

次结构，造成资本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是新中产阶级产生的首要前提。垄断企业的跨州、跨部门活动使垄断寡头只能在纽约、芝加哥等中心城市遥控，企业的直接管理就操于经理人员之手了。财团大公司的合并、协定、交易等往往委托给中介代理的专职律师、经纪人等，他们比董事们更熟悉整个公司的运转和联接。例如，埃尔伯特·盖利作为法律顾问办理从苏必利尔铁矿到卡内基公司的12个大公司合并，组成了巨大的美国钢铁公司，盖利本人也从一名律师跃为总经理。垄断企业为了在竞争中打败对手，尽量采用新技术和高效管理、网罗科技和管理人员，从而扩大了新中产阶级的来源。到1900年，农业以外各经济部门的经理人员已达151万人，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有38万人。[①] 其中像创造“血汗劳动制”的泰勒，为垄断资本获取高额利润使用了“一切科学方法”。新中产阶级的两重性同样十分显著：新中产阶级本身受雇于垄断资本，但其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一般雇员之上，最高年薪可达10万美元以上，故也参加了瓜分利润的行列；其中少数人虽然有可能进入财团核心，但多数却地位不稳定。新中产阶级本身执行着个别财团代理人的职能，但其中很多人鼓吹国家干预政策，试图把企业内部的计划管理用于社会改革。新中产阶级的两重性，是进入垄断时期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复杂化的关键性因素。

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阶级结构仍带有新旧交替的特点，但其基本趋势是垄断资产阶级同整个社会日益处于对立状态之中。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条件而出现的新阶层，同时也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否定因素在发展着。

---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141—142页。

第三节　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农业商品化和地区专业化〕　在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的同时，农业资本主义也在19世纪末叶获得巨大发展。一方面是西部农业开发和耕地面积空前扩大；另一方面是农业机械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的水平迅速提高。60年代宅地法实施和横贯大陆铁路的修筑，使移民如潮水般地涌向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平原和落基山麓垦荒拓殖。1866年至1900年，全美国的耕地面积由4.07亿英亩增加到8.79亿英亩；农场数由204万个增加到643万个。[①] 其中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发展更加迅速。1870年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农业总产值为全国农业总产值的16%，到1890年已上升为33%[②]；西部人口在全国的比重也从1870年的14%上升到1900年的25%[③]。西部农业的迅速崛起表现出19世纪末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在广度上发展的特点。由于耕地面积急剧扩大，美国农业在这个时期迅速实现以畜力为动力的半机械化。1860—1900年间，农业机械和农具总值从2.46亿美元增加到7.50亿美元。农业劳动生产率成倍地提高。90年代末的小麦劳动生产率比内战前提高了17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农业在这40年间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其总产值也从1860年的22亿美元增加到1900年的58亿美元。这种农业发展速度尽管得力于美国自然条件的优厚，仍然是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228页。
② 沙伊贝等：前引书，第49页。
③ 沙伊贝等：前引书，第56页。

农业生产力提高是与农业商品化程度加深同步进行的。横贯大陆铁路的建成把西部农业与整个国内外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深深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西部农业的生产一直以东部工业城市的需求为市场，并以此来交换所需农业机械和消费用品。东部和南部的农业商品化程度也比内战前大为提高。农产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大量出口成为欧洲市场的主要供应者。例如小麦出口在总产量的比重从 1878 年的 35.8% 上升到 1893 年的 41.5%。其他大宗产品如棉花、肉类等也一直保持着出口的上升趋势。

农业商品化趋势促使美国农业原有的地区专业化进一步发展，在各地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以单一作物集中种植的“生产地带”。主要有西部小麦带、中部玉米带、东北部多种经营带和南部棉花带。

内战后，小麦带从原来的俄亥俄河流域向西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密苏里河中上游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小麦生产适合于大规模经营，故在这些地区形成一批耕地面积在1,000 英亩至 1 万英亩、实行雇佣劳动制的巨型机械化农场。这些大农场一般直接接受东部的投资和管理，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小麦生产对美国外贸具有重要意义。1860 年美国出口小麦 400 万蒲式耳，仅占出口总值 1.5%；1892 年已达 1.57 亿蒲式耳，占出口总值的 21%。[①]

玉米带主要集中在从俄亥俄、伊利诺伊到艾奥瓦、内布拉斯加等中部诸州。这个地区土壤肥沃，气候温暖；加以盛产玉米作为饲料，故又成为全国主要的牲畜产区。到 80 年代，这里除了生产全国一半以上的玉米以外，还提供了全国食用肉类和肉制品

①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第 127—128 页。

的50%。19世纪最后40年间，玉米产量增加近2倍，肉类出口也随之大幅度上升。

随着中西部和大平原农业迅速开发，东北部地区不得不调整农业生产格局以应付竞争。同时，由于东北部城市居民的食品结构发生变化，这一地区农场主减少了谷物和肉类的大宗生产，转向经营乳制品、家禽饲养、水果、蔬菜和花卉种植等，形成了多种经营农业区。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南部也发展起类似的农业—养殖业经营。

南部在内战后仍保持其棉花生产带的特点。70年代末，南部棉花产量近580万包，超过内战前最高水平。到1899年，棉花产值已达3.24亿美元，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11%。由于南部分成制的束缚，其机械化水平远低于其他地区。

农业地区专业化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化程度。各地区的大规模农产品交易促使在纽约、芝加哥、新奥尔良发展起巨大的农产品交易所。开始多以当场拍卖、银货两清的方式进行“现货”交易。不久，期货买卖盛行起来，农产品的流通速度随之加快。农场主对市场价格变动日趋敏感，竭力依靠农业机械和改良技术来提高产品竞争力。因此，农业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必然推动其机械化，进而要求粗放农业走向资本密集型农业。

〔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及其变型〕　内战后西部农业的迅速开发，为美国农业发展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欧洲国家的道路，即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其基本特点是宅地农民较为自由地获得西部土地，迅速发展起与国内外市场相联系的商品化农业；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农场主发生多层次分化：少数上升为资本充足的机械化大农场主，多数则由于缺乏资本、陷入抵押债务而成为受东部金融资本控制的租佃农场主，另一部分因破产失去生产手段而沦为农业雇佣工人。美国式道路除了上述主

要趋势以外，还发展出一系列变型，即发展类型不同的北部、西部和南部；以及各种合作制的农业组织、国家支持下的农业技术机构和水利设施。因此，“美国式道路”不只是资产阶级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手段和途径，而且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形成的一种模式。

北部（主要包括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各州和大湖区东部）是工业发达地区。这里集中了全国工业的5/6，从而为当地农业提供了市场潜力和资金来源，促使北部农业朝着集约型农业不断发展。北部农场的土地经营面积较小，但机械化和投资水平均较高。到19世纪末，这个地区农业的耕地面积有所减少，但单位面积上地上所拥有的农机具和雇佣劳动费用都不断上升，表明北部农业的资本化程度加深。北部农业由于以乳制品、蔬菜水果等产品为主，故其耕地面积远远少于西部和南部，但其产值却占全国农业的一半以上，成为全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农业区。北部农业模式是“美国式道路”中较为成功且代价较小的一种变型。

西部农业是“美国式道路”的典型模式。首先，内战后农业资本主义在西部的广泛发展与资本化的深层发展存在着尖锐矛盾。在80年代，大平原地区建立一个完整农场至少需要1,000美元以上的投资，用于房屋建筑、围栏、水井和购买机器、工具、饲料及种子等。而新到西部的农场主很难付出这笔资金，加以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不断追加资本以更新设备和提高技术，否则就难以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这样，一个农场主如不具备3,000美元资本作为最初投入，就不得不弃地而走。而这个时期数十万个农场在西部落户，其所需资金总额就极为惊人了。加上西部缺乏银行和通货，农场主能够取得资金的主要来源就是以土地抵押来取得东部银行和铁路公司的高利率贷款。因此，西部农场主走向破产

的主要途径不是大农场的排挤和竞争，而是东部金融资本渗透和控制。其次，西部农业的超速膨胀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市场条件，造成19世纪末持续农产品价格下跌，是西部农场主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19世纪最后30年的美国粮食生产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率，国内农产品市场相对狭小的同时，国际市场上又遇到加拿大、俄国、阿根廷、印度、埃及等国农产品的有力竞争，加上铁路和工业垄断组织竭力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抬高农产品运价等，使农场主陷于"成本—价格两面夹攻"的困境。1870—1895年间，美国的小麦、玉米、棉花三种主要农产品价格分别下跌了35%至50%[①]。这种市场形势促使西部农场主走向破产。其三，落后的宅地农场生产方式遇到了正在形成的垄断资本的有力破坏，使之不得不被纳入整个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轨道之中。一家一户进行独立垦殖的宅地农场主，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农业生产的典型组织形式。在19世纪末的商品化、机械化大农业中立即显示出它的陈旧落后的特点。宅地农场主面临着强大的铁路公司、谷仓公司、土地抵押公司以及东北部各种工业垄断组织，难以进行有效的抵抗。尽管农场主进行一系列合作运动试图改变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但他们缺乏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生产手段，故无法同垄断资本进行抗争。因此，宅地农场的独立性日益丧失，只得以租佃农场的形式屈从于东北部垄断资本的控制。一部分农场主则完全失去生产手段成为农业工人。可见，作为典型的"美国式道路"的西部农业，其最后归宿是在资本、市场和土地所有权等方面"相当完整、相当显著、相当痛苦地"依赖于垄断资本。

南部农业发展不同于典型的"美国式道路"，那里的小农基

① R.A.比林顿：前引书，第631页。

本上没有获得自由土地，因而不具备发展“美国式道路”的基本条件。内战后在原来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谷物分成制，是北方的高利贷资本、南方的种植园土地所有者和缺乏生产资料的小农三者的畸形结合。这种半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方式在美国南部存在近一个世纪，使南部资本主义农业走上一条缓慢、痛苦的“普鲁士式发展道路”。（关于南部分成制请详见第二章第四节）

〔*农业新技术的突破与普及*〕　19 世纪末美国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1862 年联邦政府建立农业部，其最初宗旨就是协助农场主了解最新的农业技术和市场行情。农业部及时收集各地农业生产的成功经验，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推荐。农业部下属的研究机构开展多种科研活动，研究动植物疾病的控制方法，积极引进国外的农作物新品种并加以推广。1889 年初，农业部正式升格为内阁部，下设“牲畜工业局”、“植物工业局”、“农业化学工程局”、“昆虫与植物检疫局”等，到 20 世纪初该部已拥有 40 个局处，成为一个行政管理与科研综合的部门。农业部先后引进外国植物达43,000 种以上，其中还有来自中国的许多优良品种。农业部在各州设立野外实验站，对植物病虫害进行防治和预报，使美国在 19 世纪末一直未发生大面积的农作物虫灾。在农业部的示范下，各州政府在 70 年代至 90 年代陆续建立农业管理部门，使整个农业管理和科研体制层层得到落实。

在农业部建立的几乎同时，1862 年联邦政府颁布了以促进农业教育为目的的莫里尔土地法。该法全称是“设立学院以促进农业和机械工艺在各州和准州授予公地的法案”。在莫里尔法的推动下，建立起一批州的大学、农业学院和农业专科学校，并通

过短期训练、函授教育等方式来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在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等州建立农业实验站的经验基础上，1887年国会通过“哈奇法令”。要求每州普遍建立农业实验站，广泛吸收农业院校参加科技实验工作。由此使美国的农业教育与科研自始就密切联系。到1893年已达到每州一个实验站的要求，不久又增至66个。农业院校、实验站及政府有关部门的配合，使美国农业产值不断上升，体现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巨大影响。此外，联邦和各州政府还积极创办农业报刊500余种，其中有著名的《农业年鉴》、《农业研究评论》、《农作物报告月刊》等，发行量最多的达50万份。

农业技术突破的另一个方面是新型农业机械和农具的层出不穷。西部广大土地开垦和劳动力缺乏的尖锐矛盾，推动了美国农机具发明创造的高潮到来。1878年由威斯康星的约翰·F·阿普耳比发明的“双排打包机”（又译“盘绕扎谷机”）使小麦收割工效提高了8倍。此后，小麦生产带的农业机械化突飞猛进。80年代初，西部开始普遍使用24匹马牵引的康拜因机，把收割、脱粒、捡净、装袋等各道工序连接一起，大大加快了小麦收获速度。1885年，这种收割机的产量已达25万台。随着收获机械的重大改进，各种播种机、中耕机、双铧耙、双铧犁、锄草机等纷纷问世，使田间作业在90年代基本上实现机械化。同时，谷物的装卸、传送机械，玉米的割捆机械也在80年代投入使用。到90年代末，美国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比80年代初提高近1/4，其主要原因是机械化普遍实现。故有人称这段时间为美国的“农业革命时期”。它标志着美国农业也开始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新阶段。

在西部干旱地区，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成为农业发展的关键。在犹他、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等州，农场主联

合为集体组织，在政府资助下开发水利。1894年，国会立法规定对各干旱州拨给100万英亩土地资助水利建设。1902年又决定将联邦农业基金用于水利项目。此后，水利勘探设计也成为农业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提及的是，美国农场主们在农业科技普及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70年代的格兰其组织就把普及农业科技知识作为其基本任务之一，在这过程中培养出大批农场主自己兼任的农业技术人员。80年代末的农民联盟也运用合作组织的资金开发技术，购置新设备。许多州的农业实验站人员参与合作组织的科技活动。即使人民党运动消沉以后，有许多农场主的合作组织转变为农业公司，成为农业新技术开发的重要力量。

简言之，19世纪末美国农业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是整个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西部的巨大开发，工业制造能力的强有力推进，以及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一系列变革，使农业由内战前的小生产方式跃入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农业为工业提供了足够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原料，保证了这个时期工业生产能力的迅速上升。然而，90年代的农业萧条并未从美国经济中消除阴影，它一直在20世纪美国经济中成为导致危机的潜在因素。

第四章

西部的开拓及其对美国发展的历史作用

19世纪后期西进运动是美国不断扩张领土的运动，也是美国人民和移民开发西部的群众性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和移民从加州往东或越过密西西比河往西，不断涌入这片一望无际的美国心脏地区，开采矿藏、经营牧场、开垦荒地和建立城镇，使资本主义在美国获得广泛的发展，从而为现代美国的诞生奠定了有利的基础。随着西部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新州陆续建立，美国版图也随之扩大。

在这片历史上曾以“美国大沙漠”著称的广阔地区中，有相当一部分已划归印第安人，作为他们的永久居留地。可是，后来又在这里发现了丰富的矿藏和适于放牧的富饶草原，因而开拓者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一地区。为了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和扫除西进运动的“障碍”，美国政府采取了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的野蛮政策，在西进运动史上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因此，西部并不像有些美国历史学家所美化的那样，说它是个“伊甸的乐园”，西进运动也不像后来美国小说和电影、电视所渲染的那样充满浪漫传奇的轶事，而是为空前未有的暴力所伴随。尽管如此，西进运动和美国政府推行开发西部的各种政策，却破坏了印第安人的游

牧生活，促使他们脱离原始社会，卷人资本主义社会，逐渐成为美利坚民族的组成部分。

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开拓者的思想、传统和风尚因适应新环境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是进取求实、流动迁徙和民主自治等精神的增强。这些变化进一步塑造了美利坚民族的性格，促进了美国的民主制。

第一节 西部印第安人土地的被剥夺

〔大平原的土地和居民〕 内战结束后，美国人和移民开始大量涌入“最后的西部”，即美国的大平原，进行拓荒和开发。这个大平原的范围包括东起密苏里河西至落基山脉，南起得克萨斯北迄美、加边界的广大地区。这片广大地区的地形是复杂的：既有风沙漫天的平原，又有高耸的山脉；既有荒凉的沙漠，又有深邃的峡谷。由于地形复杂，人烟稀少，长期以来这个地区一直是美国人向西移殖难以逾越的障碍。直到 19 世纪上半期，美国地理书上仍称它为“美国大沙漠”。内战前，多数从东部前往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的商旅都避开这片“沙漠”，绕道而行。但是，这个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落基山麓地区蕴藏有大量金、银和铜等金属，由得克萨斯向北延伸的大草原乃最适于放牧牛、羊的场地。这些富庶的资源和广阔的土地，无论对资本家还是对开拓者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内战结束后，随着横贯大陆铁路的建成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向西移殖的障碍也就逐渐被克服了。

内战前，这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印第安人和为数不多的白人。

1860年，散居在这片草原和山麓地区的印第安人约有25万人。[1]这里的动物除了以草为食物的亿万啮齿动物（鼠和长耳兔）和“草原狗”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巨大的野牛群。据估计，19世纪中叶，在大平原漫游的野牛约有1,200万头之多。[2]印第安人大都骠悍强壮，善于骑射，经常在草原上奔驰，以捕捉野牛为生。牛肉供食用，毛皮可做衣着，还可用来作帐篷。因此，狩猎野牛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心，也是他们举行宗教祈祷的主要内容。他们为了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狩猎场地，对于白人入侵者非常敏感，往往进行顽强的抵抗。当时，这一地区较强的印第安人部落，北部有苏族人（或译为西荷族人）、布莱克菲特（即黑脚）族人、克劳族人、切恩涅族人和阿拉帕霍族人；南部有科曼彻族人、基奥瓦族人、尤特族人和阿巴齐族人等。

这里的白人约有175,000人，其中90%都是男性，散居在后来建州的南、北达科他、蒙大拿、爱达荷、怀俄明、科罗拉多、内华达以及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等地。这些白人，除了定居在犹他的2万多摩门教徒[3]外，也像印第安人一样，过着不断迁徙的生活。他们除捕捉野牛外，还放牧牛、羊群，勘察贵重金属，有时为前往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移民带路以及拖运横越大陆的货物和邮件等。他们既同印第安人进行贸易，也不时同印第安人发生冲突。

大平原居民的这种荒野生活仅持续了一个短暂时期。随着横

---

①②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等：《美国共和国，1865年以后》，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59年，第2卷，第66页。

③ 摩门教徒（Mormons）是1830年在纽约州创立的一个教派的信徒，由于实行一夫多妻制，遭到公众的反对，1847年该教派领袖率信徒迁往犹他，在那里组成由摩门教会控制的政府，进行垦荒和兴修水利。1890年，该教派废除了一夫多妻制，6年后，犹他才被联邦接纳为州。

贯大陆铁路的建成以及东部和外国资本的不断渗人，这一地区的采矿业、畜牧业和农业先后兴起，并日益为东部和外国的公司所控制。在开发大平原的过程中，“讨伐”印第安人的战争连续不断，使印第安人遭受大量伤亡和深重的苦难。

〔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　内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继续推行驱赶印第安人的传统政策。凡是交通线需要穿越的地区，印第安人就必须离开，往往被赶人指定的保留区；就是在已指定的保留区内，如果发现新的矿藏或其他自然资源，印第安人也必须放弃原有的土地，被迫迁往其他更加偏僻、贫瘠的保留区去。为了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美国政府沿用了与酋长签订“条约”以及“购买”等东部通行已久的手段，如果印第安人拒绝服从或稍有反抗，它就运用武力进行威胁，甚至发动“讨伐”战争。从19世纪60年代初起，美国政府开始了连续不断的血腥“讨伐”，一直持续到1890年，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1860年初，美国军队为西南部探矿者开路占地，与散居在新墨西哥山区一带的阿巴齐族人和纳瓦霍族人发生冲突。这次冲突时断时续地持续到1863—1864年。在一系列战争中，两族印第安人终因力量悬殊而被打败，结果664人被杀害，8,793人被俘，其余数千人被迫迁往土地贫瘠的小保留区。[①]

同时，在科罗拉多北部派克山脉附近发现金矿后，许多矿主和开采者蜂拥而来，闯进切恩涅族人和阿拉帕霍族人的保留区，并要求美国军队把他们赶走。结果双方于1861年发生冲突，持续了3年之久。到1864年，两族印第安人被迫放弃他们原有的土地，迁往科罗拉多东部的一个较小保留区去。但在撤离途中，他们遭到美国军队的挑衅。科罗拉多总督要求他们立即集中到指

① 参看雷·A·比林顿：《向西扩张：美国边疆史》，纽约1974年，第564页。

定地点去，才答应停止军事行动。约有700多印第安人轻信了他的保证，集中到里昂要塞附近扎营。但是，在当晚他们入睡后，却被J.M.齐温顿上校统率的1,000多民兵所包围，遭到极其残酷的屠杀。后来，有个目睹这次屠杀的商人作证时说：

> "他们（指印第安人——作者）被剥去头皮盖，脑髓被敲出，士兵用小刀剥掉妇女的皮，用棍棒打小孩，还用枪敲打他们的头颅，割断他们的四肢。"①

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激起了残存的切恩涅族人和阿拉帕霍族人更加剧烈的反抗。经过将近3年的围剿，两族印第安人才被迫于1865年签订"和约"，迁往指定的保留区。同时，散居在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一带的基奥瓦人和科曼彻人部落也遭到同样残暴的袭击，最后落到听任美国军队摆布的境地。

在"讨伐"南部印第安人的战争告一段落时，反对西部和北部印第安人的战争又在好几处爆发了。其中最剧烈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冲突是在蒙大拿爆发的。1865年，为帮助蒙大拿矿主解决供应品运输的困难，美国政府准备从怀俄明的拉拉米要塞修筑一条直通博兹曼和赫勒纳的小道，即"博兹曼小道"。这条小道需要穿越苏族人最好的狩猎场地，因而引起苏族人的强烈抗议。他们在首领红云指挥下，不断袭击运输物资的车队，捣毁筑路工程的设施。1860年2月，美国政府派军队前往镇压，但红云率领的队伍在荒野中消失了。一支由W.J.费特曼上尉指挥的部队进入荒野搜寻时，遭到伏击，结果全军覆没，费特曼也被打死。苏族人在胜利鼓舞下，继续不断出击，迫使美国政府只得放弃修筑这条小道的计划。

美国政府连年"讨伐"印第安人的战争，虽然为西部的开拓

---

① 比林顿：前引书，第568页。

扫除了一些所谓“障碍”，但却支出了庞大的军费。据印第安人事务专员约翰·柯立尔宣称：“在1862年至1867年期间，仅仅对苏族、切恩涅族和纳瓦塞族的战争，就使美国政府花费了一亿美元。”①

“讨伐”印第安人战争的庞大开支和征服苏族战争的失败，都引起了国内舆论的抨击，当时有影响的《民族》周刊发表评论指出：“我们整个的印第安人政策是处置失当的”，“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弊端。”②

〔“和平委员会”及其划分印第安人保留区的策略〕　东部一些评论家认为，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管理不当是造成他们不断反抗的主要因素。这种管理不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管理印第安人事务的权力分属于内政部的印第安人事务局和陆军部，它们各自为政，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致使印第安人无所适从。前者被授权管理印第安人土地的转让、支付年金和分配印第安人所需要的供应品。这个机构的全部官职均为政党分赃制的“战利品”，其中许多雇员都是贪污腐化的、不称职的。后者的主要职能就是对“违反”规定的印第安人实行“残酷的惩处”。许多军官力主使用武力，叫嚷“印第安人只对武力或武力威胁作出反应。”③ 其次，西移的白人在联邦政府支持下，经常侵占业已保证给印第安人的土地。因此，这些评论家坚持认为，只有结束军人“火与剑”的政策，采用和平方式公正对待印第安人才是解决

---

① 约翰·柯立尔：《美洲印第安人》，纽约1947年，第128页；转引自威廉·福斯特著：《美洲政治史纲》，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56年，第281页。

② 转引自比林顿：前引书，第570页。

③ 阿雷尔·M·吉布森：《从史前期到现在的美国印第安人》，列克星敦1980年，第395页。

问题的惟一办法。[1]

在舆论不断指责下，国会于 1867 年 3 月通过了一个“与仍在同美国作战的印第安人部落建立和平”的法案，组织一个由 4 名文官、3 名将领组成的“和平委员会”，其任务是结束“苏族人的战争”，消除导致“印第安人战争”的因素，以确保种族间的和平。国会之所以采取这一措施，固然在于平息指责政府的舆论，也由于使用武力迫使印第安人屈服的代价太大，且收效甚微。因此，国会多数议员认为，只有说服印第安人放弃游牧方式，逐渐过渡到在保留区内从事耕耘的定居方式，才能消除“印第安人战争”，从而确保种族间的和平。根据这种意图，“和平委员会”在圣路易斯会议中，主张建立两个容纳大平原大部分印第安人的保留区：一个是位于达科他领地黑山地方的保留区，那里将容纳在北部草原漫游的约45,000 印第安人；另一个是设在现今俄克拉荷马州的保留区，计划诱使南部约86,000 印第安人集中到那里定居。每个保留区都设有一个所谓“公正廉洁”的总督，负责推行“传播先进文明的广泛计划”；各部落都能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并由有关官员予以监督和指导。“和平委员会”之所以选定这两个地区作为大平原印第安人的保留区，是因为黑山地方远离横越大陆的交通线，且为多山丘陵地带，对白人开拓者没有什么吸引力；而俄克拉荷马地方原先就是从东南部迁来的“五个文明部落”[2] 保留区的一部分，把它加以扩大便能容纳更多的南部印第安人部落。

“和平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与南部印第安人部落首领谈判过

---

① 参看比林顿：前引书，第 570 页。

②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现今美国东南部是为讲马希克吉恩语的印第安人所控制。他们包括乔克托人、奇克卡索人、克里克人、西密诺尔人和契洛克人。后来，他们以“五个文明的部落”著称。

程中，不断使用威胁利诱的各种手法，迫使他们答应率领他们的部族迁往俄克拉荷马地方的保留区。接着，他们又与北部印第安人部落首领谈判。1868 年 4 月，他们以停止修筑波得河小道的承诺与苏族人领袖红云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苏族人同意集中到密苏里河以西达科他领地内的永久保留区，美国政府则承认大角山以东的地方是印第安人不能割让的领地。这样，“和平委员会”的成员们便认为他们已大功告成，可以向国会交待了。但是，他们对实现大平原“种族间和平”的估计是过分乐观了，因为一些印第安人部落首领因受欺骗、收买而签字放弃了数百万英亩的部落土地，但他们并不能迫使自己的部族人改变整个生活方式。相反，大多数印第安年轻战士和小头领纷纷拒绝遵守“条约”，谴责签订“条约”的行动，并准备为保卫印第安人的生存条件而战。从 1868 年秋季开始，印第安人的反抗斗争在各个地区又陆续展开。

〔*对保留区的暴虐统治与印第安人的反抗斗争*〕　在西南部，切恩涅族人和阿拉帕霍族人不甘于所受限制，首先于 1868 年秋季冲出了保留区。接着，基奥瓦族人和科曼彻族人也起而响应，约有2,000 印第安人在堪萨斯和得克萨斯一带漫游、狩猎，但他们不断遭到美国军队的袭击。在得克萨斯的沃希托河畔一次战斗中，有 100 多印第安人惨遭杀戮，横尸遍野，其余的印第安人又被赶回保留区。印第安人因不断冲出保留区而与政府军队发生激战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据统计，在 1869 到 1875 年期间，政府军队与印第安人发生的激战在 200 次以上，政府军队剿杀印第安人的手段非常野蛮残暴，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1871 年，担任印第安人事务专员的 F. 沃克将军就供认说：“我们对付野蛮人(指印第安人——作者)，就像对付野兽一样，不会涉及国家荣誉的问题。不管是战斗、逃跑，还是运用诡计，那只是个权宜之计

的问题。”[1]

在大平原印第安人被迫迁移到南、北两个保留区后，他们仍保有大片的土地，但这些土地也因不断被剥夺而日益缩小。1869年，国会设立了“印第安人专员委员会”，它与内政部官员共同管理用于补偿印第安人割让土地的拨款，负责控制保留区及其宝贵的自然资源。[2] 1871年，国会又通过了“印第安人拨款法”，其中附加条款规定，美国政府不再承认印第安人部落是个签订条约的独立实体，而且有权处理印第安人事务，无须取得部落的同意。[3] 这样，印第安人在法律上不再被视为“异域人”，通过订立“条约”来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方式也被废止，但美国政府却享有对保留区及其自然资源的直接控制权，利用所谓“拨款”方式便可任意掠夺印第安人土地，占有保留区内的自然资源。从此，所有印第安人都必须受国会法律和总统行政法令的管辖。[4]

在保留区内，印第安人生活非常困苦。他们虽被迫弃牧务农，但却既无农具，也无种子，因而无法耕种，只得仍以狩猎勉强为生。许多部落不能及时得到政府供应的食品，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政府官员提供的食品和用品，往往是以非法的高价卖给他们，甚至有时是腐烂变质的，其中有“发霉的面粉、腐臭的牛肉和虫蛀的毯子”，[5] 因而引起印第安人极大的反感。投机商人也经常用赝品、次品和酒类骗取他们仅有的毛皮和财物。保留区内一旦发现金属或石油贮藏时，印第安人就被从他们居住的地方撵走，迁往更加偏僻的地方去。在政府官员、矿主和投机商专横

①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73页。
② 莫里斯主编：前引书，第643页。
③ 莫里斯主编：前引书，第644页。
④ 吉布森：前引书，第396页。
⑤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74页。

暴虐的统治下，许多印第安人被逼得走投无路，陷入绝境，只有进行武装斗争，以保卫自身的生存权利。

1875—1876年间，在北部达科他的黑山保留区爆发了苏族人战争。当时，苏族人被迫起事有两个原因：一是修筑北太平洋铁路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侵入他们的保留区；二是1874年在黑山地区发现金矿后，成千上万的淘金者和矿主不顾苏族人的反对，竟成群结伙闯入保留区。1875年，政府军队为庇护这伙人与苏族人发生冲突。1876年，苏族人领袖狂马和坐牛率领至少2,500名战士，[①] 与政府的“讨伐军”大战于小大角地方，由256人组成的“讨伐军”全部被歼，队长G. 卡斯特上尉也被击毙。这次战斗谱写了印第安人反抗斗争的一曲英勇凯歌。

在西北部地区，俄勒冈大龙德地方的内兹帕西族人因反对白人侵占他们的土地于1877年举行起义。政府军队发动进攻后，内兹帕西族领袖约瑟夫率领500多男女老少逃出住地，企图转往加拿大。在政府军追击下，约瑟夫带领他的一伙人在4个月里行军1,300多英里，最后在离加拿大边界不远的地方被拦截镇压了。[②]

在西南部，新墨西哥的阿巴齐族人，由于不堪忍受保留区的暴虐管制，从70年代初便展开有组织的反抗。接着，他们愤然离开保留区，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一带流动，并对阻击他们的政府军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到80年代中期，他们在首领吉罗尼摩领导下展开了英勇的战斗，直到1886年吉罗尼摩被俘后，这次

---

① 另一说法是他们率领4,000名战士，参看理查德·柯伦特等：《美国史》，纽约1979年，第2卷，第447页。无论是哪一个数目，都是美国印第安人在一次战斗中调集的一支最大的兵力。

② 参看拉尔夫·安德里斯特：《缓慢的死亡：平原印第安人的末日》（纽约，1964年）一书，转引自约翰·H·卡里等主编：《从内战到现在美国生活的社会结构》，波士顿1981年，第33页。

武装反抗才被镇压下去。

美国印第安人最后一次反抗是南达科他的特顿苏族部落于1890年掀起的武装斗争。他们对政府食品供应的严重不足并把他们的保留区缩小一半都非常不满，准备起事。这时有位印第安人宗教领袖沃沃卡对苏族人宣称，只要举行某种舞蹈和宗教仪式，便可收回他们的土地，白种人也会自然消失。于是苏族人便跳起"魔鬼舞"（这是美国白人对沃沃卡主持的舞蹈的蔑称），但却为此招致了美国军队的干涉。双方发生了冲突，结果是包括坐牛在内的许多苏族战士被杀害了。同时，美国军队还企图解除另一批苏族战士的武装，引起后者的顽强反抗，最后在翁戴德尼地方一场战斗中，有200多苏族战士和妇孺遭到野蛮的屠杀。

印第安人原是美国所在大陆的主人，他们分属于600个左右不同的部落，过着原始社会的游牧生活。自从资本主义势力大举闯入美国西部以来，他们一直处于受欺凌的屈辱地位。为了保卫自身的生存，各部落印第安人进行了殊死的英勇斗争。但由于武器装备的差异和军事力量的悬殊，他们难以抗拒对手的进攻，终于在军事上被打垮了，绝大部分的土地被侵占，整个种族濒于毁灭的边缘。据统计，到1890年，美国印第安人的数目已从早先的150余万人锐减到少于25万人。[①] 美国印第安人人口的大幅度减少，是近代世界民族史上罕见的现象，这说明美国专横暴虐的统治给印第安人造成的灾难。印第安人的反抗斗争之所以失败，固然由于原始的部落无法与资本主义势力相匹敌，也由于各部落间缺乏联系和不够团结。此外，白种人所传播的各种流行病、特别是天花和性病等，也是对印第安人的致命伤。

〔联合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与野牛群的灭绝〕　在大平原印

① 吉布森：前引书，第443页。

第安人遭受美国军队围剿屠杀的同时，另一种毁灭印第安人游牧生活条件的灾难发生了，那就是以北美洲骎犎著称的大平原野牛群的逐渐灭绝。这种长满粗毛的野牛是印第安人衣食和各种用品的主要来源，有人曾作过这样形象的比喻：对印第安人来说，野牛是个"奔驰的百货商店"。[①] 因此，只有巨大野牛群在西部漫游，印第安人才能维持他们的游牧生活；一旦野牛群灭绝了，印第安人原先赖以为生的条件也就丧失了。他们除接受联邦政府的特定安排外，别无其他选择。

内战结束时，在大平原漫游的野牛约有1,300余万之多。随着联合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巨大的野牛群逐渐被分割为两部分，无论南部或北部的野牛群，都遭到铁路工人、矿工、猎人和冒险家的捕捉杀害。联合太平洋铁路通车后，有时一列行驶的火车突然被惊吓乱闯的野牛群所撞翻，因此铁路公司雇用一批专门枪杀野牛的猎人，以保证火车行驶的安全。当时，有个绰号叫"野牛比尔"的科迪以在18个月中杀死4,000头野牛而出了名，他就是受雇于堪萨斯太平洋铁路的猎人。由于各条铁路及其支线相继修建，以枪杀野牛为职业的猎人日益增多，他们和许多业余的打猎者都毫无顾忌地枪杀野牛群，并以此为"娱乐"。这样，南、北两部分野牛都遭到严重的浩劫。到1871年，枪杀野牛群的活动开始更加猖獗。那年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制革厂发现野牛皮能制成商品革。该厂遂以每张1—3美元价格收购。这一信息传开后，许多猎人和投机分子都争先恐后涌往大平原，掠取新的致富资源。据统计，在1872—1874年期间，每年平均残杀300万头野牛。后来，野牛骨头也作为肥料出口，残杀之风因而更甚。到1878年，南部的野牛几乎灭绝了，北部平原的野牛群在1883年

---

① 柯伦特等：前引书，第2卷，第473页。

也消失了。那年，美国国家博物馆为制作野牛的标本曾派出一个考察队去西部，结果找到的野牛还不到200头。到1903年找到野牛的数目更锐减到34头了。[1]

〔道斯法案的实施及其实质〕　美国政府剿灭印第安人的残暴政策，虽然得到矿主、铁路公司、农牧场主和土地投机商的支持和拥护，却引起了东部社会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者的谴责和反对。他们认为联邦政府以武力迫使印第安人在保留区定居的措施已告失败，经过"讨伐"战争残存下来的印第安人部落仍然坚持它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为了实现西部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和平共处，他们要求取消保留区，建议不再把印第安人看成是部落的成员，而是分别作为独立的个人，并在土地分配方面实行个人所有制的原则下，引导他们从狩猎转向农业，"训练他们履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从而促进他们与白种人的"融合"。这种建议的目的在于瓦解印第安人的部落，把他们生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从而实现对印第安人的同化。

为了扩大这种舆论的影响，各地"印第安人之友"社团纷纷建立，其中主要有"印第安人保护委员会"和"印第安人权利协会"等，出版了许多宣传鼓动性的刊物，要求政府改变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在这方面，著名女作家海伦·H·杰克逊发表的两部作品——《一个可耻的世纪》（1881年出版）和小说《雷蒙娜》（1884年出版）——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是一部谴责政府对印第安人传统政策的控诉书，其中着重揭露了政府残害印第安人的一贯性和"独创性"。她写道：

> "翻阅（白人征服——作者）印第安人历史的记录无论翻到哪里，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每页和每年都有其

---

[1] 比林顿：前引书，第579页。

邪恶的污点。一个部落的历史就是所有部落的历史，不同之处只是时间和地点的不同，但是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都不会对主要事实有什么影响。1880年科罗拉多出现的贪婪和不公正的现象同1830年佐治亚发生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美国政府不守诺言的手法是同过去一样的熟练，并且由于长期的实践而具有更多的独创性。”①

后者是一部描述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困苦处境的小说，内容有点像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不过它的主人公是印第安人，后来被拍成彩色电影，风行一时。② 这两部作品使广大读者充分认识到改革对印第安人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这种要求改革的舆论压力下，联邦政府不得不承认强行同化印第安人政策的失败，因此决定实行土地个人所有的分配制，即把土地分配给个人的办法，并力图把这种办法与教育和传教活动结合起来，构成“改造印第安人的三部曲”。③ 在联邦政府官员看来，自由处置地产的个人所有制是最主要的，它将使印第安人个体化，进而成为促使他们自行实现“美国化”的动力。

1887年，国会通过了道斯法案，其中主要规定是：（一）解散作为法律实体的印第安人部落，把部落的土地分配给成员个人——每户家长160英亩，每个独身成年人80英亩；（二）联邦政府保有25年托管权，托管满期时，把土地所有权移交给个人并授予美国公民的资格；（三）分配土地给现有部落成员后，余下的保留区土地得向非印第安人定居者开放。④

---

① 转引自柯伦特等：前引书，第2卷，第477页。
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75页。
③ 吉布森，前引书，第489页。
④ 莫里斯主编，前引书，第644页。

根据这个法案，每个成年印第安人都能分得土地，但须经托管25年，他才享有土地所有权，并取得美国公民的资格。这是对印第安人的传统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以适应当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这一法案的实施有着双层的意义：（一）联邦政府力图借此促成印第安人放弃原始社会的游牧生活，逐渐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二）印第安人的法律地位发生了变化，他们已由“化外之民”变成了美国“准公民”了。美国印第安人的法律地位这一变化尽管是纸面上的，但从印第安人一直遭受凌辱和迫害的整个历史来看，不失为一种进展。同时，联邦政府还把它保有25年的托管权解释为防止没有经验的土著人立即处理他们占有的土地，以免受骗上当。看来，这一切好像都是为印第安人着想似的；实际上，这一法案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首先，这个土地分配制度实行后，那些贪婪的白人资本家更进一步大量夺取了印第安人的土地。以俄克拉荷马地方为例，分配制度实施后，“五个文明部落”在那里原有土地1,600万英亩，在以后20年间却丧失了1,450万英亩。[①] 其次，即便印第安人侥幸分到较好的土地，由于他们缺乏土地所有权经验和法律知识，往往为贪婪狡诈的白种人土地投机商所骗去。因而他们在相当长期间仍然一贫如洗，陷于痛苦和悲惨的境地。

第二节　西部的开拓与“最后的边疆”

〔*开发金银矿的浪潮与西部城镇的兴起*〕　大平原并非像早先美国人所想像的那样，尽是沙漠和荒原，而是个拥有广大草原、肥沃土地和丰富矿业资源的地区。在落基山脉和高原地区都

---

① 福斯特著：前引书，第282—283页。

拥有丰富的金、银、铜、铁、铝、锌等矿藏和深厚的煤层，在得克萨斯一带地下则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

西部矿业开发时期是较短的，它出现于1860年左右，接着是持续30年之久的繁荣兴盛，到1890年以后就逐渐衰落了。各地区矿业开发大体上经历了3个连续的阶段：（一）个别的勘探者用淘金盘和砂矿开采方式采掘地表层矿石（砂）；（二）在较浅的矿床枯竭后，一些公司进入矿区，开采矿脉和石英矿；（三）商业化开采或是最后失败了，或是在有限的基地上继续下去，与此同时牧场主和农民到来了，他们在那里建立起来一个较固定的社区经济。①

19世纪5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华金与萨克拉门托流域出现淘金热后，科罗拉多和内华达地方也发现金、银矿。1858年，在落基山东麓派克山脉地区（靠近现今丹佛城）发现金矿，次年闻风而来的探矿者和移民在10万人以上。② 他们分别从加利福尼亚和堪萨斯以及东部各地跋山涉水来到科罗拉多，丹佛和其他矿业营地一下子变成了“城镇”。但不久发现，这里虽有金矿，但产量不多。不少探矿者和移民又纷纷离去，留下来的人们转而从事耕种和放牧，为日后科罗拉多经济打下了基础。到70年代初，利德维尔附近发现了银矿，接着在克里浦小河附近也发现了金矿。这些矿藏的发现与开采，使丹佛成为这一地区的商业中心。

同年，在内华达的塔霍湖附近发现丰富的金、银矿。它位于康斯托克矿脉，这是世界上最富的矿脉之一。消息传出后，探矿者和移民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不到一年，在这片原系沙漠荒原

---

① 科伦特著：前引书，第2卷，第467页。

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78页。

上涌现了许多新兴城镇，其中较大的有弗吉尼亚、奥罗拉和黄金山等。在1859—1863年期间，仅从康斯托克矿脉的砂矿中就采掘出价值1,500万美元的金银。随着技术人员和资本家的到来，开采技术与经营方式也有了改进，在降低成本和提高金银产量方面都取得较好的效果。在60年代初，这里采掘金银普遍使用墨西哥的“还原法”，但这种方法成本高，产量少：从一吨优质矿苗中采出价值200美元的银子，其费用为50美元，回收率仅有65%。在1866年以后10年中，改用新法采掘，每吨的费用降低10美元，而回收率却提高到85%。[①] 1869年，有个名叫阿道夫·苏特罗的普鲁士移民工程师用开凿隧道法开采这里的深矿，银的产量因而猛增。[②]

后来，在爱达荷和蒙大拿地区也发现了金矿，大批探矿者、冒险家和投机商纷纷涌入这两个地区，采掘了价值巨大的金子。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两个地区也出现了像博伊西和赫勒纳（当时名为“最后机会的峡谷”）这样的矿业城镇，但是那里的社会治安是很糟的，经常有一些匪帮和歹徒进行骚扰和抢劫。争吵搏斗、私刑拷打以至枪击厮杀的事件层出不穷。当地开拓者不得不组织起治安维持会，自行制定法规，以维持社会秩序。但是这些城镇的居民是不固定的，他们常随着采矿业的兴衰而流动转移。在60年代，蒙大拿开采了价值1亿多美元这样巨额的贵重金属，但是这个“矿业王国”是短命的，一旦矿源枯竭，人们便纷纷离去，矿业营地的帐篷也消失了。根据1870年人口普查，蒙大拿全境人口仅有2万多人。

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过去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都

---

①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78页。
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78页。

曾以拥有丰富的银矿著称，但60年代美国探矿者在这里交了恶运，没有发现什么值得开采的银矿，不久便撤往其他更有希望的地方去了。在这两个地区，铜矿业的发展比金银开采更为重要，一个位于比斯比，以“铜皇后”著称的矿井采出的铜，其产值超过了金、银矿开采的全部收益。

到1874年，勘探和开采金、银贵重金属的浪潮大体上告一段落，因为各地矿区表面层的矿源日益枯竭，而开采深矿则非一般探矿者力量之所及。从此，西部矿业开发逐渐转移到开采贵金属的深矿和其他贱金属矿了，而这类开采就需要更多的资本和技术了。

〔铁路的修建与资本集团对矿业开发的控制〕　随着西部矿业的兴起，连结中心城市和商业网点的交通运输日益成为突出的问题。当时，有些矿区远离商业网点，一般在几百英里以上，而且陆路运输异常困难，不得不依靠水运。例如，“旧金山要通过帆船和汽船绕过下加利福尼亚的尖端才能达到科罗拉多河河口，来为亚利桑那的科罗拉多河畔矿山服务；把商品运到三角洲来，而后把矿石运到旧金山去冶炼。”[①] 另外一些矿区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生活用品大都是靠大湖区城镇、特别是芝加哥供应的；它们开采的矿石和金属也需要运往附近的城镇冶炼和加工。可是，在19世纪中叶，联系东、西部或大湖区与西部矿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1858年9月，有家私营公司派出了第一辆四轮马车从圣路易斯驶往太平洋海岸港口，全程历时24天之久。接着，经营陆路运输的私人公司相继出现，小马快递的邮政制度也建立起来了。但是，这种奔驰在驿道上的马车运输远不能适应西部开发的要求：一是驿道崎岖不平，马车拖运能力有限；二是

① 马丁·里奇：“西进运动”，载格伦·波特主编：前引书，第2卷，第583页。

运输所需时间太长。

为了适应西部开发的需要，横贯大陆的第一条铁路在60年代初开始修建，到1869年，东西相向修建的联合太平洋铁路与中央太平洋铁路在犹他的普罗蒙特里接轨通车了。接着，陆续修建一些通向商业中心城镇的支线。这样，铁路不仅承担了长距离的货运，及时为矿区运送大量的机器设备和物资，而且输送了它所需要的矿工和移民。同时，大批供应行业也在矿区建立起来，那里市场因而有可能维持下去。因此，铁路的相继修建为西部矿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一次淘金热是在达科他西部的黑山地区（即苏族印第安人的保留区）出现的。1874年，这里发现金矿的消息在边疆地区广泛传开后，就开始了一场紧张的淘金热。这一地区交通条件较好：修至比斯马克的大北铁路以及从夏延来的马车驿道都能通向这一地区，因此大批探矿者得以迅速涌入这个荒芜的丘陵地区，他们都想利用这一机会掘金致富。一时之间，这里喧腾鼎沸，热闹非凡。但是不久之后，开采的金矿就逐渐为大量提供资金的公司，如宅地公司等所接管和控制。1876年，在南达科他环绕戴得伍德峡谷地区发现了最丰富的金矿脉。随着人口的增加，卡斯特城成为达科他矿区的第一个中心。在一些公司和矿主经营下，这里开采出的金子总值约有9.8亿美元。①

从此，西部矿业开采日益为东部资本集团所控制，因为现代矿业开采需要大量资本以及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当时，东部的金融巨头，像纽约的亨利·罗杰斯和洛克菲勒家族、费城的古根海姆家族以及匹兹堡的梅隆家族等，都插足矿业开采，控制了矿业资源并攫取了高额利润。1881年，在蒙大拿的比由特发现了当

①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81页。

时世界上最丰富的铜矿藏，铜矿的开采也是在资本集团支持下展开的。由于工业发展对铜线的大量需求，铜的产量激增。这里铜的年产值在80年代末超过了金产值，到1900年，接近于金银产值的总和。另一种金属——铅也随着电气蓄电池的广泛应用而产量剧增。铅主要产于密苏里州，到1880年，在科罗拉多州的利德维尔和爱达荷的克达伦也开采了大量的铅。1901年，随着汽车的商业化，得克萨斯的“黑金矿”喷出了大量的石油。

西部矿业的开发在时间上虽然是短暂的，但对西部以及全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首先，矿业开发的历程使美国人认识到从密苏里河到太平洋沿岸这一广大地区所拥有的巨大资源。为了开发西部这些资源，矿业资本家要求联邦政府解决“印第安人问题”，大力资助铁路的修建，以及必须为以后农业人口的移入创造条件等。这些要求和主张都对日后美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西部矿业开采生产了大量的金、银。据统计，在1860到1890年的30年间，西部矿业开采了价值12亿多美元的金子和9亿多美元的银子。金、银财富的大量增加使联邦政府能够恢复硬币支付，但也引起了“货币问题”，这一问题成为以后20年间美国政党间重要的政治争端之一。再次，资本集团对西部矿业的掠夺式开发，不仅严重损害了印第安人的生存条件，使他们生活受到巨大的威胁，而且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

〔“牧畜王国”〕　美国于1845年兼并得克萨斯后，美国人才开始发展牧牛业，经营大牧场。随着牛、马群的不断北移，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也开始发展畜牧业，它因对矿业营地、筑路人员和西去移民供应牛肉和马匹而逐渐兴旺起来。这个畜牧区不断向草原和山麓地区延伸，扩大成为一个“牧畜王国”，其领域包括东起密苏里河西到落基山、南起红河北迄加拿大萨斯喀切温的

广大地区。数百万头的牛群——有得克萨斯长角牛、赫里福特纯种牛以及怀俄明和蒙大拿的小公牛等——在这片茂盛的草原上繁衍起来。经营畜牧业的巨商和大牧场主是这个广大领域的统治者，他们和牧牛人以及牛仔们在这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独特风俗习惯的社区。牧牛人都须有个放牧的固定基地，由于经营不断扩大，逐渐成为牧场主，他们雇佣一些牛仔，放牧牛群。牧场里有牧主的住宅、雇工的住房和一片放牧的草地。有的牧场是用篱栅围起来的，也有的是敞开式的，但它们都位于接近水源的地方。起初，牧场主雇用的牛仔，大多数都是南部同盟军的退伍军人，后来，黑人逐渐占多数，超过了北部白人和墨西哥人，他们经常被分配做更卑贱、更劳累的活计，如夜间看守牛群和野外烧饭等。根据牧场主的意图，每年春季牛仔们结成一伙，把饲养的牛群从得克萨斯赶到怀俄明和南、北达科他一些地区聚集起来。在放牧的途中，牛仔们手持"六轮枪"，精心驱赶各自牧场主的牛群，以防止狼群的袭击和歹徒的盗窃，并派出先遣人员寻找水源和茂盛的草场。到达放牧区后，他们把打上烙印的小牛在草原上自由放牧一个时期，到小牛长到三、四岁时，就把它们赶往最靠近的牛镇，装上火车运往东部出售。牛仔们的奇异服饰、放牧用具（这些都主要来源于墨西哥牧民）和放牧方式，形成独特的美国牛仔形象。他们放牧牛群的长途跋涉，在后来流行的西部小说和电影中，往往被涂上浪漫传奇的色彩，但实际上他们的放牧生活是非常艰苦和危险的。一般说来，他们放牧生涯的平均年限只有七年。① 在驱赶牛群途中，主要危险就是在牲畜熟睡后突如其来的嘈杂喧闹就可能引起它们疯狂的乱窜，以致失散和死亡。为了防止这种喧闹的干扰，牛仔们经常在牛群中哼唱小调或反复呼

① 参看《美国历史简明辞典》，纽约 1983 年，第 258—259 页。

喊。这逐渐发展成为反映牛仔生活的放牧歌曲，并流传下来。[1]

怀俄明是个最典型的牧畜地区，那里自然条件只适于大规模的放牧，而不宜于耕种。由于牧牛业获利丰厚，[2] 东部和英国的资本不断流到这里。牧牛业的经济结构逐渐采用公司的形式，有一年，拥有1,200万美元的联合资本的20家公司都在怀俄明获得了特许证。[3] 由大牧畜公司的代表组成的“怀俄明牧畜饲养者协会”是这个地区实际上的政府，统治这里达20年之久。它制定了许多管理土地、使用河川湖泊的水权以及驱赶牧畜等有关事项的法律和规定，强制会员和非会员一体遵守；还竭力游说国会议员修订西部土地法，要求承认牧牛场主获得土地的优先权。它力图以欺骗、恐吓和暴力等方式保持怀俄明成为牧场主专用的保留地。[4] 有些牧畜公司还不择手段地夺取对草地的控制权，骗取了印第安人数百万英亩的土地。同时把另外数百万英亩的土地用铁蒺藜围起，并沿河溪的水流立桩标明所有权，拒绝农民使用河水，借以阻止农民和牧羊人闯入他们的领地。美国内政部长于1866年报告说：“实际上，在西经110度子午线以西的整个放牧地区”，都被牧场主用篱栅围起来了。[5]

内战后20多年间，西部牧畜业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内战后，西部国有土地的开放和印第安人保留区的日益缩小，使牧畜业、特别是牧牛业的大规模发展有了广阔的场地。第二，美国和欧洲对肉类消费的增长，从而扩

---

① 参看前引《美国历史简明辞典》，第258—259页。

② 据称投资5,000美元4年内可获得45,000美元收益，这对东部和英国的资本家当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参看科伦特：前引书，第2卷，第472页。

③ 参看科伦特：前引书，第2卷，第472页。

④ 塞缪尔·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94页。

⑤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94页。

大了国内和世界市场对牛、羊肉的需要。第三，横贯大陆铁路及其支线的建成，冷藏车的发明和巨大包装中心的形成，都为牛羊肉和毛皮的外运与加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牧牛业的“大本营”与向东北部市场的贩运〕　牧牛业的“大本营”是得克萨斯，内战时，那里饲养的长角牛约有500万头。内战后，每头小牛在得克萨斯的售价不超过3至4美元，而北部市场的售价高达40美元。得克萨斯的大牧场主获悉后，决定把牛群赶往北部出售。但是，驱赶牛群前往芝加哥，一则路途遥远，牛群常在迂回曲折的森林中乱窜、散失，难以控制；二则沿途不时遭到定居的农民和印第安人的袭击，牛群损失很大。直到1867年，堪萨斯太平洋铁路线向西延伸到阿比林（一个新兴起来的牛镇），才解决了运输牛群的问题。只要把牛群沿着奇斯霍尔姆小道赶到阿比林，便能将它们装上火车运往芝加哥屠宰场。1868年，得克萨斯驱赶到阿比林的牛群有75,000头，1871年这个数字迅速增加到70万头的高峰。[①] 随着堪萨斯太平洋铁路穿越堪萨斯州向西延伸，新兴的牛镇如埃尔斯沃思、道奇城和纽顿等也先后出现了。在1872—1875年期间，埃尔斯沃思接受了100多万头牛；1876—1879年期间，道奇城也接受了100多万头牛。[②]同时，在联合太平洋铁路线上，先是夏延，接着是拉拉米，都成为接受牛群的始发站。

到70年代，得克萨斯的牧场主发现把小牛群赶往堪萨斯、科罗拉多以及北部草原地区，在青草茂盛的公共牧区放牧4至5年，养肥长膘后再运往中西部和东北部市场，获利更大。据称，每头仅值5美元的小牛，经过4至5年的敞开放牧，运到东部市场去，便可卖到45至60美元。因此，从1878年起，在放牧区

①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85页。

放牧的牧畜业日趋兴旺，在以后七、八年间成为美国获利最多的行业之一。东部和欧洲的资本大量流入这一地区。纷纷建立公司，经营和控制这一行业。

但是，牧畜业的这种兴旺是短暂的，到80年代中期，它因天灾和人为的竞争而逐渐衰落。首先，草原的公共牧区因大量牛群的不断涌入而变得拥挤不堪，加上1885—1886年出现冬季奇冷、夏季酷热的气候异常情况，牲畜因大片牧草枯萎而大量死亡。其次，当时得克萨斯饲养羊的牧场主也把大批羊群赶往北部草原放牧。羊不仅吃草，而且连草根一起吃了，以致大片的草原逐渐变成荒地。再次，对牧牛业更为致命的打击是众多农民开始在大平原定居下来，并用铁蒺藜将他们的农场围起来。有些农场主还在自己的农场里圈养牲畜，由于精心喂养和管理，牛肉的质量远比放牧区所提供的牛肉为好，因而后者的市场价格猛烈下跌。1882年，在芝加哥，放牧区牛肉每100磅售价是9.35美元，而到1887年却跌到每100磅1.90美元了。[①]

牧牛业的这种衰落，在牛仔们的歌唱中也有了反映。那时，他们开始悲叹地唱道：

> "我很少去想20年左右以后将发生什么事情，那时企图在牧区定居的农民带来了妻子和孩子，他的狗和铁蒺藜也出现了。"[②]

〔**鼓励垦殖西部的土地政策**〕　正当牧畜业处于兴旺的时候，却受到了不可抗拒的农民垦殖的压力，他们成千上万地涌入大平原和山谷地区，征服了草原和山麓的荒野，把它们变为可供耕种的农田。内战结束后，美国人想要获得土地的愿望仍是他们

---

①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87页。

② 同上。

向西迁移的巨大动力。为了鼓励东部居民和外来移民开拓西部，联邦政府于1862年实施宅地法后，又颁布一系列使定居移民易于获得土地的土地法。1862年的宅地法实施后，到1900年联邦政府拨出的土地达8,000万英亩，但其中相当大的部分为冒牌定居者所领去，最后落到牧场主、林场主和土地投机商的手中。尽管如此，宅地法对移民拓殖密西西比河以西广大地区还是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宅地法分配每户160英亩的作法，虽适合于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带的情况，但对干旱、无树木的大平原来说，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对小农户来说，开垦这块土地直到收获所需的费用，加上灌溉、建房、购买设备和请帮工的开支，都非个人力量所能承担。1871年，据农业部估计，光是为这块土地修木围墙一项就需要1,000美元。[①] 对大农场主或农业公司来说，虽都有力量进行投资，也愿意使用适于大平原耕种的新机器，但只有160英亩的土地是不值得投资的。

后来，联邦政府逐渐认识到地区间的差别性这一问题。到1873年，国会通过了育林法，作为西部分配土地的补充措施。这个法案根据育林会带来雨量的理论，对愿意植树40英亩（1878年改为10英亩）的耕种者都授予另外160英亩的土地。这些所谓“申请育林”的种植者共获得900多万英亩的土地，大部分位于内布拉斯加、堪萨斯和南、北达科他等地。这个法案实施后，因效果不大，于1891年废除了。

为了激励移民去西部垦殖和定居，国会又通过两个法案：一个是1877年颁布的荒地法，另一个是1878年颁布的木材和砾石法。前者规定，每个移民按每英亩1.25美元的地价先缴付现款0.25美元，就可占用640英亩荒地；条件是必须保证在3年内至

①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88页。

少对其中一部分荒地进行灌溉；荒地灌溉后经有关机构检查合格，再补缴每英亩 1.00 美元的地价，就可正式取得土地所有权。这个法案是国会在牧场主的压力之下通过的，因为大牧场主总想以最低的地价获得尽可能多的土地。数千农民也根据这个法案购得了不少荒地，但因灌溉工程非常困难，个人财力难以承担，不到 3 年的期限便都放弃了。结果大片的土地都落到牧场主手中。后者规定，政府出售所谓"不适宜于耕种"而只对采伐木材或采石有用的土地，购买者可按每英亩 2.5 美元的价格买到不超过 160 英亩的土地。当时，每英亩 2.5 美元的价格是很便宜的，用美国西进运动史学者 R. 比林顿的话来说：它"约为一根好原木的价格"。[①] 这是适应林场主和矿主的需要而制定的法律。在法案实施后，他们雇佣大批移民去政府登记，把领到的土地证都交给他们，然后发给受雇者每人 10 到 50 美元的酬金。这个法案最初只适用于西海岸 3 个州和内华达，1892 年又推广到了其他州的国有土地。这样，美国西部森林地带很快就被林业和矿业资本家以极低的代价收买去了。

同时，根据 1862 年的莫利尔法和 1864 年太平洋铁路的修订法，铁路公司、土地公司和各州也从联邦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它们向西部定居者出售 500—600 万英亩的土地至少有五、六次之多，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土地靠近交通线和城镇，每英亩售价 2 至 10 美元不等。[②] 有些铁路公司还在国内和欧洲许多城市设立代理机构，为出售土地和开垦西部的优惠条件大事宣传，以广招徕。

〔大平原的开垦及耕作方式〕　西部大量土地的出售与各

---

① 比林顿：前引书，第 608 页。

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 2 卷，第 88 页。

铁路干线的修建为农民的垦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他们要把半干旱的大平原变成适于耕种的农田，还必须克服一系列的困难和障碍。首先，最紧迫的问题是环绕农田修建篱栅的问题。对农场主来说，无论是饲养牲畜、存贮粪肥，还是维护水源，保证庄稼免遭牲口的祸害，修建篱栅都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当大平原农场主与牧场主为放牧问题而引起的斗争日趋剧烈的时候，筑篱栅的问题更加突出。前者强烈要求后者筑栅圈养牲畜，而后者则坚持敞开放牧，并要求前者自建篱栅，以防牲畜进入。双方争执不下，甚至发生流血的殴斗。但是，在大平原修筑篱栅是极其困难的，因为那里缺乏树木，以致环绕农田修筑篱栅所需的木材，必须从外地运入，而且费用高昂，一般农户根本无力负担。后来，有些农户曾试用挖沟筑堤或种树成篱等各种办法代替木篱，但都难以推广应用。直到1874年伊利诺伊州农场主J.F.格利登发明的铁蒺藜（即有倒刺的铁丝）投入市场后，筑篱的问题才得到解决。接着，在供应铁丝的东部企业主购买格利登公司的一半股权后，该公司于1876年开始大量生产。那年，生产了300万磅铁蒺藜，售价是每100磅约20美元。5年内，铁蒺藜的销售量急剧上升到8,000万磅，而每100磅的价格却下降到10美元，到1890年更下降到4美元。这样便宜的价格使得大平原大部分适宜耕种的土地都用铁蒺藜围了起来，成为小麦的主要产区。因此，有的美国历史学家强调指出，铁蒺藜“对大平原发展的重要性是堪与轧棉机对南部发展的重要性相比的”。[①]

筑篱问题的解决使大平原的农田耕作有了可能，但是发展农业，扩大种植面积，还需要解决水的问题。大平原是片缺水的干

① 莫里斯等：前引书，第2卷，第97页。

旱地区，经常发生周期性水荒。随着牲畜的大量繁殖和农田的不断扩大，供水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那些远离河流的农户遇到更大的困难。那里解决的办法是钻打深井、利用风车汲水和采用旱地农作法等。大平原土质干旱，只有钻打深井，才能找到水源，而钻打100英尺以上的深井就需要机械设备。这种机械设备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制造出来，开始供应。风车的应用解决了从深井汲水的动力问题，因为它是靠大平原上强劲的风力旋转的。到70年代后期，那里许多农场都竖立起高耸的风车，成为大平原景色的一种明显标志。另一较广泛运用的办法就是旱地农作法，它是在一场雨后立即耙地松土以保持湿度防止蒸发的科学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在那里大部分土地播下抗旱性谷类的种子就有可能发芽、生长，经过不断的莳弄，就能取得较好的收成。采用这种农作法的土地，每两年必须休耕一年。只有在那些异常干旱的地带，这种农作法才没有奏效。那里农民遇到的另一困难就是土质坚硬，一般老式的犁因铁质较软翻土很不得力。直到70年代后期，冷淬铁制作的犁大量上市后，这里农民才有了翻土的主要工具。不久，单座的多铧犁也问世了，这样农民就能一次开掘好几条垄沟，从而提高了播种的工作效率。大平原的某些地区经常遭到风暴、冰雹和严寒的袭击，因此秋季收割庄稼必须迅速完成，否则一遇气候突变就有全部被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农场主或农户经常担心的不是他能种植多少农田，而是他能及时收割多少庄稼。到80年代，收割扎捆机的发明及其广泛使用解决了这一问题。用这种收割机，两个人赶几匹马每天就可收割20英亩的小麦。后来，半机械化的收割效率日益提高，到1890年，一个西部农民就可能每天收割135英亩的庄稼。[1] 最后还有

---

[1]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90页。

麦种的问题。那里冬季气候严寒，不能种植东部通常种的越冬小麦，而只能改种春小麦：5月播种，冰冻前收割。春小麦种植推广后，大平原各农业州的小麦产量大大增加，使广大西部成为美国主要的产粮基地。

大平原的干旱少雨、树木缺乏等自然特点，也给农业开拓者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由于这里缺乏木材和石头等建筑材料，农民只得用草原上带有草根的硬泥块垒起矮小的住房，美国人称此为“草根泥屋”。这种粗陋的小屋虽也有些优点，即冬暖夏凉，风吹不倒，也不怕草原的野火，但生活在阴湿的四壁当中感到非常抑郁。在干燥季节，屋顶的泥土和草根经常脱落，到了雨季，屋顶上就成了泥泞不堪的泥潭，不断滴答漏水，主妇只能在屋内打伞作饭，非常令人沮丧。缺乏木材也造成燃料困难，尤其是在严冬季节，取暖问题更加严重。最初，农民用晾干的野牛粪作燃料，后来野牛日渐稀少、绝迹，改烧干草，还设计了特制炉灶，以节约干草。但这些燃料都不能令人满意，直到铁路把煤运入大平原，才解决了问题。总之，在开垦大平原过程中，农民不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

由于大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不断解决以及广大农民的艰苦劳动和铁路运输的广泛延伸，美国西部的最后开拓以空前的速度展开。首先，西部人口急剧增加，在1870至1890年期间，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西部人口从687万多人猛增到1,677万多人。[①] 其次，美国耕种的土地也迅速扩大。据统计，在1860到1900年期间，美国农场主和农民拥有的土地增加了1倍多，即从4.07亿英亩增加到8.41亿英亩，其中用于耕种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比重从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98页。

40%上升到差不多50%。[1] 这样，加上农业半机械化的实现，美国农业广泛而迅速地发展了。在农产品价格因世界市场的竞争而下跌以前，美国农业经历了一个繁荣兴旺的时期。

〔“边疆的消失”及其影响〕　随着西部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开拓工作的广泛开展，在密西西比河与西海岸之间的广大地区逐渐为农、牧场主和林业、矿业公司以及众多的开拓者所占据。因此，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总监在年度报告中宣称：“直到1880年，这个国家（指美国——作者）还有一条拓居的边疆，但是现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地区已经为一大批分散孤立的拓居地弄得残破不全了，因而简直不能说还有一条边疆线了”。[2] 据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边疆学说”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J. 特纳把“边疆的消失”看成是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里程碑，认为它标志着从1607年开始的西进运动的结束和美国历史新时代的开端。这里他提出了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是“边疆的消失”是否意味着西进运动的结束？二是美国历史的新时代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这需要结合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予以分析。

首先，“边疆的消失”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较小的。因为1890年后西进运动同以前一样仍在继续，而且1890年后30年间为定居和放牧的目的而获得所有权的土地比1890年前30年间还要多些。[3] 尽管人口普查局发出了那个公告，说西部土地每平方英亩平均已有2到6个居民，但实际上，那里只有稀稀落落的居民点，仍有大量空隙的土地有待开垦。据统计，1890年除加州以外整个西部农场数比密西西比单独一州还少，仅有俄亥俄农场

① 福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89页。
② 转引自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99页。
③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99页。

数的一半；全部耕种土地的英亩数仅为俄亥俄州的两倍。[1] 因此，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期，力求改善自己处境的人们仍然遵循霍勒斯·格里利的忠告，[2] 络绎不绝地前往西部。在他们看来，与人口稠密的东部老区相比，西部新区的土地较便宜，竞争者较少，而且发财致富的机会较多，因此他们仍把西部看成是“希望之乡”。不过 1890 年后那里已经没有无人居住的大面积土地了，他们拓居的土地大部分位于大平原分散孤立的农场之间的空隙地区和蒙大拿、怀俄明等新区。

其次，“边疆的消失”对美国社会心理的影响远远超过经济方面的影响。当时，许多美国人虽然对人口普查局公告的发表感到突然，但也逐渐认识到大陆扩张的时代已告结束，海外经营活动的时代即将开始。怎样适应“边疆的消失”后这种巨大变化是美国社会各阶层都不能不加以考虑的问题，首先是西部农场主和农民，他们过去习惯于迁徙流动并靠土地的肥沃来增产商品粮食，今后能否使自己适应稳定性生活和水土保持的习惯？其次是东部工人，他们过去因劳动力和移民不断涌向西部而保有高工资，以后这种情况还能继续下去吗？再次是矿主和林业采伐公司在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上也开始踌躇不前，他们过去一直靠掠夺式的开采和砍伐而获得巨大的利润，今后对固定的自然资源增加投资能否获得按比例增长的收益？有些经济学家也发出警告说，长期以来美国经济一直靠继续不断的扩张而取得迅速的发展，今后在没有新的自然资源可供开发的情况下，这种发展的势头还能保持吗？总之这些疑虑和其他类似的问题都对美国舆论和社会心

---

① 比林顿：前引书，第 656 页。

② 霍勒斯·格里利（1811—1872 年）是美国著名的报纸编辑和改革者，曾发出“青年人向西部去”的口号。

理产生较大的影响。当时，美国统治集团为了适应垄断资本集团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的需要，也利用“边疆消失”后社会心理变化的时机，大力鼓吹向海外扩张。有些扩张主义学者也随声附和，宣扬政府的职责就在于为美国人寻求另外可供开发的地区，鼓吹海外扩张乃“边疆消失”后合乎逻辑的发展。因此，海外扩张是美国历史“新时代”的一个主要方面，所谓“新时代的开端”不过是加强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罢了。

第三节　西部开拓的历史作用

〔西部开拓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西部开拓对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它不仅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国内市场、粮食和原料基地，而且促进了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吸收了巨额外资，从而使采矿业、牧牛业、铁路建设和其他企业有了蓬勃的发展。在19世纪最后30年，西部拓居的土地比1607—1860年美国整个历史时期开拓的土地面积还要大。经过开拓者的惨淡经营和艰苦劳动，密苏里州以西广大地区发展成为小麦主要产区，使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麦供应者；艾奥瓦、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则成为盛产玉米的地区。西部各地矿山的开采既为美国工业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原料，也刺激了商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的兴起。横贯大陆的铁路事业的发展，又加速了大平原和落基山地区的开拓。在1869—1893年，美国先后建成了5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这些铁路干线及其支线就像几根长长的动脉从东部心脏地区伸向中西部、西南部和远西部的各个角落，把移民和资本以及器材设备输送到“最后的边区”。“一个国家以这么短的时间，开发了这一片广大土地，这无疑是一篇壮丽的史诗。这种现象在历史上，虽不

能说是绝后的，但可以说是空前的……西部土地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无论用什么动听的字眼来形容，恐怕也不能算作过分的。"[1]

美国西进运动是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的一个典型，它是受着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制约的。剥削和扩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备条件。在西进运动中，掠夺印第安人土地和屠杀印第安人的政策，在美国资产阶级看来，标志着"文明"战胜了"野蛮"，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特纳在其著作中之所以完全无视向西扩张的残酷性，硬把西部描绘成"和平的"伊甸乐园，也决非偶然。"西部固然为移民提供了机会，但也不若特纳渲染的那样美好。西去的移民（也）是受着无情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支配和驱使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西进过程中，造成极大的物质和人力的浪费，无数劳动者在精神上和生命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

〔美国版图的扩大与新州的建立〕　随着西部的开拓和西去移民的激增，美国版图扩大了，新的州也在不断建立。1860年，美国约有1/3以上地区被划分为一些联邦控制下的准州（或称领地）。准州设有一个两院的议会：一个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和一个由众议院提名、经国会选择其中5人组成的小型"立法委员会"。[3] 准州地方长官对一切立法都拥有否决权。准州议会两院共同选出一名代表，"他将在国会中拥有一个席位，……有权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4] 当准州自由居民人数达到6万时，即可被接纳为一个州参加联邦。当时，在东起明尼苏达州西

---

① 杨生茂："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和区域说"，载《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页。

② 前引《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第15页。

③④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历程》，纽约1965年，第421页。参看这一著作的中译本，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香港1987年）第518页。

到俄勒冈、南起得克萨斯州北迄美、加边界这片广大地区上，还没有一个正式建立的州。但在1860年以后30多年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这片广大地区也逐渐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其中大部分包括在新建的各州之内，成为联邦正式的组成部分。因此，建立州制是美国吸收西部的一个重要步骤。①

1864年，毗邻加州的内华达作为一个新州加入联邦。接着，内布拉斯加和科罗拉多分别于1867年和1876年被联邦接纳为新州。随着怀俄明准州的建立，西部的领土再划分也基本完成了，但是这些以矿业资源为基础的准州，很少在短期内具备正式建州的条件。

横贯大陆铁路的陆续建成使西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它们给西部一些准州带来了长住的农业居民并带动了城镇的兴起，从而为它们争取建州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870年，达科他、爱达荷和华盛顿等准州的人口总共仅有37,000人，到1890年，即北太平洋铁路已经建成和大北铁路即将建成的时候，那里的人口已增加到1,128,000人了。② 因此，这些横贯大陆的铁路在创建西部新州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争取建立正式州的鼓动是持续不断的，特别是在达科他和华盛顿准州中。这种鼓动既反映了公众要求建州的热忱，也表明了职业政客力图成为国会议员和新州官员的欲望。但是，华盛顿和达科他准州的情况却是复杂的，华盛顿准州的居民力求把爱达荷狭长地带划入该州，而达科他准州的公众，则坚持把该准州划分为两个正式州，即南达科他和北达科他加入联邦。虽然这两个准州和其他准州根据人口的数量都有充分的资格取得州的地位，但

---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101页。
②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101页。

由于首都华盛顿政党斗争的剧烈而被拖延了 10 年之久。直到 1890 年，国会召开两院联席时，南达科他、北达科他、蒙大拿和华盛顿才取得州的地位，加入联邦。次年，怀俄明和爱达荷也分别被接纳为正式的州。犹他准州是摩门教盛行的地区，该教盛行的一夫多妻制是取得州地位的主要障碍，直到该教领袖宣布放弃这一制度后，才于 1896 年被接纳为新州。到 19 世纪末，西部只有 3 个准州尚未取得州的地位，那就是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俄克拉何马。它们未被接纳为州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综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因素：人口稀少、不愿与他州合并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以及准州内印第安人问题尚未得到妥善的处理。

〔西部开拓对美利坚民族性格及政治制度的影响〕　美利坚民族形成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其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主要来源于欧洲，这是人所熟知的史实。随着时代的进展和环境的变换，美国的民族性格和政治制度也有了一些发展变化。西部开拓者主要来自美国东部和欧洲，其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也主要来源于美国东部和欧洲，但西部环境及其开拓对他们的思想、传统、风俗习惯以至组织机构都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人员的频繁交往和资源货物的不断交流而逐渐扩大到东部以至全国，从而对进一步塑造美利坚民族性格和促进民主制度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仅就几个较突出的方面阐述如下。

首先是开拓者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所形成的进取、求实精神。内战后，前往西部的开拓者是各种各样的：既有为发财致富而投资于农、牧、林、矿业以及修建铁路的资本家，也有去西部寻求机会和“新奇”的投机者和冒险家，但是大多数却是为摆脱困境而去西部谋生的东部劳动者和外来移民，他们是开拓者的主体。尽管各类人前往西部的动因和目的有所不同，但大多数开拓者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富于进取、求实的精神。他们争取自我改

善的意志和决心都比留在东部的人们坚强，他们较少受到家庭和宅地的束缚，因而在西部开拓过程中呈现出一派进取的气氛；但为了实现自我改善的目的，决不能单凭硬拼蛮干，而必须有从现实出发的求实精神。他们是讲求实际的，既对理论不感兴趣，也不考虑过去和将来的事，而只注意目前，解决每天遇到的实际问题。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西部环境中，无论是从事生产或安排生活，他们都不能墨守原有的传统和成规，而需要勇于探索和革新，不断结合实际取得实践的经验。否则，开拓者不仅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会因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而遭到惨重的失败。这种失败的事例在西部开发史中并不是少见的，但它们却从反面教育了开拓者，使他们养成了面对现实，探索问题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进取、求实精神的影响日益扩大，从而加强塑造了美利坚民族性格这一明显特点。

其次，西部资源富庶，人少地多，因而能为开拓者提供较多改善自己处境和致富的机会，这就助长了流动的习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曾指出，在西部"现实生活中，机会就意味着社会流动性，即个人有机会飞黄腾达而不受其社会地位的束缚。"[①] 这种社会流动表现为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内战后，由于西部广泛、迅速的开发，开拓者的横向流动更加频繁，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处境，从东部涌往西部，其中一部分又从农村移往城镇，最后从城镇移往城市。他们离去的地方又为后来者或外来移民所填补。西部新开发的地区也存在着阶级界限，但不像东部较老的社区那样明显、固定地划分，而且较容易被突破。因为开拓者既有可能在那里开发许多未被利用的资源以致富，又易于在

① 奥斯卡·汉德林："机会在美国：历史的回顾"，载《交流》，1983年第2期，第63页。

一个尚未定型的社会秩序中获得上升的机会。这种社会经济地位上升，即纵向流动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小农场主靠肥沃土地的丰产很快地便富裕起来，投机者由于出售他在城镇的一些地块而获得一笔巨额收入，运气好的矿工拿起铁锹干一阵子便发现丰富的矿藏，从而发了横财。总之，一个人只要在有利时机的情况下致力于发财致富，他就有可能提高他的社会地位。这种川流不息的人群流动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交替之际达到了高潮，而且时断时续地一直持续到现在，使美国人成为一个“流动的民族”。①

第三，西部地域极其广阔，因而开拓者的流动往往是长途跋涉的。为适应远距离迅速流动的需要，西部开拓者逐渐养成了一种“拼命赶”精神。这种精神主要来自开拓者的思想意识和开发实践两方面。在涌向西部过程中，开拓者认为：“如果你不能赶在别人的前头，抢先到达那里，好处就可能被别人捞走。”② 可是西去“路途遥远，充满危险：沙漠烈日、缺乏饮水、寒冬深雪、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每一个深谋远虑的男子汉加快步伐，以尽可能缩短发生危险的可能性。”③因此，在开拓者看来，最紧要的是抢先到达目的地，即使不能成为第一个，也要尽快地到达那里。正是这种“拼命赶”精神，“明确形成了美国向西迁移时的一大特征，”④ 加强塑造了美国人“讲求速度与效率”的性格。当时，这种“拼命赶”精神也推动了水陆运输的改进和铁路的修建，在改进交通运输的竞争中，承包者都力求技术进步，以便超越竞争者。这一点在西部铁路及其支线的修建上突出反映出来了，后来在美国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表现出

---

① 比林顿：前引书，第 654 页。

②③ 丹尼尔·布尔斯廷：前引书，第 97 页。

④ 布尔斯廷：前引书（中译本），第 117 页。

来。

第四，美国人浪费的传统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与西部开拓的历程是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内战后，西部广泛开发所造成的自然资源极大的浪费更助长了这种风气。当时，煤、铁、木材和石油等资源都极为丰富，而且易于开采。比如1859年美国打了第一口油井，只钻探了59英尺深就冒出了石油；许多煤矿都是露天煤矿，这就大大简便了采煤的过程。因此，开拓者一般认为美国自然资源极其富庶，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只有开发而不是保存资源，才能更快地取得财富。这种对自然资源毫不爱惜的风气就助长了美国人的浪费性格。当时，西部乱砍滥伐原始森林，洗劫矿藏资源的现象层出不穷。开拓者既不考虑节约和保护自然资源，更不为子孙后代着想。到20世纪初，尽管老罗斯福政府推行保护自然资源的政策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美国人的浪费习惯仍延续下去了。

第五，西部开拓对促进美国民主制起了一定的作用。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来源于欧洲和美国东部，而决不像特纳所坚持的那样，说它来源于美国边疆，诞生于“美国的森林”。[①] 西部边疆只不过为美国民主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宜的场所。那里土地所有权的广泛分散以及需要自治来解决独特的地方问题都要求扩大民主权利，从而削弱集中领导的控制。开拓者不喜欢政府干涉他们的生活，就像殖民地人民不喜欢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干涉一样，但却要求政府尽力为他们的开发服务。

在草拟制定西部各州的宪法中，就反映出这种扩大民主权利的趋势。西部各州宪法主要是因袭、摹仿东部各州的宪法，但却反映了开拓者关于扩大民主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赋予州

---

① 弗雷德里克·J. 特纳：《美国历史中的边疆》，纽约1976年，第293页。

立法机构较大的权力，因为开拓者认为立法机构更能响应公众舆论的要求；同时把立法权置于公众控制之下，采取了诸如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等。（二）扩大民选官员的范围：州长、立法机构的议员、教育委员会负责人以至法官等都由民选产生。①（三）扩大了公民权，取消了选民的财产限制和宗教测验，成年男子都享有普选权。怀俄明和犹他两州的宪法还规定妇女有选举权，不久以后科罗拉多州和其他西部各州也把这项规定纳入它们的州宪法。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19 世纪后期西进运动是美国不断扩张领土的运动，也是美国人和移民开发西部的群众性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既充满了美国统治集团驱赶、屠杀印第安人的血腥史实，也留下了开拓者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的开发业绩。这种开发业绩既对美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进一步塑造了美利坚民族的性格，促进了美国民主制的发展。

---

① 比林顿：前引书，第 652 页。

②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 2 卷，第 104 页。

第五章

内战后涌入美国的移民洪流及其对美国发展的巨大作用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它的历史进程受着连续不断的移民洪流极大的影响。在世界近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吸引了数目这样众多、民族（或种族）这样庞杂的外来移民。除了原有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外，所有美国人不是外来移民，便是外来移民的后代。

19世纪后期是美国移民急剧增长的时期，涌入美国的各国人民形成了连续不断的移民洪流。这些移民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欧洲：19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来自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但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二、三十年期间，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移民逐渐居于多数。经过不断的繁衍与融合，美国逐渐形成一个以欧洲白种人占多数的国家。

自建国以来，美国出于对劳动力的需要，一直欢迎外来移民，采取来者不拒的政策。直到1882年“排华法案”实施后，美国才逐渐过渡到以种族和国籍为基础的限制和选择移民政策。这种限制和选择政策主要是针对华侨和东欧、南欧各国移民的。美国采取排华政策，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美国资产阶级既把华工作为剥削的对象，又是其用来挑拨民族关系和对付

本国工人阶级的手段。

这个时期，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生活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他们不仅为美国工业化和西部开发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技术，从而大大加速了美国工业化和西部开发的进程，而且丰富了美国精神生活，促进了美利坚民族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内战后移民洪流及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

〔内战后移民洪流及“老移民”的情况〕　1860—1900年期间，美国人口总数增加了一倍多，即从3,100多万人增至7,600多万人。在全国人口增长中，外来移民占有很大的部分，仅在这40年间，就有1,400多万移民涌入美国。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欧洲：19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来自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但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二三十年间，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的移民逐渐居于多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涌入美国的移民数目出现了两个高峰年代：一个是1881—1890年，达到了520多万人，另一个是1901—1910年，达到了870余万人之多①，它在美国移民史上是个创纪录的数字。这个时期，美国的外来移民在数量上连续出现高峰年代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另方面是有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欧和南欧各国，人口激增，而本国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却不足以容纳激增的人口，适应他们生产和生活的要求，以致大量外流。

19世纪80年代以前四五十年间，美国的大部分移民来自英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一部分，第105—106页。

格兰、爱尔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西欧和北欧国家，他们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老移民”。这些移民的数量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峰，以后就大为减少，其情况有如下表。19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或地区前往美国移民大为减少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它们本国工业日益发展，因而对劳动力的需要激增；第二，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德等国开始占领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因而它们国内过剩的人口也可向那些地方转移。

西欧和北欧各国前往美国移民的数目表

（1841—1900年）

国别或地区 / 年代	德 国	爱尔兰	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士	斯堪的纳维亚
1841—1850	434，626	780，719	267，044	13，122
1851—1860	951，657	914，119	423，929	24，680
1861—1870	827，468	435，697	607，076	126，392
1871—1880	718，182	436，871	548，043	242，934
1881—1890	1，452，970	655，540	807，357	655，494
1891—1900	505，152	388，416	271，538	371，512
总 计	4，890，055	3，611，362	2，924，987	1，434，134

资料来源：伦纳德·丁内尔斯坦等：《美国人的种族、外来移民与同化史》，纽约1982年版，第12页。

在19世纪中叶以后，西欧和北欧各国的“老移民”之所以离乡背井、移居美国，固然由于他们在本国生活无着以及难以忍受的政治和宗教迫害，也由于当时“美国热”在欧洲盛极一时。那时，美国铁路公司和大企业为了出售铁路沿线的大量土地和招募工厂所迫切需要的劳动力，纷纷在欧洲各国设立代理机构，一方面大渲染移民易于获得便宜土地，经营田园的美妙景象，另方

面广泛宣扬美国就业机会多、工资高的优越条件，以广招徕。有些公司和企业老板在欧洲招募迫切需要的工人时，甚至先垫付来美移民的旅费，日后由他们工资中扣还。此外，早先移居美国的“老移民”也纷纷写信回国，夸耀美国的富庶，甚至把它描绘成“天国乐土”或“希望之乡”。有个来自挪威的移民就在家信中夸大其词地写道：“挪威不能与美国相比，正如一片沙漠不能与鲜花盛开的花园相比一样”。[1] 这对他们故国同胞和亲友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同时，由欧洲来美国的移民在出境手续和旅程条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进。移民的迁徙自由，逐渐为西欧、北欧各国政府所确认，因为人口过剩的幽灵促使它们把移居外国看成是一种医治本国贫困和人民不满情绪的“安全阀”。欧洲各大港口设施都有所改进，办理离境手续也在简化。远洋轮船取代了帆船，大大缩短了航期，到19世纪70年代，横渡大西洋的航程无需几个月了，而只需10天左右。由于航行日程大大缩短，船上供应的水和食物都易于保持新鲜，疾病和死亡率因而也大为减少。

欧洲的“老移民”到美国后，一部分从事修筑铁路和开凿运河等艰苦劳动，大部分留在他们登陆的港口城市及其周围，充当工人或从事商业活动。到19世纪末，旧金山和新奥尔良等城市都有爱尔兰人聚居区。德国在19世纪中叶的农业歉收虽然没有恶化到当时爱尔兰那样程度，但是19世纪60年代由于俾斯麦发动的战争而引起德国各邦的动乱以及大量征兵和雇佣劳动者社会地位的低下都加剧了移民外流的浪潮。德国人是来美国的移民中最大的民族集团，到19世纪末达到将近五百万人。他们中多数

---

① 伦纳德·丁内尔斯坦和戴维·里门斯：《美国人的种族，外来移民与同化史》，纽约1982年，第16页。

在中央北部各州(伊利诺伊、密歇根、密苏里、艾奥瓦和威斯康星)从事农业劳动,也有少数人进入城市,充当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或经营小商店等,因而使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和米尔沃基等中西部城市都富有德意志民族的色彩。甚至在纽约市,他们的人数也超过了其他外来移民。那里的"居民谋生甚至不需要懂英语。"①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之所以离乡前来美国,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政治和宗教的原因。在瑞典和挪威,由于政教一体,不信国教者与政治上持异议者都遭到迫害和惩治,严峻的征兵法也使得许多青年人逃役外流。在1890年前,他们大部分前往美国中央北部各州产麦区从事耕种,因而中西部、特别是明尼苏达州人口激增。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们转向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充当企业工人,也有些去太平洋西北部,从事采伐区和锯木工厂的劳动。据191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有60%以上的瑞典移民及其子女居住在城市及其附近地区。

〔"新移民"的来源及其特点〕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东欧和南欧各国移民日益增加,到19世纪90年代他们汇成了一股移民洪流,超过了移入美国人数的一半,后来在20世纪头10年间更增加到占来美国移民总数的72%②。这些移民被称为"新移民",以区别于19世纪80年代以前来自西欧和北欧各国的"老移民"。他们分属于意大利人、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三个民族集团,主要来自欧洲三个国家: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包括波罗的海国家)。这三个国家的移民数量的增长情况有如下表所示。

---

① 丁内尔斯坦:前引书,第24页。

② 阿瑟·林克等著:《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3年,上册,第11页。

在这批移民来源的变化中,意大利移民数目的增长是个突出的例证:1880年来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只有12,000多人,但到1907年却增加到285,000多人,占该年来美国移民总数的22%。[1]

1871—1910年来自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的移民人数增长表

年代＼国别	奥匈帝国	意大利	俄国	总和
1871—1880	72,969	55,759	39,284	168,012
1881—1890	353,719	307,309	213,282	874,310
1891—1900	592,707	651,893	505,290	1,749,890
1901—1910	2,145,266	2,045,877	1,597,306	5,788,449
共计	3,164,661	3,060,838	2,355,162	8,580,661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代到1970年》,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975年版,第1部分,第105—106页。

"新移民"具有不同于"老移民"的一些特点。首先,在宗教信仰上,他们不是新教徒,而主要是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教徒。其次,他们操本国或本民族语言,不能讲英语。第三,他们来自比"老移民"(爱尔兰人除外)贫穷得多的国家,原有生活都较贫困,教育和文化程度也较低,文盲比率大,但是男性和青年所占比重都超过了"老移民"。第四,他们到美国后,大都在城市的本民族聚居区定居谋生。

到19世纪末期,美国农村可供出售的便宜土地已经不多,而城市里迅速扩展的轻、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非熟练工人,"新移民"正好适应这种需要。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只身来美国的,家眷仍留在本国,因为这些人亦不打算在美国定居,而只想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一部分,第105—106页。

寻求发财致富的机会，一旦发迹，便准备衣锦还乡。所以有位美国社会学家称他们为"迁徙的产业工人"。[1]

"新移民"之所以离乡背井，移居美国，基本上同"老移民"一样，也出于政治、经济和宗教等方面原因。不过由于时代背景和地区情况的不同，他们离乡外迁的原因也有某些特点。首先，宗教迫害仍是东欧各国人口外流的原因。在19世纪后期，西欧各国对不同教派的容忍精神日益增多，因此宗教信仰问题已非移民出境的主要原因。但是东欧几个国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它们继续歧视犹太人宗教，特别是在沙皇俄国占领下的波兰，在19世纪80年代初就因宗教信仰问题发生过对犹太人有组织的迫害，后来还发生了几次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结果造成犹太人大量离境。据统计，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东欧来美国的犹太人移民在200万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来自俄国，也有一部分来自奥匈帝国。其次，由于受到政治迫害而大量出境的是波兰人，他们在波兰被瓜分后受到异族的残暴统治，对俄、德占领当局推行俄罗斯化和日耳曼化的奴役政策深恶痛绝，因而纷纷外迁。第三，由于原有农业秩序的破坏和严重歉收，东欧和南欧各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背井离乡，特别是意大利农民因生活困苦、走投无路而大量迁往美国。当时，小麦和柑桔等水果价格在世界市场上暴跌，导致了意大利农业经济的衰落，这使得原已生活贫困的农民更陷入绝境。有些来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后来说：那时"如果我们仍留在意大利，那么只有当作食物互相吃掉了。"[2] 当时，在奥匈帝国，许多农民因丧失了土地，无以为生，而新建的工厂又寥寥无几，根本无法吸收大量无地的农民和失业者。这就导致大量

---

① 参看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2卷，第178页。

② 丁内尔斯坦等：前引书，第33页。

的马扎耳人和斯洛伐克人离境外迁。

〔“新移民”来美国后生活和工作情况〕　　“新移民”到美国后，主要分散定居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和俄亥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他们中多数定居在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等州，也有相当数量的移民前往伊利诺伊和俄亥俄两州谋生，只有很少数去南部各州，这是因为南部在提供土地和就业机会方面都不能与北部相比。

“新移民”中大多数定居在纽约、芝加哥和底特律等一些大城市中，这是因为那里工厂林立、商业发达，就业机会多，而且在民族聚居区里有不少他们的亲友和同胞，这自然有助于他们谋求生计和适应新的环境。这些不同民族聚居区俨然像个大城市里的小城镇，因此有许多美国学者把它们称作“被包围的飞地”，比如当今纽约市里仍存在的“小意大利区”、“犹太人区”和“斯洛伐克人区”等就是这些延续下来的“飞地”的例证。因此，这批在大城市定居的“新移民”，既没有与土生的美国人融合在一起，也与其他民族聚居区彼此隔离，不大往来。

这种民族（或种族）聚集的趋势也反映在移民职业上。他们从事的职业虽然各种各样，但由于民族（或种族）聚合力的作用，往往集中于某些行业或从事某几种职业。比如，“新移民”中最大的民族集团意大利人从事的职业虽较广泛，但他们大部分集中于以下几种职业：接替爱尔兰人，充当铁路工人、建筑队工人以及矿工；经营果园、葡萄园和城郊的蔬菜农场。斯拉夫人多在密歇根、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等州的矿山和工厂劳动，也有些在芝加哥屠宰场和炼钢厂当工人。犹太人主要是在大城市里开店铺，做小生意，也有不少在雪茄工厂和酿酒厂当工人。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因受过教育，有些文化，往往被工厂录用为技术工人。后来，犹太人就利用他们掌握的某些工艺，在纽约市的一些轻工

业行业、特别是服装行业中长期占有优势。

总的看来，“新移民”干的活计大部分属于社会底层的职业，是土生美国人和“老移民”所不屑于的既劳累而又肮脏的活计。但是为了谋生，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这种工资既低、工作时间又长的重活和粗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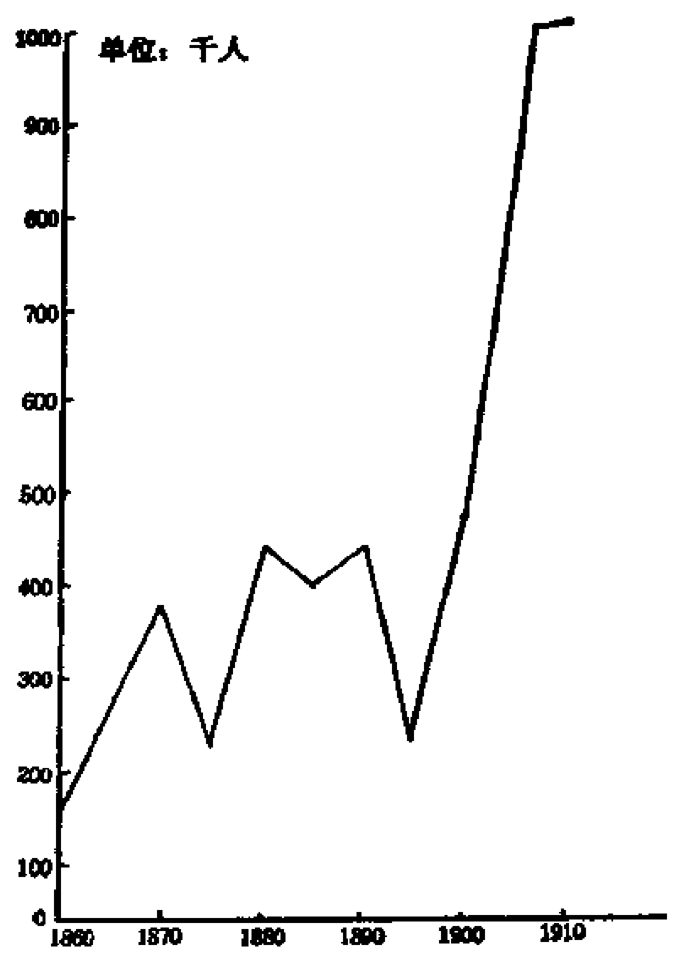
〔“推和拉”作用的分析〕　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不断向西部扩张，先后通过购买、谈判、掠夺与合并等方式，逐步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直到太平洋沿岸的北美大陆纳入美国版图。这片地广人稀、有待开发的广阔土地对外国移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内战以后，随着美国工业化的普遍、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美国工人工资比较高，超过了当时欧洲各国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一事实也对外国移民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因此，在19世纪后半期，涌入美国的移民数量是曲线上升的，但有较大的起伏，如下页图所示。这种起伏与美国和移民出境的国家双方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关系？是美国经济繁荣吸引移民的“拉”，还是欧洲各国经济衰退导致移民外流的“推”起主要作用？对于这种问题，美国经济学界早先的一种说法是：美国外来移民的高潮与低潮与美国商业周期有密切的关系，而与移民离去的国家经济情况的关系较少，即美国外来移民的高潮和低潮是以美国经济繁荣或衰退为转移的。[①] 美国繁荣时期对劳工的需求明显增加，不断从劳动力过剩国家或地区吸引劳工，从而出现移民来美国的高潮；反之，美国经济衰退时期，由于失业人数增长，外来移民的流量迅速减少了。这也就是说，在移民涌入美国这个运动中，美国方面“拉”的力量起了主要作用，而欧洲各国方面

---

① 哈里·杰罗姆：《移民群与商业周期》，纽约1926年，第209页；参看哈里·N. 沙伊贝等：《美国经济史选读》，纽约1964年，第395—405页。

“推”的作用则较小。

1860—1910年迁居美国的移民人数表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至1957年》，华盛顿1960年，第33—34页。

到本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布林利·托马斯提出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设想。[①] 他认为当时存在一个由互相依存的国家构成的“大西洋经济体”，而移民周期的变化与欧洲和美国经济发展

① 布林利·托马斯：《移民群与经济增长》，1954年版；参看格伦·波特主编：前引书，第3卷，第1072—1073页。

的节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不是从短期的商业周期，而是从双方长期的经济发展与资本构成的速度来考察美国外来移民数量的起伏。他指出，当投资额在英国明显增长时，美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就缓慢了，以人力和资本为主体的西进运动也减弱了；可是，资本一旦大量流入美国，那里经济活动便扩展了，移民洪流也就很快地随之而来。根据资本流向和资本构成变化的情况，他认为，1870 年以前，美国工业生产的高涨（以铁路修建、生铁生产和外国投资的增长等为标志）是紧随着一次移民高潮而出现的，所以那时欧洲萧条的"推"比美国繁荣的"拉"对移民去美国有着更大的影响；但在 1870 年以后，当美国经济发生结构变化时，即美国经济首次出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时，外来移民的高潮是随着美国经济高涨而来的，这标志了"拉"的因素居于主导地位。①

托马斯的这种分析虽然以"大西洋经济体"为名来考察美国外来移民数量的起伏，但实际上，只是以研究英、美两国经济相互作用为依据的，而没有对美国与移民离去的其他国家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因而不可能说明其他国家移民去美国的原因和演变情况。

实际上，在美国经济对移民具有同样吸引力的条件下，各地移民外迁的数量和速度是不一样的，是随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而异的。这种差异和悬殊主要是由移民各自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决定的。一般说来，欧洲各国移民外迁经历着一种普遍的趋势：即开头数量较小，中间出现高峰，末尾急剧下降，而这种趋势与美国经济的发展并无直接关系。比如，1830—1834 年，来自德国的

---

① 参看马尔德温·A·琼斯："外来移民"，载格伦·波特：前引书，第 3 卷，第 1072 页。

移民只占其全部人口的2.2‰，到19世纪50年代前期上升到9‰的高峰，但在1880—1884年却下降到3.8‰，最后到20世纪初期则更少于1‰，而这个时期却是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①]就是在一个国家内，移民外迁的强度也由于地区情况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在1905年匈牙利境内，前往美国的移民比率在马扎耳人中是4‰，而在斯洛伐克人和罗塞尼亚人当中却分别高达19.2‰和15.1‰。[②]

因此，这种大量人口的移动不单纯是由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的，而且也取决于移民离去的国家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后者比前者更能确切地说明该国移民外迁的数量和演变。

〔排外主义的抬头与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 自从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人一般是赞成广泛吸收外来移民的。这是因为：第一，美国幅员广大，资源富庶，但既缺少劳动力又缺乏技术，因此开拓土地、开发资源和发展经济都有赖于连续不断的移民洪流；第二，美国人相信他们有力量同化外来的移民，认为美国是个不同民族、种族的“熔炉”，经过这座“熔炉”的冶炼，美利坚民族将日益发展壮大。

但是，随着移民洪流的不断到来，土生的美国人和早来的移民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恐惧与担忧。他们害怕日益增多的外来移民会危及美国原有的“社会团结”，特别是害怕移民当中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教徒和欧洲思想激进分子都会在美国煽动和制造“骚乱”，从而威胁美国共和政体和民主制度。甚至担忧外来移民会给美国带来贫困、疾病和罪犯等严重社会问题，从而“结束了

---

① 约翰·博德纳：《迁徙的移民，都市化美国的外来移民史》，布鲁明顿1985年，第3页。

② 同上。

美国对欧洲社会弊病的免疫性。”这种恐惧和担忧由于报刊宣扬欧洲各国政府有计划地把社会渣滓倾倒给美国的报道而更为加剧。特别是宗教偏见在煽起美国排外主义情绪上起了更大的作用。先是爱尔兰和德国天主教徒的大量涌入，继而是东欧和南欧各国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大批到来，都被认为是对美国新教性质的威胁，以致引起了殖民地时期反对天主教活动的复活。在19世纪中叶，美国反对天主教的宣传鼓动不是侧重于教义和教会仪式的差异，而是集中于与欧洲专制主义和暴政有紧密联系的天主教会的信徒对美国现行制度所造成的危险。甚至有人捏造说罗马教廷有个借助天主教徒移民颠覆美国自由制度的阴谋计划，以致酿成了一系列暴徒袭击天主教机构的事件。“一无所知党”便是在50年代反对天主教和外来移民运动中出现的。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新移民”中天主教徒的激增和天主教教区学校的不断扩展，美国反对天主教会的排外主义也日益加剧。1887年创立的“美国保护协会”，其宗旨就是限制天主教徒担任公职，支持国家义务教育法，防止天主教会对公立学校影响的扩大。它还利用关于罗马教皇命令天主教徒消灭美国一切异教徒的谣传，大肆煽动反对天主教会的情绪，并在当时中西部农业区得到广泛的支持。同时，犹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也招致了反犹太主义运动的增长。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犹太人越来越成为

联邦政府对外来移民实行来者不拒的政策，并把管理移民事务的权力留给各州。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由于西部边疆的消失，外来移民激增，国内排外主义情绪日益增长，联邦政府开始考虑限制移民的政策。

1882年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是第一个以种族和国籍为理由禁止外来移民入境的联邦法案。它规定禁止华工入境十年，并禁止华侨入籍。1892年，国会又将该法案延长十年，到1902年进而无限期延长。“排华法案”虽然是针对中国人的，但也是限制东方人入境的开端。

这个时期，禁止移民入境的对象不仅限于华工，也涉及东欧和南欧各国的劳工。1885年，国会通过了禁止输入契约劳工的法案。这主要是来自劳动骑士团压力的结果，因为它宣称美国雇主们正在签订从东欧和西欧各国输入大量劳工的合同，用以破坏美国工人的罢工和降低工资。

从1890年起，联邦政府开始实行移民管制，并且根据个别选择的原则实行限制。那年，联邦政府设立了移民局，由它直接管理有关移民的事务。1892年，开放了埃利斯岛，把它作为纽约港的移民接受站。这时，禁止入境者的类别也在不断增加：1891年禁止入境者包括穷人、一夫多妻者和传染病患者；到1903年更增加了麻风病患者、妓女、职业乞丐和无政府主义者等，盘查入境者的措施也日益严厉和苛刻。

在1890年以后，随着“新移民”入境数量的激增，排外主义者把矛头日益对准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他们担心“老血统”的美国人有被这批“新移民”淹没的危险，极力鼓吹以认字为基础的“文化测验”，以限制东欧和南欧移民入境。接着，禁止不能阅读一种文字的移民入境的宣传运动便广泛展开了。在排外主义者不断鼓动下，国会于1896年通过一项对移民实行识字测验的法案，即成年的外国

移民不能阅读一段英文或其他文字者，一律不得入境。但这个法案却为克利夫兰总统所否决。在20世纪初期，国会又三次通过类似的法案，但均为历届总统所否决，直到1917年，国会不顾总统的否决，终于以2/3以上的多数票通过有关"文化测验"的法案。

这样，一直对移民敞开着的美国大门——几个世纪以来千百万移民憧憬着的机会之门——到20世纪初期部分地关闭了。这固然是排外主义者大肆活动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到本世纪初期，美国人口已接近1亿大关，它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缺乏劳动力了。

第二节　招募华工开发西部与美国排华暴行

〔招募华工开发加州与华侨遭受剥削和迫害〕　1848年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山谷发现金矿后，许多淘金者蜂拥而来，东部资本家也开始前往投资。但是那里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成为资本家开发资源的主要困难。为了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美国资本家开始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招募华工。在两三年内，被招募前往加州的华工达两万多人。经营远东贸易的美国船商因客、货运量激增，也获得巨额利润。

前往加州的华工不仅为资本家开矿掘金，有些还为他们开荒种地、疏浚河道、修建铁路和房舍等。因此，华工曾以自己的血汗在开发加州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而且得到一些美国学者的公认和称赞。① 但不久后，华工和华侨都遭到了歧视和迫害。当

① 玛丽·库利治在《中国移民》（纽约，1909年）一书结论中称"没有华侨勤勉劳动的贡献，加州是不会像今天这样富庶和安适的"，见该书第478页。美国作家J.H.卡逊在《加州生活》一书中也指出，"华工在开发加州农业资源方面贡献最大"，转引自《中国移民》，第55页。

时，在加州掘金的外籍矿工都须交纳高额的执照税，而外籍矿工中，以华工为最多，因此沉重的赋税负担都落在他们肩上了。据统计，在1850—1870年期间，华侨占加州人口总数不到1/10，但华工缴纳这项税款却达500万美元之巨，占该时期州行政开支的一半。同时，从事掘金的华工又以工资低廉，招致白人矿工的忌恨。当地政客和种族主义者便乘机煽动排华情绪，以取得白人矿工的拥护。在当地法院的纵容和支持下，一些暴徒和种族主义者更肆无忌惮地抢劫和谋害华侨，各地矿区杀害华工的事件也日益增多。杀人者逍遥法外，被谋害者无人过问。1857年，加州《沙斯塔共和报》曾作了较为客观的报道：

> "五年以来，华人之为人谋杀者，不下数百，皆我（指美国——作者）亡命之徒所为。盖谋杀华人之事，无日靡有，而罪人斯得，明正典刑者，最多不过两三次，犹有反对白人为华人抵偿者，窃以人之情忌，其违背天理，莫此为甚。"[①]

华侨在遭受迫害的同时，还受到加州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那里榨取华侨的苛捐杂税真是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华工因负担不起这种沉重的苛税而被迫回国者日增。因此，有些加州议员指出，排华政策的实施，不宜过于急骤，因为他们担心倘华工因承受不了过分沉重的赋税而纷纷离境，那么地方政府的经费来源便成了问题。[②] 所以，采取在华侨不生不死的范围内榨取其财货的作法，便成为这个时期加州排华政策的基本方针了。

〔"蒲安臣条约"及其实质〕　华侨在加州备受歧视和迫害，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仍然鼓励华工来美。这是因为美国内战期间，有400万青壮年被征入伍，工农业生产都感到劳动力严重

---

① 慈亨利：《华侨志》，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28年，第138页。

② 库利治：前引书，第33页。

不足。内战结束后，北部资产阶级开始大量投资开发西部，修筑横贯大路的铁路，而开发和建设都需要大批劳工。在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招募华工又形迫切。因此排华论调也暂时收敛起来。1868年乘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英文原名为安森·伯林格姆）代表清政府出使各国、到达华盛顿时，共和党政府同他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美国一般称之为“蒲安臣条约”)。该条约共有八条，涉及互派领事、商业贸易、宗教信仰以及人民互相往来和旅行、居住等项事宜，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五条，规定“中美两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自便，不得禁阻。”[①] 这项规定实际上符合了美国对华工日益增长的需要。所以当时鼓吹输入“廉价劳动力”的美国国务卿威廉·H·西沃德，力主把保证中国不受限制地向美国移民这一条写进这个条约。[②] 因此，这个条约公布时，受到了美国（包括加州在内）舆论界的广泛赞扬。

从表面上看，这个条约似乎是个平等条约，过去许多中外学者也确实是这样看的。直到近年，有的华裔美国学者仍称它是个“非凡的”文件，指出它“明确地处理了中国人向美国移民的问题”，表明了美国“以合作精神发展美、中两国间贸易和经济关系的期望”[③] 这种看法可能是为条约的表面词句所眩惑，而没有透过当时美国政府的真正意图观察它的实质。其实，这一条约不过是使美国人来华传教、游历更加自由，并使其在中国招募华工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69卷，第20页。按第五条“入籍”一词恐系当时翻译之误，因该条约英文本并无“入籍”字样，同时本条约中文本第六条亦载有“中国人民在美者亦不得因此条约，即特作为美国人民”，所以与第五条“入籍”一词前后矛盾。

② 参看托马斯·A·贝利：《美国人民外交史》，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0年，第307—308页。

③ 杰克·陈（陈依范）：《美国华人的历史》，旧金山1981年，第128—129页。

活动合法化而已。由于条约载明来往自由，华工去美国的障碍暂被去除，去美国谋生的华工人数因而激增，从1868到1870年期间，共有33，000多人，逐年增加的数字见下表。

1868—1870年前往美国的华侨人数表

年　　份	前往美国的华侨人数
1868年	5，157人
1869年	12，874人
1870年	15，825人
三年合计	33，856人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代至1970年》，华盛顿1975年，第一部分，第108页。

美国政府既已达到招募华工合法化的目的，因而对清政府代表所提关于美国虐待华侨的软弱抗议，也作了纸面上的让步。该条约第四条规定："……嗣后中国人在美国亦不得因中国人民异教稍有屈抑苛待以昭公允"。[①] 据随同蒲安臣出使的华人代表志刚在他日记中的记载，清政府提出这项条款的原因是："中国人之在金山者，现在被抑勒之事，如华民与本地人争讼，即华民被屈，若无本地人作证，官不准理。不准华人作证，其意以华民异教，不奉耶稣，其言不足信也。又华民在金山工作，每人每年（应为每月——作者）出税银两元，从前各国之人俱纳，现已均免，惟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69卷，第20—21页。

不免华民之税，其意亦因其为异教人也。"[1] 条约虽然明文规定美国对华侨不得"屈抑苛待"，然而实际上仍将华侨看成是异教的"劣等民族"，华侨在各州仍无控诉权和作证权，旧金山市华侨在纳税上所受的歧视待遇并未改变，联邦政府也未因签订这个条约而有所干预，华侨受压抑、歧视的痛苦生活仍然如故。

〔华工对修筑铁路和开垦农田的巨大贡献〕 "蒲安臣条约"签订后，大批去美国的华工正好适应美国修筑铁路和开发西部的需要。1862 年，美国国会通过修筑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的议案。这项工程分别由中央太平洋和联合太平洋两家铁路公司承包，由加州萨克拉门托和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相向修筑，最后在犹他州接轨会合。西部工程由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承包，它所经的加州塞拉岭和内华达州一带，高山峻岭绵亘，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塞拉山区冬季常有暴风雪，沙漠地带夏季干燥炎热，施工条件异常艰险，不少白人工人纷纷离去。西段筑路工程，进展非常迟缓，开工两年之久，铺轨尚不足 50 英里。于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开始雇用华工，到 1869 年西段全线雇用的筑路工人将近 1 万，其中 9/10 均系华工。华工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了一系列的艰难险阻，完成了大量繁重而复杂的筑路工程，例如从 1866 年夏季开始，用一年多时间终于打通了穿越塞拉岭长达百里的峻岩通道。有位美国作家对华工开凿这段艰险通道的英勇精神作了客观的描述，他写道：

"……合恩角（或译为"牛角岭"——作者）犹如一堵花岗岩石墙。它是这一年（指 1866 年——作者）里最不易攻克的难关。它的下部是垂直光滑达一千英尺

---

① 志刚：《初使泰西记》（系《走向世界丛书》的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27 页。

的悬崖峭壁。百折不挠的华工腰系绳索，身悬半空，用锤子和钢钎凿出一条险峻的小道，然后再费力地逐步向里扩展，开出一条行使车辆的通道。"①

在塞拉岭开凿隧道的过程中，冬季经常发生雪崩，工地营篷至少四次被雪崩冲落峡谷，死亡华工约有500至1,000人之多。②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承担的西段工程异常艰险，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承担的东段基本属于平川大地，施工容易得多。所以《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报》编辑指出，后者的铁路工程与前者"对比之下，像是儿戏"。③ 在东西两段展开筑路竞赛的最后阶段，华工创造了每天铺轨10英里的空前纪录。④ 在华工付出巨大牺牲和血汗代价下，中央太平洋铁路终于1869年5月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与联合太平洋铁路接轨，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连接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因而宣告建成。在庆祝这条铁路建成的大会上，华工因受到种族歧视而未能参加，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四巨头之一、招募华工的倡议者、加州法官查尔斯·克劳克在庆祝大会上提醒大家：

"这条铁路之所以能及早完成，大部分应归功于那些贫苦而被人蔑视的中国工人，他们忠诚勤奋，表现著异。"⑤

后来，有些美国历史学家对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成与华工的功绩也作了较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评价，他们写道：修筑这条铁路所

---

① 奥斯卡·刘易斯：《四大股东》，纽约1938年，第74—75页；转引自宋李瑞芳著：《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4年，第31页。

② 参看刘伯骥著：《美国华侨史》，台湾1975年，第614—615页。

③ 宋李瑞芳：前引书，第32页。

④ 刘伯骥：前引书，第616页。

⑤ 刘伯骥：前引书，第617页。

"要克服的障碍几乎是难以逾越的"，要"同山中的暴风雪和沙漠的酷热作经常斗争"，"这些困难的克服……应归因于"包括华工在内的数千劳工的"勇敢和献身精神"，施工中"最沉重的部分都落在他们强壮的肩膀上"。[①]

华工还参加修筑了北太平洋铁路线，把这条横贯大陆铁路的受益地区扩大到了西北部。同时，他们也是南太平洋铁路工程的主要劳动力，把这条铁路的支线伸向西南部。

华工除以极大的努力和牺牲建成美国通向西部的铁路线外，还对加州的农业开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介于萨克拉门托河口和圣华金河口之间三角地带现在是加州肥沃的农田和菜园，但它最初是全凭华工勤劳的双手开垦出来的：先是筑堤垦荒，接着修建排水渠道和灌溉系统，才把萨克拉门托河畔的沼泽地变为良田。从1870年起，小麦逐渐成为加州主要农作物，但是农场小麦种植从播种、除草和收割全靠中国农业工人。当时，阿拉米达县有位美国农场主说，每逢收割季节，除华工外，其他雇工都靠不住，如果没有华工，那么农作物就收不回来。[②] 华工不仅勤劳可靠，而且多数都比白人农业工人有更熟练的耕作经验。所以当时加州各地农场主都纷纷雇用华工，充当农场的主要劳动力。据统计，1870年，加州有1/10的农业工人是华侨，到1880年，华侨农业工人的比例增至1/3，4年之后，一半以上的农业劳动力是华侨。[③] 此外，还有不少华工从事果园劳动，据1886年加州的统计，受雇于果园的华工有3万人，约占该州果园工人总数的7/8。[④] 总之，华侨是加州农业开垦的一支主力，这是早期美国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106—107页。
② 参看刘伯骥：前引书，第623页。
③ 宋李瑞芳：前引书，第64页。
④ 参看刘伯骥：前引书，第623页。

历史学家所一致公认的。他们开垦荒地、收获庄稼，才使大批涌向西部定居、征服荒野地区的移民得以温饱。

〔加州政客煽动下的排华浪潮及其蔓延〕　1873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使初具规模的加州企业受到严重的打击，工厂倒闭，矿区停工，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中央太平洋铁路建成后，有近万被解雇的华工也在这时回到旧金山市，流浪徘徊，寻找工作。这引起了白人失业工人的恐惧，他们指责华工接受低工资，形成对他们就业的威胁。于是地方政客和种族主义者乘机挑拨不同民族工人之间的关系，在各种报刊和公众集会中肆意诋毁华工，说他们“智力低下，虚伪成性，道德堕落，生活卑贱”，是世界上“最低劣的民族”。“他们不能为教育所同化，又不能完成任何公民义务”，“如果允许他们呆在美国，那不仅美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要大大降低，而且精神道德方面也要受到毒害”。在排华气氛日趋增长的情况下，有些暴徒开始在一些城镇和中国城侮辱和袭击华侨，而肇事者却未受到任何干涉和惩治。同时，加州的民主党与共和党都竞相以排华为其政治资本，把“排斥华工”列入它们的政纲，以争取工人的选票，从而达到取得加州政权的目的。

1876年加州发生旱灾，造成农业歉收，许多农场主因而破产，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接着，作为加州经济支柱的采金业，因矿源枯竭，大量锐减，产值仅及1869年的1/3。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加州社会秩序更加动荡不安，排华情绪也迅速增长。从1877年7月23日起，旧金山市开始了持续三天的排华骚动，一群暴徒和失业工人在市政厅附近的沙地集会后去中国城投掷炸弹，殴打华人，抢劫他们的财物，烧毁他们的店铺，造成损失约达50万美元。这次骚乱，直到驻防的陆海军部队会同警察和市治安维持会组织的“检查棍队”出面弹压后，才停止下来。但是，这种停止只是排华风暴的暂息。以爱尔兰裔的丹尼斯·卡尼

为首的一帮暴徒和种族主义分子继续策划排华运动，并于该年10月成立了加利福尼亚工人党——即所谓“沙地党”。该党虽标榜反对资本家和消灭土地垄断制度，但其主要目标是“以最大的速度并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全部清除国内廉价的中国劳动力”。①卡尼也大肆宣扬华工的激增乃是造成工人失业和生活困苦的主要因素，喊出“华人必须滚蛋！”“他们正在夺走我们的工作！”②等煽动性口号。他的主张不仅受到当地失业工人的拥护，而且还得到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某些领导人的支持，因而他的党迅速壮大，并在加州某些地区选举中获胜。

在卡尼和“沙地党”鼓动下，加州排华运动日益扩大，并且蔓延到俄勒冈和华盛顿等西部各州，致使西部“各大城市中，苟华侨人数稍多者，几莫不为群众攻击之点，往往焚掠庐舍，侮辱人民，在萨克兰缅多（即萨克拉门托——作者）及旧金山两处，尤属至再至三，连续不断。”③ 当时中国公使曾向美国政府抗议这种烧杀劫掠华侨的暴行，但是联邦政府却轻描淡写地答复说，它无法干涉各州法律的行使。1879年，加州制宪会议采纳了“沙地党”提出的一系列的排华措施，修订了州宪法，其中规定：禁止中国移民入境，华侨必须从一些市镇迁出，任何公私机构和企业都不得雇用中国人等。这些措施都直接违反“蒲安臣条约”的规定，但加州政客却顽固坚持，其目的固在于冲淡工人群众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把群众不满情绪转移到排华轨道上来，也在于制造舆论，扩大影响，争取国会制定全国性排华政策。

〔“排斥华工”成为全国性的政治问题〕　到了19世纪70

---

① 方纳：前引书，第1卷，第720页。

② 杰克·陈：前引书，第141页。

③ 宓亨利：前引书，第139页。

年代后期，加州掀起的排华运动这一局部性问题已成为全国性政治的焦点之一。这是因为（一）当时美国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实力已互相接近，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①]，使太平洋沿岸各州在总统选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双方在争夺总统宝座的竞选中，为了迎合西海岸各州选民的排华心理，都竞相把排斥华工列入政纲，以争取西海岸各州的选票。（二）中国移民问题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东部各州，但东部各州政客对加州限制华侨入境的要求却持赞同的态度。这是因为当时东部各州对外来移民的态度也有显著的变化：移民的激增给纽约和波士顿等东部沿海大城市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而要求限制移民入境的公众舆论日益增强；加上东部出现少数企业主为破坏罢工而雇用华工的事例，也引起了东部工人群众对华工的反感。[②]

在美国政党政治的这种变化形势下，排华问题逐渐被提上了美国政府的议事日程。1879 年，美国国会开始讨论排华问题，通过了西部民主党议员提出的议案，规定到达美国的船只，每艘所载的中国乘客不得超过 15 人。海斯总统虽以其违背“蒲安臣条约”的规定为名予以否决，但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于 1880 年派遣了以詹姆斯·安吉尔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前往中国，迫使清政府为限制华工入境修订条约。在美国的压力下，清政府终于与美国签订了新的条约，即“中美续修条约”。其中第一条规定：“如有时大美国查华工前往美国，或在各处居住，实于美国之益有所妨碍，或与美国内及美国一处地方之平安有所妨碍，大清国准大美国可以或为整理，或定人数年数之限，并非禁止前往。”[③]

① 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一节。

② 参看杰克·陈：前引书，第 150—151 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 24 卷，第 13 页。

从此，美国取得限制华工入境之权，但该约第四条注明，美国如依照条约制定任何限制华工的新立法，必须事先与清政府取得协议后，方能付诸实施。

〔禁止华工入境的“排华法案”及其补充法案〕　“中美续修条约”签订后，被招募去美国的华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据美国商业部的统计，这几年去美国华侨人数激增。

1880年　“中美续修条约”签订后去美国的华侨人数表

年份	去美国的华侨人数	在美国华侨总数	附　注
1879	9,604	108,827	
1880	5,802	104,991	离美者多于入境，总数反减。
1881	11,890	105,796	同上
1882	39,579	132,300	在美华侨的最高额。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殖民时代至1970年》，第一部分，第108页；库利治：《中国移民》，附表，第498页。

去美国华侨人数激增乃美国航运资本家再次大肆招募华工的结果。当时美国北太平洋线和加拿大太平洋线两条横贯大陆北部的铁路开始动工，需要大批劳动力。他们以“苦力”贸易获利丰厚，遂调动船只从事贩运。

加州政客看到这种趋势，一方面指责投机船商牟利行为之不当，另方面抱怨限制华工入境的“中美续修条约”之无效。加州议员约翰·米勒在国会中更是大声疾呼，要求国会采取断然措施。他说，这个限制华工入境的条约已经失败，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那将“使所有贩运人口的船商，无阻碍地继续这种卑鄙的贸易，把繁

衍的中国奴隶们悉数运到加州来。"[①] 他的这种诬蔑华侨的滥调和要求国会采取断然处置的呼吁，都得到西部和南部各州议员的支持。1882年，美国国会在未与清政府协商的情况下，竟然通过了"关于实施与中国人有关的某些条约规定的法令"，即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这一法案的通过表明了排华政策已确定为美国的国策。美国政府违反"中美续修条约"的规定，单方面制定关于中国移民的政策，对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作用。这个法案包括15条，其中主要规定是：自本法案通过90日开始，10年内禁止华工来美国，所谓"华工"系指熟练的和不熟练的工人，矿工也包括在内；华侨不得加入美国籍，以前与本法案抵触的法令一概作废；凡有意把华工由外国港口，经由水路或陆路带入美国者，均属犯罪行为；其他华侨如无适当的证件，应一律予以驱逐出境。

此后，美国国会还陆续通过了一些排华法案。1884年的补充法案规定：凡开抵美国港口的船只，其船主若有意载运华工来美国，每带一人，船主应处以一年以下的监禁和500美元以下的罚金。这表明美国统治阶级排华政策与船商利益的矛盾。这一补充法案还对"商人"一词作了荒谬的解释，称"商人"乃专指经营商业公司的经理，其他工作人员如襄理、协理、管账员以及店员等均非"商人"。他们通统被列入华工范畴，以便排斥和驱逐。1888年，国会又通过"斯科特法案"，其中规定(一)出境华工一律不得重新入境；(二)过去美国政府所发的华工身份证自即日起通统作废。这就意味着两万余名回国探亲、持证返美国的华工[②] 遭到蛮横无理的闭门羹，有些尚有家属、财产在美国的华工，更遭受妻离子

① 库利治：前引书，第169页。

② 在1882—1888年期间，华工领身份证回国的有20,000余人。

散的痛苦。对此，中国驻美公使提出抗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布莱恩却拒绝讨论这一问题，只说国会制定并废除法案；总统只能否决法案。作为国务卿，我无能为力。[1] 1892年，国会制定了更为苛刻的排斥华人的“吉瑞法案”，规定除清政府外交人员外，禁止一切华人入境；所有在美华侨必须注册，领取居留证；在审理涉及华人的诉讼案件时，不准华人被保释。此后，美国政府在“斯科特法案”和“吉瑞法案”的基础上，不断补充、修订。这些排华法案的实施，不仅完全断绝了华工前往美国的途径，就连其他前往美国的华人，无论是官员和商人，还是教师、学生和过境旅客，也都受到极其苛刻的盘查，形同囚犯。由于美国加紧排华而采取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入境华人急剧减少。据统计，在1882年“排华法案”实施后五年期间，每年入境的华人数目由39，000多人锐减到10人，此后虽有所回升，但也只是在一、二千人之间。[2] 1892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把1882年“排华法案”有效期延长10年，到1902年更决定把它无限期延长了。

〔排华暴行的扩展〕 1882年“排华法案”实施后，美国排华地区日趋扩展，迫害华侨的方式也变本加厉，从虐待、拘捕和监禁等方式进而发展到集体驱逐和杀害华侨居民。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排华狂潮，迫害华侨的事件愈演愈烈，其中以罗克斯普林斯（即岩泉镇）、塔科马和西雅图等事件为最严重。

1885年9月2日，怀俄明州岩泉镇的华人矿工拒绝参加白人矿工的同盟罢工而遭到白人暴徒的突然袭击。华工因毫无准备，惨遭杀戮，计死亡28人，重伤15人，其余华工被迫逃入山中。

---

① 转引自宋李瑞芳：前引书，第51页。

② 《美国历史统计》，第1部分，第108页。

白人暴徒乘机抢劫华侨财产，全部损失达 14 万多美元。事后清政府驻美公使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凶、赔偿，但美国国务卿巴亚德却以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地方事务为借口，推脱责任，同时还否认清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只答应请求国会拨款“抚恤”。美国政府对这次杀害华工的暴行，便这样草草了事。

同年 10 月 24 日夜，西雅图附近华人矿工的房舍全部为白人暴徒纵火焚烧，事后白人暴徒召开排华大会，决定限令所有华侨于 11 月 1 日前一律离境。11 月 3 日，塔科马也发生白人暴徒袭击华侨的事件，700 余华侨被迫逃往附近的铁路货车上躲避，经过一夜的露宿和恐怖骚扰，有两人死亡，多人得病。11 月 5 日，普压镇又发生了集体驱逐华侨的事件。华盛顿准州之所以连续发生排华暴行同地方政府的支持、纵容是分不开的，因为该准州州长斯奎尔事先对排华暴徒的预谋活动了如指掌，但他并未加以制止，反而采取纵容的态度。[①] 在该准州排华骚动日益蔓延扩大的情况下，克利夫兰总统被迫宣布在该地区戒严，但事后既未惩办肇事的暴徒，也未赔偿华侨的财产损失。

1886 年初，加州各地“赶走华侨”的运动继续扩大，在 1 月到 4 月期间有 35 个社区陆续把华侨驱逐出去，因而逃往旧金山中国城避难的华侨达 2 万人之多。[②] 清政府驻旧金山领事曾就苏特镇于该年 2 月将华侨驱逐出镇的骚动向加州州长提出质询，但他得到的答复是：该镇官员并未报告他们不能维持治安，所以州政府无法过问。这就是美国官员使用推诿责任的一贯手法。

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西部各州驱逐和杀害华侨的骚动此起

---

① 参看《1981—1983 年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 1983 年，第 349 页。

② 杰克·陈：前引书，第 152 页。

彼伏，连续不断。华侨因而死伤者数百人，财产损失达百万美元以上。

第三节　美国的“熔炉”与移民对美国发展的巨大贡献

〔民族“熔炉”与移民的“美国化”〕　美国移民来源不同，且具有各自的民族传统和特征；他们在北美大陆上，经过长期繁衍与融合，不断充实和扩大了美利坚民族。因此，过去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把美国说成是民族“熔炉”，认为它把众多民族、种族移民的传统和特征“熔化成一种新的独特的金属，倾注于美国环境的铸模，并与美国人的思想揉合在一起了。”①

来自各国和各地区的众多移民在与美国社会接触后，虽然有些仍然保留了各自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并且在某些地区和大城市里形成了独自的聚居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多数、特别是他们的后代逐渐削弱或丧失了各自原有的民族传统和特征，不断为美国这个民族“熔炉”所熔化，从而逐渐实现了“美国化”。在移民“美国化”进程中，有些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其中主要是语言、学校教育和社会流动等因素。

在19世纪后期，除了来自英伦三岛的移民外，来自欧洲的其他移民，无论是“老移民”还是“新移民”，大都不会英语，只能讲本国或本民族语言。因此，他们到美国后，大都前往本民族聚居地区居住和谋生，“新移民”更多的是去大城市本民族聚居区投亲靠友、寻找工作。但是，这些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经

① 莫里森等：前引书，第2卷，第174—176页。

过美国学校的教育，掌握了英语，逐渐不用或忘掉了原有的语言。在移民后裔逐渐不能使用原有语言的情况下，那些原先靠使用本民族语言维系的移民组织，诸如各派教会、民族俱乐部、互济会和福利组织等也逐渐削弱或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作用，用本民族语文出版的报刊种类和发行的数量都有减少的趋势。随着移民及其后裔使用语言的变化，各派教会如天主教会和犹太人教会等在传教、布道时也渐渐用英语代替了原先使用的外国语言。这种变化虽然是渐进的、缓慢的，但却是美国各教派的原有民族特性日趋淡薄的表现，也是移民日益"美国化"的重要标志。①

学校教育是消除移民间的民族隔阂和实现民族融合的一个关键因素。移民的后裔在公立学校中是按照美国社会准则受教育的，他们不仅掌握了英语，而且吸收和接受了美国文化。美国清教徒所一贯宣扬的美国社会准则，如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就的信念已逐渐为移民及其后代所接受。② 这样，在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和民族传统的移民当中，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日益缩小，而融合成为一体的趋势则不断增强。

移民后裔既受到美国学校共同的教育，又掌握了英语，这自然为他们扩大与土生美国人以及其他民族集团的交往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他们离开本民族聚居区去求职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移民间交往范围的扩大导致了不同的民族集团和宗教派别的成员之间的通婚。这种通婚也是美国实现民族融合的重要方式。起初，移民与外族通婚是罕见的，他们宁愿回到故国去找配偶，也不愿与当地外族人结婚。这种趋向在第一代"新移民"中更为明显。据说，当罗马天主教徒选择新教徒作为配偶并且不在天主教

---

① 丁内尔斯坦著：前引书，第133页。

② 丁内尔斯坦著：前引书，第138页。

会举行婚礼时，往往被本教派视为姘居，并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1] 不过，随着移民“美国化”的加深，他们与异族的通婚率增加了。但是，坚持在同一宗教系统内结婚的信念，直到本世纪中期仍然是很强烈的。根据这种情况，有的美国历史学家认为，美国社会发展形成的不是单一的“熔炉”，而是由三个部分——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宗教集团——合成的“熔炉”，而且通婚主要是存在于三个宗教集团各自范围内不同民族之间的。[2]

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迅速的发展以及城市的蓬勃兴起，移民的社会流动也日益增强。这主要表现在横向流动，从事农、牧业的移民向西部迁移，寻求肥沃的土地或适于放牧的场所，许多“新移民”则从城市里聚居区迁往其他城市或地区，寻求发迹致富的途径。这种横向流动有时也为纵向流动所伴随，即少数受过高等教育和掌握技艺的移民随着职业的变化而上升到富裕的阶层。无论是横向流动，还是纵向流动，都大大加强了移民及其后裔与土生美国人及其他来源的移民之间往来交流，从而为互相融合成为一体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是，美国对移民集团的同化并非单向的进程，而是不断吸收各民族、种族优秀的传统和文化，并使它们逐渐成为美利坚民族共享的遗产。比如，“当今美国社会的许多方言、食物、音乐和文化特征都曾一度具有种族的特色，而今却成为（美利坚民族）共同遗产的一部分了。”[3] 各民族集团移居美国后都已发生了变化，而且美国社会在接纳它们之后也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因此，各民族集团在美国这个“熔炉”中并未消失，但它们

---

① 参看丁内尔斯坦等：前引书，第135—136页。

② 参看丁内尔斯坦等：前引书，第135页。

③ 托马斯·索厄尔：《美国种族史》，纽约1981年，第14页。

和美国这个国家都不是原来的老样子了。[1] 美国“熔炉”虽然在同化移民集团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它并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创建一个单一种族的社会，而是创立了一个多元的社会。[2] 这个多元的社会正如有的美国作家所指出的那样，倒是像一盘五光十色的沙拉，其中每一种成分既受到整体味道的影响，又保留其各自的特性。

〔移民对美国发展的巨大贡献〕 19 世纪后期，移民洪流对美国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既对美国提供了它所迫切需要的大量劳动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帮助开发了它丰富的自然资源，扩大了美国市场，从而大大促进了美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丰富了美国文化艺术生活。难怪有的美国历史学家认为，移民洪流是“美国历史的中心主题”，比“没有贵族政治、边疆的存在、自然资源的富庶、企业家的推动力或被两大洋隔离的安全更加重要”。[3]

首先，这个时期外来移民为美国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据统计，移民中男子多系年富力强者，“新移民”中有 85% 是从 14 岁到 44 岁之间的青壮年。他们中许多人都从事最艰苦而收入较少的劳动：如修筑横贯大陆的铁路，在西部山区开采矿物和在制造业中承担最繁重的体力活等。在 1870 年，移民工人在一些重要工业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采矿业中占 53.3%，在一些纺织业中占 37.6%，在钢铁工业一些部门中占 43.4%；到 1890 年，他们在上述三种工业中所占比重

① 托马斯·索尼尔：《美国种族史》，纽约 1981 年，第 14 页。

② 参看詹姆斯·S. 奥尔森：《美国历史中种族的重要性》，两卷，纽约 1979 年，第 2 卷，序言，第 IV 页。

③ 参看詹姆斯·S. 奥尔森：前引书，第 2 卷，序言，第 IV 页。

分别为49.1%、42.8%和37.9%。[①]

外来移民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就形成一种自然的技术引进，推动了美国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美国政府为加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步伐，鼓励采用许多新技术和发明，而其中有不少发明家就是外来移民及其后裔。如电话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就是1871年来到美国的苏格兰移民。举世闻名的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也是移民的后裔。这些发明的应用、推广大大发展了美国电力、电讯工业。移民及其后裔的其他发明都对加速美国工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此，列宁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写道，移民“对美国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②]

其次，移民大大促进了美国西部地区的开发。19世纪后期，美国大平原和落基山地带的开发主要依靠移民。在19世纪最后30年内，西部开拓的土地面积比从北美殖民地开始到内战前整个历史时期拓居的土地还大，经过移民披荆斩棘的开拓，美国西部不仅建立了广袤的农业区和放牧区，而且迅速开采了各种各样的矿藏，为发展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提供了它们所迫切需要的矿业原料。在开发西部的最后进程中，移民及其后裔往往承担了最艰辛的任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③]

第三，移民洪流促进了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从而有助于形成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格局。广大移民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

---

① 爱德华·E·柯克兰：《充分发展时期的工业》，纽约1961年，第327页。

② 列宁：“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9卷，第453—4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0页。

者。他们普遍需要住房、衣着和食品等生活必需的消费品。这就增加了对工农业产品及各种消费品的需求，从而扩大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城市的兴起，推动了交通运输的发展。因此，有的美国经济史学家强调指出："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过去的大量富有经验的外来移民的参加，那么 1914 年以前的美国经济的一些方面高速增长的格局，和迅速充实新开发的西部地区、采矿业和伐木业的发展，各城市市场规模的扩大等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①

最后，外来移民丰富和发展了美国文化艺术生活。他们中有不少杰出艺术家和知名人士，对推动美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有来自爱尔兰的雕刻艺术家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来自匈牙利的著名新闻工作者约瑟夫·普利策以及曾在美国侨居的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等等。他们的作品不仅丰富了美国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而且给他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圣—郭登斯精心设计制作的林肯雕塑像和谢尔曼将军骑马的雕塑像至今仍然分别竖立在芝加哥和纽约市，供人们瞻仰。德沃夏克在侨居美国期间，不仅谱写了著名的"来自新大陆"交响曲，还在纽约主持了音乐学院，培养了不少美国音乐家和作曲家，为发展美国音乐事业作出了贡献。

---

① 沙伊贝和福克纳等：前引书，第 135 页。

第 六 章

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
两党政治和国内政策

19 世纪最后 30 年是美国历史上的所谓“镀金时代”。这个时期的政治特征是保守主义的放任政策和腐朽之风盛行。两大党日趋僵化保守，垄断资本逐渐控制政局。由此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工人斗争和各种改革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下层社会斗争与上层的改良政策互为影响，产生了新旧交替的趋势。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差别日益缩小。它们从内战前两种经济制度的政治代表转变为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策执行者。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放任政策已发展到极端，政府调节干预政策仍在萌芽之中。在经济迅速发展、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资产阶级被迫调整部分国家机器，加强其镇压和平衡的功能。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联邦政府开始与垄断资本直接结合，其内外政策逐渐纳入与大财团利益一致的轨道。新旧交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社会力量组合，终于在 1896 年选举中发生了政党力量大改组，为 20 世纪两党政治的到来开辟了道路。

第一节　两党政治的发展变化

〔重建后的两党政治格局〕　两党力量对比在重建后期已出现明显的消长变化。首先是共和党内部发生新的分化改组。原来的共和党激进派趋于瓦解。一部分不满于格兰特政府腐败之风的共和党人组成“自由派”。南部共和党的几支力量，来自北方的“自备毡囊者”、南方的白人小农和黑人自由民各行其是，难以形成一致的政治力量。1872 年以后共和党内主张坚持激进重建政策的力量已成强弩之末，妥协力量开始占上风。其次是民主党开始恢复在内战中严重受挫的元气，在许多州内同共和党分庭相抗。北部民主党人借助共和党自由派的力量，并乘 1873 年危机造成的民众不满，在 1874 年连续在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等州获得多数选票，并在这一年占据了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南部民主党到 1875 年已在田纳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阿肯色、得克萨斯和密西西比等 8 个州据有优势，仅剩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等 3 个州仍控制在共和党和联邦军管当局手中。在此形势下，一旦南北两部分民主党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击败共和党，重新问鼎白宫。

尽管如此，民主党仍不具备立即控制联邦政府的力量。内战严重地破坏了民主党的政党机器和政治形象，而且长期的在野地位使它缺乏共和党所具有的种种便利条件，故在全国性选举中缺乏足够的号召力。更重要的是，南北两部分民主党在政策上分歧颇多，提不出取代共和党政策的完整纲领，甚至找不到有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1872 年选举中民主党只得借用自由派共和党人霍勒斯·格里利。1876 年民主党挑选了纽约州长塞缪尔·蒂尔登

作为总统候选人，但此人优柔寡断，声望平平。可见，两大党的力量对比并未转变。

1876年选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两大党的一次历史性妥协。共和党仅比民主党多1张选举人票，而民主党则多得25万张普通选票。为了获得民主党对共和党在联邦继续执政的首肯，共和党决定撤销对南部最后三个州的军事管制，承认民主党对南部各州的完全控制。此即史称"海斯—蒂尔登妥协"。内战后"一边倒"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南部按照现实的力量对比又回到了民主党单独执政的局面。但是民主党的核心力量已经转向了北部，它与共和党一起大力推进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全国性政策，同时从地域的、集团利益的差别出发与共和党展开角逐。

从1876年到1896年，两大党处于势均力敌的局面。民主党控制着南部和西部的14个州，共和党则在北部16个州占优势。1876年至1892年的5次总统选举，两大党的普通选票差额仅在1%—3%之间。① 在1875年至1895年的10届国会中，民主党控制着其中的8届众议院，共和党则掌握着同样届数的参议院。②两党长期维持着均势，用地域斗争的旧旗号来掩盖尖锐的社会争端，这使两党政治如同一潭死水，毫无生气。

共和党以"老大党"自居，无意进行任何改革。主张"稳健"成为抱守陈规的托辞，从海斯总统的话中就可以略见一斑。他认为："我们正处在老问题已经解决，新问题尚未提出的这么一个时期。如果在这种时候采取过激行动，那么它就会把党毁灭

---

① 伯纳德·贝林，布里翁·戴维斯等：《伟大的共和国，美国人民史》，1977年，第621页。

② 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政党史》，纽约1973年，第2卷，第1428页。

了。稳健是惟一可取的方法。"[①] 此时共和党的注意力已从争夺南部控制权转移到保证北部大资本在全国市场中的利益。但它还是竭力以地域主义的"血衬衫"口号来保持人们对内战的回忆，挑选内战中的联邦将领作为总统候选人，企图保持联邦拯救者的形象，以骗得选票。

这种保守政策使共和党内部离心倾向日益严重。一部分自由派要求改变既定的保守政策，动辄以退党作为要挟，被称为"脱党派"。共和党上层也分裂为"温和派"和"死硬派"。前者空喊改革口号，暗中营私舞弊，其首领是詹姆斯·布莱恩。后者长期把持要职，在国会和各州为所欲为，罗斯科·康克林等人是其主要干将，格兰特也常常充当其后台。在这种保守政策之下，以中西部农场主为主体的共和党中下层受到严重损害。中西部的两党政客为了争取这部分下层力量，不时提出一些与东部不同的口号而名噪一时。例如，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乔治·彭德尔顿、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奥立弗·莫顿和约翰·洛根等人，都由此而自成一派。在此基础上，两大党内部逐渐形成了与原来的北部、南部集团并存的中西部集团。这种犬牙交错的政党力量组合，为第三党运动提供了可能。

民主党在表面上抱着所谓"失败的事业"，控制着"团结一致的南部"，形成了大批坚守旧民主党立场的"波旁分子"。另一方面，民主党的内部构成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极有权势的犹太金融集团罗思柴尔德家族此时已成为民主党的重要后台，钢铁业的艾布拉姆·休伊特、铁路业的詹姆斯·菲斯克、农机制造业的赛勒斯·麦考密克等著名的大资本家也纷纷支持民主党。民主党的头面人物塞缪尔·蒂尔登和格罗弗·克利夫兰都曾是纽约银行

---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政党史》，纽约 1973 年，第 2 卷，第 1412 页。

业的重要人物。此外，重建后投资于南部各州的北部工业资本，也转而渗入南部诸州的民主党核心。70 年代以后大批涌入美国的移民洪流也影响着民主党的构成。由于共和党的传统势力以白人新教徒为主，故来自爱尔兰和南欧的天主教徒移民大部投靠民主党。尤其是在移民人数较多的中西部，民主党人数上升，在底特律等城市形成了新的民主党势力中心。民主党成分的复杂化，使本质上一致的两大党蒙上了一层互相对立的色彩。

〔两党轮流执政与 1890 年妥协〕　恩格斯对英国的资产阶级两党制曾作评论，“至少在正在争夺统治权的政党中，……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因此，我们把问题的这一方面也适当地研究一下才算是公正的。”① 这段论述同样适用于 19 世纪末美国的两大党斗争。

争权夺利的斗争不仅在两大党之间，而且在两党内部剧烈展开。1880 年总统选举充分表现了这种争斗。当时共和党“死硬派”提名的格兰特和“温和派”推选的布莱恩相持不下，来自俄亥俄州的詹姆斯·加菲尔德充当了“黑马”总统。加菲尔德为了改变自己的“黑马”形象，试图在文官改革中作点文章，却招致了“死硬派”的忌恨。1881 年 7 月 2 日，加菲尔德总统在华盛顿车站遭到因丢失官职而疯狂的查尔斯·奎特的袭击，身负重伤。9 月，加菲尔德去世，死硬派代表人物、副总统切斯特·亚瑟继任总统。此后共和党内腐朽之风更加有恃无恐，争斗不可开交。

民主党利用共和党内讧之机，重整旗鼓。经过 8 年苦心经营，在 1884 年选举中积极争取再入白宫。共和党为了破坏民主党的挑战，抓住克利夫兰的私生活不轨大肆渲染。民主党亦不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第 1 卷，第 547 页。

弱，以揭露布莱恩卷人莫比利尔丑闻展开反击。这场无聊的人身攻击充分表现了两党竞选中虚张声势的伎俩。两党相斗难解难分之时，共和党内自由派的倒戈使民主党获得援兵。克利夫兰接连在纽约、康涅狄格、新泽西和印第安纳等关键州获胜，终于以219张对183张选举人票击败布莱恩。民主党终于结束了连续24年的在野党地位。

克利夫兰上台证明了两大党政策大体一致。格罗弗·克利夫兰是土生土长的纽约州民主党人，曾多年为大公司任辩护律师。在担任布法罗市长和纽约州长时，曾以改革姿态采取一些纠正时弊的措施。他擅长于左右逢源的政客手腕，颇得大资本家们的赞赏。克利夫兰上台后，马上收到铁路巨头杰伊·古尔德的贺电："我感到……在你的掌握之下，这个国家巨大的商业利益将会是安然无恙的。"[1] 克利夫兰政府的财政部长是纽约的银行家丹尼尔·曼宁，海军部长威廉·惠特尼是美孚集团重要成员[2]。他的政府在保护大企业利益方面较之其共和党前任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克利夫兰当然也不会错过执政机会，立即对多年未过官瘾的民主党人论功行赏，进行分赃。当时联邦政府雇员的90%约11万名为共和党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将他们全部解职。但克利夫兰慑于此际影响较大的文官改革运动，不敢贸然造次，只得撤换其中的4万名官员以犒劳部分效忠分子。在调整政策方面，克利夫兰试图用关税和抚恤金这两个地域性的旧争端，来掩盖其时舆论最为集中的货币争端。抚恤金曾经是共和党稳定其社会基础的主要手段之一，故不断递增。1876年抚恤金支出为联邦财政岁收的1/10，到1886年已达其1/4。共和党以此笼络约40万

①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纽约1977年，第180页。

② 同上书，第179页。

联邦复员军人及其家属100余万人。克利夫兰在位期间对抚恤金提案屡施否决权，以报复共和党人。接着克利夫兰又在1886年提出了关于降低关税率的特别咨文，引起国会内一番空前激烈的辩论。抚恤金和关税问题纠缠在一起，使一度消沉的地域斗争情绪再度上升。为了平息舆论，克利夫兰对"州际商务条例"破例地未加否决；并对文官制度改革也表现出一丝宽容，以讨好共和党自由派。然而在货币问题上，他坚持着前几届共和党政府的硬币政策，始终捍卫着华尔街的利益。总之，在克利夫兰任内，地域斗争的口号和改革立法都只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争夺民心的手段而已。

共和党抓住克利夫兰所处的窘境，在1888年选举政纲中提出"毫不妥协地赞同美国保护关税制度"，赢得了大企业的数百万美元捐助。本杰明·哈里森由此上台，他吹嘘这是"天命"赐予的胜利。宾夕法尼亚的共和党党魁马修·奎伊却说，哈里森从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他成为总统而锒铛入狱。"[①] 哈里森是威廉·哈里森总统的孙子，他本人是内战中的联邦将军，又兼印第安纳铁路公司的律师，集世家望族、共和党元老和大企业代表于一身。他作为一个过渡型总统，其政策也具有妥协性特点。

哈里森上台后，先是在官职分赃和抚恤金这两个地域性争端上报复了民主党人。他撤除了3万名民主党人的官职，又在1890年通过"家属抚恤法"，把抚恤金总额提高到1.6亿美元。然而，在改革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哈里森也不得不对日趋尖锐的社会争端作出反应，由此产生了1890年关于托拉斯、货币和关税的三项妥协性立法。

在这三个重要争端上，哈里森政府是有所选择的。首先能影

---

① 贝林、戴维斯等：前引书，第629页。

响全国政治的是货币问题。共和党力图拉住远西部新加入联邦的6个州（即1889至1890年间建立的怀俄明、爱达荷、北达科他、南达科他、蒙大拿和华盛顿等州）。这些州盛产白银，银币派势力相当大。同时，还要保持共和党的中下层基础，因西部农场主和北部中小企业主债务较重，亦倾向银币派。哈里森政府决定在货币问题上稍作让步，在国会中通过谢尔曼购银法。然后，借用共和党银币派的力量来保证麦金莱关税法的通过。这笔立法交易给大企业带来了实惠，而银币派并未达到自由铸造银币的目的。最后，用一项含糊不清、缺乏强制性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来搪塞改革派和第三党，平息舆论，却无损于托拉斯的真正利益。1890年的三项妥协性立法表明，两大党本身已难以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相反，共和党对南部黑人选举权问题早已视为无足轻重。参议员亨利·洛奇在1890年提出通过联邦监督来控制南部选举程序、防止诳骗黑人选票的“强制法案”，却被国会搁置了。这表明共和党公开纵容南部民主党实行剥夺黑人权利的种族压迫政策。正如当时有人说：“这不过是另一个征兆，预示着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即将发生。人们对货币问题比对选举议案更感兴趣。”[①]

〔第三党运动与90年代政党改组〕　曾经作为“社会安全阀”的两党政治因保守僵化而失灵了。社会的不满和改革要求就通过第三党运动表现出来。因此，19世纪末的美国第三党相当活跃。从70年代起，就出现了格兰其运动、绿背纸币运动；继而又有禁酒党、反垄断党、联合劳工党和农民联盟等几十个小党；到90年代，它们大多汇集到人民党运动之中，成为美国历史上一场持久、广泛的第三党运动，有力地打破了“镀金时代”沉寂的政治空气。

① 小施莱辛格：前引书，第2卷，第1426页。

人民党运动主要在中西部和远西部发展起来。这两个地区既不像南部完全被民主党所控制，也不同于东北部在大企业的左右之下。这里有内战后大量涌入的农场主、牧场主和其他开发者，又有迅速向西挺进的铁路公司和急剧渗入的银行和抵押资本，这两支巨大的社会势力在西部形成冲突的漩涡。这种冲突同两大党在西部的势力真空相结合，为第三党运动兴起提供了空间条件。

这场第三党运动是在向垄断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它表现出与经济周期同步进行的时间特点，由此形成了 70 年代初的格兰其运动、80 年代初的绿背纸币运动、90 年代初的人民党运动三个不断上升的高潮。另一方面，它们是基本上尚未脱离两党制框架的第三党，其势力涨落受到两大党的选举活动影响。在中期选举时，第三党选票明显上升，说明它们在州一级较有力量。但在总统选举中则严重下降，又表明在全国政治中第三党实力仍相当薄弱。正是在这种起伏涨落中，第三党影响着两大党的均势。

到 1890 年，农民联盟在西部十几个州内纷纷转为人民党，在有些州已有取代大党之势。在曾号称为“共和党旗帜”的堪萨斯州，人民党控制了州议会多数，并选出其参议员威廉·皮弗。东部共和党对此甚为恐慌，担心引起“雪崩”。南部农民联盟在 1891 年也纷纷脱离民主党而独立，成为民主党在南部的心腹之患。1892 年初，全国有 500 万人签名支持人民党奥马哈政纲，32 个全国性改革团体加入人民党之列，各种第三党报刊已达 1000 多种。

第三党的改革主张，如格兰其的铁路管制立法、绿背纸币党的货币纲领、联合劳工党和反垄断党的反托拉斯口号，农民联盟的国库分库计划，都吸引了两大党的大批下层群众，有力地冲击了两大党的保守政策。1892 年人民党奥马哈纲领集以往各改革

纲领之大成，提出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核心的完整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向两大党提出了挑战。西部、南部一些州的两大党头领，为了争取选民，纷纷接过人民党口号，抄袭其纲领，转身一变成为“改革派”代表。如南卡罗来纳州的本杰明·蒂尔曼，得克萨斯州的H. 豪格，明尼苏达州的克纽特·纳尔逊，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布赖恩等人。总之，人民党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两大党产生了强大的压力。

然而，人民党内部存在的党派成见、地域隔阂、种族歧视以及阶级利益的种种裂痕，使之只能成为各州独立党派的松散联盟。它的主体是西部和南部的农场主，他们主张的低关税、复本位都不能被东北部城市工人所接受。以萨缪尔·冈珀斯为首的劳联和丹尼尔·德里昂为首的社会主义劳工党，从各自立场上排斥人民党，使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难以同人民党结合。况且人民党上层多为大银矿主、大农场主和不满于两大党的失意政客，与下层目标极不协调，到关键时刻常常表现出与大党妥协的倾向。加以经费寥寥无几，难以同大党的竞选实力相对抗。这些都说明人民党难以取代两大党中的任何一个大党，最终仍是两党制的一种特殊补充。

人民党在1892年总统选举中充分显示了上述作用。尽管共和党募集了2倍于1888年的竞选捐款，但仍无济于事。人民党拉走了共和党在大平原和落基山区的一大部分选票，“在西部已不存在一个可靠的共和党州了”。[①] 结果是哈里森因所得选票比克利夫兰少3%而归于失败。人民党在此选举中不仅得到103万张普通选票，还得到22张选举人票，选出10名国会议员，控制了24个州立法机构。这次选举大大加速了90年代政党改组。纽

---

① 拉塞尔·奈：《中西部进步政治》，密歇根1939年，第62页。

约“太阳报”评论说：人民党在两大党之中“引起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恐慌。”[①]

〔*1893 年危机与民主党分裂*〕　克利夫兰再度上台后，执行了比共和党更为保守的政策。克利夫兰与华尔街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铁路巨头兼银行家惠特尼称克利夫兰的观点“是由东部金融势力炮制的”。[②] 这就是对正在形成的垄断资本实行完全放任的政策，不顾社会冲突和经济危机正在加剧。这种政策在 1893 年危机中遭到了严重破产。

1892 年以后，美国金融形势开始急剧恶化。累积多年的国际债务、铁路债务、农场抵押，同国际股票市场波动、联邦黄金储备锐减交织一起，加上农业长期萧条，农场主购买力相对下降，使美国经济结构难以承受超重负荷。到 1893 年 5 月，终于爆发了 19 世纪美国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一年之中银行破产达 624 家，破产总额近 3.5 亿美元。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工人失业率达 20%。农产品价格跌到历史最低水平，联邦黄金储备仅存 7,000 万美元。[③]

面对极为棘手的“多事之秋”，克利夫兰仍抱着陈旧的放任政策一意孤行。他的观点是“治愈危机的最好办法是装作不知道危机的存在。”[④] 并公开声称，“只要我在总统职位上，政策就不会对企业利益产生任何伤害。”[⑤] 为了保证大资本渡过难关，克利夫兰采取了一系列牺牲工农利益的措施。1893 年底，克利夫兰撤销谢尔曼购银法。1894 年，他派遣联邦军队镇压普尔曼铁

---

① 拉塞尔·奈：《中西部进步政治》，密歇根 1939 年，第 61 页。
② 霍夫施塔特：前引书，第 179 页。
③ P.R. 德维：《1885 年至 1897 年的全国性问题》，纽约 1907 年，第 260 页。
④ 拉塞尔·奈：前引书，第 91 页。
⑤ 拉塞尔·奈：前引书，第 81 页。

路大罢工和“柯克西进军”，并以反托拉斯法的名义逮捕尤金·德布斯等罢工领袖。这些举动得到大资本家和保守派的喝彩，把克利夫兰当政称为“上帝的慈悲”。1894 年，克利夫兰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联邦财政，同以约翰·P·摩根为首的华尔街银行集团达成 1 亿美元以上的债券交易。其价值超过当时联邦黄金储备总额，实际上为摩根集团提供了巨额债息收入。总之，克利夫兰在这次危机中为垄断资本尽效犬马之劳，却使民怨沸腾，民主党内的裂痕加深，一场更大的冲突不可避免。

“危机是政治变革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①] 克利夫兰的极端政策把民主党内久已存在的分歧变成了公开的分裂。在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部和南部的民主党人不肯继续按照东北部民主党上层的旨意行事。他们为了保住在各自州内的大党地位，不再追随克利夫兰的金本位政策，公开打出“自由银币”的旗号。这样，民主党内各种地域势力争斗，抵销了它与共和党的抗衡力量。1894 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去了在国会两院中的多数席位。面对这种形势，民主党银币派决定以合并人民党的策略来与共和党互争高低。他们先以偷梁换柱的手法提出一个类似于人民党观点的“影子纲领”，用“自由银币”口号取代人民党的各项改革条款。然后推出狂热的银币鼓吹者威廉·布赖恩作为总统候选人；并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人民党上层分子许以官职。在布赖恩等人的游说之下，人民党领袖们对民主党充满幻想。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选出一个站在人民党纲领一边的总统，就毋需奢望更多了。他们不顾中下层改革派的激烈反对，将 28 个州的人民党组织拱手奉送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塞缪尔·琼斯，并接受布赖恩作为两党共同的总统候选人。人民党成为民主党的附庸，民主党避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第 33 卷，第 258—259 页。

了崩溃的厄运，三党斗争重新复归为两党争夺。

〔*1896年总统选举及其历史意义*〕　人民党与民主党的合并，引起了东北部大资本的极度不安。垄断巨头几乎都站到共和党一边。为了保证共和党获胜，俄亥俄州的百万富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库斯·汉纳亲自坐镇，部署1896年总统竞选。共和党在政纲中提出所谓“健全货币”，实际上坚持了金本位政策，并大肆宣传“高关税即高工资”、“麦金莱即繁荣”，这些口号迷惑了一大批正在危机中挣扎的中小资本家和城市工人。垄断资本家对威廉·麦金莱的出马竞选寄予厚望。美孚集团和摩根家族各自为他解囊25万美元，甚至以往支持民主党的银行家们也转向了麦金莱。共和党所得竞选捐助总数达1,000万美元，创当时的历史纪录。[①] 共和党依仗其雄厚财源，雇佣数千名演讲员，印发2.5亿册宣传材料，并在纽约和芝加哥设立了两个竞选总部以协调各地的活动。与共和党的竞选狂潮相比，民主党仍使用旧式的演说鼓动来争取选民。民主党所得捐助仅30万美元，布赖恩不得不只身乘坐火车四处游说。尽管他行程18,000英里，足迹遍及21个州，到处发表他的“金十字架”演说[②]，但依然难以在东北部工业中心取得响应。他的声音很快就被共和党的广告式宣传所淹没。垄断资本家还采用解雇工人、取消抵押、增加合同附加条款等手段，向工人、农场和小企业主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投票支持共和党。1896年秋的小麦价格上升，也被共和党用来证明是银币政策的失败，从而使中西部小麦带农场主亦倒向共和党，民主党失去了一部分关键性选票。这样，共和党稳定地控制

---

① 小施莱辛格：前引书，第3卷，第2077页。

② “金十字架”是布赖恩在1896年竞选演说中常用的一个名词，指金币政策对社会中下层的沉重压迫。布赖恩也因发明该名词而一时名声大噪。

了占人口多数的东北部、大湖区和太平洋沿岸各州的选票。竞选结果是麦金莱比布赖恩多得 57 万张普通选票和 95 张选举人票，双方差距之悬殊是重建以来所没有的。共和党终于在垄断资本的全力支持下赢得了这场空前激烈的竞选。

1896 年选举是 19 世纪后期美国政党力量改组的总结，也是美国两党政治由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转折点。

这次选举后，重建以来残存的南北对立的党派格局开始消失。民主党与人民党合并后，在西部的密苏里、内布拉斯加、科罗拉多、蒙大拿等 9 个州具有优势；在东北部的纽约、新泽西、印第安纳、俄亥俄等州仍保持着较大实力。共和党则在大多数城市中影响上升。在全国 82 个大中城市中，共和党占据上风的有 70 个。[①] 这种政党力量的地域分布大致保持到本世纪 30 年代的新政时期。

1896 年后共和党的长期执政并控制多数城市，进一步加强了共和党内垄断资本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在 1901 年，共和党的参议员有 1/3 来自企业界，而民主党仅有 1/7。在支持共和党的企业家中，年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的占 1/5，超过 5 万美元的占 45%；而支持民主党的这两个层次分别占 1/10 和 32%。[②] 在民主党内，西部—南部农业集团以及城市移民集团的作用则相应地更大一些。两大党的构成差别无疑对 20 世纪美国两党政治有着深刻影响。

经过这次选举，两党斗争策略发生重大变化，旧的地域斗争口号退出政治舞台。两大党都力图利用当时最有影响的社会争端

---

① 卡尔·戴格勒："美国政党与城市兴起"，载于《美国历史评论》1964 年第 1 期，第 48 页。

② 小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3 卷，第 2073 页。

来拉拢选民。民主党不惜屈尊盗用人民党纲领以保持自己的大党地位，为大党“同化”小党提供了经验。共和党为了击败民主党与人民党的联合挑战，以垄断资本的巨额资助来进行大规模的广告式宣传，并辅之以各种经济压力和手段来控制选民，也成为20世纪大党竞选的典型模式。此后民主党长期借用中下层的改革口号，从传统的州权主义和放任政策的鼓吹者，转变为国家干预政策的推行者。与此相反，共和党则长期代表大财团势力，转而成为新的放任政策奉行者。“保守的”共和党和“改革的”民主党交替，成为垄断资产阶级得心应手的工具。

人民党运动在1896年以后销声匿迹，但它提出的改革纲领被继之而起的进步运动所发展，并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联邦干预政策的组成部分。20世纪初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新国家主义”，伍德罗·威尔逊提出“新自由主义”，都在金融、托拉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社会福利和劳工等领域开始进行政府干预。这些干预活动又为30年代“新政”提供了经验和雏形。两大党的上述政策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世纪末第三党运动的历史作用。

总之，从“镀金时代”僵化的两党政治，开始转变为20世纪较有弹性的两党政治，是这个时期美国社会上层建筑的重大变化之一。

第二节　国内政策与社会争端

〔放任政策的发展与作用〕　放任政策是19世纪末美国国内政策的核心。它的理论来源可上溯到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贸易理论，反映了19世纪初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的利益和要求。19世纪下半叶为赫伯

特·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又为这种政策提供了新的支持。斯宾塞用"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弱肉强食的现象，恰恰满足了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大资本的需要。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末美国找到了最好的土壤，使放任政策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的信条。

美国的放任政策又有其特殊的具体内容。它是同贸易保护主义、政府鼓励措施相结合的放任主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中已经完整地提出了这种政策，即在关税、银行、货币、专利、交通等方面积极保护和发展大资本的利益。直到内战后，美国工业资产阶级扫除了奴隶制障碍，才得以通过联邦政府较为全面地贯彻上述政策思想。同时，美国的放任政策还得到了宪法的支持，这就是重建时期国会通过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该修正案原旨在阻止南部各州剥夺黑人权利和财产而提出的"正当法律程序"，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利用来作为放任企业活动的护身符。法院把修正案中的"任何人"解释为任何"法人"，从而使各个大公司可以"法人"身份为所欲为。而联邦和州政府对企业的任何管制则被归结为"侵犯私人财产和权利"的非正当程序，使之归于违宪和无效。因此，第14条修正案在19世纪末成为放任政策的重要保护，却为干预政策的出现套上了紧箍咒。总之，这时期美国的放任政策，是当时诸种思想的、历史的、经济的、法律的因素结合并充分发展的产物。

放任政策对19世纪末美国社会经济产生了两重作用。它促进了内战后美国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为大企业提供了充分的经济机遇；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中下层人民利益，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土地政策为例，内战后联邦政府向铁路公司赠予巨额土地，仅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两家公司所得土地的价

值，就相当于它们投资的26%和34%[1]。石油业、木材业和采矿业也通过土地赠予占有了当时最有价值的油田、森林和矿山。而移居西部的农场主、牧场主、淘金者只得屈从于铁路公司和大矿主们，向他们高价购买土地，或者接受他们的雇佣。内战后联邦的土地政策对于西部的社会冲突、东部与西部的地域矛盾、金融资本的集中和垄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再以税收政策为例，联邦政府取消了内战中一度实行的所得税，国内税收主要来自农场主交纳的土地税和消费者所承担的商品税。而对当时集中了社会财富大部分的银行、股份公司和托拉斯，几乎没有任何财政监督和税收调节的机制，各种股票、息票、债券和抵押都不在征税之列。相反，税收政策还对银行资本和大企业集团给予各种特殊的恩惠。经过这种税收政策的作用，社会财富以更快的节奏向着华尔街及其他金融中心集中了。可见，放任政策的真正受益者是垄断资本。

两大党在实行放任政策时几乎如出一辙。例如，共和党首领布莱恩曾标榜自己是改革派，但他谈及大企业时却毫不掩饰："托拉斯是私人事务……任何人都无权干预。"[2] 民主党的克利夫兰在任布法罗市长时也曾扮演过改革者的角色，但他入主白宫后，面对得克萨斯州的严重旱灾，他反对拨出任何政府救济，并坚持认为"政府不应当支持人民。"[3] 海斯和克利夫兰在派遣联邦军队镇压工人罢工时，同样毫不手软。两大党共同奉行放任政策，使资本集中和垄断形成得到最有利的环境。各社会集团围绕着放任政策的几个主要方面即关税、货币、铁路及托拉斯等焦

---

① 沙伊贝等：前引书，第177页。

② 拉塞尔·奈：前引书，第95页。

③ 阿伦·内文斯：《格罗弗·克利夫兰》，纽约1933年版，第332页。

点，展开了尖锐复杂的冲突。

〔高关税政策及其作用〕　关税问题曾经是内战前南北地域斗争的重大争端之一。内战后，共和党利用长期执政的地位，不断提高关税税率。1857年的关税率为19%，到1890年提高到50%以上，形成了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高关税壁垒。旧的地域争端同新的社会冲突交织在一起，引起了多次关税争论。早在60年代初，联邦财政部长詹姆斯·考克斯、联邦税务署特别税务专员戴维·威尔斯都曾提出降低关税的主张，但很快被强大的压力所挫败。此后历任共和党总统都把高关税政策当成自己的护官符。格兰特在1872年连任后，不仅保持了原来的关税率，而且还取消了原来的所得税。海斯上台后，抛弃原来支持自己的低关税派，坚定地执行高关税政策，博得了大企业的青睐，卸职后改任国会关税委员会主席。在阿瑟和哈里森任内，联邦财政每年都有1亿多美元结余，其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关税收入。但这两个总统都不敢丝毫降低关税率，宁可将财政剩余用于扩大抚恤金、政治分赃和更新海军装备。有时共和党为了避免党内分裂，也调整部分税率，但保持总的关税水平。海斯对此直言不讳："目标是通过减低关税来实行保护关税。"①

民主党在内战后仍然是低关税集团的代表。克利夫兰上台后，在全国关税改革联盟支持下，1887年提出一份低关税咨文。根据这项咨文，民主党人米尔斯提出要求普遍降低关税率7%的议案。这在国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阿尔德里治和众议员麦金莱率领高关税派展开猛烈反击，米尔斯提案遭到惨败，高关税壁垒依然完整无损。在1890年，高关税派又得到最大实惠，使税率高达50%以上的麦金莱关税法得以通过。

---

① 贝林、戴维斯等：前引书，第575页。

由于这个税率过高，使美国的出口贸易受到影响，国会又设法对某些集团实行补偿。例如，为了使在古巴投资的美国资本获利，麦金莱法对蔗糖进口实行免税；同时为了补偿国内炼糖业所受损失，政府对糖业资本家给予每磅糖 2 美分的补贴。在 1893 年危机中，高关税政策暴露出造成市场萎缩的缺陷。民主党乘机在 1894 年提出威尔逊一戈尔曼关税法，将平均税率降至 39.9%；同时实行征收所得税，对年收入 4000 美元以上者征税 2%。即使如此微弱的一次税利改革，1895 年仍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1897 年经济再度繁荣以后，麦金莱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实行了丁格利关税法，其平均税率高达 57%，并保持了 12 年之久，堪称美国高关税政策的顶峰。

高关税政策对促进美国国内市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 世纪末的美国商品进出口总额仍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1/10，故不足以成为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但是美国的劳动力价格偏高，致使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不利。高关税政策大大提高了美国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比重，从 1860 年的 60% 上升到 1900 年的 97%，[①] 有力地保证了美国在此期间迅速成为世界工业大国。

另一方面，农业受到高关税政策的严重损害。70 年代以后，美国农产品在国内供过于求，过剩严重。在国际市场上，又遇到了加拿大、俄国、阿根廷等国的小麦和埃及、印度棉花的有力竞争。高关税政策引起欧洲国家对美国农产品的严厉报复。美国农产品只得以低价向欧洲市场倾销，反过来又加速了国内价格的猛跌，进一步扩大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而工业产品却以农产品作为牺牲来保持稳定的国内价格。

---

① 福克纳：前引书，第 75 页。

高关税政策还促进了美国工业的集中和垄断。关税壁垒稳定了国内市场行情，有利于大企业之间建立价格协定、普尔和各种联合体。受到高关税保护的工业部门大多较早地形成垄断。糖业托拉斯总经理哈夫曼承认："高关税乃托拉斯政策。"关税税率调整反映了部门经济和资本集团的发展不平衡。例如，60年代末苏必利尔湖大铜矿被发现后，国会立即对智利铜矿进口征高关税，以进口智利矿石为主的新英格兰冶铜业却由此倒闭。一般地说，受益于高关税政策的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的中西部大企业。新英格兰、纽约的出口商、航运业则站在低关税立场上。当时企业实力增长最快的正是中西部，故高关税政策更不易动摇。总之，联邦政府按照资本集团的实力变化来调整关税税率，却牺牲了农场主、中小资本和消费者的利益。

〔货币争端及其引起的社会冲突〕　货币问题较之关税问题更为尖锐复杂。它既是由内战遗留的财政问题所引起，又与向垄断过渡的金融结构密切相关。内战后的美国币制相当混乱，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包括金币、银币证券、国民银行和州立银行的钞票、联邦的绿背纸币和债券等。其中绿背纸币占通货量的一半，约4.5亿美元。绿背纸币既不能兑换黄金，又不能用于国际支付，遂不断贬值。1865年每元绿背纸币的实际价值只等于35美分金币。这种状况造成市场价格波动，银行信用缺乏保证，不利于资本家取得稳定利润，同时影响着美国的国际支付能力，难以吸收急需的欧洲资金。

1866年以后，共和党几次试图恢复硬币支付，但屡屡受挫。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彭德尔顿提出，如果政府用硬币支付公债，就会引起私人债务的硬币支付，那么以往借贷纸币的债务人利益就会受到损失，因此政府仍应以纸币偿债。此即所谓"俄亥俄观点"。格兰特总统对此观点不屑一顾。他决定对所有的联邦

债务实行金币支付。1873年危机造成金融形势恶化，硬币派抢先在1872年12月通过“恢复硬币支付法”。规定从1875年开始以硬币发行量80%的比率陆续收回绿背纸币，直至绿背纸币流通额降至3亿美元；至1878年美元同黄金价值挂钩，全部纸币均可兑换硬币。这个法令表明美国实际上开始实行金本位制。

然而，向垄断过渡时期的中小资本和农场主的大量破产，使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矛盾有增无减。原来的绿背纸币派把减轻债务的出路转向了通过恢复金银复本位制来增加通货量。早在1837年联邦政府就规定了白银与黄金的比价为16比1。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开采后，出现银贵金贱。1861年，黄金年产量为白银的20倍，银币退出流通。70年代落基山区巨大银矿发现和开采，形势陡变为金贵银贱。但此时欧洲国家已相继实行金本位制，国际市场上白银贬值。尽管如此，联邦政府并未正式废止复本位制，故绿背纸币派就转变为银币派。银币派根据“格雷欣法则”[①]，认为白银一旦进入流通，就会取代黄金，实现通货膨胀。但是1873年铸币法限制了白银铸币量，从而堵住了债务人的另一条出路，他们愤怒地把该法称为“1873年罪恶”。

慑于银币派的压力，国会在1878年讨论银币问题。密苏里州民主党众议员理查德·布兰德提出了按16比1无限制铸造银币的议案。经过一番争执，金币派通过了稍作让步的布兰德—艾利逊购银法。规定财政部每月购入相当于200万至400万美元的白银并发行同量的银元券。但这无法改变白银供过于求的状况，银元券也难以进入流通，“金银之争”有增无减。80年代末，银币

---

① 格雷欣（1519—1579）是英国经济学家。他提出，一旦发行价值不足的货币即劣币，就会使足值货币即良币退出流通。此即“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

派广泛开展活动，并于1889年成立全国复本位联盟。两大党迫于压力，在政纲中都列入了复本位条款，但实际上都保留了金币政策。1890年，高关税派和银币派达成交易，在国会中通过谢尔曼购银法，实现了暂时的妥协。该法规定财政部每月购银450万盎司，相当于全国的白银月产量；并发行具有货币效力的国库券来支付银价。从1878年布兰德购银法开始，到1893年谢尔曼购银法被撤销，联邦政府共购白银5.34亿美元。但这并未改变畸形的金融结构和通货紧缩的局面，因而也无法平息“金银之争”。1893年危机时黄金储备大量流失，购银法再也无法维持。“金银之争”同整个社会的政治冲突纠缠在一起，成为党派阵营的分水岭。

硬币政策保证了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促使银行资本走向集中和垄断，对内战后美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同样是以牺牲下层人民利益为前提的。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深入发展，这种政策的弊端也不断地暴露出来。长期的通货紧缩造成货币供不应求。从1869年到1897年，货币总供应量比总需求量少2%—4%[①]。人口平均拥有货币量从1865年的30美元降至1890年的27.06美元。[②] 由此导致利率持续上升，债务不断加重，农业、铁路等部门日益陷入困难境地，成为1893年危机的诱发因素。这种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分布的极不均衡。东北部所拥有的货币量超过西部和南部总和的几十倍，从而控制了这两个地域的货币供应。这种金融分布的地域格局为东北部银行在西部经营抵押、在南部发放高利贷提供了极有利条件。整个东北部从

---

① H.瓦特：前引书，第259页。

② 小施莱辛格：前引书，第2卷，第1705页。

西部抵押中每年收益可达 1.8 亿美元[①]。但是西部、南部的长期萧条状态，使这种金融结构基础极为脆弱；一旦崩溃，就会导致恶性的连锁反应。

从全国范围看，纽约集中了当时国民银行全部现金储备的40%以上。[②] 华尔街以此控制了全国各部门、各地区的投资方向，形成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摩根集团在 1893 年危机中，有能力动员 350 万盎司黄金来支撑当时面濒临崩溃的联邦信用。这充分证明了内战后货币政策的实质性结果，即联邦政府以全国的财力支持华尔街，最后竟使白宫仰仗华尔街的鼻息。至于金本位和复本位的胜负问题，在 1897 年以后已无关紧要。黄金产量猛增，使货币发行量从 1896 年的 18 亿美元增至 1901 年的 31 亿美元，物价也提高了一半。国会在 1900 年毫不费力地通过金本位法，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金银之争。但金融体制的改革远未完成，货币争端的影子在 20 世纪美国社会中一直可见。

〔*从格兰其法到州际商务条例*〕　　内战后的铁路建设是美国经济发展的缩影，铁路公司也由此而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铁路巨头得到了政府的巨额土地赠予和津贴，但仍欲壑难填。他们采取“掺水股票”[③]、回扣、运费率歧视、价格协定、普尔等方式，攫取巨额非法利润。仅掺水股票的年收入就可达2.4 亿美元。[④] 运费率歧视亦骇人听闻，西部平均运费率相当于东部的 4 倍。农场主收入的 3/5 用于运费支付。铁路公司还兼营谷仓和土地抵押，操纵农产品价格和利率，成为西部农业的“天

---

① 拉塞尔·奈：前引书，第 22 页。

②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 401 页。

③ 指在实际投资总额以外掺入的虚假股票，而这些虚假股票同样参加利润分配，故谓之“掺水”。

④ 小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2 卷，第 1702 页。

然垄断者”。因此，西部各州首先兴起了管制铁路的立法运动。

1869年至1875年，在格兰其组织推动下，伊利诺伊、艾奥瓦、明尼苏达、威斯康星等州立法机构，通过一系列政府管制铁路经营和运费率的法令，被称为“格兰其法”。根据这些法令，各州建立有权监督或制定铁路运费率的铁路管制委员会，禁止运费率歧视，禁止平行线路合并以保持竞争等等。它们是“州际商务条例”的蓝本。此时的最高法院仍承认“格兰其法”的法律效力，并在芒恩诉伊利诺伊案中判决州政府有权管制州际铁路。

80年代后，6个垄断集团基本上将全国的铁路网瓜分完毕，跨州运输成为铁路经营的主要方式。铁路公司与托拉斯互相勾结，排挤中小资本和农场主的现象更加严重。铁路公司操纵各州政局相当普遍。例如，圣菲铁路在堪萨斯拥有全权；在内布拉斯加，则是布林顿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两家分享。格兰其法变得空有其文。剧烈竞争也造成了运费暴跌，许多铁路公司损失惨重。它们试图订立统一的运费率，却终未成功。于是，管制铁路的呼声在全国范围内更为高涨了。

80年代末，管制铁路的立法活动在更广、更高的范围展开。1886年，全国30个州建立铁路管制委员会。国会参议院组成以谢必尔·卡勒姆为首的委员会。他们根据各州经验，提出建立联邦铁路管制委员会的议案。各铁路公司则愿意接受“较为宽仁”的控制，因为无情竞争使他们徒劳而无所获。最高法院则从反面促成了联邦管制。1886年，最高法院在沃巴什判案中否认了伊利诺伊州规定铁路运费的权利，并认为这违背了联邦宪法关于州际贸易的条款。各州的铁路管制实际上变得无效，人们只得诉诸联邦政府的力量。国会参、众两院在格兰其法和卡勒姆议案的基础上，形成“州际商务条例”，并在1887年2月4日以压倒多数通过。克利夫兰总统慑于社会压力而签署了这项法案。联邦政府

就这样不自觉地从放任政策向干预政策走出了第一步。

1887年“州际商务条例”的主要内容是：设立一个由5名成员组成的州际商务委员会，经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各铁路公司须将运费率公开，禁止运价歧视和普尔等。从内容上看，这项条例并不比格兰其法有更多的创新。但是，它对于联邦政府的结构和职能的发展变化有着深刻的意义。这项法律是联邦宪法关于州际商务条款的第一个具体体现，为联邦政府在其他经济领域的干预提供了先例和法律依据。同时，州际商务委员会有权调查各铁路公司的营业状况，传讯证人，作出某些裁决或发布指令。它在隶属关系上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兼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特点。以后出现的各种联邦管制机构大多是这种模式的继续和发展。

尽管纳尔逊·阿尔德里治等保守派将这项立法说成是“无异于一场革命”，州际商务委员会仍长期软弱无能。因为它的权力是非强制性的，铁路公司可以拒不接受并向最高法院上诉。事实上是最高法院的复审权决定一切。1887至1905年间的16项上诉案件中，最高法院的15项判决有利于铁路公司。有的案件拖延5年以上，使委员会的裁决无法执行。1900年的1份国会报告承认铁路公司仍在实行价格歧视，其“程度也许和以往相同”。[①]该委员会形同虚设，还由于其成员绝大多数来自两大党保守派。他们认为如果立即实施管制，将会引起强烈变化，使铁路公司蒙受“非常严重的损失”。[②] 因此，州际商务委员会不可能为了有效地执行职责而去触犯垄断巨头们。相反，委员会在搜集统计资料、提出分析和建议、提供业务咨询等方面，却为垄断资本提供

---

① 福克纳：前引书，第171页。

② 沙伊贝等：前引书，第191页。

了方便。可见，这个时期的干预政策极为微弱，其有效程度只能以垄断资本的需要为转移。

〔反托拉斯运动与反托拉斯法〕　1882年美孚石油公司组成托拉斯以后，各垄断集团纷纷效法，在钢铁、肉类加工、烟草、制糖、农机制造等部门出现了一系列托拉斯组织。它们滥用垄断特权，巧取豪夺，对社会中下层构成严重威胁。旧中产阶级为了避免完全破产的厄运，恢复旧日的"机会均等"，展开了一场反托拉斯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思想代表是当时颇享盛名的改良主义者亨利·乔治、爱德华·贝拉米和亨利·劳埃德。他们从农业民主思想、乌托邦思想等旧观念出发，揭露和谴责托拉斯的罪恶，同时提出由国家控制托拉斯的主张。他们著书立说，乔治的《进步与贫困》、贝拉米的《回顾》、劳埃德的《反对共和国的财富》风靡全国。反托拉斯运动在这些人影响下形成一股颇有声势的浪潮。在北部城市中出现了单一税论者、国家主义者、反垄断党和联合劳工党等反托拉斯组织。在西部各州，农场主为主体的第三党推动各州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反托拉斯立法。80年代末，反托拉斯已同关税、货币争端一样，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了。

各州反托拉斯立法最初都因袭了16世纪英国的反垄断习惯法，把一切垄断和合谋性联合都定为非法行为。在当时14个州的反托拉斯立法中，以密歇根州最为完整。它规定，凡限制、控制、妨碍或管制产量或市场价格的任何合同、协定、默契和联合均为非法，并详尽地规定了惩处方式和执行机构。同铁路管制一样，各州无法对跨州经营的托拉斯进行有效的干预。更复杂的是，1889年新泽西州立法为各个跨州经营的大公司提供营业执照，使许多垄断企业逃脱了所在州的管制。州一级反托拉斯法的疲软无力，促使各州改革派转向了联邦的立法和干预。

两大党为了争取选民也竞相做出反托拉斯的姿态。在1884

年的民主党政纲中就已列入了反垄断条款，试图乘机打击共和党。共和党也不得不在1888年政纲中点缀反托拉斯的辞令，哈里森许诺要实行“禁止”托拉斯的立法。国会组成了专门调查托拉斯情况的普乔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报告承认托拉斯过分膨胀已是既成事实，它们控制了许多部门，并正渗入新的地域。仅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参与交易的20余个托拉斯，各自的交易金额都达几千万美元①。仅1889至1890年，众议院接到的反托拉斯立法已有16份。此时国会再也不能对托拉斯问题假作不知，只得把它同关税、货币争端放在一起，作为党派妥协的一个筹码。

1890年反托拉斯法名义上是由参议员约翰·谢尔曼提出的，实际上是由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乔治·F·爱德蒙参照各州反托拉斯法并汲取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后起草的。爱德蒙的草案认为所有企业联合都“阻碍了完全、自由的竞争”②。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把草案措辞改得更加含混无力。参议院的辩论只涉及了法案与宪法的一致性问题以及关税和垄断的关系，根本没有研究对垄断行为的具体惩处办法。结果是参众两院仅有一票反对就轻易地通过了该法。保守派领袖托马斯·普拉特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认为这项立法无意于惩处和禁止托拉斯，因而被称为将“惩罚托拉斯的立法送到了国人面前。”③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共7项条款。它宣布任何限制、垄断州际贸易或对外贸易的合同、联合均为非法，须处以罚款5,000美元或1年徒刑的惩罚；受到上述非法行为损害者可起诉并索取3倍于损失的赔款。但这些条款没有明确“不合理行为”的范围，也

---

① V.S. 克拉克：《美国制造业史》，华盛顿1929年，第2卷，第176—177页。

② 默尔·芬索德等：《政府与美国经济》，纽约1959年，第446—448页。

③ 芬索德：前引书，第448页。

没有具体说明“托拉斯”、“垄断”等概念的涵义。其惩治方式都是微不足道的，因而垄断组织不可能真正受到制约。谢尔曼本人也认为，反托拉斯法是把旧的习惯法运用于州际、国际贸易中，故“要在合法的和非法的联合企业之间用法律语言明确其界限是困难的”[①]。可见，反托拉斯法的缺陷既是由两大党的欺骗策略所造成，也表现出旧法律概念与新经济现象之间的矛盾，使之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最高法院对反托拉斯法采取极端保守的态度。一方面，最高法院为受控的托拉斯竭力开脱。在1895年的奈特公司案中，最高法院把占全国糖产量95%的奈特公司判为合法，并诡辩说制造业不属于贸易范围，故不在反托拉斯法的惩罚之列。由于这个判例，制造业的其他托拉斯也幸免于制裁。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却把反托拉斯法用于镇压工人罢工。1894年普尔曼罢工时曾拒绝运输邮件，司法部以“限制贸易罪”对罢工领袖尤金·德布斯提出起诉，最高法院则依据反托拉斯法判处德布斯徒刑。克利夫兰任内仅有5起反托拉斯案，其中4起是控告工会的。而1890至1900年的18起反托拉斯案例中，没有一个托拉斯遭到解散。[②]

国会和行政部门同样削弱了反托拉斯法的执行。国会在10余年间没有为反托拉斯法提供执行经费和机构。直到1903年，司法部才设立反托拉斯局，每年经费为50万美元，仍远不足以对付数百个巨型垄断组织。司法部长理查德·奥尔尼等人在一系列反托拉斯判例中都直接支持了最高法院。因此，1890年后托拉斯数量继续骤增。仅1899至1901年间组成的托拉斯就有146

---

① 芬索德：前引书，第448页。
②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565页。

家[1]。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种种弱点日渐暴露，对垄断资本发展也产生不利影响。20世纪初，托拉斯开始向控股公司转变。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等总统屡经修补，在1913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基础上形成了较完整的反托拉斯法体系。尽管反托拉斯法未能抑制垄断组织的膨胀，但它毕竟标志着放任政策进一步转向干预政策，联邦政府不得不开始借助于“看得见的手”来保持社会经济结构的平衡了。

第三节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调整和加强

〔*党魁势力和政治丑闻*〕　在“镀金时代”，党魁势力恶性膨胀。党魁亦称政治老板。他们控制各级政党机器，纵横捭阖，游说策划于幕前幕后；依靠恩赐官职来拉拢党派骨干，进而控制各种选举和州、联邦的政局。一些关键州的大党魁，如纽约州的罗斯科·康克林、缅因州的詹姆斯·布莱恩等，都由此发迹并盘踞国会多年。同样，得到官职的党派忠诚分子也利用职权来回报党魁。他们挪用政府财政来充实本党金库，把大批合同、专利、投标转让给支持本党的企业家等。可见，政治分赃、恩赐庇护和党魁老板三位一体，是造成当时腐败政治的主要原因之一。进入80年代，一批新党魁出现，如宾夕法尼亚州的马修·奎伊、纽约州的托马斯·普拉特、罗得艾兰州的纳尔逊·阿尔德里治、加利福尼亚州的乔治·赫斯特等。他们与注重地域问题的旧党魁不同，而是长期坐镇国会，遥控各州，从容地进行全国性的政治交易。90年代以后，出现了垄断资本家直接充任的特大党魁，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马库斯·汉纳是其代表。汉纳本人是百万富翁，弃

---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565页。

商从政，成为赫赫有名的"总统制造者"。此后的麦金莱、塔夫脱、哈定等总统均出自俄亥俄州，同汉纳的苦心经营不无关系。

正是在这种党魁横行的年代里，政治丑闻充斥着美国社会。1871年纽约市民主党的坦慕尼厅"特威德集团案"首先遭到揭露。威廉·特威德从1869年开始控制坦慕尼厅，进而操纵纽约市政府。仅在2年时间里，特威德集团侵吞公款就达1亿美元之多。这次揭露使两党政治中最腐败的内幕暴露于世，举国震惊。民主党大伤元气，就大力搜集共和党上层丑闻作为报复，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互相攻讦。在"莫比利尔公司案"中，许多共和党头面人物接受了大量股票赠予，副总统舒勒·考尔法克斯和参议院领袖詹姆斯·加菲尔德也都牵连其中。此案又引出一大批联邦高级官员的营私舞弊案。例如，海军部利用签订军舰制造合同之机分得赃款几十万美元。陆军部则大量出售西部地区的皮货贸易特权。内政部、财政部与土地投机商公开勾结，借分配西部土地而大捞便宜。甚至美国驻英国和巴西的大使也盗用合众国名义诈骗巨款后逃之夭夭。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等主要海关无一不是贪污黑巢。许多丑闻一直涉及到白宫内部。在逃税漏税的"威士忌集团案"中，总统私人秘书参与密谋并通风报信，但却得到格兰特总统的庇护，依然逍遥法外。

各州的政治腐败也不亚于联邦政府。纽约州议会把伊利铁路的控制权以低价卖给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公开出售立法法案。伊利诺伊州的某届议会通过了700多项有利于人公司的立法。在艾奥瓦、明尼苏达、加利福尼亚等州，这类舞弊行径也是司空见惯的。

这种政治腐败现象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在企业界的疯狂竞争中充满着欺诈手段，侵吞股票、制造假破产、发放掺水股票、故挑事端等等，都成为聚敛财富的极佳手段。西部土地、矿藏和

铁路都是投机家和暴发户们的理想场所。商业的欺诈和疯狂造成一种狂热的投机心理，使政界的钻营舞弊也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向垄断过渡时期的美国经济为政治“新贵”和既得利益集团提供了“天赐良机”。

〔文官改革运动与彭德尔顿法〕　腐败的党魁政治使政府效率低下，支出庞大，既损及下层民众利益，又危及统治秩序。有识之士对此深为忧虑，认为改变分赃制度是势在必行。其中的代表人物多是行政部门的改革派官员，如乔治·科蒂斯、汉密尔顿·菲希、詹姆斯·考克斯和卡尔·舒尔茨等人。在他们的鼓动下，兴起了一场美国文官制改革运动。

美国文官改革运动经历了较长的准备阶段。1867 年，国会众议员托马斯·詹克斯已提出报告，主张借鉴中国科举制及英、法、普鲁士等国的文官制度，实行官员考试录用、选拔制度。这个提议在国会中遭到冷遇，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70 年代以后，改革派不断向国会施加压力，1871 年使“文官拨款法”得以通过。该法附件规定了组成由总统任命的制定文官管理规则的委员会。科蒂斯任首届委员会主席。1872 年 6 月举行了第一次文官考试。这项初步改革遭到保守派的拼命抵制，国会拒绝对文官委员会拨款。到 1875 年科蒂斯被迫辞职，改革中途搁浅。1880 年海斯总统支持文官制改革。由道曼·伊顿出任文官委员会主席。伊顿发表《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史》，为美国文官制度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同时，舒尔茨、谢尔曼等人各自在内政部、财政部进行改革试验，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经验。党魁势力则把文官制改革说成是中国科举制的翻版，将会破坏美国民主政治等等。他们还利用改革中的缺陷，偷梁换柱，试图把文官考试变成另一种分赃形式。改革派为了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在 1881 年成立了全国文官改革联盟。改革联盟广泛揭露党魁分赃的弊端，

为进一步推行改革扫清障碍。

正当改革派与党魁势力僵持不下时，发生了举国震惊的1881年加菲尔德被刺事件。分赃制造成一些政客疯狂追逐官职，以致出现铤而走险、持枪行刺的恶果。这不仅使改革派和社会中下层感到切肤之痛，许多官员和政客也不得不承认分赃制已成为过时的赘疣，19世纪初确立的党派分赃制已不适应对数十万官员进行选拔的需要了。国会在舆论压力下，经过多次辩论，于1883年初通过了由参议员彭德尔顿提出的文官法案。从此，文官改革开始纳入法律程序之内。

彭德尔顿文官法吸取别国文官制的长处，总结并提出一整套美国的文官管理规则。这些规则直到目前仍保持稳定。其主要内容有：对官员选拔实行竞争性的公开考试和考核制，同时对高级要职实行选举制和任命制；按照各州人口比例分配政府官员名额；实行文官预备期制度；禁止现职政府官员介入党派活动；禁止以官职作为竞选诱饵；文官隶属于行政部门。彭德尔顿法的核心是实行竞争淘汰的考绩制，即根据公职人员的能力和政绩，按照公开竞争原则决定其录用和提拔降退。彭德尔顿法还规定了文官委员会的组成与权限，其职能包括举行文官考试、调查文官法执行情况以及制定各项细则。虽然文官委员会几度险遭撤除，但仍得到保持和发展，直到1979年才改组为联邦人事管理总署。

文官法虽然得以通过，但是它以部分保留赐官分赃制作为代价，在实行中仍很不彻底。1883年文官法的适用范围只及当时联邦官员的12%，州和地方政府仍在实行分赃制。克利夫兰、哈里森、麦金莱等总统利用文官法覆盖面狭窄的缺陷，继续在政府内充塞党派势力。但是总的趋势是功绩制范围不断扩大，到1900年已占联邦文官的20%。文官法的另一个缺陷是没有任期

限制，这被保守派人士攻击为终身任职。联邦政府直到1920年实行官员退休制，才弥补了这个缺陷。国会在党魁势力的操纵下，动辄使用调查权来阻挠文官委员会的工作进展，还借口文官委员会不应成为官僚机构，削砍委员会的拨款和编制。曾在委员会任职6年的西奥多·罗斯福认为：由于力量悬殊，仅仅靠文官委员会是无法制止违反文官法的现象的。[①] 直至20世纪美国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改革配套进行，文官法才较全面地得以实施。1950年采用功绩制的联邦官员已达90%。[②]

文官制改革对于美国政治体制的调整具有深刻影响。首先，以功绩制取代分赃制，有利于统治阶级网罗人才，提高官员素质和政府效率，也相对体现了“机会均等”原则，使知识分子有较多机会进入政界，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缓和了社会矛盾。其次，逐步形成了由总统垂直领导的行政人事制度，将党魁把持的政治分赃转变为由总统进行的权力分配；总统成为两大党的实际领袖，使行政和立法的制衡关系发生新变化。其三，限制了官员直接介入党派活动，切断了政府对两大党提供的财源，客观上促使两大党更多地向垄断资本靠拢以取得竞选支持。双方找到了结合的共同点，两大党用政纲和金钱吸引选票比用官职笼络少数党派骨干更能争取选民，大企业直接过问政纲和候选人比通过党魁间接控制政局更为有效。其四，政府官员中的党员忠诚分子越来越被技术专家所取代，国会和内阁开始大量聘用管理专家和技术人员，许多专业研究人员纷纷进入政界兼职，这甚至引起了大学课程设置和学术研究动向的一系列变化。总之，文官制改革引起了连锁反应，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相对顺应了经济结构变化的要

---

① 莫里森编：《西奥多·罗斯福通信集》，哈佛1951年，第1卷，第166页。

② 吕贝克·格鲁弗：《美国史》，马萨诸塞1981年，第538页。

求。

〔白宫与国会的权力之争〕　　重建后的联邦决策权一度由国会掌握。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为了恢复其权力优势，与国会展开了复杂的权力斗争。首先在官职任命权方面展开。1867年官职任期法是重建时期激进派击败约翰逊总统的一张王牌。此后国会坚持与总统分享官职任免权。海斯就任总统后，未同国会磋商即独立进行组阁；接着又几度与党魁势力代表罗斯科·康克林较量，控制了对纽约海关官员的任命权，在内战后首开先例。克利夫兰上台后利用文官改革的形势，在1887年3月迫使国会撤销了官职任期法，为恢复总统的完整权力走出了第一步。

国会还竭力插手内阁各部事务。在70年代初，部分国会议员已主张总统应尽量少过问内阁事务，内阁部长们应直接对国会各对应的委员会负责[①]。1881年，国会再次要求各部每月向国会报告工作。这种架空总统的手法显然有悖于三权分立原则，故未被行政部门接受。国会又利用其接受上诉、进行调查的特权，来干预内阁各部。1880至1886年国会接受上诉案达3,000余件。这又引起了司法部门的不满。国会只得以调查各部情况作为主要渗透手段，在1887年组成了参议院考克瑞尔委员会，1893年又组成了参众两院的联合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考核各部工作，接受各部的工作报告白皮书。结果是国会未能控制内阁各部，却形成了一种监督、改善行政部门的重要手段，促进了新的制衡关系建立。尽管如此，到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开始对内阁各部加强控制，上述两个委员会就寿终正寝。

财政支配权是双方争夺的又一个焦点。财政决策直接与关

---

① L.D. 怀特：《共和党时代，1869—1901年》，麦克米兰公司1958年，第47页。

税、货币、土地、铁路、抚恤金等重大争端相关，故又与党派斗争纠缠在一起。例如，海斯为了增加对联邦在南部驻军的拨款，克利夫兰为了减少抚恤金支出，都曾与相对立的国会发生争执。总的看，行政部门对于财政拨款的数量和使用方向仍无真正的发言权。尽管如此，行政部门仍尽力保持对既有拨款的支配权。约翰·谢尔曼任财政部长期间，提出专款专用、收支平衡、不得提前付款和透支等财政管理原则，使财政部对其他各部拨款使用情况有监督权，从而部分抵销了国会的影响。双方僵持到1921年，行政部门中专设了联邦预算局，才使国会与内阁的财政职责较为分明。

立法与行政的权力斗争反映了这个时期旧的地域性政策同新的全国性政策之间的更替。行政权力较为适应这种更替，从而得到保持和发展。从内战后到20世纪初，内阁增加了5个部[①]，直接推动了行政权力的上升。其中的农业部开展了科研指导、市场调查、生产监督和信息传递等业务，为其他各部提供了经验。行政部门的职能扩大还表现在新设立的一系列独立委员会，如文官委员会和州际贸易委员会等。这些机构既对总统负责，又具有准司法和准立法的职能，故比旧行政机构更具有灵活性，成为以后行政权力扩展的主要形式。总统直属的白宫办公机构也开始形成，从格兰特时的6名办公人员发展到麦金莱的几十个人，并得到国会的专项拨款。白宫机构的发展，使总统得以更加自行其是而不忌国会的插手。行政职能扩大，为联邦政府增加大批官员，其人数从1871年的53,000人增到1901年的256,000人，30年内

① 1862年成立的农业部在1889年升格为正式内阁部；原有的邮政总局和检察总署，在1872年和1870年分别升为内阁的邮政部和司法部；1903年成立的商业和劳工部，在1913年分设为内阁的商业部和劳工部。

增加近四倍。①

总统为首的行政权力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经济集中的趋势。全国市场的形成要求联邦政府迅速有效地处理全国性争端。而国会内党魁势力纷争，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和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长期对峙，使立法部门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相反，80年代以后历届总统竭力摆脱“看门人”的角色，克利夫兰在其两次任内使用否决权300余次，有力促进了总统地位上升。总统所处的位置较有利于联邦政府、两大党与垄断资本的三者结合。克利夫兰与纽约金融界、哈里森与铁路集团、麦金莱与中西部制造业集团均关系甚密，为国会的党魁势力所不及。在竞选过程中，总统比国会表现得更“开明”一些，作出改革姿态以争取民心，故在调整政策方面略胜一筹。此外，总统能比国会更迅速、更坚决地保护企业利益，在历次经济危机和大罢工面前，总统都采取非常措施来保护资本家渡过难关。因此，行政权力上升也是向垄断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尖锐的产物。正如当时有学者所预言的：“有理由相信，（总统权力）将达到一个比内战以来任何时候都要高的地位。在美国各地的趋势正在把权力和责任集中于一个人，这是毫无疑问的。”② 当然，真正形成总统权力中心的还是从西奥多·罗斯福、经过伍德罗·威尔逊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那个时期。

〔国会、最高法院和军队的强化〕　国会曾长期被保守势力所控制，其议员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化素质较低的内战时期复员军人和党派骨干。这种落后的构成使国会在19世纪末联邦政府中的地位下降。然而，国会的结构也在发生缓慢的变化，各种院

① 《美国历史统计》，第294页。

② J·布莱斯：《美利坚共和国》，纽约1894年，第2卷，第846页。

外集团和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加强。

院外集团又称“压力集团”，即某种相同利益的社会集团通过各种途径向国会施加影响的政治力量。19世纪末的院外集团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由党魁直接操纵的政党机器。二是由大资本控制的企业集团，如铁路集团、糖业集团、制造商协会等等。三是内战后遗留的有关地域斗争的集团，如“共和党大军”[1]。四是与重大社会争端有关的团体，如文官改革联盟、复本位联盟、关税改革联盟等。五是来自社会下层的集团，如农场主集团、“黑幕揭发者”等。各种院外集团互相交叉，往往通过达成默契和妥协来保证某些立法得以通过。由于地域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某些旧的院外集团日渐衰落。如内战前很有影响的南方集团，此时已无足轻重；在70年代曾颇有势力的共和党大军，到90年代几乎销声匿迹。而与垄断资本主义同时发展的一些集团则颐指气使，左右政局。如全国制造商协会，其主席是显赫一时的马库斯·汉纳，在参、众两院势力甚众。其他一些集团的首领也往往出任国会的委员会主席或内阁部长。院外集团是两党制和国会的补充，亦是财团控制政府的重要途径，又被称为“无形国会”或“第三院”。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急剧扩大，立法过程变得更加繁忙和复杂。每届国会讨论的议案从70年代的37,000项增至80年代的74,000项[2]。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立法程序的主要环节越来越在各专业P委员会中进行，国会的辩论和表决成为一种形式。国会的委员会可分为两种：一是关系到国会法定职能和权限的常设委

---

① 内战后由大批原联邦复员军人及其家属组成的社会政治集团，因坚持地域主义口号，要求扩大抚恤金额，追随共和党保守政策而得其名。

② 戴维斯等：前引书，第643页。

员会，如关税、筹款和拨款、上诉委员会等等，均由当时最有影响的政界人物担任主席，如加非尔德、海斯、谢尔曼等。二是负责重要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的专门委员会，如彭德尔顿委员会、普乔委员会、考克瑞尔委员会等。委员会的增多使议员的职业化趋势日益明显，其更换率从70年代的58%降至90年代的24%[①]。其服务年资也越来越长，当时有影响的两名众议院议长托马斯·里德和约瑟夫·坎农的服务年资分别是20年和28年[②]。于是，各个委员会掌握着实际立法权，年资最长的议员操纵着立法程序，使国会更加失去“民选”的意义。同时，国会构成的相对稳定使之保守性增强，也更有利于垄断资本对立法过程施加影响。

最高法院在阻碍改革、破坏罢工和维持种族压迫等方面具有行政、立法部门所不具备的特殊作用。它之所以有恃无恐，在于它受到所谓“司法独立”的保护。国会在重建时期为了制约行政部门，并阻止民主党人进入最高法院，于1869年明确规定最高法院由9名法官组成，并再度肯定法官的终身任职制。终身任职制使大法官们得以顽固守旧而无后忧。最高法院还利用“司法复审权”对各种改革立法横加阻挡，动辄以“正当法律程序”宣判联邦和州的干预政策为“违宪”。反托拉斯法经过他们的解释变成了作用全然不同的双刃剑。罢工领袖被最高法院判为“垄断贸易”的“罪犯”，而在南部横行不法迫害黑人的三K党问题却是“联邦无法干预的各州内部事务”。最高法院充当保守势力的主要堡垒，即使在奥立弗·霍尔姆斯法官提出改革理论后仍纹丝不动，直到本世纪30年代“新政”才触及了这块“禁地”。

---

① N. 鲍尔斯拜：“联邦众议院的制度化”，《美国政治学评论》1968年第1期，第146—148页。

② 同上。

内战结束后，联邦军队的主要任务从平定南部叛乱和执行军管，逐步转移到治服西部印第安人和防止北部城市工人的罢工蔓延。适应这种转变，其人数从100万人削减到3万人左右，这并不意味着军队地位下降。相反，联邦政府一直对军队给予优惠的拨款。陆军的巨额抚恤金和装备开支是联邦政府的第一项主要开支。海军拨款从70年代的400万美元增到90年代的3,000万美元。到1893年，美国海军已建造22艘5,000吨铁甲舰，形成了距海岸线1,000英里以外的作战能力，为大规模海外扩张准备了条件[①]。除了更新和加强军队装备以外，联邦政府还着手改造建国初期延续下来的旧指挥系统。麦金莱任内的陆军部长艾利胡·卢特开始设立总参谋部，用以制定防御和动员计划、调查部队效率和状况、协调军兵种行动，在陆军部与部队之间建立起较为畅通的渠道。美西战争后，总参谋部进一步得到加强，并在1903年为国会正式批准。总之，经过19世纪末联邦政府对军事机器的调整与加强，美国军队基本上适应了20世纪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内统治、对外扩张的要求。

〔联邦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原因〕　　内战从政治上摧毁了州权主义恶性发展的产物、即分裂主义的南部同盟。接踵而来的全国市场迅速扩大，又从经济上削弱了州权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垄断资本取代分散的自由资本而居统治地位，为实行更完整的全国性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些因素都促进了美国的联邦主义在19世纪末的新发展。

联邦主义发展还由于当时一系列具体因素的作用。从政府的人事构成上看，内战前的南部官员绝大多数在战争中和战后退出了联邦政府。这就直接消除了旧地域主义重新占据优势的可能

---

① L. 怀特：前引书，第159—160页。

性。同时，重建后的联邦政府仍然注意保持地域政治的力量平衡。海斯总统在其内阁中保留一名南部官员和几名边界州官员担任部长的作法，被以后的总统们沿袭而成为惯例。从宪法体系上看，联邦主义发展与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修正案有密切关系。这三条修正案名义上是为了保证黑人权利而制定的，实际上处处包含着削弱州权的涵义。三条修正案都明文规定："联邦国会有权以适当的立法强制执行本条。"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州权抵制联邦权力的法律依据，迫使各州最终在政治上服从联邦。

联邦主义发展有其经济趋势的内在作用。19世纪末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促使联邦政府在关税、货币、土地、铁路和专利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资助和鼓励企业的发展，联邦权力也由此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发展。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也要求联邦积极干预各州内部事务。各州既无法遏制垄断企业的极端行为，也难以应付工人运动的严重挑战，只有借助联邦政府的力量才能使各州保持内部稳定。联邦主义加强还借助于美国政治区划的变化。一批西部新州建立，从开始它们就缺乏州权主义传统，而且比旧州更依赖联邦的财政支持，从而间接加强了联邦主义。

同时，各州仍保留着部分独立性，不同的地域在政策上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反映了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差异。例如，南部各州保存了实行种族隔离的"吉姆·克劳制"，挫败了联邦干预南部选举的企图；中西部各州在第三党的推动下，较早制定了铁路管制和反托拉斯立法；远西部的新州创立了包括创制权、复决权、直接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等民主程序的州宪法；东北部各州较早地开始实行城市环境改善和劳工保护等改良主义政策。各州、各地域的特殊政策从不同方面影响到国会的力量对比和三权制衡关系，补充和发展了联邦的全国性政策。

如果说，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主义特点是从邦联走向联邦；19世纪中叶至内战的联邦主义特点是逐步铲除分裂主义、巩固联邦的统一；那么，可以认为19世纪末的联邦主义发展的主要特点在于联邦政府与垄断资本开始全面结合。1893年危机导致企业合并高潮，垄断组织在主要工业部门确立优势，摩根集团通过公债交易控制了联邦金融命脉。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必然要转变为政治上的主宰地位。1896年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麦金莱得到各个垄断集团的解囊相助，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第一个全权代表登上总统宝座。由于两大党上层一致倒向麦金莱，国会中的形势也对他特别有利。当时国会的“四巨头”即罗德艾兰的纳尔逊·阿尔德里治、康涅狄格的奥维尔·普拉特、艾奥瓦的威廉·艾利森和威斯康星的约翰·斯普纳，都曾是麦金莱当参议员时的重要伙伴。他们代表着东北部和中西部两大城市群的垄断集团利益。麦金莱的后台马克·汉纳也走向了前台，亲自坐镇国会。于是，麦金莱就成为总统、国会、垄断资本和两大党四位一体的人格化了。这标志着垄断资本与联邦政府全面结合的时代开始，这种结合本身也是联邦主义战胜地域主义或州权主义的象征。

麦金莱上台后，立即组成一个权势极大的内阁。政界元老约翰·谢尔曼担任了国务卿，他与洛克菲勒私交甚厚。内政部长布利斯是纽约大银行家、公平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陆军部长卢瑟尔·阿尔格是密歇根州的木材业巨头，继而又由摩根的法律顾问艾利胡·卢特担任。此外，许多大企业家还被任命为驻英、法、德、日等国的使节。麦金莱政府由此被称为“百万富翁俱乐部”。总统按照各财团实力来分配权力，比旧党魁的分赃制更符合垄断资本的要求。从此，百万富翁本人出任内阁部长或联邦政府要职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了。

三权制衡关系变化、联邦主义发展、垄断资本与联邦政府结

合，三者不约而同地加强了总统权力。政府机构的调整与增设，官员素质和效率提高，镇压和平衡两种职能的同步发展，使整个国家机器开始适应经济运转的要求。尽管这些变化是被动的、不自觉的，但是它们的历史意义仍在于为20世纪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大政府”出现准备了条件。

第七章

19世纪后期工人运动的发展

19世纪后期是美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时期。工业革命造成的市场急剧扩张，向垄断过渡所产生的剧烈竞争，促使企业资本家强化剥削手段，导致工人地位和生活条件下降，是这一时期美国工人运动高涨的直接原因。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及其阶段性特点又为工业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所制约。60年代，代表熟练手工业者的工人组织主要是为摆脱雇佣劳动制、恢复旧工匠地位而斗争。这种与工业革命发展趋势相背离的斗争目标导致它们的衰落。80年代以后，与大机器工业相结合的新熟练工人开始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产生了以劳联为代表的新工联主义。早期劳联虽然摆脱了乌托邦改良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却局限于经济斗争的狭隘目标，逐渐形成了它的机会主义路线。90年代以后，它的领导者为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积极推行劳资合作政策，结果把美国工人运动引入歧途。

尽管如此，美国工人阶级英勇的反抗斗争，仍极大地震动了美国社会。1886年，美国工人为实现八小时工作日制举行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罢工斗争。90年代后，随着垄断资本统治的确立，罢工斗争更加集中和剧烈，把19世纪末美国工人运动推向了高

潮。

美国工人运动另一重大缺陷是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分离。其原因除了资产阶级的政策作用和劳联的消极影响外，还由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着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以致它难以取得对工会组织的领导地位。

第一节　全国劳工同盟和劳动骑士团

〔全国劳工同盟建立及其活动〕　内战前，美国工人运动的规模仍受到工业革命发展水平较低的限制，工会组织大多是地方性的城市工会。其成分主要是技工与工匠，故带有浓厚的行会色彩。五、六十年代前后，大机器工业在全部制造业中仍未占据优势地位。内战后，工业受到战争刺激而迅速发展，市场扩大又造成企业间、地区间的剧烈竞争。资本家为追逐高额利润，不断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东部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指数从 1861 年的 100 降到 1864 年的 64。[①] 一方面，工业革命尚未在各部门最后完成，大批熟练手工工人仍保持着旧的经济地位和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势不可当的工业革命又日益威胁着熟练工人的存在条件。内战后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展开的。

美国工会运动曾在 1857 年经济危机和内战初期受到严重影响，在 1862 年以后又开始复兴。到 1865 年 11 月，在 69 个行业中已建立了 300 个工会组织，会员总数为 20 万人。[②] 其中 70%集中在马萨诸塞、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三个州。较大的工会组织是铸工、技工、木工及印刷工人的行业工会。各地工会组织纷纷建

① H.G. 瓦特：前引书，第 49 页。
② 约瑟夫·雷贝克：《美国劳工史》，纽约 1966 年，第 111 页。

立，为全国性的统一工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各行业工会经过长期酝酿，于1866年8月20日，在巴尔的摩成立了全国劳工同盟。来自13个州的77名代表，分别代表着各个地方大会、城市联合会、八小时联盟和全国性工会的大约6万名工人。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代表会议，标志着美国工人运动进入新阶段。

这次大会讨论的内容包括罢工、八小时工作日、合作社运动和土地改革等问题。大会的各委员会报告中表述了全国劳工同盟的主要观点和原则。首先，大会认为应将所有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组织进工会；但不主张罢工，认为罢工对工人“极其有害”，应以仲裁来解决劳资冲突。① 其次，大会讨论了八小时工作日和政治行动问题，认为应该建立以八小时工作日为目标的全国劳工党；但是部分代表反对建立政党和政治行动。其三，会议认为合作社是对“现存工业制度的种种弊端的一种可靠和永久的补救方法”，还提出“全部土地只分配给实际拓荒者”的口号。② 这两个观点表明全国劳工同盟深受当时的改良主义思潮影响，并同西部农场主保持着相当多的联系。

1866年以后，在全国劳工同盟的推动下，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出现了第一次浪潮。由于工人组织薄弱和联合水平较低，这次浪潮并未取得实质性效果。1868年6月，国会通过法律，规定联邦政府雇佣的劳工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另外还有六个州通过了八小时工作日法。尽管这些法律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仍足以证明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已经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注意并产生了一定的

---

① 约翰·R·康芒斯：《美国工业社会文献史》，纽约，1958年，第9卷，第130—132页。

② 康芒斯：前引书，第134—137、138—140页。

影响。

全国劳工同盟对合作社运动更为重视。1866年，在纽约州特洛伊建立了第一家合作制的翻砂厂。此后三年中，合作社运动在各行业工人中纷纷展开。其中以铸工国际工会主席威廉·席威斯领导的合作工场最为重要。席威斯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使合作思想在许多工会组织中几乎成了惟一的话题。”① 总的看来，合作社运动范围仍然很窄，它与大机器工业的工厂工人基本上不发生联系。这就决定了合作社运动具有保守、改良的色彩，而且同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以及政治斗争互不相容。另一方面，合作社运动缺乏基本的周转资金，得不到可靠的贷款来源，在资本主义结构内部显然是难以维持下去的。合作社运动的上述局限性使之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

〔凯洛格理论与全国劳工党的失败〕　为了使合作社运动得到出路，许多工会组织和会员接受了爱德华·凯洛格的低值货币理论。凯洛格原是个纽约商人，经营失败后转向研究金融制度，并于1848年发表了《劳动及其他资本》。凯洛格认为，现存的金融制度纵容金融家造成货币短缺以提高利率，给劳工和平民带来了灾难。因此他主张由联邦政府发行以不动产为基础的纸币，利率规定为1%；以此迫使银行降低利率，使农场主、小企业主和熟练工匠能获得急需的货币和贷款。凯洛格甚至提出，一旦实行这种改革，最终会导致雇佣劳动制度的废除。显然，这种理论是相当肤浅幼稚的。凯洛格理论在50年代对工会运动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在内战后，由于金融问题的冲突和合作社运动兴起，低值货币论成为对工会运动及其他改良运动有重要影响的思潮。席威斯、理查德·特里弗雷克等劳工领袖一时都成为这个理

---

① 玛丽·比尔德：《美国劳工运动简史》，纽约，1928年，第75页。

论的崇拜者。

1867年，全国劳工同盟提出一项金融改革纲领，将凯洛格理论更加具体化了。该项纲领提出，取消国民银行制度；由政府规定利率，公债利率为3%；政府以绿背纸币向公民贷款，利率为1%。[①] 这项金融改革的目的在于，一是使合作社得到充分贷款；二是使中小企业主获得所需资金以保持在那些企业中的工人就业机会。可见，它既反映了合作社运动的工人要求，也有利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小资本和农场主。作为内战后第一个金融改革纲领，对后来绿背纸币党、农民联盟和人民党的金融改革纲领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为了实现这种金融改革，全国劳工同盟将其主要注意力从合作社运动转向建立政党的准备工作。1867年，劳工同盟在芝加哥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建立"全国劳工党"的要求。到1870年终于采取实际步骤，选举产生了全国劳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1872年，该党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城召开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准备参加当年的总统选举。劳工党把绿背纸币计划作为主要纲领，这就偏离了劳工同盟原来注重合作社运动的路线，使下层群众与上层领导逐渐脱离。同时，劳工党一旦卷入政党角逐，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政客的操纵。于是，劳工党的总统提名活动就成了一种徒劳的努力。随着提名活动的失败，金融改革纲领也付诸东流，全国劳工同盟迅速瓦解。这种从合作社运动走向金融改革及政党斗争，并趋于失败的道路，在19世纪末的美国第三党中十分典型。后来的格兰其、农民联盟和人民党都有类似的经历，劳工党只是首开其例罢了。

---

① 雷贝克：前引书，第123—124页。

全国劳工同盟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各行业工会联合起来的第一个工人组织，它的出现是内战后美国工人运动走向高潮的标志；同时，它的纲领和实践的局限性，反映了这个时期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一方面，全国劳工同盟把八小时工作日作为自己的目标，表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在局部地区已有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它竭力倡导合作社实验和金融改革，试图以此来摆脱雇佣劳动制度，幻想回到昔日小手工业者的“黄金时代”。这说明在劳工同盟中产业工人的比例较小，熟练工匠、破产小业主及西部农场主的影响仍然很大，他们同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相背离的。从思想上看，由于劳工同盟的阶级构成，决定它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却对凯洛格理论一见如故。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凯洛格的货币理论是一种“幼稚看法”，以为工人贫困原因在于“需要钱的时候却没有钱，这是由于世间的钱根本不够。”“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只有通过实验和破产才能纠正过来……”[①] 因此，全国劳工同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而兴起，又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而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70 年代危机与劳动骑士团〕　1873 年 9 月，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美国，并一直持续到 1878 年。工人们在这场危机中受到惨重打击。全国有 1/5 工人长期失业，2/5 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被降低 40% 至 60%。工会运动也遭到严重挫折。1873 年的 30 个工会，到 1877 年仅存不到 10 个。会员人数也从 30 万减到仅 5 万人。[②] 在危机的打击下，美国工人阶级并未停止自己的斗争，他们以英勇的罢工斗争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9 卷第 53 页。

② 雷贝克：前引书，第 129—130 页。

1875年，马萨诸塞福尔河区的纺织工人，为了抗议资本家连续4次削减工资，举行了长达8个星期的罢工斗争，最后由于饥饿而被迫接受资本家的工资条件。同年，宾夕法尼亚无烟煤矿的矿工在约翰·沃尔什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更为持久的罢工斗争。1874年底，矿主们将矿工工资削减10%—20%，并取消最低工资限额。矿工们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罢工从1月一直坚持到6月。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矿工们被迫停止罢工。沃尔什在《全国工人论坛报》上写道："我们被击败了"，"在我们的妻子儿女的无情需要下，被迫接受了"被削减的工资条件。[①] 即使这样，宾州法院仍将10名矿工判处了绞刑，暴露了法律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实质。

比这两次罢工更为艰巨的是1877年宾夕法尼亚铁路大罢工。危机期间，铁路工人被削减工资35%，大批工人遭到解雇和黑名单迫害，劳资冲突加深。1877年宾州铁路公司再度削减工资10%，激起工人更大义愤。7月16日，从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开始，罢工迅速在各铁路沿线展开。在匹兹堡，斗争最为激烈。罢工工人控制了线路，货运完全瘫痪。连前来镇压的当地民兵也加入了罢工行列。州长只得从费城调来600名民兵。在双方冲突中，26名工人当场身亡，全城为之震怒。工人潮水般地涌到枪杀现场，包围了民兵部队，迫使他们撤出匹兹堡。整个城市被工人控制了。州政府只得求助于联邦政府。海斯总统直接派遣联邦军队，终于在8月2日将罢工残酷地镇压了。为期两周的罢工使铁路公司的损失达500万美元。[②] 在美国历史上这是联邦军队首次镇压罢工运动。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促使联邦政府大大

① 方纳：前引书，第1卷，第670—678页。

② 雷贝克：前引书，第134—135页。

强化了国家的镇压职能。

70年代的罢工斗争对19世纪末美国工人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一部分觉悟工人开始认识到，联邦政府和两大党是资本家的忠实看守人，决不能幻想它们的慈悲。要争取工人的利益，只有加强工人自身的团结。必须弥补以往工会组织的严重缺陷，建立工会会费制度，以保证在罢工时发挥紧急的援助作用。70年代末以后的工会组织开始趋向严密化。这次罢工高潮主要发生在工业革命水平较高的东北部地区，特别是工人集中的纺织、煤矿和铁路等产业部门。这也证明这些地区和部门的工人开始摆脱旧的乌托邦幻想，走上实际斗争的道路。

这时期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仍大大低于东北部地区。1870年，该地区制造业的年产值仅为全国的18.7%[①]。工业集中现象仍不多见，工人的流动性较大，并且与小业主、农场主等阶层互为渗透。这使中西部的工人运动仍滞留在东北部70年代以前的水平。从全国范围看，家庭手工业与手工工场在制造业中仍占重要位置。1870年，手工产品占制造业总产量的50%。因此，许多旧式的行业工会组织在危机后仍能逐渐恢复。到80年代初，它们重新回到了旧的乌托邦改良主义轨道上去了。上述状况成为劳动骑士团影响扩大，特别是在中西部形成较大力量的社会基础。

劳动骑士团成立于1869年，是尤赖亚·史蒂芬斯领导一些服装工人所建立，全名为“神圣劳动骑士团”。骑士团接纳一切以工资收入为生的人，其中包括商人、雇主、农场主（不包括律师、医生和银行家）。这就决定了劳动骑士团是个成分复杂的改良主义团体。1873年危机后，劳动骑士团向中西部地区发展。

---

① 瓦特：前引书，第97页。

到1878年秋，骑士团组织已扩展到俄亥俄、伊利诺伊、印第安纳等州。一些在危机中濒于瓦解的工会组织也转入了骑士团。危机结束后，骑士团已成为当时美国容纳工人人数最多的组织。

1878年1月，骑士团在宾夕法尼亚州雷丁城召开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所通过的章程进一步明确了骑士团的乌托邦改良主义宗旨。它在序言中宣称：工人只有把“每一个工业生产部门都组织起来”，才能避免赤贫化和享受幸福；为此，工人必须接受知识的指导；建立“生产与分配的合作制度”，最终实现劳资双方的和睦相处，公平分享果实。概言之，骑士团的基本原则就是“组织、教育、合作”。这样一个纲领“代表着工人阶级内部各种色彩的、个人的和地方的意见”。然而它是“美国实际上整个雇佣工人阶级的产儿，是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惟一的全国性的纽带”。[①] 骑士团的这种复杂性在后来的实践中一再表现出来。

〔*劳动骑士团的发展与衰落*〕　劳动骑士团奉行的改良主义路线使之未能成为美国工人运动的主体，相反却随着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而走向衰落。

1886年以前，骑士团领导集团热衷于合作运动。从1884年至1886年间，骑士团建立的合作社有135个，大多数是资金在1万美元左右的小型合作社，[②] 其经营的范围包括银行、杂货店、报社、作坊和工厂。这些合作社实验大多是在乡村或半乡村地区进行的。骑士团把这些实验看作是摆脱雇佣劳动、上升到业主地位的捷径。[③] 但是，现实无情地打碎了他们的梦幻。“自由企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向垄断过渡的激烈竞争和货币短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0、261页。

② 雷贝克：前引书，第160页。

③ J.N. 格罗勃：《工人与乌托邦》，奎德兰吉尔1960年，第46页。

缺的金融结构，使这些本小利微的合作社根本无法与大资本抗争。到1888年，骑士团的合作社已大多失败。骑士团苦心经营的合作社运动的失败，证明保存小生产、抵制大工业的努力是徒劳的。这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美国工人运动之转变。

尽管乌托邦改良主义已成为死胡同，但是骑士团领导们仍然不肯改变初衷，并竭力反对组织以提高工资、缩短工时为目的的罢工斗争。骑士团大师傅（即总会长）特伦斯·鲍德利认为，提高工资是一种"浅见"，不过是"每天增加几分钱"而已。骑士团另一总会成员赖特宣称：增加工资、减少工时不会带来劳工的解放。[1] 他们还认为，任何罢工只能把工会搞垮。骑士团上层的这些观点，恰恰为资本家所利用，他们乘机加强对骑士团会员工人的压迫。骑士团下层决定改变这种破产了的政策。他们纷纷摒弃合作社运动，独立地展开了一系列罢工斗争。仅在1885年骑士团会员们所进行的罢工斗争就达196次。[2] 其中以1884年底至1885年初的密苏里太平洋铁路罢工较为突出。这个铁路公司的工人反对杰伊·古尔德两次削减工资，在骑士团地方分会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并得到铁路工人兄弟会的支持。铁路公司被迫停止削减工资，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再次证明了骑士团守旧政策的破产，同时也扩大了骑士团的影响。大批工人涌入了骑士团，其人数从1885年的11万人猛增到1886年的72万人。这是骑士团的鼎盛时期。

骑士团的迅速发展，使之更加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境地。这种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骑士团下层要求改变原有政策和组织形式的离心倾向加强；二是以行业为基础的全国性工会兴起，吸

---

① J.N. 格罗勃：《工人与乌托邦》，奎德兰吉尔1960年，第38页。

② 祖波克：《美国史纲》，三联书店中译本，1972年上册，第148页。

引着骑士团下层群众。骑士团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两种冲突，尤其是骑士团与行业工会的冲突更为严重。骑士团旨在以合作制来取代雇佣劳动制；而工会则把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工作条件作为斗争目标。尽管这种宗旨都未脱离改良主义轨道，但工会注重实际经济利益的改良主义，比骑士团的乌托邦式合作运动更具有吸引力。在不同宗旨之下，二者的组织形式也截然不同。骑士团的主体组织是按地域、由不同行业组成的混合大会，并主要服务于政治目的。而行业工会却有利于工人的罢工斗争和集体谈判，更适合于当时工人运动的直接需要。骑士团的基层组织有许多是行业性的，容易接受行业工会的组织形式。于是，骑士团的内部分歧就同骑士团与各行业工会争夺工人群众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了。

1881 年，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的行业与劳工联合会成立。其代表有 59 名来自骑士团，占代表的半数以上。这对骑士团本身发展构成了威胁。为了防止下层会员脱离，骑士团在 1882 年作出决议，鼓励下层组织建立全国性行业工会。这就与其他行业工会发生激烈冲突。1883 年至 1885 年，砌砖与石工、印刷、司机、铅管、制鞋、雪茄等行业工会纷纷与骑士团发生纠纷。到 1886 年，几乎所有的行业工会都指责骑士团领导集团。这场冲突最后导致了骑士团与各工会分道扬镳。由雪茄工会发起，各全国性行业工会联合组成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终于取代劳动骑士团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人组织。骑士团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

〔1886 年“五一”罢工和“秣市惨案”〕　80 年代中叶，美国工业革命进入最后的完成阶段。工厂制不仅在东北部，而且在中西部大湖区基本上确立。美国工人阶级不仅在人数上大大增加，而且其稳定性也大为增强。如恩格斯在 1887 年所指出的：

美国已经存在“一个新的、特殊的阶级，……即无产者的阶级。”[①] 这个阶级开始抛弃旧的乌托邦改良主义，转向同资本家直接对抗的经济斗争，并由此形成日益强烈的阶级意识。因此，美国工人运动在80年代迅速高涨。仅在1886年至1890年，共发生罢工6,000余起，参加的工人达200万以上。[②] 这次工人运动高潮的突出标志就是1886年“五一”大罢工为起点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

自从劳动骑士团的合作运动受挫以后，新兴的行业工会就把八小时工作日作为主要目标提出来了。1884年至1885年，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的行业与劳工联合会两次通过决议，规定在1886年5月1日在全国同时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经联合会的积极组织，全国有35万工人参加了这次总罢工。他们上街示威游行，要求实现八小时工作日。芝加哥是这次罢工斗争的中心，有4万多工人参加了罢工，还有45,000多工人虽未参加罢工，但自行缩短了工作日。整个罢工涉及到11,000多家企业，极大地震动了美国社会。由于劳动骑士团领导拒绝支持这场罢工，八小时工作日运动未能得到预期结果。但仍有18万工人实现了八小时工作日；20多万工人的工作日缩短到十小时和九小时。[③]

在这场运动影响下发生的芝加哥“秣市惨案”，是这时期美国工人运动的又一重大事件。1886年5月初，芝加哥麦考密克收割机工厂关闭，1,000多工人被解雇。工人们被迫举行罢工。5月3日，工人与工贼发生冲突，警察前来干预，当场打死4名工人，伤亡多人。翌晚，3,000名工人集会于秣市，工人领袖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84页。

② 沙伊贝等：前引书，第163页。

③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103—104页。

古斯特·斯皮斯发表演说，抗议警察的暴行。集会临结束时，180名警察赶到会场。斯皮斯正与警方交涉，突然有人向警察投掷炸弹，警察死亡一人，受伤若干。芝加哥警察局立即以“炸弹案”为由逮捕斯皮斯等8名工人领袖。芝加哥和各地民主人士纷纷签名营救，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也集会声援芝加哥被捕工人。但伊利诺伊州政府竟断然将斯皮斯等4人处以死刑。斯皮斯等人在绞架上高呼：“让全世界人民听到美国人民的声音吧！”4名英雄牺牲后，有几万人送葬，这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崇高敬意。

“五一”大罢工及“秣市惨案”迅速提高了美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极大地锻炼了美国工人的战斗力。同时，五月事件也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凶残本质。他们不仅杀害了工人领袖，而且采用各种手段反攻倒算，取消八小时工作制，实行恐怖统治。恩格斯在1886年6月3日就指出：“地球上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天堂正在迅速变成涤罪所，而只有刚成长起来的美国无产阶级的迅速发展，才有可能使它不致像欧洲那样变为地狱。”①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通过决议，正式规定每年五月一日为国际劳动节。从此，国际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共同节日。

〔纽约市竞选和亨利·乔治〕　在展开大规模经济斗争的同时，美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也发展起来了。1886年纽约市长选举运动就表现出工人的政治力量。这场政治斗争起因于1883年至1886年纽约市中央劳工联合会多次展开的联合抵制雇主的斗争。这种抵制斗争不久就发展为工会同法院的政治斗争。为了保证工人在政治上的权利和地位，1886年8月，纽约各个劳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482页。

团体在中央劳工联合会的发起下，决定在即将到来的市长竞选中，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即组成“独立劳工党”，提名亨利·乔治为市长候选人，并由乔治本人制定竞选纲领。

亨利·乔治是个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在1879年发表的《进步与贫困》，提出了单一土地税理论。他认为，社会上贫富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者被剥夺了土地，在于土地垄断和地租。要清除贫困，必须实行土地国有化，对私有土地征收单一累进税，并逐渐消灭土地垄断现象。在乔治的竞选纲领中，除了一项有关司法程序的改革条款外，其他内容都是主张单一税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亨利·乔治的理论有过深刻的论述。马克思认为，亨利·乔治的书“是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的尝试”。[①] 他“在理论方面是非常落后的，他根本不懂得剩余价值的本质。”[②] 恩格斯明确区分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乔治改良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认为，前者是“实行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全面的变革”；后者是“把现在的社会生产方式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仅仅把土地的分配调整一下”。[③] 经典作家对乔治理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改良主义思潮。

尽管亨利·乔治所散布的是一种幻想，但他对美国现存秩序的尖锐批判和对工人处境的深刻同情，仍然博得了纽约各工会以至鲍德利、塞缪尔·冈珀斯等人的支持，有数以万计的工人阅读了《进步与贫困》。但是，由于“独立劳工党”缺乏竞选经验，民主党的坦慕尼厅又广泛使用贿赂手段，结果民主党候选人休伊特以9万多张选票当选为市长。亨利·乔治得到68,000张选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1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191—1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0页。

仍超过了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①] 乔治虽然落选了，但这次选举表现出纽约工人阶级敢于同两大党抗争的觉悟与实力。慑于工人参与政治的威力，纽约市立法机构匆匆通过了一系列劳工立法，对劳资关系稍作修补和调整。纽约市工人参与政党斗争的经验，促使其他重要城市在1886年底组成了新的工人政党，芝加哥、米尔沃基工人都参加了竞选运动。总的看来，1886年选举反映了美国工人阶级的不成熟性，他们还难以摆脱资产阶级民主和改良主义的深刻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尚未出现。

1886年作为美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转折点载入了史册。旧的乌托邦式的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开始被产业无产阶级争取政治、经济地位和权利的直接斗争所代替。工人运动的范围从东北部扩展到中西部，工人的组织程度更高了。恩格斯评论说：在1886年，“美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在任何其他国家至少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变革。”[②]

第二节　劳联的蜕变与90年代工人运动的高涨

〔劳联的建立及其初期的政策〕　80年代美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淘汰了旧的劳动骑士团的纲领和组织形式。实践要求有一种更高形式的全国性工会组织。1886年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

劳联的前身是1881年组成的“美国及加拿大有组织的各行业及工会联合会”。1886年12月28日，劳工联合会在俄亥俄州

①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1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5页。

的哥伦布城正式成立。有25个工人组织、12个全国性工会的42名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代表着约15万名工会会员。[①] 大会通过的劳联章程明确指出："整个文明世界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所有国家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如果工人不联合起来以求得保护和利益，千百万劳动者就会陷入极端悲惨的境地。"[②] 基于这种认识，劳联的宗旨就是积极建立从地方到全国，以至国际性的行业工会，"以便互相援助，并争取通过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全国性立法"[③]。劳联的上述指导思想比劳动骑士团的合作社理论前进了一步，即把目标集中于直接经济斗争以改善工人地位。

在组织原则方面，劳联与骑士团有两个重大区别。一是会员必须是支持工会的雇佣劳动者，这使劳联成为纯粹的工会组织，不像骑士团那样成份繁杂。二是劳联不是按产业原则、而是按狭隘的行业原则建立的，这造成若干个行业工会并存于一个企业，难以统一行动。劳联组织的这两个特点说明它具有新旧交替的两重性。一方面表现出雇佣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熟练技工维护其既得利益的保守意识。这种两重性影响到劳联后来的发展趋势。

在劳联成立大会上，塞缪尔·冈珀斯被选为执委会主席。冈珀斯1850年生于伦敦的一个卷烟工人家庭，10岁开始当学徒，故较早受到英国工联主义思潮熏陶。1863年移居美国，不久加入纽约市雪茄工人工会。1875年当选为雪茄工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主席。1877年罢工失败后，冈珀斯开始改组工会。他加强

---

① F.R. 杜勒斯：《美国劳工史》，纽约1955年，第161页。
② F. 塔夫脱：《冈珀斯时代的劳联》，纽约1957年，第61页。
③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142页。

了上层工会对基层组织的管辖权，健全了会费制和储备基金制度，使会员在遇到不测和参加罢工时有一定的保证。这些措施稳固了工会组织，使雪茄工会成为劳联的核心组织之一。1881 年，冈珀斯又当选为美—加行业与劳工联合会的组织委员会主席，在更大范围内推行了雪茄工会的经验。冈珀斯的组织才能使他在各工会中赢得较高威信，因此，从 1886 年起，除了 1895 年以外，冈珀斯终生担任劳联主席职务，一直到 1924 年去世。

劳联在取代骑士团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以后，采取了一些促进工人斗争的政策。1888 年末，劳联决定重新开展八小时工作日运动。1889 年，在冈珀斯的建议下，木工工会首先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翌年 5 月 1 日，许多工会以游行、募捐的方式支持木工斗争。结果是 137 个城市的 4 万多名木工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近 3 万名工人的工作日减到了 9 小时。

在对待黑人加入工会的问题上，劳联自始就存在着两重倾向。起初，劳联否定了完全排斥黑人入会的做法。例如，1890 年，劳联拒绝对实行种族歧视的机械工会发给执照，另建承认黑白工人平等的新机械工会。在 1893 年锅炉、造船工会加入劳联时，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同时，劳联对黑人实行了单独组织黑人工会的做法，使黑人不能得到白人工会的有力支持。这又表现出劳联的种族歧视倾向。

从开始起，劳联政策中的根本错误就是反对进行政治斗争，拒绝建立工人政党，对社会主义运动持敌视态度。劳联内部的社会主义者曾同这种政策展开斗争。在 1893 年的芝加哥大会上，托马斯·摩根提出著名的“十一点政治纲领”，其核心是“全部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归全民集体所有。”当时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这项纲领。但是冈珀斯为首的劳联上层决心抵制这个纲领，并认

为这个纲领关系到劳联的前途。[1] 1894 年底，冈珀斯等密谋策划，将“政治纲领”实际上加以否决。1895 年劳联的决议宣称：“美国劳工联合会没有政治纲领。”[2] 劳联彻底地抛弃政治纲领，使其从一般的改良主义开始转向机会主义。

劳联初期政策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致力于改善工人的经济状况，通过经济斗争来团结和教育工人，并形成较有力的全国性工会组织。但是，劳联排斥占大多数的非熟练工人，使美国工人阶级队伍陷入分裂。它崇尚经济斗争而拒绝政治斗争，使之停留在自发阶段，成为一个新工联主义的组织。劳联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制度，对社会主义抱有顽固的敌视态度，严重阻碍了美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冈珀斯声称：“除了增加每一美分的工资外，其他的目的是没有的。”劳联政策的局限性必然导致其后期的完全蜕变。

〔排斥非熟练工人的政策〕　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劳联不断加强其排斥非熟练工人的政策。首先，劳联在 1894 年至 1896 年先后接纳了拒绝黑人入会的机械、锅炉、造船等工会。至 1900 年，劳联章程也作了重大修改，公开规定组成单独的有色人种工会，然后再发给劳联执照。冈珀斯宣称，将黑人与白人工人隔离，对整个工人运动都是最合适的，可以避免“引起不愉快。”[3] 至此，劳联把种族歧视作为一种政策固定下来。在劳联上层的怂恿下，许多劳联基层负责人公开宣扬白人沙文主义。他们污蔑黑人“粗笨”，是“天生的罢工破坏者”，因而“完全不适合加入工会。”[4] 一些工会甚至同雇主们达成秘密协定，在许多

---

① 格罗勃：前引书，第 178 页。
② 塔夫脱：前引书，第 73 页。
③ 方纳：前引书，第 2 卷，第 455 页。
④ 方纳：前引书，第 2 卷，第 463 页。

工种上都写明“只雇白人”。据不完全统计，几乎所有的技术工种，如电气、煤气、管道安装、各种司机、起重与升降机驾驶员、机械工等几十种熟练和半熟练工种完全排斥了黑人。即使在同样工种内，黑人的工作时间更长而工资更低。可见，劳联的种族歧视政策直接加强了资本家对黑人的压迫。

劳联对移民工人、女工的排斥也是触目惊心的。移民工人大部分是非熟练工人，劳联对他们同样采取排斥、敌视的政策。劳联上层借口“新移民”不能适应工会组织，容易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等，制定了一系列阻碍移民工人加入工会的措施。例如要求移民工人必须具有美国公民身份、交纳100至500美元的入会费、经全国工会领导人批准、接受文化测验等。劳联甚至与国会、联邦移民局合伙使用立法和行政手段歧视移民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工人很少有机会成为熟练工人。据统计，在1903年的全部移民中，只有14.5%成为熟练工人。① 劳联对女工也采取了许多苛刻条件，使她们极难加入工会。女工们由于缺乏工会保护和集体斗争的力量，其工资水平要比男工少1/4至1/2。在1900年，全国受雇用的女工达500万人，她们的低廉工资为雇主们带来了超额利润。②

大机器工业使各工种更紧密地联结起来，行业工会在大企业中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人斗争的新的需要。劳联上层却坚持行业工会的形式，由此造成各行业工会之间频频发生管辖权之争。对这些争端，劳联多次裁决“所有工会会员都应属于各自的行业工会。”③ 劳联将这种陈旧的组织形式一直保持到20世纪30年代，

---

①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467页。

②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473—474页。

③ 塔夫脱：前引书，第187—188页。

顽固地抵制产业工会的发展，其实质是为了保持熟练工人的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大部分工人被排斥在工会之外，到1900年，美国有组织的工人仅79万，占全部劳动力的2.7%。[①] 可见，劳联排斥非熟练工人的政策是美国工人运动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

劳联的这种政策大大加强了熟练工人"贵族化"的趋向。在90年代，美国熟练工人约占全部劳动力的12%至14%，他们的工资水平比非熟练工人高出一倍以上。[②] 而有组织的熟练工人不足全部劳动力的3%，其工资水平更是大大高于其他97%的工人。至于劳联上层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已资产阶级化了，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贵族。劳联的政策压低了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条件和工资水平，使垄断资本能够从源源不断的高额利润中拿出极小部分来满足这些工人贵族的私利。作为交换条件，劳联则使非熟练工人处于无组织的状态。劳联蜕变为典型的工人贵族组织，对20世纪美国工人运动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是向垄断过渡时期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

〔*劳联的阶级合作政策*〕　劳联蜕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行劳资合作、为垄断资本辩护的政策。早在1883年，冈珀斯等人就公开赞成雇佣劳动制，认为"雇主有权得到一份利润。"[③] 因此，"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敌视是毫无必要的。"[④] 进入90年代以后，劳联领导人不仅对当时席卷美国的反托拉斯运动十分冷漠，而且公开站出来为托拉斯辩护。当时劳联内部的左

---

① 李和帕塞尔：前引书，第342页。

② 《美国历史统计》，第168页。

③ H.C.利夫赛：《冈珀斯与美国有组织的劳工》，波士顿1978年，第125—126页。

④ 卡尔·戴格勒：《形成现代美国的诸力量》，纽约1970年，第267页。

派代表们已提出：随着托拉斯迅速兴起，工会必须采取新的政策，否则劳工运动就会受挫，甚至出现连续几十年的低潮。[①] 劳联上层对这些强烈呼吁无动于衷，认为是杞人忧天，并坚决反对在垄断企业中发展工会组织的主张。他们认为托拉斯并未危及熟练工人利益，组织大型工会，只会引起激烈的阶级对抗。这样，劳联领导坐失了一个使美国工人运动得到广泛发展的良机。

垄断资本十分重视寻求劳联上层的好感和支持，希望由他们出面来说明托拉斯对工人的好处。冈珀斯等人则甘愿效劳。在1899年芝加哥公民联合会举办的州际托拉斯会议上，冈珀斯和服装工会总书记亨利·怀特一致认为，只有公司数目受到限制并消灭竞争，才能保证高额利润；资本家也才能付出高额工资。因此，工人与托拉斯并无争执，他们只要求“分享利润”。[②] 他们的观点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的热烈赞扬，他们一再被邀请向全国各地的企业组织发表演说。而劳联的基层组织和下层会员对此却异常愤慨。他们称冈珀斯等人是“劳工运动的寄生虫和叛徒”、“托拉斯的工具。”[③] 冈珀斯等人对工人们的抗议不屑一顾。他们继续施加影响，阻止劳联加入广泛发展的反托拉斯运动，并警告其下属组织不得用劳联名义发表任何反托拉斯的声明。

在人民党运动和普尔曼罢工中，劳联的阶级合作政策表现得尤为突出。从1890年开始，劳联就抵制人民党运动。他们声称人民党是“富裕农场主的党”，实际上是坚持不参与任何政治斗争的立场。人民党在其纲领和实践中都支持工会运动，劳联基层组织也认为应与之联合行动，但冈珀斯依然拒绝与人民党结成任

---

①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479—481页。
②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487—488页。
③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490页。

何同盟。直到1896年选举，劳联还作出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支持工人的独立政治行动。对此，当时著名作家亨利·劳埃德发表评论，指出劳联领袖们的作用是“保证工会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起带头羊的作用，以防止工人群众脱离控制。”[①] 这些评论是一针见血的。

对于1894年普尔曼罢工，劳联一直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当芝加哥铁路工人浴血搏斗，迫切需要全国工人声援时，劳联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到铁路工人精疲力尽时，冈珀斯才前往芝加哥去“仲裁”，假惺惺地提出由劳联捐赠1,000美元，资助罢工领袖德布斯作为诉讼费用。罢工失败后极为困厄的铁路工会会员们仍未得到劳联的分文相助。劳联之所以采取如此冷酷的做法，是因为德布斯领导的铁路工会是个产业工会，它与劳联所属的铁路兄弟会处于竞争地位。趁罢工之机来削弱铁路工会，也就消除了对劳联行业工会原则的现实威胁。冈珀斯本人也承认，他在这次罢工中的方针就是尽最大努力以维护铁路兄弟会的完整。[②]

1900年10月，垄断资产阶级决定召开“全国公民联合会”，参加者主要是大企业家、保守的舆论界人士和以劳联为代表的劳工领袖。会议主持者拉尔夫·伊斯利在给冈珀斯的信中，申明会议的宗旨是在互谅的基础上，调整劳资关系。冈珀斯为首的29名劳联代表出席了会议。有名的“总统制造者”马克·汉纳担任联合会主席，冈珀斯则是第一副主席。在会议中，伊斯利和冈珀斯经过一夜密谈，达成了劳资合作的默契和妥协：劳联拒不过问政治并力图使工会具有保守色彩；而企业界的让步则是允许在大

---

①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444页。

② 塞缪尔·冈珀斯：《七十年生活与劳工》，纽约1962年，第1卷，第414页。

公司内组织工会。[1] 从此，阶级合作成为劳联的基本方针。

〔劳联蜕变的社会根源〕　劳联的蜕变是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由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诸因素中，美国工人阶级的特殊构成尤应注意。同时，工厂制的确立、垄断资本形成、资产阶级对劳工政策的转变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潮变化都起了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劳联形成、发展于美国工业革命的最后完成时期，同时又是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工人阶级构成、尤其是熟练工人的地位产生极大影响。一方面，大批旧的熟练工人即手工工匠或半手工技工被大机器生产所淘汰，开始沦为半熟练工人或非熟练工人；另有一部分熟练工人则适应了大机器生产，进入了新的技术部门和工种而转变为新熟练工人。新熟练工人为了避免重蹈旧熟练工人的覆辙，就以工种、行业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保护自己利益的行业工会。因此，作为这些行业工会的集合体，劳联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另一方面，迅速发展的美国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它同19世纪末涌入美国的移民高潮相结合，形成了美国工人阶级的一个新阶层。在19世纪7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为300万人；80年代为550万人；90年代为400万人。[2] 30年内共进入移民1,250万人。“新移民”进入机器生产的大企业，成为非熟练工人的主体。资本家以比本地工人低得多的工资雇佣这批移民工人，使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产生了利益差异。原来就以保持熟练工人地位为宗旨的劳联，力图扩大这种差异。因此在组织

①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499—500页。

② 《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华盛顿1902年，第19卷，第957—961页。

形式上加强了排斥非熟练工人的措施，使非熟练工人尽可能处于无组织状态。于是，劳联从保护既得利益出发，转向了同资本家一起排挤非熟练工人的轨道。

同时，以“老移民”为主的熟练工人大多是盎格鲁—新教—白种人，他们把“新移民”和黑人看作是一种异己力量。原有的经济利益摩擦又同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冲突纠缠在一起，使美国工人运动更加难以统一。劳联的政策恰恰与美国资产阶级对工人“分而治之”的策略相吻合，实际上成为维护美国资本主义秩序的卫道者。劳联政策阻碍了美国工人运动向广度发展，致使大多数工人被排斥在外；亦难以向深度发展，使工会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互相分离，无法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

劳联的蜕变是美国工人贵族阶层形成的直接表现。劳联所代表的熟练工人，不足美国工人总数的10%，而他们的工资水平却是非熟练工人的几倍。至于劳联的上层，通过高额会费制度和垄断资本给予他们的优惠待遇，其收入又是普通熟练工人的几十倍，从而形成了一小部分高踞工人之上的工会官僚。加上一批被资本家收买了的监工、工头和工贼，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这个阶层从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都资产阶级化了。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同垄断资本分享高额利润中的极小部分，因而把保存垄断资本主义视为自己的护身符。

劳联上层不仅阻止工人同资本家发生真正的对抗，而且在政治上麻痹工人群众，起到了两大党所不能起的作用。冈珀斯的著名口号就是：“酬报你的朋友，惩罚你的敌人。”无论两大党中哪一个，只要接受劳联所提出的某些经济要求，劳联就尽力为这个大党拉选票；反之，则在选举中加以报复。冈珀斯自认为这证明了劳联的力量，两大党中哪一个都离不开它。这实际上恰恰是使劳联堕落为两大党的附庸，从而使第三党，不论是改良主义的人

民党还是社会主义劳工党，都难以形成强大的抗衡力量。劳联对美国扩张主义政策也热烈支持，说明它在内外政策上都追随资产阶级。它受到白宫和华尔街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曾经叫嚷要对罢工"像镇压巴黎公社那样进行镇压"、"把他们的十来个领袖弄到墙前枪毙"的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年入主白宫以后，对冈珀斯大为赞赏，称他为"最好的公民"，两人结为盟友。①冈珀斯在全国公民联合会中的所作所为，更是博得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片掌声。

总之，美国工人阶级的特殊构成，是劳联蜕变的重要前提；这种构成又同19世纪末特定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导致劳联蜕变。这证明了帝国主义阶段的一个共同趋向，即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有可能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②

〔90年代工人运动的高涨〕　　工人运动并不因为劳联的阻挠而停止下来。进入90年代后，美国工人又发动了一系列重大的罢工斗争。这些罢工同1893年危机相结合，表现出向垄断过渡的最后时刻社会阶级斗争空前激烈。其中最有意义的是1892年霍姆斯特德钢铁工人罢工和1894年普尔曼铁路大罢工。

霍姆斯特德钢厂属卡内基钢铁公司。厂内熟练工人大部分属于钢铁工人混合协会，他们曾取得为期3年的工资协定。到1892年协定期满。厂方决定借机打击工会，削减了325名熟练工人的工资。到6月30日，厂方解雇工人，并招来300名平克顿③密探"保护工厂"。工人们决定以罢工回答资本家的挑战。熟练工

① 亨利·普林格尔：《西奥多·罗斯福》，纽约1938年，第124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22页。

③ 私人侦探组织。全名为平克顿全国侦探署。由艾伦·平克顿于1850年建立。19世纪后叶，在中西部专以协助资本家破坏罢工而著称。

人与非熟练工人摒弃成见，联合起来保卫共同利益。7 月 6 日晨，工人们与平克顿密探展开激战，把他们逐出霍姆斯特德，钢铁工会控制了整个城市。卡内基公司只得向宾夕法尼亚州长紧急求援。州长派出8,000 名国民警卫队，将1,000 名外地工人护送进厂。罢工工人仍然不屈，同厂方进行了长达 4 个月的法庭诉讼。工人虽然胜诉，但经济上消耗过重，元气大伤，至 11 月 20 日被迫复工。这次罢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大机器生产发展，使熟练工人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削弱，资本家能够随时雇用大批非熟练工人来恢复生产。这也暴露出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存在着致命弱点。罢工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劳联领导人的变节。他们在罢工斗争的关键时刻，拒绝在其他工业部门中组织工人声援，使霍姆斯特德地区罢工工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次罢工失败，不仅结束了该厂的工会活动，而且导致钢铁工人混合协会全面衰落。到 1901 年，钢铁业工人共有 16 万，但工会会员不足 1 万。①

在 1892 年，还爆发了另外三次较大的罢工斗争，即爱达荷州的科达伦银矿罢工、纽约州布法罗铁路扳道工罢工和田纳西州东部煤矿矿工反对囚犯劳动制度的斗争。这些工人斗争都在联邦军队和州民兵的镇压下失败了。一系列失败表明，资本家越来越依赖政府的暴力机器，对工人阶级进行残酷镇压，整个力量对比对工人阶级日益不利。

1893 年危机爆发使劳资冲突进一步激化。工人阶级在这次危机中遭到极沉重打击。到 1893 年底，119 个城市中的失业工人

---

① 路易斯·L. 罗文：《美国劳联的历史：政策和前景》，华盛顿 1933 年，第 63 页。

已达300万。[1] 大批失业工人形成一支新的抗议力量。他们纷纷自发地徒步行进到首都华盛顿进行请愿，其中以雅各布·柯克西率领的"饥饿大军"最为著名。柯克西本人是俄亥俄州的一个制造商。危机期间，他提出一项改革计划，以增加绿背纸币发行量为资本，举办公共工程来安置失业工人。这项计划比以往的国家干预政策更前进了一步，即要求国家直接组织劳动力市场，并将此同对生产、金融的干预结合起来。极端保守的克利夫兰政府对此毫不理睬。于是，柯克西在1894年春，率领500多名失业工人从俄亥俄州的马西隆出发向首都华盛顿进军。5月1日，"饥饿大军"进入华盛顿举行请愿。警察借口队伍进入国会大厦地带，强行驱散了请愿队伍，并扣押了柯克西本人。"柯克西进军"失败了。他的改革计划在当时也未免失之于天真，但是这种改革思想却是后来30年代"新政"中"以工代赈"的最初萌芽。

普尔曼罢工是90年代工人斗争的高潮。危机爆发后，普尔曼公司削减了工人工资的22%，但房租及其他费用丝毫不减。工人们不堪忍受，与公司进行交涉，遭到拒绝。于是在1894年5月11日，普尔曼工人全体罢工。普尔曼工人大都属于尤金·德布斯领导的铁路工会，该工会按产业原则建立，当时已有15万人。铁路工会立即对普尔曼工人进行声援。6月26日，西部各铁路线6万名工人参加罢工，整个西部运输陷入瘫痪。联合抵制很快就扩展到南部和东部。各铁路公司也决定以联合行动来压制罢工工人。拥有全国24条干线，资本达8亿多美元的铁路经理联合总会决心支持普尔曼公司，以此来消除德布斯为首的铁路工会的威胁。[2] 联邦司法部长理查德·奥尔尼本人就是几条铁路的董事，

---

①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235页。

② R.O.博耶等：前引书，第126页。

他坚决站在经理联合总会一边，用“一切合法手段”来粉碎罢工。奥尔尼罗织了所谓“罢工是阴谋限制贸易”的罪名，企图援引反托拉斯法的有关条例对罢工领袖提出起诉。7月初，芝加哥的联邦地区法院颁布禁令，禁止任何人“干涉”芝加哥各铁路线的一切业务。这项禁令遭到罢工工人的有力抵制。该法院只得请求克利夫兰政府派遣联邦军队前往弹压。7月4日，联邦军队进入芝加哥，当地政府又派遣了2,600名法警和5,000名州民兵协助弹压。由铁路公司承担这些军警的全部费用。大批工人愤怒地聚集在车场和轨道上，烧毁货车和货物，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局势极为混乱。联邦军队不断增加，最多时达14,000人。而在罢工工人方面，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声援。劳联领导拒绝了德布斯的求援呼吁，认为同联邦军队进行斗争是没有前途的，应停止罢工。形势对工人极为不利。德布斯等工人领袖被捕，工人及家属贫困难忍，铁路工会日趋瓦解，这次罢工终于失败了。

1894年普尔曼罢工显示了美国铁路工人的伟大力量，它震撼了刚刚确立的美国垄断资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次罢工揭示了无产阶级同垄断资产阶级在整体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联邦和州政府在这种斗争中不惜一切代价、动用各种手段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劳联上层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则充分暴露出为垄断资本效劳的本来面目。90年代美国工人运动在规模上大大超过了80年代，但是工会组织的形式基本上停留在80年代，少数产业工会也在这次斗争中严重受挫。美国工人运动终于未能在90年代危机中进入新的阶段，而在危机以后则陷入了长期消沉之中。

〔资产阶级改良政策及其作用〕　面对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资产阶级内部一些较有远见的代表人物意识到，单纯依靠镇压是无济于事的，需要辅之以调和政策。早在1878年，国会调

查罢工的专门委员会主席、制铁业巨商艾布拉姆·休伊特就指出："一股新的势力已经进人工商界，我们必须承认这股势力……资本已做好了同劳工讨论问题的准备。"① 8年后，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写道："迟早必须承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因为"工会对劳动与资本都是有利的。"因此，劳资关系"必须重新作出某些调整。"② 某些垄断资本家认为，"秣市惨案"只是劳资双方一系列冲突的开端。③ 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马克·汉纳甚至疾呼："必须改变传统政策，否则工人将把我们送上绞架！"所有这些说明，改变单纯镇压的做法已势在必行。而且，英国等欧洲国家所实行的改良政策已起作用，为美国资产阶级提供了借鉴。

从70年代开始，有关劳工的改良立法逐渐从各州向联邦政府扩展。在1874年，马萨诸塞州就订立了缩短女工童工工时的立法。纽约州在80年代也实行了厂房安全法。从1886年至1900年，除南部以外，各州相继推行各种劳工立法，其中包括工业纠纷仲裁法、童工法、女工法、安全工厂法、事故责任法及工时法等。联邦政府为了及时地处理劳资冲突，在1884年建立了劳工局，作为调查和仲裁劳工问题的一个部。为了防止各地罢工影响到联邦政府本身，在1892年实行了联邦雇员的八小时工作日。1898年国会又通过立法，规定州际运输中劳资冲突由联邦仲裁。上述改良立法虽属扬汤止沸之举，但它们毕竟是工人斗争的成果，相对改善了工人的处境；也为20世纪社会改良提供了经验。

---

① A.C.柯克兰：《工业成熟，1860—1897年的企业、劳工及政府政策》，纽约1961年，第397页。

② 丹尼尔·纳尔逊：《经理与工人，1880—1920年美国新工厂制度的起源》，威斯康辛1980年，第51—52页。

③ 莫里森、康马杰：前引书，第2卷，第169页。

同时表明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采用各种手段来保持平衡了。

资产阶级改良政策不仅通过立法来体现，还表现在垄断资本家直接拉拢和收买工会领导人和熟练工人上层，竭力培养工人贵族。如前所述，1900 年全国公民联合会上资产阶级与工会代表达成默契。垄断资本家承认熟练工人的工会，在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诸方面作出让步；而劳联领导人则同意不在大企业中“制造事端”，不反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控制，不从事独立的政治活动。垄断资产阶级政策变化和劳联的蜕变同时发生，说明向垄断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①

垄断资产阶级政策变化的另一个深刻的原因，在于这种政策也适应了大资本在竞争中排挤中小资本的需要。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必然增加生产中的劳动成本，这对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中小资本当然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在新兴的重工业部门占据优势的垄断资本把阶级调和政策当成打击中小企业的一种手段，从而加速了垄断确立的进程。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些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和消灭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一种手段。”因此，“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②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正确地揭示了垄断资产阶级改良政策的深刻根源和多重影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73—274 页。

第三节　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

〔*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初发展*〕　早在19世纪50年代，约瑟夫·魏德迈等人从德国移居美国，为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主要是在弗里德里克·阿·左尔格等人建立第一国际支部以后。1867年，左尔格写信给马克思，表示要建立第一国际美国支部的愿望，得到了马克思的支持。同年10月，左尔格领导的共产主义俱乐部成为第一国际在美国的第一个组织。翌年，共产主义俱乐部又同德籍工人总会合并，成立纽约社会党，但该党存在仅数月就解散了。[①] 1869年，第一国际在美国的3个支部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第一国际北美临时中央委员会，左尔格当选为通讯书记。从此，第一国际北美支部进入了发展时期。

1872年7月6日，北美支部在纽约举行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下属22个支部，近2,000名会员。[②] 其章程规定，每个支部内雇佣工人比例必须达到3/4以上，应积极支持工会活动。[③] 这种正确的政策使北美联合会得到稳步发展。至1873年，东北部和中西部的主要工业城市都已建立起第一国际的支部。但北美联合会在组织上有严重缺陷。一是主要骨干大多是德籍移民，存在着浓厚的宗派倾向。二是各种中产阶级改良派纷纷加入其中，削弱了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两个缺陷对后来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有很大的消极作用。

---

① H. 奎特：《美国社会主义的形成》，印第安纳波利斯1964年，第9页。
② 巴赫等著：《第一国际》，三联书店1981年中译本，第2卷，第510页。
③ 尤·切斯克洛夫：《第一国际》，三联书店1974年中译本，第280—281页。

187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第一国际北美联合会实际上成为失业工人运动的组织核心。它发动和领导了1874年1月13日的纽约汤普金斯广场示威游行。这次斗争在警察突袭下失败了，仍显示了第一国际各支部在美国工人阶级中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同时，第一国际还努力同全国劳工同盟加强联系。但是，劳工同盟一方面表示“坚持国际工人协会的诸原则”；另一方面，却否决了加入第一国际的决议案。[①] 直至劳工同盟趋于瓦解，仍未真正接受第一国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

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共存在了近十年。尽管它没有获得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它对社会主义传播仍起了重要作用，并增强了美国工人阶级与欧洲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到1876年，第一国际由于历史条件变化而宣布解散，北美支部的大部分成员亦转入了美国工人党即后来的社会主义劳工党。

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拉萨尔派妥协的产物。70年代以后，随着外籍移民大量增多，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拉萨尔主义也渗透到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之中。拉萨尔从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出发，否定工会组织和经济斗争；主张在国家帮助下建立合作社，依靠政治选票来取得解放。70年代危机期间，拉萨尔观点泛滥一时。当时建立的伊利诺伊劳工党和北美社会民主工人党都以拉萨尔观点为其行动纲领，但在1874年选举中均告失败。以此为契机，第一国际美国支部与伊利诺伊劳工党开始走向联合，并在1875年拟定了把社会主义组织联合为统一政党的计划。1876年7月，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连续召开两次会议，完成了建立统一政党的准备工作，并

---

① A.C.约翰逊：《俄国革命前美国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纽约1974年，第40页。

于7月22日正式成立了美国工人党，代表着约3,000名美国社会主义者。在左尔格、魏德迈等人影响下，其党纲采取了第一国际的工会政策，决定首先致力于改善工人状况的经济斗争。但是，设在芝加哥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则被拉萨尔派所控制。美国工人党内部从开始就存在着对立的政策和观点之间的斗争。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思潮斗争〕　70年代末以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思潮斗争日趋剧烈。同拉萨尔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使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曲折的发展趋势。

美国工人党建立以后，拉萨尔派的控制力量逐渐取得优势。1877年12月，该党改名为社会主义劳工党。拉萨尔派的帕尔顿当选为全国书记。原来的党章被修改，党的指导原则变成了拉萨尔派的信条："科学是兵工厂，理性是武器，选票是弹药。"在1878年选举中，该党一度获得较多选票。但是1879年经济转向繁荣，劳工党的选票迅速下降。党员人数也从10,000人减到2,600余人。[①] 由于党的力量迅速削弱，一些领袖人物开始对政治行动感到失望。其中一派向右转向完全脱离政治的单纯工联主义；另一派则主张放弃选举，放弃工会组织和经济斗争，而代之以工人的武装行动。这部分极端派就成为美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开端。

美国无政府主义同样具有国际背景。许多来到美国的移民都曾受到过本国政府的迫害。例如来自德国的移民曾受到1878年俾斯麦"非常法"的迫害；来自俄国和意大利的移民亦遭本国政府的镇压。这些移民往往带有绝望的情绪，把诉诸暴力和恐怖手段作为惟一的斗争手段，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美国的社会基础。

---

① 卡尔·里夫：《丹尼尔·德里昂的生平及其时代》，纽约1972年，第35页。

早在1875年，芝加哥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就成立了一个武装团体以抵抗警察镇压。1877年铁路罢工中，社会主义劳工党的许多党员也参加了这个运动。不久，劳工党内就武装行动问题发生分歧，并导致1880年的分裂。纽约的少数极端派在1880年脱党并成立社会革命党人俱乐部。这种分裂组织很快向其他城市蔓延。其中以阿尔伯特·帕森斯和奥古斯特·斯皮斯领导的芝加哥俱乐部最为著名。1881年，这些分裂组织在芝加哥成立社会革命党，其纲领声称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工会；谴责参与投票选举；并把武装斗争作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武器。这个分裂组织和极左纲领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混乱。

1882年，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约翰·莫斯特来到美国，旋即成为美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公认领袖。1883年，他们在匹兹堡成立所谓"国际工人协会"。[①] 该协会通过了莫斯特起草的宣言，强调"用一切手段……来摧毁现存的阶级统治"，"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②] 这个分裂组织使社会主义劳工党难以保持其组织的完整。到1883年，劳工党只有1,500名党员了，而无政府主义的"国际"则号称拥有7,000会员。同时，无政府主义者还渗透到一些工会组织中，仅在芝加哥，"国际"控制的工会会员就有5,000名至6,000名。至1885年，其势力盛极一时。然而，1886年的"秣市惨案"使无政府主义大失人心。许多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开始意识到这种思潮的危害。"国际工人协会"开始走向衰落。

由于拉萨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泛滥，社会主义劳工党一直

---

① 该组织的英文全称为International Working People's Association，与第一国际原名：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不同。

②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39页。

未能得到真正的巩固和发展。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党只有一个虚名，因为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它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没有作为一个政党出现。而且它对美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外来的。"①因此，他们"不了解怎样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推动美国人民大众前进的杠杆。"②

〔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会的关系〕　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劳工党尽可能地排除拉萨尔派的干扰，在各工会中积极活动，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劳工党参与了许多行业工会和城市中央工会的建立过程。例如，家具工人协会曾是第一国际支部建立的工会组织。到1884年，该工会仍号召其会员"加入以社会主义劳工党纲领为基础的独立劳工党。"③ 1882年建立的中央工会，其纲领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精神"，并在工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886年，已拥有207个附属工会，共15万会员。这些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同样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

但是社会主义劳工党始终未能深入当时的主要工会组织骑士团和劳联，未能将它们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劳联内部的社会主义者，曾多次提出建立独立工人政党的议案，但屡遭否决。社会主义劳工党与劳联上层的矛盾遂日益激化。在纽约中央工会内部，骑士团与劳工党的支持者也发生分裂。劳联的冈珀斯又插手这场纠纷。于是，劳工党与上述两个主要工会陷入更复杂的冲突纠葛之中。到1889年，冈珀斯断然拒绝深受劳工党影响的纽约中央工会加入劳联。在1890年劳联代表大会上，劳工党的卢西恩·萨尼尔与冈珀斯展开了长时间激烈辩论，结果是萨尼尔被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89—3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纽约1953年，第161—162页。

③ A.C.约翰逊：前引书，第47页。

会取消了代表资格。这次斗争表明劳联采取了与劳工党公开决裂的立场。

劳工党在劳联内受挫，激怒了党内以丹尼尔·德里昂为代表的宗派主义集团。德里昂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法讲师，于1890年加入社会主义劳工党，旋即成为党内领袖。他认为，继续争取劳联已毫无意义。1893年他著文于党的《人民》周刊，号召劳联中的劳工党员退出劳联。他写道："事情已经完全清楚了。……要教育和团结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社会革命一定要踏着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前进……"[①] 德里昂的这些过激言词大大恶化了劳工党与其他工会的关系。德里昂为了推进"社会革命"，又转向争取早已衰落的劳动骑士团。但亦未奏效。到1895年，劳动骑士团亦与劳工党分道扬镳了。在劳工党的下层，仍有一些党员继续在劳联中工作，例如1893年提出劳联"政治纲领"的摩根等人。但他们的主张在劳联和劳工党两方面都得不到支持。劳工党争取工会的努力竟付诸东流。

德里昂面对困难的形势，开始建立社会主义行业与劳工联盟。1895年12月，这个新组织成立，提出"政治和经济运动并进"的原则。但是，在实际中很难实行这个原则。劳工党在1896年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劳联和骑士团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缓冲器"；同时号召全国的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行业与劳工联盟的"革命精神灌输到所有的工人组织中去"。[②] 这项决议意味着劳工党的工会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即开始实行"双重工会"政策。这种政策要求劳工党从劳联组织中退出，放弃对它们的教育和联合，而在各工业部门重新组织与劳联对立的

① 方纳：前引书，第2卷，第369—370页。

② 卡尔·里夫：前引书，第59—60页。

行业与劳工联盟。推行“双重工会”以后，大批中间立场的工人被赶入保守工会的阵营，许多倾向劳工党的工会也纷纷退出了行业与劳工联盟。这个联盟的成员从创立时的15,000人减至1899年的5,00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外国出生的。[①] 这样，劳工党与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和斗争脱节了。它从“左”的方面把自己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成为一个“纯粹的德国宗派”。[②] 与此同时，劳工党的内讧也日益加剧，最后导致完全分裂。其中一派在1901年成立了美国社会党。此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利因素〕　从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美国，到1901年社会党建立，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在此期间，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传播，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然而，科学社会主义未能成为美国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相反，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缓慢，多次分裂；社会主义政党一再失误，以致没有掌握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停滞不前的原因相当复杂。首先，从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因素来看：一方面，德国移民是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传播者，他们带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不会讲英语，脱离广大工人基本群众。同时他们借口美国工会组织的理论水平低，拒绝加入其中，最后堕落为“纯粹的德国宗派”。另一方面，欧洲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大量流入美国。它们在欧洲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批判，而在美国却未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其中以德国的拉萨尔主义、法国的无政府主义和英国的工联主义影响最大。这同前一个因素结合，使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不仅

---

① 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纽约1952年，第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347页。

没有真正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却被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弄得混乱不堪，难以形成无产阶级的战斗核心。

其次，从外部因素来看，美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欧洲有很大的差异。它是一个“从未经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国家。”①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工人的生活条件一般高于当时的欧洲工人。这种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使美国社会难以形成发生革命的客观环境，从而也阻碍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同时，西部自由土地的存在，在较长历史时期内成为防止阶级冲突加剧、形成稳定的阶级意识的“安全阀”。此外，美国民族成分的复杂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美国工人阶级整体意识的发展。本地白人工人多在劳联控制之下，而移民工人多被拒于工会之外，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难以获得适合的土壤。在政治上，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较为完善，使工人能在一定的合法范围内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削弱了组织独立工人政党的自觉性。

再次，美国资产阶级擅长于交替使用镇压与安抚两手策略，阻止工人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在19世纪末，联邦政府多次对工人运动实行残酷镇压，遏制了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许多罢工的领导人和参加者纷纷退出社会主义运动。资产阶级还动用各种舆论机器，把社会主义描绘成“外来的颠覆阴谋”，使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望而生畏。资产阶级软硬兼施的手法颇为奏效。80至90年代的各州劳工立法相对改善了工人的处境，使工人更易于接受各种改良主义思潮，对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更加模糊不清。

总之，19世纪末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停滞不前的深刻原因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558页。

于当时美国社会仍不具备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即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生产力发展仍有较大的容纳余地。说明这种停滞不前的状况及其原因，不仅有助于认识当时美国社会阶级矛盾演变的进程，而且可以更全面地分析 20 世纪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两种错误倾向的存在，同样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普遍性。

第八章

19世纪后期农民运动的高涨

19世纪最后30年间，美国农业半机械化、专业化和商品化迅速发展，宅地农场主日益脱离半自然经济状态而深深卷入国内外市场。同时，垄断资本在货币金融、铁路运输、市场价格、土地资源等方面对农业的控制不断强化。这两种趋势的冲突，导致农产品价格长期持续下跌，农场主地位日益恶化。为了摆脱破产的厄运，广大农场主展开一系列斗争，构成19世纪后期日趋高涨的农民运动。这场运动从以合作社运动为中心的经济斗争开始，发展到独立的政治斗争；从建立地域性组织到联合为全国性的第三党。这场农民运动历时之久、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均属罕见。这场运动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揭示了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的归宿；也是了解向垄断过渡时期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经济结构、地域结构变化的重要条件。

第一节　农场主社会地位衰落及其原因

〔市场条件恶化及垄断资本盘剥〕　19世纪70年代以后，

农业商品化和机械化程度不断加深，美国农场主的经济生活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然后，随着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势逐步确立，农场主的商业联系也日益成为垄断资本渗透和控制农业的途径。另一方面，农产品受到市场各种竞争力量的冲击，而农场主无力摆脱价格下跌的趋势。因此，农场主的社会经济地位随着卷入市场的进程而急剧衰落。

首先，大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对农场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农产品的销售和加工，他们通过普尔（联营）和托拉斯等垄断组织控制原料和产品的市场价格。但是作为个体经营的农场主，受到生产分散性和地区差异的制约，却难以联合起来有效地控制、调节生产和价格。因此，农场主常常被迫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在市场上抛售其农产品。不仅如此，美国农业的惊人增长不断受到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大约有 2/3 以上的棉花、1/4 以上的小麦在国外市场销售，以玉米为饲料的畜牧业也有很大比重出口。但是，从 80 年代至 90 年代，俄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的小麦和谷物、埃及和印度的棉花潮水般涌入欧洲市场，迫使美国农产品价格一跌再跌。1866 年小麦每蒲式耳价格为 1.52 美元，此后 30 多年中长期低于单价 1 美元，1894 年甚至惨跌到 0.49 美元。棉花在 1871 年每磅为 18 美分，此后 30 年间棉价始终低于 10 美分。[①] 然而，农场主还必须不断添置新型农机具等生产资料以增加产量，更要每年支付 6 亿美元来购买消费用品。于是，他们在竞争市场上出售农产品，却在受高关税保护、被垄断组织控制的市场上购买工业品；作为买方和卖方，农场主都受到剪刀差的盘剥。可见，19 世纪后期农业的蓬勃发展，对农场主并不意味着“黄金时代”的到来，却使他们

① 非特和里斯：前引书，第 536 页。

遭到农产品过剩和价格跌落的双重折磨。有时农场主实在迫于无奈，只得将收获的玉米全部当作燃料付之一炬。面对着极不利的市场条件，农场主的不满达到了极限，成为农民运动的深刻动因。

其次，几乎全部农产品都必须经过铁路公司运往东部以及欧洲市场，因此铁路成为垄断资本控制农业的主要渠道。铁路剥削农场主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是实行运价歧视。由于西部农业区的铁路营运额较低，加上大企业勾结铁路公司实行优惠差价，铁路公司就把各种财政亏损全部转嫁到农产品运费上，由农场主来承担铁路混乱的后果。例如，从北达科他州东部的法戈到明尼苏达州德卢斯的小麦运费，几乎是从明尼阿波利斯到芝加哥运费的 2 倍，而后者的距离却比前者长 2 倍。从密西西比河以西运输谷物到大西洋沿岸，每蒲式耳运价高达 52.5 美分，而小麦时价为 106.7 美分，玉米为 41.1 美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等地的农场主抱怨：他们需“花费 1 蒲式耳玉米的价格才能运另一蒲式耳玉米到市场去。”[①] 至于垄断企业如“美孚”等可以随时调用车辆，并享有回扣、减价和特价等优惠。政府官员们还常常得到铁路公司的免费乘车证。官员和铁路之间贿赂舞弊成风，农场主对此痛心疾首，切齿不平。

铁路公司还与芝加哥、新奥尔良等地农产品交易所勾结，在铁路沿线设立许多堆栈和粮仓，控制了农产品和牲畜的收购价格。在收获季节，铁路和栈仓公司就乘机压低粮价、收取高额贮存费，对农场主进行无情盘剥。据估计，中西部、西部和南部运往东部市场的农产品收人，至少有一半落入中介商人之手。[②]

---

① 希克斯：前引书，第 60—61 页。

② A. 内文斯：《近代美国的出现，1865—1878 年》，纽约 1927 年，第 164 页。

对农场主更为致命的是严重缺乏资金。他们为了定居垦荒、购置农业机械和维持农作物收获前的生计，不得不四处求贷。东北部银行利用西部缺乏通货的状况，派出代理人建立贷款机构。农场主一旦接受这种高利贷，就陷入债海不可自拔。为了偿清债务，农场主们只得以土地、动产、甚至尚未收获的庄稼作为抵押。而东部银行发放的贷款利率一般为 1.5 分至 1.8 分，南部各州高达 3—4 分。七、八十年代在西部经营的几十家抵押公司，每年给东北部金融资本带来收益达 1.8 亿美元。农场主的债务总额却从 1880 年的 3.43 亿美元上升到 5.86 亿美元。[①] 将农场抵押的农户在 1890 年已达 88.7 万户，到 1900 年更增至 112.8 万户，约占全部农场主的 1/3。[②] 农场主为了扩大生产而追加资本的结果是失去其视为根本的土地所有权。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对传统的宅地农民是沉重打击。负债累累的农场主试图在合作运动和政府干预中找回自己原有的地位，正是 19 世纪末美国农民运动的心理动因。

正如 1890 年《农场主联盟报》所揭露的：在内布拉斯加州共有 3 项主要收入来源，一是种植玉米的收入；一是运费的收入；一是利息收入。前者是农场主辛勤劳动所得，后二者正是铁路和抵押公司瓜分农场主劳动所得的收入。[③] 这种情况不独发生在内布拉斯加，而且在整个西部以至南部莫不概然。这也是农民运动普遍发展的基本原因。

〔牺牲农场主利益的联邦政策〕　内战后联邦政府虽然在发展农业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的积极措施，但是在一系列方针政

---

① A.M.施莱辛格：《现代美国的兴起，1861—1951 年》，纽约 1954 年，第 148 页。

② 《第 13 次人口调查（1910 年）》，第 5 卷，华盛顿 1913 年，第 160 页。

③ 希克斯：前引书，第 83 页。

策上，基本上是以牺牲农场主利益来保证工业资产阶级、银行家、公债持有人和土地投机商的利益。因此，农场主的不满和积怨与日俱增。

在土地政策上，联邦政府名义上规定了无偿分配国有土地的原则，但是“宅地法”又附有“折偿”条款，即在宅地上居住6个月，按每英亩1.25美元现金交付即可取得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折偿”方式实际上为土地投机商抢购土地大开方便之门。他们纷纷成立公司，假冒“实际移住者”的名义抢购土地。仅在1882年以后的20年中，按“折偿”条例处理的公有土地2，000万英亩，约占宅地分配的23%。国有土地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折偿（条款）成了国有土地以惊人的速度转到大公司掌握中的巧妙手段。”[①] 联邦政府在赠予铁路公司土地方面是极为慷慨的。至1871年，拨给各铁路公司的土地已达1.75亿英亩；各州政府也向铁路公司赠拨大量土地；两级政府共拨给铁路公司2亿英亩土地。[②] 铁路公司除了占用一小部分土地铺设路轨，其余均以每英亩2至15美元价格出售。铁路公司通过土地赠予一方面获得大量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又控制了铁路两侧的农场主，使之成为铁路公司的盘剥对象。总之，“宅地法”的大部分实惠被土地投机商和铁路公司占据了。农场主所得土地不仅数量少，而且多半是质次、偏远的荒凉地段。他们不满联邦政府，同铁路、土地公司一再展开争夺土地的激烈斗争。

促使农场主经济状况恶化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联邦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70年代以后，联邦政府采取紧缩通货的政策，停

---

① 蒂尔登：《被看作美国农业革命的基础的内战时期立法》，洛杉矶1937年，第116页。

②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416—417页。

发纸币、限制银币、逐步推行金本位制。这些措施虽然稳定了信用市场，有利于投资和国际支付，但也加剧了货币供应严重不足和通货量分布极不平衡状况。东北部金融界利用西部和南部的通货紧缺，加紧进行高利贷和土地抵押活动。尤其在农产品大宗上市时，通货不足更显紧迫。谷仓公司乘机大煞买价，抵押公司则竭力抬高利率，农场主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紧缩通货和物价下跌互为影响，身负重债的农场主不得不用升值的美元来支付本息。他们在 1870 年仍可用1,000 蒲式耳小麦来偿还1,000 美元债务，到 1890 年却要用2,000 蒲式耳小麦才能偿清这些债务。因此，追求一种符合农场主利益的金融政策和体制，成为这个时期美国农民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财政政策的另一方面是税收制度。以国内税为例，农场主需为其土地纳税，在其消费品中承担商品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但是东部银行资本却不为其西部抵押和高利贷承担任何税收义务，可以有恃无恐地抓紧进行抵押活动。至于高关税政策的双刃剑作用，即在市场上保护工业资本、打击农产品价格方面胜过其他政策，以致美国农场主成为“保护贸易”的牺牲品，这已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说土地政策从外围扫清了垄断资本渗入农业的途径，那么金融政策则在核心部分使垄断资本掐住了农场主的咽喉。农场主试图摆脱越勒越紧的绳索，他们在反对垄断控制的同时，把矛头对准了制定这种种政策的联邦政府和两大党。这也是农业合作社运动最终转向政党斗争的深刻原因。

〔*农场主各阶层的分化状况*〕　在农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农场主从以往的宅地小农分化为利益不同的各个阶层。新阶层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发展而增大，旧阶层则相应地衰落下去。

农业集中现象虽不十分普遍，但在小麦生产带出现了为数不

少的大农场。1880年至1900年间，西北地区1,0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由29,000个增至47,000个。[①] 这些大农场的资本化和机械化程度较高，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也较发达。大农场主（包括大牧场主）往往同当地的矿业资本和铁路公司联系密切，成为西部地方政治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构成了农业资产阶级的主体。在一些全国性争端上，大农场主与东部资本存在着利益冲突，故需要利用中小农场主的力量，充当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但在地方性政策上，他们又同租佃农场主分歧颇大。最终大农场主也难以避免在经济上受垄断资本控制、在政治上归附两大党的命运。

在东北部集约型农业中产生了专业化农场主。这些农场主虽拥有土地面积较小，如新英格兰平均每个农户的耕地仅为西北地区的1/4。但他们资本投放量大，其每英亩耕地使用机器的平均价值为其他地区的2至3倍；使用雇佣劳动的平均价值也是其他地区的3倍。[②] 因此，这种专业化农场主构成了美国农业资产阶级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东北部农场的市场条件较好，其产品价格远不像大宗农产品那样猛烈下跌，资金来源较为充足，运输费用和消费品价格都相对稳定，故这个地区的农场主较少地卷入后期农民运动高潮。

美国农场主的主体是西部广大的宅地农民。1868年至1900年，在西部获得宅地的小农场主共有68万户。如包括购买铁路公司和土地公司土地的移民，这个时期西部农场增加达100万户以上。其中60%以上是耕地不足100英亩的小农场主。在西部干旱地区进行粗放耕作的条件下，100英亩规模的小农场几乎难以维持生计。加以负债累累，其中大部分小农场主只得以土地抵押

---

① 《美国历史统计》，前引书，第46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3页。

来进行再生产。到1890年，在伊利诺伊、内布拉斯加、堪萨斯等8个州的农场抵押率分别达36.7%至61.7%之间[①]。80年代末的西部严重干旱和90年代初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使美国农业陷入空前的困境，西部土地抵押发生崩溃式的连锁反应。抵押取消率达70%至90%。[②] 大批土地所有权转入东部金融资本之手。由于东部资本与西部土地在空间上分离，不便直接经营，从而把农场经营管理权仍保留给已经破产的旧农场主。于是，在土地抵押制的基础上，形成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东北部“不在地主”和西部租佃农场主。租佃农场主是“半所有者”，与完全失去生产手段的分成农和农业工人不同。他们仍拥有一定的资本，能在机械、土地改良和雇工方面进行部分投资。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金融资本的控制和剥削。因此，租佃农场主是农业社会化和金融资本渗入农业二者结合的产物。租佃农场主与东部垄断集团的冲突几乎涉及19世纪末各种社会政治争端，他们成为这一时期农民运动的主体。但是由于租佃农场主的经济力量薄弱和生产的分散性，他们亦无力改变自己的地位衰落。

在南部，金融资本的控制是同内战后形成的谷物分成制相结合的。南部的高利贷商人、种植园主和北部银行代理商三位一体，构成了南部特有的“不在地主”。分成农以全年收成作为抵押，向高利贷地主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可见分成农既无土地所有权，也无资本使用和管理权，故是农业无产阶级的变型。况且南部种植园地主还制定各种立法限制分成农自由流动。在1880年，分成农占南部黑人农民的40%，白人农民的30%；到

---

① 斯托克：“地产抵押、抵押取消和西部农业动乱”，载于《经济史杂志》1984年第4期第94页。

② L.B.奈：前引书，第41页。

1900年，南部白人农民也大多沦为分成农了。[1] 在分成制的束缚下，南部人口平均收入仅及全国水平的1/2，而黑人又比南部白人平均水平低2/3以上。南部分成农的经济处境和社会地位，使他们同南部高利贷地主和北部金融资本之间的冲突十分尖锐，但又难以进行有效的抗争。加上历史遗留的种族偏见和地域隔阂，造成南部农民运动的发展艰难。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小农场主完全破产而沦为农业雇佣工人。以中西部7个主要谷物生产州为例（伊利诺伊、艾奥瓦、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和南达科他），在1880—1900年间，农业工人从36万余人增加到63万余人。[2] 就全国而言，1900年的农业工人总数已达到200万人，相当于农场户主总数的35.5%。农业无产阶级人数迅速增长，表明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趋于成熟。但美国农业工人以季节工居多，其分散、流动性很大，故难以在19世纪末农民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农场主分化为若干不同阶层，但他们同金融资本、工业垄断集团、铁路公司以及联邦政府的尖锐矛盾却是共同的，其社会地位下降趋势也大体相仿。因此，这个曾经在美国社会中居人口多数的集团，在其走向衰落的困境中发出了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声，给即将到来的20世纪美国投下了一道深远的光束。

---

① 波特主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前引书，第1卷第381页。

② 沙伊贝，前引书，第67—68页。

第二节　农民协进会（格兰其）和绿背纸币运动

〔农民协进会和格兰其法〕　农民协进会是内战后美国第一个全国性农民组织，它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推动了农民运动的第一个高潮。1867年11月，奥利弗·凯利在首都华盛顿创立"农业保护者协进会"(即格兰其)。凯利曾任农业部职员，对南部农村作过调查，对那里的落后状况和农民的困苦处境深有感触。他按照共济会的秘密组织形式创办了农民协进会，其宗旨是倡导农场主互助合作，交流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发展农村教育，以改进农场主的状况。可见，格兰其的初期是个不过问政治的农业教育组织。至1871年，它在9个州建立180个地方分会，其中一半设在艾奥瓦州。然而，参加协进会的中小农场主却对华盛顿总部的纲领和行动不满。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有组织的经济活动，才能摆脱困境。有些地方组织提出"合作起来"以针对流通领域的垄断行为。1869年，一些州和地方的协进会建立起商务代办所，为会员出售农产品，代购农具、种籽和牲畜，设置临时仓库贮存谷物，有时还向会员提供市场行情。协进会的活动表明独立农场主开始进行经济合作的尝试。

187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农产品价格猛烈下跌，普尔等垄断组织形式在工业、铁路部门中广泛发展，农场主面临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恶化。更多的农场主把协进会看作是自已经济利益的保护者。1874年，全国37个州中已有32个州建立起州一级协进会组织，地方分会21,697个，会员总数猛增至80万。[①] 在中西部

① 菲特和里斯：前引书，第542页。

和南部地区，几乎每个县和社区都建立起分会。除了中小农场主外，还有大批城镇小商人和小企业主也纷纷加入协进会。

农民协进会的力量壮大，使其领导人和纲领也变得更为激进。1874年圣路易斯大会发表的宣言提出："反对垄断资本的暴政，……反对贷款制度和抵押制度。"[1] 同时又提出"我们不是资本的敌人"，"只是希望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在农场主和制造商之间建立尽可能直接和友好的关系。"这个纲领反映了协进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他们试图以合作制和阶级调和来阻止中小农场主和小商人、小企业主的破产，却又力图阻挡正在出现的向垄断过渡趋势，从而在思想上陷入混乱。在行动中协进会更明确了发展集体所有的合作制的措施，这一点比其成立初期前进了一大步。

1873—1875年，农民协进会展开大规模的合作运动。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广大土地上，出现了成千上万个合作商店、粮仓货栈、保险公司以及少数银行。26个州协进会建立起经营批发业务的"经纪人制度"，为会员储运、代销农产品。南部某些州协进会派出经纪人常驻纽约和英国的利物浦，随时掌握棉花市场行情。加利福尼亚协进会还自行装运17艘船的粮食，直接向国外销售。同时，这些机构还设法从制造商那里直接批发农机具和日用品，以较低廉价格向会员出售，以减少中间盘剥。在堪萨斯、密苏里等中部各州协进会还投资兴办小型制造业工厂，生产农业机械，加工面粉、奶酪、大麻纤维等农产品。其中艾奥瓦的一家收割机厂在1874年就生产收割机250多台，并以市价的一半出售给会员。农民协进会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这一系列改革，为农场主们提供了实惠，并且积累了参与社会化生产的经

---

① C.C. 泰勒：《美国农民运动，1620—1920》，纽约1953年，第134页。

验。仅艾奥瓦一个州的合作机构就为其会员节省40%的运输费和100万美元的购置费。[1]

尽管农民协进会在其纲领中坚持它不是政党组织，不讨论政治和宗教问题，但在其经济活动中又不能不参加到政治斗争和立法活动中去。在基层会员的推动下，1876年农民协进会在华盛顿组成一个院外活动集团，对国会立法施加影响。各州协进会也有相当多的组织转变为地方性政党。1873至1876年在中西部和西部的11个州涌现出一系列农民政党，如反垄断党、改革党和独立党等。这些小党的纲领主要集中在敦促联邦和州政府制定铁路管制立法；实行合理的赋税制度；将西部国有土地授予真正的垦殖者；由国家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等。这些农民政党和协进会在地方政治中积极展开活动，并在某些州暂时取得某些优势。在威斯康星、明尼苏达、伊利诺伊和艾奥瓦等4州议会中，在农民协进会和独立小党一起推动下，管制铁路的立法得以通过。这些称为"格兰其法"的立法主要是对铁路运输的最高限价、收费率、长短途和小额货运的差价等作出一般规定。西部其他各州很快效法，"格兰其法"迅速传播，得到社会中下层的广泛支持。但是，铁路公司竭力诋毁格兰其法，指责这种管制违反了特许营业证规定，侵犯法人财产权，触犯联邦宪法关于州际贸易的条款。铁路公司与中西部州发生一系列争执，构成所谓"格兰其案件"。187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对"芒恩诉伊利诺伊州案"和"派克诉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案"中，都判决州政府的管制铁路为合法，因为铁路公司是关系到公共利益的事业，必须服从公众的管理，并认为"铁路运费属于州政府有关的内部事务"。这样，农民协进会在立法斗争方面取得暂时的上风。格兰其法作为对放任

---

① 艾伦·内文斯和亨利·康马杰合著：《美国史》，华盛顿1966年，第370页。

政策和垄断行为的第一次冲击，对以后的立法有深远影响。

〔格兰其衰落与绿背纸币运动兴起〕　1876年以后，农民协进会运动转入低潮，其地方组织松弛瓦解。1880年其会员人数锐减至12万余人。农民协进会以合作社运动和单项立法来抵抗垄断组织、挽救农场主的衰落趋势，自然是力不从心。具体地说，协进会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大批合作商店、企业和公司，而且管理不善，经营范围过大，加以垄断组织的排挤倾轧，这些企业因而大部分倒闭。虽有少数得以维持，但已不是为格兰其成员利益而活动的集体合作组织了。从政治上看，格兰其法对铁路公司并未构成真正制约，并且实行时间较短。各州政府大多与铁路公司互为利用，将格兰其法搁置不理，或修改得面目全非。1876年后危机转向繁荣，农场主对投身运动的兴趣淡漠。加以协进会内部成分复杂，要求不一，难以在进一步发展时确定目标。农民协进会作为19世纪末第一次全国性农民运动高潮，其历史作用仍值得肯定。它推动分散的个体农场主走向联合，并积累了在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广泛活动的经验。它为后来的农民运动提供了骨干和经验，其中许多会员转入绿背纸币党或农民联盟，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格兰其法也在联邦州际贸易条例中得到了发展。

当农民协进会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时，另一个农民运动高潮已悄然来到了。这就是1874年以后绿背纸币运动的兴起。绿背纸币运动不同于农民协进会之处，主要在于它以政治斗争为主，并建立以农场主为主体的全国性政党。其活动范围以中西部为主，但在东北部也有很大影响。绿背纸币运动的上述特点产生于这场运动的争端焦点即货币问题。对于内战后遗留的国债和纸币问题的解决方式，涉及到当时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债权人希望以足值的硬币来支付全部债务，尽管他们在内战中是以纸币购买大部

分债券的。而债务人则希望仍以纸币偿债，如换以硬币付债则会使他们的私人债务成倍增加。然而联邦政府站在债权人利益一边，在1869年决定以金币偿付全部国债。在1873年，联邦政府又决定停止印发纸币、逐步实行金本位制。这两项立法实际上是置负债累累的农场主于更加艰难的境地，它将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债务更加上升。其他面临破产的小企业主也对紧缩通货政策持反对立场。主张通货膨胀的债务人集团从爱德华·凯洛格那里接受了低值货币论，认为联邦政府应改革金融制度，发行低值货币，并由政府发放低利率贷款，使社会中下层得以摆脱破产的厄运。这种观点把信贷资本看作资本的主要形式，把通货膨胀视为改造社会的基础，显然是极为幼稚的幻想。但是由于这种理论揭露了当时联邦政府支持金融资本对社会中下层的掠夺，激起了人们对于改革金融体制的强烈要求。正值1873年危机的到来，绿背纸币运动迅速在北部各州风靡起来。

1874年11月，在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农民党的发起下，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密歇根、肯塔基等7个州的农场主和部分工人代表，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集会，决议成立新的政党。其宗旨是抵制垄断资本的侵犯、改革税制、纠正政府腐败现象并"适当解决货币问题"，由此揭开绿背纸币运动的序幕。1875年3月在克利夫兰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正式成立独立党，并通过以金融改革为中心的政治纲领。这项纲领认为金融问题比其他问题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实际利益，要求以绿背纸币偿付国债、废除1875年恢复硬币支付法。独立党的核心要求围绕着绿背纸币问题，所以它被通称为绿背纸币党。1876年，绿背纸币党决定参加当年的总统竞选，推选纽约慈善家彼得·库珀为总统候选人。在竞选纲领中，绿背纸币党着重提出了废除硬币法、增发纸币等4项要求，但在其他方面并未拿出更有力的改革主张。况且竞选

经费极为不足，故所得选票仅 8 万余张，占全国选票总额的 1%。由此可见，绿背纸币党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货币问题上，并不能吸引足够的下层群众。

〔绿背纸币运动的高涨与失败〕　70 年代后期，绿背纸币运动成为农场主与工人运动交汇的聚合点。在 1877 年的铁路罢工期间，中西部的农场主积极展开声援，向罢工工人捐赠粮食和马铃薯。很多工人组织在这过程中与绿背纸币党建立密切联系。工会也从 1877 年罢工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与农场主联合的必要性。在纽约、新泽西和马萨诸塞等州的工人党在地方选举中和绿背纸币党联合，取得重要进展。在这些联合行动的基础上，1878 年 2 月"工人及货币改革者全国代表大会"在托来多召开。许多著名工人领袖和绿背纸币党活动家出席了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绿背劳工党。大会纲领揭露了农场主、工人生活水准和收入不断下降，"一种无可比拟的苦难已侵袭着我们人民中的贫困阶层和中产阶级。……贫穷与饥饿已充斥国家的每个角落。"① 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政策法令"以高利贷者、银行家及公债持有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绿背劳工党进一步发展了农民协进会的纲领。它将斗争焦点从铁路管制转变为货币体制的改革；提出实行累进所得税；要求建立劳工统计局，反映工人的利益和要求。这些纲领发展说明农民运动已向第三党运动发展，而且要求政府实行干预政策越来越成为其纲领的核心部分。1878 年中期选举中，绿背劳工党获得 106 万张选票，14 名代表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地方选举中也取得重大成果。绿背劳工党比绿背纸币党更具有群众基础，它在全国政治中所产生的影响也超过了农民协进会及其他独立小党。

---

① 方纳：前引书，第 709 页。

1878年以后，绿背纸币运动逐渐走向低落。其原因之一在于联邦政府在1879年正式以硬币偿还绿背纸币债务后，并未出现物价暴跌，小麦、玉米等大宗农产品价格还略有回升。这种情况使许多农场主对货币问题失去兴趣，纷纷退出运动。另一方面，绿背纸币运动中的工人与农场主的利益歧异，其联合并不巩固。东北部工人对通货紧缩政策的关切远不如中西部农场主。绿背纸币运动的上层领导人却把金融改革视为治愈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并不关心工人的疾苦，其政纲中反映工人要求的条款越来越少。绿背纸币党的有些领袖甚至声称决不与"共产主义或工会之类的劳工团体"建立联系，"我们的全部需要只是一种在全国通用的绿背钞票和一个诚实的政府。"[1] 许多工会组织和工人对此怨言甚多，遂脱离绿背劳工党。在1880年大选中，该党候选人只获得30万张选票。1882年绿背纸币党与工会的政治联盟已彻底瓦解。1884年后绿背纸币党不再活动于美国政治舞台上了。绿背纸币运动虽然在政治斗争方面比农民协进会前进了一步，但它的经济活动毫无进展，社会基础更为纷杂，故难以对大党构成真正的挑战。

第三节　农民联盟和人民党

〔北方联盟和南方联盟〕　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叶，先是农民联盟、后是人民党相继兴起，构成了这个时期美国农民运动的第三次高潮。这次高潮继承和发展了前两次的主要特点。在影响范围上，它席卷整个中西部、远西部和南部，并波及东北部。在活动方式上，它不仅掀起更为广泛的合作运动，而且形成

① 方纳：前引书，第1卷，第714—715页。

了以农场主为主体的全国性第三党，展开了对两党政治有力的挑战。其斗争锋芒直指东北部的垄断组织，对90年代的全国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80年代各地农场主在原格兰其和绿背纸币运动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许多自发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在互相支持的过程中组成了跨州的农民联盟。其中以"全国农民联盟"（即北方联盟）和"全国农民联盟和工业联合会"（即南方联盟）为最有影响。

早在1880年4月，芝加哥《西部农村报》编辑密尔顿·乔治就在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县创建农民联盟。许多曾是格兰其活动的地区也跟着出现这类农场主组织。从一开始农民联盟就运用报纸等舆论工具揭露垄断组织、铁路公司和政府官员互为勾结、压榨农场主的丑行，号召全国各地农场主联合起来，为保卫自身利益进行斗争。同年10月，"农民运输问题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各地农场主组织的数百名代表出席会议，并在会上正式成立"全国农民联盟"。联盟继承了格兰其在合作、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活动方式，同时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其政纲明确指出：铁路是"名副其实的垄断"，"是对现存法律的挑战"；它盘剥民众、腐蚀政界、阻碍自由竞争、威胁共和制度。[①] 因此，农民联盟就是要联合全国的农场主，制止垄断资本的横行不法。其具体要求就是实行政府管制铁路，建立合理税制等。为此，农民联盟力争将自己的代表选入政府、参与立法，实现其改革纲领。从这最初纲领看，北方联盟的主要注意力仍集中在铁路管制问题上。

北方联盟在堪萨斯、艾奥瓦、威斯康星、伊利诺伊等州迅速发展，到1882年已有2,000个基层组织，成员达10万人，并建

---

① 希克斯：前引书，第98页。

立起州级联盟组织。1887年中西部遭受严重旱灾，农场主处境恶化。更多农场主接受农民联盟的纲领，参加人数增至40万，其中以堪萨斯为最多。同年10月，联盟在明尼阿波利斯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纲领，其中包括实行铁路国有化和自由无限制地铸造银币等条款。在联盟下级组织的报刊编辑中，形成了一批较有思想的激进派。他们已经开始讨论政府、垄断企业和农业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改革理论了，为以后人民党纲领的提出作舆论准备。

南方联盟的起源甚至早于北方联盟。1874—1875年间得克萨斯兰巴萨斯县的边疆农场主为了抵御马贼、大地主及大牧场主的强取豪夺，建立一些秘密的自卫组织。这个组织又扩展到附近各县，并在1878年与其他农场主组织联合为“得克萨斯农民大联盟”。此后较长时间内“大联盟”不参与政治经济斗争，发展缓慢。1884年，联盟决定改变组织性质，将合作社运动作为其主要活动方式，为盟员提供有利的商业活动。“大联盟”在各地设立股份公司和合作商店、谷仓、轧棉机工厂、保险公司等。合作企业的商品价格一般低于市场价格1/4至1/2。联盟还在达拉斯建立农产品销售中心，以保持价格稳定。联盟的经济活动吸引了大批农场主，1885—1886年其地方组织由700个增至3,500个。正在大联盟蓬勃发展之时，C.W.麦丘恩当选为执委会主席。麦丘恩主办《全国经济学家报》，在农场主改革派中很有声望。他修改了联盟纲领，提出取缔外资控制的铁路公司、增收铁路财产税和土地投机的调节税、增加货币发行量、制定州际贸易法等改革主张，使纲领具有较为先进的思想特征。另一方面，麦丘恩极力消除联盟内部的分裂倾向，使“大联盟”成为南部各农民组织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改革团体。

在80年代，南部其他州也陆续出现了农场主的合作组织。

例如，1880年建立的路易斯安那农民联盟；1883年阿肯色州农场主建立的“农业车轮会”在1888年已发展会员50万人。这些组织与得克萨斯“大联盟”互相呼应，构成犄角之势。麦丘恩为了在整个南方形成强有力的农场主组织，派出联络人员往阿拉巴马、密西西比、田纳西、肯塔基和密苏里等州开展工作。1887年1月，“大联盟”首先与路易斯安那农民联盟合并，组成“全国农民联盟”。翌年，又与“农业车轮会”联合。1889年，南方的三大农民组织合称为“全国农民联盟和工业联合会”，即南方联盟。南方联盟在南部各州积极扩大影响，不久又吸收了北卡罗来纳农民协会。到1890年，南方联盟及相关的农民组织共有会员300万人，比北方联盟会员多2倍。其基本成分是农场主、分成农、农业工人和乡村小知识分子，对于金融界、商业、地产、铁路等行业人士一概拒之门外。南方联盟对黑人分成农仍持歧视态度。一方面规定禁止黑人参加联盟，另一方面又声称与黑人农民组织进行政治合作，以借助这部分社会力量。南方联盟在首都华盛顿设立总部，并办报刊近200种。其声势不仅遍及南部各州，而且对北部、西部也产生了很大震动。

〔农民联盟向第三党的转变〕　80年代末，西部大平原发生连续严重干旱。从内布拉斯加向南直至得克萨斯热风横行，庄稼焦萎，草原干枯。冬季奇寒和风暴袭击，又将牲畜大批冻死。同时，市场条件更趋恶劣。玉米价格降至每蒲式耳仅10美分。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西部农场主破产速度加快。1890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南北达科他、明尼苏达的人口平均抵押债务额居全国前列，平均每2至3人中就有一份抵押债务[①]，而且抵押取消率高达2/3以上。在这样的困难境地中，农场主更加把改

① 希克斯：前引书，第23页。

善状况的希望寄予农民联盟的政治经济力量加强，渴望能通过政府干预使农场主保持在市场上的一席之地。正是上述形势，推动着农民联盟向第三党转变。

1889年12月，南方联盟在圣路易斯召开代表大会，北方联盟、全国其他重要农民组织及劳动骑士团亦有代表出席。南北两大联盟在大会上制定了共同纲领，其要点仍集中在货币、铁路、土地、税收等重大争端上。纲领提出实行无限制铸造银币，发行充足的法定货币；取缔“不在地主”，收回铁路公司的多余土地和没收外国辛迪加所占土地；实行累进所得税等。圣路易斯纲领集中了格兰其、绿背纸币党历次纲领的基本改革要求，体现出农场主与东部大资本的矛盾尖锐化。这个纲领也反映了南北农民联盟在改革的主要方面持有一致立场，为两个联盟的进一步合作准备了积极的前提。

圣路易斯大会的另一重要成果就是在麦丘恩设计的合作制度和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国库分库计划”。这项计划要求联邦政府在每个农业年产值50万美元以上的县内设立国库分库，按寄存的农产品价值80%发行法定纸币贷款，利率为一厘。农场主通过分库在行情相当时出售贮存的农产品，或取得分库证券偿付债款、保险费和运输装卸费等。如一年内农产品未被赎出，分库有权自行处理。国库分库计划的实施需要联邦政府至少增加5.5亿美元的货币供应量。因此，该计划不仅为解决农业资金和价格问题提供了途径，而且促使政府实行一种与市场供求关系相适应的有弹性的通货膨胀政策。这项计划比绿背纸币理论更接近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现实，成为后来的联邦储备体系所借鉴的蓝图之一。它也总结了农场主合作社运动的经验，力图将合作制与联邦政府干预政策结合起来。农民联盟要实现分库计划，就必须力争在联邦政府中取得足够的影响力。这就要联盟尽快地转变为

全国性政党。可见，分库计划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有深刻的意义。

然而，南北联盟合并为全国性政党的主观条件并未成熟。首先是西部农场主与南部分成农的经济利益和地域要求不尽一致，故在纲领和组织形式上仍有分歧。西部农场主认为小麦不及棉花易于储存，故对分库计划不感兴趣。他们对南部农民以棉籽油制造人造黄油亦不满，因这样有碍于北部畜产品和奶油制品市场的扩大。两大联盟在对黑人农民加入联盟的问题上亦观点对立。尽管南部黑人农民在 1886 年已成立“全国有色农民联盟及合作协会”，到 1890 年已有成员 100 万人；但南方联盟仍抱着种族歧视的偏见，拒绝接受黑人加入南方联盟。北方联盟则力主与有色联盟合并。北方联盟还担心人数众多的南方联盟会吞没自己的力量。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南北联盟未能达成合并的协议。

然而，农民联盟的政治、经济活动仍然为第三党的形成提供了基础。80 年代末的农场主合作社运动比格兰其时期规模和形式都更有发展。例如，南卡罗来纳、南北达科他农民联盟都采用由农场主集资的股份公司来保证合作企业的资金周转。得克萨斯、密西西比、佐治亚等州农民联盟建立了信贷销售和赊销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到 1890 年，在 18 个州的农场主合作机构年交易总额已达 1 千万美元，其经营范围从经销农产品到谷仓、银行、保险业、铁路和航运。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必然与垄断组织展开交锋。例如在 1888 年麻业托拉斯将黄麻包装布的售价提高 1 倍，南方联盟决定展开抵制，最后迫使麻业托拉斯把黄麻布售价从每米 14 美分降至 5 美分。这场斗争显示了农民联盟的实力。在总体上，合作机构与垄断组织之间的实力对比相当悬殊。垄断资本不可能把市场控制权让给农民联盟。他们通过银行拒绝提供贷款，铁路公司实行运费歧视，制造公司拒绝以批发价格出售农机

和日用品，打击合作企业，使其中大部分难以维持而停业。经济斗争的受挫，使农民联盟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政治斗争。

广大农场主对两大党的诺言也日益感到幻灭，他们迫切要求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第三党。1890 年，西部诸州首先出现农场主的独立政党：在堪萨斯、印第安纳的“人民党”，南达科他的“独立党”，内布拉斯加的“人民独立党”，科罗拉多的“独立联合党”等。南方联盟也开展了政治斗争，但他们主要是通过民主党来实现其要求。1890 年中期选举表现了农民联盟强烈的政治倾向。在联盟支持下，第三党在 7 个州议会的参众两院中据控制地位，在 6 个州的众议院占有优势。在当选的 332 名国会议员中，倾向农民联盟的议员有 52 名。这次中期选举推动了农民联盟向全国性第三党转变的趋向。

〔人民党的建立及其纲领〕　90 年代是美国社会急剧转变的时期。1893 年危机爆发，使农业萧条达到最低点。同时银价惨跌，西部银矿几乎完全停产。通货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全国性争端的焦点，各种社会力量展开激烈斗争。农场主集团也竭尽全力在这次政治角逐中取得自己的地位，从而迅速地从农民联盟转变为人民党，农民运动遂在这一时期发展到最高峰。

1890 年末，各地农场主组织开始共同商讨建立第三党问题，尤其在 1891 年 5 月的辛辛那提大会上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次大会共有 33 个州和地区的1,400 名代表出席。南北两大联盟的领导人及其改革团体的主要代表进行磋商，拟定共同政纲。北方联盟为了促进统一，接受了“国库分库计划”。同时，南方联盟却担心建立第三党，会在南部分散白人选票，仍幻想通过民主党进行改革。但是，南部的农民群众对上层领导人的迟疑不决极为不满。如《全国经济学家》当时所指出的：南方存在着一个深深的愤怒暗流；如果民主党不能表明对下层民众的同情，整个南方

就会出现一个新党。[1] 下层群众的强烈情绪，使南方联盟领导人不得不走上独立斗争的道路。在辛辛那提大会上，农民联盟为了获得工人支持，在纲领中列入了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限额的条款。农民联盟的努力确实吸引了劳动骑士团、俄亥俄矿工联盟等工人组织，但并未在劳联等主要工会中产生积极的反响。

1892 年 2 月 22 日，人民党在圣路易斯召开成立大会。除了南北农民联盟以外，还有若干工会组织、全国报刊改革协会、基督教妇女联合会也派代表参加，共有 22 个组织、约 800 名代表。这次大会主要解决了对建立第三党的必要性的看法，绝大多数代表都支持转变为人民党。然而，真正使人民党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的是 1892 年 7 月召开的奥马哈大会。这次大会所制定的人民党纲领在美国政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奥马哈纲领”。

奥马哈纲领尖锐谴责了垄断势力的专横和两党政治的腐败。它指出：“美国富豪无视我们的共和国并危害我们的自由，肆无忌惮地窃取我国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以建立他们的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巨富。”“两大党为了争权夺利和分赃不均所作的斗争，我们已目睹二三十年了。”“我们控诉支配这两党的势力集团，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现存的可怕情况，相反却容许这种状况继续发展。”[2] 因此，纲领宣称不消除社会弊病、实现平等权利，已经组织起来的改革力量的斗争决不会停息。

奥马哈纲领的核心内容是对当时经济、政治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其主要方面有：建立全国统一的有弹性的货币体制，按 16 比 1 的银金比价自由地铸造银币，使人口平均货币流通量达

---

① 罗彻斯特：前引书，第 69 页。

② K.H. 波特：《全国政党纲领集 1848—1968》，坎布里奇 1972 年，第 89—91 页。

到 50 美元以上（相当于当时实际拥有量的 2 倍），在农业州实行国库分库计划。在土地制度方面收回铁路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过剩土地，剥夺外国公司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给实际拓殖者分配土地。实行铁路、电报、电话、邮政的国有化，按照人民利益加以管理。改革税收制度，实行累进所得税，减少对农业土地税收。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总统、副总统一届任期制，实行无记名投票、参议员直接选举、公民创制权和复决权。在劳资关系方面，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禁止童工，取缔工贼和平克顿密探，限制外国移民。[①]

奥马哈纲领集 19 世纪末美国各改革纲领之大成，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发展。其突出特点是斗争矛头直指横行一时的垄断资本，揭露两大党的保守和腐败，提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案和政策。纲领的致命弱点在于对联邦政府抱有过于乐观的幻想，以为国家会自动调节金融和市场；并且错误地估计形势，把迅速增长的人民党力量看作足以取代两大党的政治力量，似乎类似内战前共和党取代辉格党的局面还会再现。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形成之中，其内部矛盾尚未发展到极为严峻的地步，因此联邦政府就不可能对现存结构进行关键性的改革，更不会轻易接受第三党提出的纲领。而且农场主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它已从内战前北部资产阶级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政治同盟者沦为东北部垄断资本掠夺、控制的对象，因而也就不可能再出现小党取代大党的局面。尽管如此，奥马哈纲领在当时引起了美国各界的震动，在此纲领上签字的民众达 500 多万人。这表明人民党一出现于美国政坛上，就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向两大党腐朽政治发起冲击。

---

① K.H. 波特：前引书，第 89—91 页。

人民党成立后，立即参加1892年总统选举。原北方联盟主席詹姆斯·韦弗被推为总统候选人，南方联盟的詹姆斯·菲尔德为副总统候选人。人民党在大选中虽不能扭转乾坤，但所获的104万张选票也足以使两大党震慑。同时，人民党还有5名代表当选为参议员，10名选为众议员。在地方选举中，4名人民党人当选为州长（科罗拉多、堪萨斯、北达科他和怀俄明），6,500个人民党人当选为地方官员。这些人民党人在联邦和地方立法部门中不懈地为奥马哈纲领作出努力，使人民党第一次成为两大党以外能够在全国政治中取得发言权的第三党。

〔人民党与民主党合并及其失败〕　人民党的崛起引起两大党上层的恐慌，奥马哈纲领以其充满改革精神吸引了农场主、小资本家、部分工人和部分知识分子。劳联的下层组织也部分地转向与人民党合作的立场。1894年中期选举中人民党获得选票1,471,590张，当选国会参、众议员各6名，还有数百人被选为州政府官员。在这次选举中，人民党在工业地区选票明显增加。例如在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获得25,000票。在宾夕法尼亚的选票比1892年增加1倍。这对于曾经把中西部看作传统势力范围的共和党是个沉重打击。在南方，长期一党统治的民主党也面临着人民党的严重挑战。在1894年选举中，人民党在南部诸州获得选票的比例上升，如在亚拉巴马州得到48%的选票，在北卡罗来纳则达到54%。

两大党为了防止更多的下层选民转向支持人民党，在其纲领中点缀一些改革条款以改变其保守僵化的形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廉·麦金莱在1892年明尼阿波利斯大会上，提出实行廉洁选举、管制托拉斯、改革文官制度和实行复本位制等口号以蛊惑人心。而民主党更是利用下层群众在金融问题上的关切心理，狡黠地抓住“自由铸造银币”的口号。民主党的1896年选举纲

领是与人民党奥马哈纲领十分相似的“影子纲领”。它剽窃了大部分改革主张加以改头换面，就是不提最关键的金融体制改革。同时删掉了农场主们十分关切的土地问题和铁路运价问题，还把劳工条款偷换为限制移民、实行劳资纠纷仲裁。民主党还推出了西部银币派首领威廉·布赖恩。布赖恩以其“不要把人类钉在金十字架上”的喊叫迷惑了相当大一批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通过这些策略变化，民主党把领导权移到了银币派手中，并作好了兼并人民党的准备。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党内部早存在的阶级差异和地域矛盾顿时显现出来。人民党上层以大农场主、银矿主和职业政客为主，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利用人民党群众力量取得官职，并迫使政府通过自由铸造银币的法令，使人民党变成“自由银币党”。1896 年人民党在圣路易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主席 H.E. 托比尼克为首的合并派竭力主张接受民主党的建议，放弃奥马哈纲领，支持布赖恩为总统候选人。代表中小农场主和佃农利益的“中间道路派”激烈反对合并主张，指出这是民主党吞并人民党的阴谋。他们认为，如果放弃奥马哈纲领则意味着“人民党运动的投降和整个组织的垮台。”[①] 堪萨斯一位人民党人在致大会信中说：“不要强迫我们倒退到民主党那里去，我们不愿意去。”[②] 但是，上层分子不顾群众的激烈反对，认为人民党再进行大选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他们认为，经过几年的经济危机，人民党的下层群众已精疲力竭，根本无力交纳活动经费，整个人民党财源枯竭。如果依靠民主党，至少能部分地反映人民党的要求。他们这种“半个面包胜于没有面包”的心理正中民主党头领们的下怀。民主党全

① 希克斯：前引书，第 357—358 页。

② 罗彻斯特：前引书，第 114 页。

国委员会主席琼斯抓住时机，与人民党上层紧急磋商，终于拟就了两党在28个州内实行合并的具体程序。这样，已经成为两大党心腹之患的人民党运动中断了。

民主党尽管在合并了人民党后，阵脚一度稳住了。但是它已无法改变同共和党的悬殊力量对比。布赖恩仅得到西部银矿主的30万美元竞选资助，仅是麦金莱所得竞选款项的1/20。而且人民党下层在合并后情绪沮丧，正赶上1890年秋小麦价格回升，共和党以此证明为银币政策的破产，小麦带的农场主转向了共和党，使布赖恩失去一部分关键性选票。加上人口众多的工业州全部倒向共和党，布赖恩所得的选举人票比麦金莱少了近100张。民主党—人民党联合阵线终于崩溃了。

人民党在1896年后虽然仍有余波泛泛，但终究平平。直至20世纪初，人民党的一些地方组织还在活动，而改革运动的主体已转移到北部工业城市的进步运动中去了。历时近30年的美国农民运动逐渐平寂下去，但人民党的思想和社会影响却持久地存在着。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两位民主党总统都在其执政期间部分地实现了人民党的改革要求，大部分人民党下层群众也随之转变为民主党的社会基础。

人民党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小规模的农场主经济无法与垄断资本的强大实力抗衡。其社会化、资本化程度较低，决定了它只能从属于垄断资本的控制。而在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条件下，农场主依靠其社会力量，仍然能够在政治、经济上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因此，美国农场主在资本主义深入发展的历史时期展开这场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是与当时其他国家所不同的。美国农民运动也由此兼有进步性和保守性的两重特点。这场农民运动所采取的合作制形式、政党组织和改革纲领等斗争方式，都是历史上各国农民运动所不及的。尤其是人民党关于经济改革的

许多设想，虽然在19世纪末美国并不具备实现的客观条件，但它所涉及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不能不朝着这种改革的基本方向发展。这就是19世纪末美国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

第 九 章

城市的大规模兴起与市政改革

伴随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美国城市化也进入鼎盛时期。至19世纪末,在全国初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进而美国的经济重心、人口流向和城乡结构等也出现一系列相应的变化。

城市的大规模兴起,也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在联邦政府自由放任政策的纵容下,握有市政实权的城市老板与各大企业沆瀣一气、互相利用,腐败之风充斥于市政管理,市政建设也弊端丛生,出现严重无政府状态,与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极不协调。

急剧膨胀的城市问题,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自八九十年代起,各种改革运动纷纷涌现,其中以社区改良运动和市政机构改革最令人瞩目。各派教会也程度不同地参与社会事务、致力于城市改革。虽然这些改革刚刚铺开,所获得的直接成果还很有限,但许多主张与实践都为进一步改革铺平了道路,拉开了进步运动的序幕。

第一节　城市的大规模兴起

〔城市发展的一般状况〕　内战前,美国绝大多数人口居

住在农村，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当时工业化的广度和深度均有局限，经济重心偏于东北一隅，城市也相应地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狭长地带的北部，如纽约、波士顿、费城等重要城市。这些城市以商业活动为主，起对外贸易和对内交流的中心作用。由于西部开发和铁路铺设的刺激，在密西西比河畔及其以东的内陆地区也出现一些中小型城市，主要是作为东北部与内陆地区经济往来的中转站，如圣路易斯、辛辛那提、芝加哥等。在密西西比河以西，仅星星点点散布着一些小型居民点和采矿中心。这一时期城市的初步发展，为更大规模的城市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内战后，伴随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这突出反映在城市化的速度上。1790 年美国联邦政府首次进行人口普查时，城市人口① 仅占全国总人口的 5.1%，至 1920 年则跃增至 50.9%，这种具有决定性意义变迁的高峰期恰恰出现在 19 世纪后半期②。1860 至 1900 年间，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 19.8%上升到 39.6%，这一速度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城市的数量也有显著增长，其中10,000 到 25,000 人的城市由 58 个增加到 280 个，100,000 人以上的城市由 9 个增加到 38 个③。至 19 世纪末，一个以大中小各类城市构成的城市网已在全国范围初步形成。这种现象当然令人瞩目。美国著名史学家老阿瑟·施莱辛格甚至主张以“城市理论”取代当时主宰史坛的特纳的“边疆理论”，去解释这段美国历史④。

---

① 1940 年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正式规定：2500 人以上的居民点为城市。

② 《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期到 1957 年》，1961 年，第 7 页。

③ 戴维·韦德：《移民与城市：19 世纪美国变化的地理》，纽约，1977 年，第 22 页。

④ 阿瑟·M·施莱辛格：《1878 至 1898 年间美国城市的兴起》，纽约，1941 年，第 80 页。

然而，由于工业化的不平衡发展，城市化也存在着地域上的明显差异。东北部工业化起步较早，因而该地区城市发展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1860至1900年间，该地区城市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每10年平均上升7.8%以上，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1890年时，全国平均每3个人中有1个居住在城市，而东北部每2个人就有1个居住在城市。纽约市在全国城市中一直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1900年它与布鲁克林合并之后，人口将近300万，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城市，仅次于伦敦。其他城市如波士顿、费城等也有较大发展。如费城人口从1860到1900年增长近3倍，达150万，在全国居第3位。

中西部地区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在农业、交通等方面又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因而内战一结束，东北部企业家、大商人等纷纷前往，形成投资兴办企业的热潮，中西部旋即成为全国工业化的中心地区。这就使得该地区城市化起点高，发展潜力亦相当雄厚。在它发展的高峰期，即1880至1890年，其城市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率上升了10.4%，这使得东北部也相形见绌，在美国历史上更属空前。截止1900年，在全国10个2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仅中西部就有4个：芝加哥、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底特律。这样，仅用三四十年时间，中西部就已由若干分散孤立的中小城市一跃而为美国一个主要的城市化地区。

在这些城市中，以芝加哥的崛起最引人注目。19世纪初，芝加哥还是人迹罕至之处。30年代移民西进，芝加哥兴隆起来，不久扩建为市。50年代铁路的铺设，更使其成为中西部重镇。但是，1871年芝加哥遭受特大火灾，全市2/3被化为灰烬，10万余人无家可归，因而受到重创。但这却构成芝加哥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余烬未尽，在东部资本的帮助下，重建即已开始。1880年该市人口再度恢复到50万，1890年跨过100万大关，

1900年又跨200万大关，每10年翻一番，一跃而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在当时世界各大城市中也雄居第5位，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①。1893年，世界博览会在芝加哥隆重举办，更使这座城市遐迩闻名。

与东北部和中西部相比，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工业化略逊一筹，城市化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80年代以后工业化速度加快，形成一股动力，但主要是促进了某些地区性中心城市的发展，没有形成各种规模城市的同步发展，各级城市间的联系与依存关系也较东北部和中西部为弱。发展较快的单个城市主要有：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和威奇托，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和明尼阿波利斯，科罗拉多州的丹佛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圣弗朗西斯科）等。这些城市的人口在1880至1890年间，分别增长了2倍到9倍，成为各地区的中心城市。

南部投资环境很差。那里战后重建需要时间，而且铁路很少，因此工业化迟迟难以展开，城市化也起步晚、速度慢，远远落在其他地区后面。1860年时，全国10，000人口以上的城市有93个，南部仅占14个。当时全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9.8%，南部仅为7.2%。到1900年，才缓缓上升到15.2%，尚不及全国1860年时的水平，和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相差将近50年。1870年，新奥尔良曾在全国大城市居第8位，但到1910年时已退居第15位，是南部惟一的人口在25万以上的大城市。路易斯维尔和亚特兰大在南部也属较大城市，到19世纪末人口刚过10万大关。

〔城市的性质、类型与布局〕　这个城市化的鼎盛时期的

---

① 康斯坦斯·M·格林：《美国城市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纽约，1957年，第100页。

另一突出现象是以大机器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城市渐居主导地位。到1900年，全国15个大型城市中，除新奥尔良外，均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

这些城市，按其性质和作用的不同，可大致分为几种类型：第一，包括多种产业的综合性全国中心城市，如纽约、芝加哥；第二，以某种产业为主的专业化地方中心城市，如巴尔的摩、费城、辛辛那提、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等；第三，单一产业的专业化小城市，如伊丽莎白、托莱多、大瀑布城等；第四，卫星城，一种是“工厂城”，围绕某大城市所建，实即该城某大企业的分支，以匹兹堡周围大批小型钢铁冶炼城镇最为典型；另一种是“卧城”，或称住宅区，隶属于某一大城市，以疏散该城过分密集的人口，如芝加哥的福莱斯特，波士顿的布鲁克莱恩。上述四种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沿袭旧格局的商业城市或商业与农副产品加工业混合的城市，或采矿冶炼中心，多分布在西部及南部。

总的来说，在这些类型众多的城市中，最突出的、也是占多数的是专业化城市。所谓专业化城市，是以某种产业为主、其他产业为辅的城市。上面提到的第2、3、4种类型的城市都可称为专业化城市，只是在专业化程度上有所不同。它们是竞争的产物，其形成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

首先，一些企业向农牧业发达地区集中而形成农畜产品加工专业化城市。如堪萨斯城曾与圣路易斯和芝加哥的企业争夺谷物加工市场，屡屡失利。后来，该城多数企业把重点转向肉类加工业（因该城接近西南大草原地区的“牧畜王国”），使堪萨斯城逐渐成为肉类、罐头加工中心。明尼阿波利斯市在70年代尚不引人注目，但到80年代，中西部以西地区农业日益兴盛，吸引了大批谷物加工企业，致使该市迅速在西北谷物带中夺得领先地

位。孟菲斯市曾以原木加工为主，后因竞争失利，很多企业转而利用当地棉花生产优势加工棉籽油，使该市逐渐成为南部棉籽油生产基地。

其次，一些企业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交通条件从事专业化生产。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宾夕法尼亚煤田和大湖区铁矿之间兴起的一大批以钢铁冶炼和加工为主的城市。如匹兹堡及其周围众多的钢铁冶炼小城镇就是专门从事钢铁冶炼，以及板材、线材、管材等钢铁半成品的初步加工的。

再次，各专业化企业在激烈竞争中采用先进技术，不断提高专业化程度。如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市在电力工业中先行一步，后来成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大本营。一些企业也往往利用当地居民的专长实行专业化生产。如密尔沃基市酿酒业的兴盛主要得益于有丰富酿酒经验的德裔移民，它所生产的酒驰名全国。在东北部，许多企业为避开中西部专业化企业的竞争锋芒，不得不放弃经营不善的产业，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当地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上。如马萨诸塞州霍利奥克市的成衣、制鞋及造纸业，洛厄尔市的毛纺业和编织业，经过一番技术改造，均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这些不同规模、各种类型的城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分布日趋均衡，进而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形成了以综合性城市与专业性城市相结合、大中小城市相结合、相互依存、同步发展的城市体系。东北部城市体系，由全国性中心城市纽约和地方性中心城市费城、波士顿等及大批中小型城市构成；中西部城市体系由全国性中心城市芝加哥和地方性中心城市密尔沃基、圣路易斯、底特律等和众多中小型城市构成。这两个城市体系集中了众多的工业企业，构成美国工业布局的心脏地区。

〔城市的兴起与美国经济结构的相应变化〕　　自由资本主

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无疑是经济结构剧烈变革的时期，大规模兴起的城市，构成这种变革的关键一环。

城市作为经济活动的枢纽和生产社会化的巨大杠杆，便利与刺激了美国工业化的发展。一般来说，工业企业集中于城市，有利于大机器工业的分工协作和专业化生产，便于分散的生产过程汇合成为彼此不可分割的社会化生产过程。城市体系的形成，以其整体性见长，更充分地发挥了城市的这种作用。仅以中西部城市体系为例：匹兹堡、芝加哥等市利用苏必利尔湖铁矿和宾夕法尼亚西部和其他地区煤田，形成钢铁冶炼中心；以其生产的钢锭及各种钢铁半成品为主要原料，底特律、克利夫兰、辛辛那提、哥伦布等市分别形成机械产品制造、机车制造、农机制造、船舶制造等专业化城市；密如蛛网的铁路是这一体系的得力媒介。从自然资源的开发、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加工、直至成品生产的全过程均可在这一城市体系中完成。这一方面有利于对资源的综合利用，使地区经济得到较合理的组合；另一方面减少了中间产品的远距离运输及损耗，缩短了生产周期，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这种优越性是分散孤立的单个城市所不可比拟的。因而，很多工业企业都把厂址设在东北部或中西部城市中。即使不在那里直接建厂的厂商，也多半将总部设在那里，或派驻代理商。“在 1900 年人口普查所确定的 185 个工业联合体中，有 70 个总部设在纽约，18 个在芝加哥，16 个在匹兹堡，6 个在克利夫兰，费城和旧金山各有 5 个，其他城市均未超过 4 个。”① 显然，东北部和中西部两个城市体系已构成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

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体系的工业布局又各有特色。中西部城

① 格伦·波特主编：前引书，第 1052 页。

市多集中于原料产地，利用当地优势，着重发展了粮食、肉类加工、钢铁冶炼、机械加工等新兴工业，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面临中西部的激烈竞争，东北部城市也不断强化其专业化程度，侧重于它的传统工业，如纺织、制革、烟草加工、日用五金等等，即以轻工业为主。轻、重两大工业区的形成，使全国工业体系臻于完善。

城市的大规模兴起，造成空前广泛的就业机会，吸引大批移民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迅速取代向西部农村流动，成为人口流向的主要趋势。这一方面反映在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据统计，1910年时全国4,200万城市居民中约有1,100万是1880年后由农村流入城市的。[①] 另一方面表现在移民的绝大部分也涌入城市。在1860至1890年间城市所增加的人口中，有54%以上是外来移民。[②] 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由于就业机会多，容纳力强，外来移民一般占城市人口总数的70%以上。[③] 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纽约市。"纽约—布鲁克林是世界最大的移民中心。它所拥有的意大利裔居民相当于那不勒斯人口的一半，它的德裔居民和汉堡的人数相当，它的爱尔兰裔居民与都柏林的人数相当，它的犹太人是华沙人口的两倍半"。[④] 大致算来，纽约市每5个居民中有4个是外来移民或其后裔。如果说美国是个民族大熔炉，那么其融合过程主要是在城市中完成的。

随着中西部城市的崛起和新的工业中心形成，曾经偏于东北

---

① 查尔斯·格莱布和A.T.布朗合著：《美国城市史》，纽约，1983年，第136页。

② 巴里·波尔森：《美国经济史》，纽约，1981年，第327页。

③ 赫伯特·G·古特：《工业化美国的劳动、文化和社会》，纽约，1976年，第40页。

④ 阿瑟·M·施莱辛格：前引书，第73页。

一隅的经济重心逐步西移。这最突出地反映在制造业的地理变化上。无论制造业雇佣人数还是产值，中西部在全国所占比重均持续上升，东北部则相对下降，[①] 进而造成美国制造业重心西移。根据美国第12届国情调查报告，从1850至1890年间，美国制造业重心向西移动了225英里。

中西部工业经济的长足发展，为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农业开发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使西部开发成果得到巩固。1870年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农业产值大约只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16%，到1890年上升到33%，成为全国著名的农业产区。制造业与农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全国人口重心西移。根据联邦人口普查局统计，从1850到1900年，美国的人口重心向西推进了200多英里，达到印第安纳州中部。[②]

中西部城市的崛起，使这一地区在美国经济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也由此纳入全国经济发展的统一轨道。这是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剧烈变革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城市化加速资本集中与垄断〕　城市的大规模兴起，为垄断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点在专业性城市和城市体系中体现得最为鲜明。在专业化城市中，同类企业共聚一处，短兵相接，竞争激烈。竞争的结果往往是一个或几个企业在同类部门中居于魁首地位，该城市也就成为夺得这种垄断地位的企业的大本营。美孚石油公司所在地克利夫兰市和美国自行车总公司所在地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就是明显的例证。至于城市体

---

① 哈洛德·瓦特：前引书，第97页。

② 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编：《1977年美国统计资料概要》，华盛顿，1977年，第9页。

系，则以其特有的各城市间经济上的密切联系而为垄断组织的纵向联合或横向联合创造了有利环境。如在钢铁专业生产基地匹兹堡地区，众多的中小城市都是相互匹配、同步发展的。卡内基钢铁公司夺得钢铁业垄断地位后，又轻易地吞并了匹兹堡周围数十个钢铁冶炼城镇中的企业，形成显赫一时的大型垄断企业美国钢铁公司。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垄断组织之所以蓬勃兴起，与城市体系形成很有关系。

垄断组织的形成是伴随着残酷竞争的，城市的发展也带有这一鲜明的印记。芝加哥和圣路易斯两个城市的某些企业对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控制权的斗争，是极为典型的。圣路易斯市地理位置优越，内战前河运贸易盛极一时，囊括整个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五六十年代，随着铁路向西延伸，芝加哥崭露头角，许多从事农畜产品加工的企业云集于此，试图通过铁路的铺设来夺取密西西比河中、上游运输业的优势。出于这种暂时的共同目的，它们组成很多团体，如"工业俱乐部"、"伊利诺伊制造业者协会"等等，以便联合对付圣路易斯市。此后，这两个城市中的同类企业为争夺地方控制权和铁路修筑权，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芝加哥一些企业大力资助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的修筑。该铁路横穿伊利诺伊州。掌握了它，芝加哥便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中、上游地区与东北部的贸易往来。进而，芝加哥市企业凭借四通八达的铁路网，赢得了控制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的主动权，并不断蚕食圣路易斯市所影响的地区，结果使圣路易斯这个中西部重镇丧失了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商业贸易中首屈一指的地位，甚至在一个时期变得一蹶不振。

城市的大规模兴起，便利了工业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的形成。这既促使工业的发展超过农业，同时也加剧了工业垄断资本对中小农场主的盘剥，致使城乡矛盾更形尖锐。在城市发展最快的地

区，这一矛盾也就更为突出。如垄断性企业控制了中西部乃至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农产品价格，销售市场、铁路运输以及金融信贷等，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农场主和小农户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所以中西部成为农民协进会、绿背纸币党、农民联盟和人民党等等此伏彼起的农民运动的一个中心地区。

城市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一系列剧烈变化。需要认识和解决的纷繁复杂的城市问题接踵而至，成为美国社会面临的新的紧迫问题。

第二节　市政管理与城市问题的恶化

〔*把持市政的“无形政府”*〕　城市的迅速发展，亟需建立与健全相应的市政机构和管理体制。但是90年代以前，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奉行自由放任政策，不干预企业活动，对城市事务也疏于过问，从未制定过全国的统一政策和原则。各州对城市的管理则是五花八门，或者由州议会分管，或者由市议会独揽，结果造成城市行政部门普遍软弱、机构设置权限不清，也不完备。再加上美国城市历史较短，缺乏管理经验，这就形成一种权力“真空”，使一些职业政客乘虚而人。这些人平日浪迹于街头巷尾，熟悉城市事务。他们拉帮结伙，并投靠某一大党为进身之阶，进而通过层层党派组织操纵竞选、恩赐官职、安插亲信，构成党派机器把持市政。为避免人们注意，他们多半不出任显要公职，而是通过党派机器在幕后发号施令，实际上是城市政府的“太上皇”，因而时人称之为“城市老板”。这一现象于60年代首先出现于东北部大城市，七八十年代后，随着西部和南部城市的兴起，也像瘟疫一样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城市政府，基本上是在城市老板及其帮派势力把持之下。这就是后

来改革派称谓的“无形政府”时期。①

城市老板及其帮派势力得以把持市政、显赫一时的原因，不仅在于市政机构软弱和党派财团的支持，也由于他们能施展手腕去拉拢移民、骗取选票。城市老板多半是移民或其后裔，出身低下，与移民有天然联系。这一特定身份，使移民对他们抱有很大幻想。他们则利用移民初到美国，人地生疏，难于谋求生计的时机，许以小恩小惠进行拉拢。比如一些城市老板专门派代理人常驻码头，接待那些举目无亲的移民，简化他们的入境手续，帮助寻找住所及工作，甚至提供必要的贷款。有的城市老板还在圣诞节之际亲自送给移民一些小礼物，并免费供餐。实际上，城市老板们只是用贪污所得钱财的一小部分来接济移民，但这些小恩小惠确实蒙蔽了许多移民。再加上美国城市人口流动性大，移民对美国政治不甚了解等因素，移民在市政选举时往往支持城市老板，而很少考虑他们的政治意图。凭借移民的选票与支持，这些城市老板麾下的帮派势力得以跻身于市或州一级政府，进而结党营私，把持市政大权。

本来就软弱松散的市政机构，在城市老板的把持下更趋混乱。他们在州、市两级立法部门中安插党棍势力，州议会干预市政的作法，司空见惯。据统计，仅 1867 年一年内纽约州议会所通过的有关该州城市的立法，就超过了整个英国在这以前 30 年的立法总和。② 城市政府的实权操在城市老板控制下的立法部门之手，行政部门近于瘫痪，市长也徒有其名。

〔“城市老板”与腐化之风〕　城市老板把持市政，使社会

---

① K.T. 杰克逊等编：《美国历史上的城市》，纽约，1972 年，第 358 页。

② 布莱克·梅克尔维：《1860 至 1915 年间美国的城市化》，纽约，1962 年，第 87 页。

上盛行的政治腐败之风在各城市泛滥起来。按照大多数城市的规定，市议会一般有权管理市政资金的征集和开销，发放市区铁路修筑特许权，签发承包公用事业的合同以及购置城市必备设备等。这些权力的运用，没有正式而严密的法定程序，于是城市老板们就此上下其手。他们通过对市议会的操纵，明目张胆地出售特许权和承包合同，肆行房地产投机和公用事业股票投机。倘若妓院、酒吧的老板乃至某些罪犯能够给他们一笔相应的贿赂，就可为非做歹，肆意妄为；一些大企业向城市老板行贿后，则不仅可逃避正常的课税，甚至连永久的特许权都买得到。至于其他种种以权牟利的肮脏交易，更是不胜枚举。在这方面最典型、也可以说是最臭名昭著的为纽约市老板威廉·M·特威德。

威廉·M·特威德（1823—1878），是苏格兰移民的后裔。早年曾任志愿消防队队长。60年代，他投靠纽约市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即“坦慕尼厅”）后步入政界。在这一组织中他拼凑起帮派班底，继而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整个纽约市的市政大权。60年代后，他的帮派兄弟们一度同时据有该市市长和三个最重要的市法官职位以及其他所有经选举产生的市政官员的职位，此外，还据有纽约州长职位及州议会中很多席位。[1] 特威德本人只担任市监理部主席和市公共工程特派员，但他通过坦慕尼厅的帮派兄弟，享有对纽约市政府的绝对控制权。他手下的帮派弟兄个个刁钻奸滑、老于世故，人称“特威德帮”。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把同伙拉入市政部门，如伪造选民名册，谎报选举结果，收买持异议的官员，以及用小恩小惠拉拢移民等；另一方面虚报账目，变相贪污市政资金。特威德要求每一位出任公职者都要虚报账

① 杰伊·S·古德曼：《美国城市政府及其政治的变迁》，纽约，1980年，第128页。

目，最初虚报的比率是10%，继而上升到66%，最后竟高达85%。特威德亲自主持建造的纽约县政府办公大楼，竣工后的实际花销相当于该工程原设计所需造价数倍以上。楼内家具和日用品价格也高得惊人。40把椅子和3张桌子便合价179,000美元，每只寒暑表竟达7,500美元以上。[①] 在区区一座大楼的工程上，贪污如此之巨，群情为之哗然。《纽约时报》一语双关地讽刺特威德为“泥水匠大王”。在特威德“当政”期间，“仅1870年1年，纽约市的市政债务就由3,600万美元陡增至9,700万美元，至翌年末，该项债务竟已超过纽约市不动产总值的12%”。[②] 特威德手下的人均善于勒索贿赂，而且名目繁多：只要某家企业或商号向他们奉送一笔可观的酬金，就可得到市政房地产交易的情报，甚至获准开设赌博或卖淫的场所；如果某厂家承包市政工程合同，则须把所得的65%作为回扣给城市老板；如果某家企业违法受控，只要它立即向特威德一伙奉送一笔款子，即可免于起诉，这类贿金被谑称为“免于起诉款”。

特威德只是当时美国城市老板中臭名远扬的一个，其他大大小小满身铜臭的城市老板也比比皆是。在费城，有号称“王”的詹姆斯·麦克梅内斯；在波士顿，有号称“沙皇”的马丁·洛马斯内；在阿尔巴尼，有奥尔康内四兄弟；在芝加哥，因城市发展较快，一度出现几个老板各霸一方的局面；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匹兹堡等大城市均有各自的城市老板；甚至首都华盛顿特区也在城市老板亚历山大·谢泼德的把持之下。城市老板的普遍存在，使得行贿受贿、假公济私、贪污腐化成为美国城市政府中司空见

---

① 利昂·F·里特沃克等著：《美国史》，新泽西，1982年，第2卷，第495页。

② 贾罗尔·B·曼海姆：《不堪回首：美国政治问题的历史透视》，纽约，1976年，第76页。

惯的现象。从1860到1900年间，全国市政部门的债务由200万美元猛增到14亿美元。这笔钱绝大部分流入城市老板及其党徒们的腰包。在美国史学家哈洛德·津克考察的18个城市老板中，有10个拥有至少100万美元的财产。[①] 其中，芝加哥的罗杰·沙利文留下遗产价值150万美元以上，费城的麦克梅内斯至少“赚”了240万美元，匹兹堡的克里斯·马吉至少拥有450万美元以上的不动产和其他财产。[②] 城市政府实际上已成为腐败与无能的象征。无怪乎当时一位著名教育家这样评论说：“美国的城市政府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的政府——最奢侈、最腐败、最无能。”[③]

城市老板的出现，实质上是党魁制在城市中的反映。它们不仅代表所属党派的利益，而且也与某些大企业集团沆瀣一气、互相利用。例如，特威德操纵纽约市法院，给铁路业大亨杰伊·古尔德以伊利铁路控制权；作为回报，特威德被聘为该公司的董事兼法律顾问，年薪高达10万美元。[④] 从这种肮脏的交易中可以看出，城市老板实际上是集政党势力、市政权力和大企业利益三位于一体。有的城市老板本身就是大企业的代表，尤其是与市政建设有关的一些行业利益的代理人。如费城老板麦克梅内斯拥有对该市各天然气公司的控制权，芝加哥老板沙利文则与该市公用事业各公司过从甚密。有了城市老板的支持，这些企业便可肆无忌惮地为追逐超额利润而横行不法、各行其是，至于应担负的社会义务，则从未予以考虑。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市政管理混乱和市

---

① 杰伊·S·古德曼：前引书，第124页。

② K、T．杰克逊等编：前引书，第365页。

③ 亚历山大·B·卡洛编：《附有评论的美国城市史论文集》，纽约，1973年，第46页。

④ 贾罗尔·曼海姆：前引书，第76页。

政建设的无政府状态。

〔市政管理和贫民窟问题〕　城市的迅速发展，产生了交通、住房、卫生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市议会不得不通过某些立法，对改善市政者予以特权或减课其财产税。由于城市老板从中作祟，与有关企业主从事幕后交易，这种特许权不仅条件慷慨，而且期限很长，往往是50至100年。阿尔巴尼市曾授予某公司以1,000年特许权。至19世纪末，布法罗市还授予某公司以999年特许权。[①] 这种特许权往往变相成为大企业攫取垄断地位的护身符，它们据此更加恣意妄为。如在纽约，授予铺设第一条市区铁路的公司以特许权时，由于该公司事先已用金钱打通关节，市政当局便有意含混其辞，对该公司施工中所占用街道及土地的范围未加明确的限制。结果，该公司在铺轨时随意占地、横穿街道。第一期线路建成后，该公司按规定将其收入的5%上缴市政部门，但对此后铺设线路的利润上缴问题，市政府未作明文规定，因此该公司索性不承担这种义务了。80年代末，各大城市在交通和照明等方面授予特许权时，都存在类似问题。

尽管各城市一再以重金和优厚的条件促进市政建设，但对这方面投资的企业主却醉心于攫取高额利润，往往施工中敷衍塞责、质量低劣，市政工程建设进展不大。更重要的是，私营企业利用所获得的特许权，开始大量控制城市公用事业。据统计，1900年时，归私营企业所有的水厂为1,539个，煤气厂951个，发电厂2,572个；而归市政府管辖的水厂、煤气厂和发电厂则分别为1,787个，14个，490个。[②] 又如1899年时，各城市营运的

---

① 查尔斯·格莱布等：前引书，第190页。

② E.S.格里菲思：《近代英美城市政府的发展》，伦敦，1972年，第80页。

3,326条交通线路中，约有46%归私营企业所有与经营。[①] 甚至有的整个城市都由一个大企业独家创建与直接掌管。较典型的例子是1880年普尔曼公司创建的普尔曼城，那里除学校以外的一切设施都归该公司所有。普尔曼公司创建该城旨在提高本企业经济效益，而对工人们的居住及生活条件则漠然置之，因而，那里居住条件的恶劣程度和其他城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894年爆发的震惊全国的普尔曼工人大罢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居住条件的恶化。

杂乱无章的市政管理加剧了城市建设的无政府状态。城市的公用事业、服务性行业等远远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需要；即使有所发展，也是参差不齐，毫无计划和秩序。以排水系统的建设为例，至19世纪末，很多城市仍未建成较完备的排水系统。在费城和圣路易斯，其排水系统总长度仅相当于这两个城市街道总长度的一半多一点，而巴尔的摩、新奥尔良和莫比尔等城市依旧大部靠露天排水沟排泄污水。[②] 各城市的污染问题也相当严重。当时有人对匹兹堡作了如下的描述："好的时候，它是一个烟雾弥漫、阴沉沉的城市；糟糕的时候，几乎想像不出还有什么地方比它更肮脏、更混乱、更令人沮丧。"[③] 只有在假日，大多数工厂歇工时，那里的空气才会显得清朗些。

市政建设的弊端更集中、更鲜明地反映在贫民窟问题上。随着工业勃兴，大批移民涌入城市。企业主们一味榨取他们的劳动，而很少投资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导致市区内住房紧缺。房地产商人则趁机大肆进行投机活动，从中牟取暴利。他们或者把

---

① 查尔斯·格莱布编：《美国城市史文献》，伊利诺伊，1963年，第179页。

② 查尔斯·格莱布编：前引书，第179页。

③ 查尔斯·格莱布编：前引书，第236页。

所占有的地皮划成小块待价而沽，或者兴建简陋住宅，或者改建旧房，以出租营利，如将原独户住宅改建成可容纳8至12户居住的小单元房间。这样，贫民窟开始大批形成，尤其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发展较快的地方这种现象更为突出。“1890年，美国平均每套住宅居住5.45人，而纽约市却高达18.52人，辛辛那提是8.87人，芝加哥是8.6人，波士顿是8.52人，哈特福德是8.12人，蒙大拿是4.9人。”① 纽约市的人口密度显然居于首位。1879年，纽约市的贫民窟住宅即已有21,000个，至1900年更增至43,000个，容纳居民高达150万，而当时整个纽约市人口尚不足400万。

在贫民窟内，人口过度拥挤，房屋建设简陋、公用设施奇缺。诸如室内照明、通风、取暖、卫生设施等条件都极差。很多贫民窟集中区既缺少排水系统，又无污物处理设施，巷口和露天阴沟常遍布垃圾和污水，空气中也弥漫着腐败的气味。当时一位美国《太阳报》的年轻记者雅各布·里斯深入纽约市贫民窟进行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那一半人怎样生活?》一书，真实地披露了贫民窟居民的悲惨处境，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他在书中写道：“这些楼层的全部新鲜空气都是从那扇永远乒乓作响的过道门和那些黑洞洞的卧室窗户透过来的……过道里到处都是污水坑，所有的住户都由此出入，因而在炎夏之际也都要忍受这些臭气熏天的污水坑的毒害……几堵阴暗的砖墙之间的间隙是（所谓的）院子，那上边有一狭长的烟尘弥漫的天空才是这里居民所能望到的苍天。”② 另据1884年关于芝加哥贫民窟的一份调查报告反映，这种住房“完全违反了排水设备、管道

---

① 卡尔·戴格勒：前引书，第312页。

② 雅各布·里斯：《那一半人怎样生活?》，纽约，1890年，第43—44页。

装设、照明、通风、防备火灾或意外事故等安全设施的所有规定；无视一切卫生法规；阴沟和厕所均令人作呕；挤得水泄不通的房屋又脏又暗；导致他们的食物易于腐烂；周围的街巷以及堆满腐烂东西和遍地臭水坑的后面空地也同样肮脏不堪。”[①] 在贫民窟集中区，由于住处拥挤而简陋，火灾也屡见不鲜。然而，就是从这些改建或新建的如此简陋的住房中，房地产商人仍攫取了惊人的利润。他们所索取的房租几乎都是敲诈性的，一般房租的年利润均相当于该房产总值的10%至12%，有的甚至高达40%。[②] 而且，破旧的房屋也不予以及时修缮，房主对那些无力支付或不愿预付房租的住户不是进行起诉，就是加以驱逐。

在贫民窟集中区，卫生设施极不完备。很多城市垃圾无法处理，只得就地掩埋，或倾倒在露天阴沟。这些垃圾传播疾病自不待说，还因堆积日久，流淌至邻近水井污染水源，人们饮用后大量罹病。1880年，纽约市曾对85口水井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只有一口井水质未受污染，尚可饮用，被标明为“好井”。八、九十年代，没有任何城市对饮水进行过滤或消毒。

恶劣的环境导致疾病流行，霍乱、伤寒、白喉等流行病四处蔓延，威胁着贫民窟居民的健康与生命。1873年，孟菲斯的贫民窟区首先发生一场流行病，随后迅速扩散，致使该市人口损失达10%。[③] 贫民窟居民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死亡率直线上升，这在婴幼儿中更为突出。据记载，“19世纪末在芝加哥的一个区里，每5个婴儿中有3个在未满周岁时就夭亡了”。[④]

---

① 方纳：前引书，第23页。

② 查尔斯·格莱布：前引书，第167页。

③ 托马斯·科克伦等：前引书，第265页。

④ 奥斯卡·汉德林：《背井离乡的人们：构成美国民族的巨大移民群的非凡经历》，波士顿，1973年，第139页。

贫民窟及其恶劣的环境不仅威胁着贫民窟居民的日常生活，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大企业的正常生产，成为整个社会的突出问题，这就迫使一些城市不得不采取一些改善措施。1879年，纽约市首次通过“贫民窟法案”，倡导兴建哑铃式住宅。这种建筑在楼房之间有一定空间，与原有的挤得水泄不通的贫民窟相比，可谓一种改善。但是，按此标准兴建的住房未过多久也变得拥挤不堪。其他城市的住房情况也曾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持续的时间同样有限。“直到1908年，纽约市还未对经济公寓式的住房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其他城市在制定有效措施方面更是一拖再拖。”①

〔*居住区的分化以及黑人聚居区的形成*〕　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和贫民窟环境的日益恶化，市中心区逐渐变得破旧而混乱。腰缠万贯的工商业巨头们索性迁往市郊，也就是当时的城市外沿，选择宽敞恬静、景色宜人的地方建造豪华的宅第、别墅和舞厅等，动辄耗资千万美元。一些经济地位逐渐上升的新中产阶级也随之外迁。随着城市面积不断扩展，向郊区迁移也就形成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无力外迁的普通市民如新移民和非熟练工人等贫困阶层只得留在市中心区。这一现象是继七、八十年代市内交通的改善后，相继在各大城市出现的，其中以芝加哥最为典型。该市的居住区大致可分为三层：里层也称内城或中心商业区，居住着贫困的市民和新移民；最外层是富豪阶层的住所；中间层则是日益富裕的新中产阶级住户；此外，市内还有几处环境宜人的地方成了阔佬们的城中之城。在那里，挤得水泄不通的贫民窟和富丽堂皇的豪华宅第形成鲜明对照。当时欧洲的一些来访者发现芝加哥的贫富悬殊状况仅次于英国的伦敦，顿觉不寒而

① 托马斯·科克伦等：前引书，第265页。

栗。又如在纽约，居住区分离的结果在该市东南部形成一个贫民窟最集中的社区，其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竟达 50 万人，居世界之首位。[①]

这一时期居住区分布中的另一重要现象是黑人聚居区的初步形成。内战后，由于黑人社会地位的部分改善和南部经济结构的变更，首先出现大批黑人移居南部城市的浪潮，70 年代后，这一浪潮转向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1870 至 1880 年间，平均每年离开南部的黑人约68,000 人，此后逐年增加，至 1900 年时已达 194,000 人。这些黑人绝大部分都涌入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例如，从 1870 到 1890 年，芝加哥的黑人人口就增加了三倍。另据统计，到 1900 年，黑人居民在5,000 人以上的城市有 72 个，纽约和费城的黑人数量分别是50,000 人，华盛顿、巴尔的摩、新奥尔良等城市的黑人数量则更多一些，在孟菲斯、亚特兰大、萨凡纳、什里夫波特等南部城市，黑人的数量甚至超过了白人。但就黑人城市人口占各地区黑人总数的比例而言，1900 年时南部仅占 20%，而在东北部和中西部，这一比例却高达 70%。也就是说，在后两个地区中的黑人，大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

内战后最初十年，城市中的黑人和白人还是混居的。八九十年代以后，南部种族主义日益猖獗，黑人不断受到政治迫害和种族歧视，地位每况愈下。"吉姆·克劳法"所规定的住房及生活方面的隔离，对黑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随着大批黑人移居城市，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由乡村到城市、由南部向北部蔓延开来。在城市中，为防范种族主义者的暴力骚扰并彼此照应，黑人倾向于聚居，再加上富有的白人不断外迁，市中心区逐渐形成黑人聚居的地方。在这些聚居区里，黑人不仅住处拥挤，而且受到种种盘

① K.T. 杰克逊等编：前引书，第 181 页。

剥和歧视。1885年，纽约市一家黑人报纸宣称，仅房租一项就至少要耗费普通黑人居民收入的1/3以上，有时甚至高达1/2，而这些住房都十分简陋，根本不值这样高的租金。从总体上看，虽然黑人聚居区还不如20世纪时那样明确、固定，但在北部已具雏形。黑人聚居区的初步形成，加速了整个城市居住区的分化。

社会问题在城市的集中，自然造成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处在社会底层的工人群众，直接处于社会矛盾的漩涡之中，迫切要求自身状况的改善，多次以有组织的形式进行斗争。在城市发展较快的地区，往往也是工人运动高涨的地区。1886年遍及全国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仅在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40,000人参加罢工，轰动一时的秣市惨案就发生在那里。1892年匹兹堡附近的霍姆斯特德工人大罢工和1894年工厂城普尔曼工人大罢工，都是美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重大工人斗争。

黑人也不甘于屈辱的地位，他们自发地组成各种团体，甚至联合起来筹建自己的企业、保险公司、教会等。但黑人的这些活动经常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野蛮干预和破坏，以致酿成1900年纽约市的种族大骚乱。大批黑人不仅在骚乱中遇难，而且损失了仅有的财产。种族关系日趋紧张，成为美国城市所特有的一大矛盾。

城市中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也表现在犯罪问题上。据人口普查的有关资料，从1880到1890年，全国犯罪收监率上升50%，大部分案件都发生在城市。另据芝加哥《时报》披露，从1881到1898年，该市杀人案件从1,266起剧增到7,480起。纵横交错的社会矛盾，使城市成为“风暴的中心”。[①] 雅各布·里斯一针见

---

① 托马斯·科克伦等：前引书，第250页。

血地指出："或者是我们扫除贫民窟，或者是贫民窟吞噬我们，非此即彼"。[1] 城市问题日益上升为全国性的首要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终于在90年代形成声势浩大的城市改革运动。

第三节　市政改革的尝试

〔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及其作用〕　城市人口增多，形成对报刊书籍的迫切需求，使新闻出版业成为一个相当有利可图的部门，吸引了大量资本。在竞争中新闻出版业不断采用新技术。七八十年代以后，排版机、轮转印刷机和折报机等相继发明并投入使用，变革了整个印刷过程。1879年，国会又通过邮政法，将杂志列为二级邮件，更刺激了新闻出版业的发展。

1870年，全国的报纸发行量为280万份，到1899年跃增为2，400万份。在各家报纸之中，约瑟夫·普利策主办的《世界报》最负盛名。这份报纸不仅最早使用套色印刷，而且敢于披露市政内幕、抨击时弊，因而畅销一时。1886年，即该报创刊仅3年，其发行量即已达到25万份，到19世纪末，成为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当然，在抨击时弊的同时，普利策也常常以言过其实、耸人听闻的报道招揽读者，扩大发行量，这种手法被人们概称为"黄色新闻"。[2] 在报纸发行量剧增的同时，反映城市生活的各种杂志也竞相问世。除原有的早期杂志外，《麦克卢尔》、《大众科学》、《全国地理》、《妇女家庭》等刊物也开始

---

① 转引自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的历程》，纽约，1973年，第284页。

② 因普利策在《世界报》上刊载一套连环漫画以黄色颜料为底色而得名。

称誉舆坛。其中1883年创刊的《妇女家庭》杂志到1890年发行量即高达100万份。

新闻出版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丰富了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它为城市改革运动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舆论阵地。在纽约市老板特威德“当政”期间，《时报》和《哈珀周刊》等曾刊载大量文章，把他和坦慕尼厅的大量丑闻公诸于众。“从1870年9月20日起整整一年时间，《时报》对‘特威德帮’及其同伙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抨击，一天也未中止。”[①] 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在《哈珀周刊》上刊登多幅既泼辣尖刻、又通俗易懂的漫画，使得很多不懂英文的移民也开始认清了特威德一伙的本来面目。这一切使得特威德和坦慕尼厅声名狼藉，再加上特威德一伙贪污甚巨，全市财政濒于崩溃，很多投资于市政建设的银行家和企业主也忧心忡忡，对他们产生不满。在这些因素作用下，特威德受到起诉和公审，最后于1878年死于狱中。1894年，牧师查尔斯·帕克赫斯特专程赴曼哈顿岛考察，将那里令人作呕的居住状况以及市政官员与某些企业主互相庇护、朋比为奸的丑闻如实地反映给新闻界。这些确凿的证据激起选民们的强烈不满，法庭不得不进行调查，结果使坦慕尼厅推举的候选人连续两年未能得到市议会的席位。在芝加哥，英国记者威廉·斯特德撰写了《如果耶稣降临芝加哥》一书，生动地揭露了在伊利诺伊一些大城市中，政客、警察和犯罪分子之间所从事的不可告人的肮脏交易。据说此书出版当天即售出7,000册，引发了芝加哥市的一场改革运动，并不断促使人们对该市和其他城市中此类问题的关注。[②]

---

① 亚历山大·卡洛编：前引书，第193页。

② 查尔斯·格莱布等：前引书，第216页。

各种书刊杂志对市政腐败的揭露与鞭挞，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要求改革的呼声空前高涨，城市改革运动逐步形成。19世纪末叶的城市改革运动，因参加的阶层比较广泛，声势颇为浩大。根据改革所采取的不同途径和侧重点，这一运动主要分为两翼：一翼面向城市下层，主张改革贫民窟以矫正社会弊端；另一翼着眼于市政机构，旨在取缔城市老板，提高市政机构的效能。

〔改造贫民窟的社区改良运动〕　社区改良运动，主要是用改善贫民窟居民生活及文化水平的方法来改造贫民窟。它的倡导者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以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女学生居多。他们对市政机构中盛行的腐败现象固然深感忧虑，但认为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安，主要原因在于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条件的不断恶化，如果任其发展，以至达到贫民窟居民无法忍受的程度，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与其改革市政机构，不如直接帮助城市下层居民，使之摆脱困境。这种作法在当时已有先例可援。七八十年代的英国，一些社会改革者曾用救济和教育贫民的方法改造伦敦市有名的贫民窟集中区伦敦东区，收到一定效果，如1884年创建的“汤因比厅”，即是一有效的尝试。

1887至1888年，美国社区改良运动的主要倡导人简·亚当斯赴英考察，并详细参观了汤因比厅。回国后，她立即和朋友艾伦·斯塔尔于1889年创办“赫尔会所”。这个会所坐落在芝加哥市贫民窟集中区，原名赫尔大楼。赫尔会所建成后，最初是作为日间托儿所兼辅导妇女家务，后来增设成人文化补习课程，以及音乐、美术教育等。参加这些活动者一概免费。这一会所的创办深得人心，其他城市的改革者纷纷仿效，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一些大城市相继创办此类设施，如波士顿的“南端会所”，纽约市的“格林威会所”，“亨利街社会福利院”等。到1895年，全国

至少有50所此类会所，而且其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加。[1] 改革者认为，在最贫困的社区创办会所，供那里的居民居住、学习和娱乐，就会在他们的指导下，形成一些社区的教育和娱乐中心。这样，既可改善那里居民的生活状况，又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增强生活上的自立能力，从而缩小他们与“特权阶层”之间的鸿沟，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水平。改革者们还组成保护儿童俱乐部，开辟娱乐场地，建立图书馆、体育馆等，并敦促市政府建造公园。亚当斯本人甚至设法谋得本社区的垃圾监管员职务，以便监督地产商和垃圾承包商履行其义务。

改革者们深入贫民窟集中区，不仅努力帮助那里的居民提高文化生活水平，而且还试图通过实地考察贫民窟现状，以制订具体改造方案。通过实地考察，他们收集了大量资料，撰写出一批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如亚当斯的《赫尔会所图文集》，劳伦斯·威利尔和罗伯特·德雷斯特合著的《贫民窟住宅问题》，罗伯特·亨特的《芝加哥贫民窟状况》等等。这些著作的出版，进一步唤起整个社会对贫民窟问题的重视，并在很大程度上为一些改革性立法提供了依据。

当然，社区改良运动仅局限于东北部和中西部一些大城市，未能在全国广泛展开，改革者们试图凭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整个社会中两极分化的现实，不啻杯水车薪。但这些活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给贫民窟居民提供了多少直接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社区改良的实验，启发与教育了社会公众，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改革都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进入20世纪后，这一改革运动仍方兴未艾，并且对30年代罗斯福推行“新政”也有一定影响。甚至时至今日，很多社区改良组织都是从19世纪末这场

① 查尔斯·格莱布著：前引书，第238页。

改良运动中繁衍下来的。

〔取缔"城市老板"的市政机构改革〕　市政机构改革运动的声势和历史影响，都比社区改良运动大得多。这一改革是由资产阶级中上层发起的，如各新兴工业部门的大企业主和董事、大商人、大银行家、不动产行业和保险公司的大股东，以及部分与其利益有关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之所以积极主张市政机构改革，完全是从本阶级利益出发的。内战后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他们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投资环境和赢利机会，因而一度无暇顾及市政权力的归属。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老板作为权力结构的一种补充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尚可反映他们的利益。但在城市老板把持之下，市政机构积弊日重：一方面，城市老板仅仅反映某个党派、某些财团的利益，毕竟不是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不利于整个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平衡；另一方面，城市老板热衷于牟取金钱，毫无管理市政的责任感，导致市政管理混乱，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为了缓解乃至平息这种动荡局面，并使切身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必须取缔城市老板。但城市老板权势盘根错节，又施展种种笼络手段取得了移民的支持，因而轻易难以根除，惟有采取强有力的改革措施。这样，八九十年代以后，各大城市几乎不约而同地掀起了市政机构的改革运动。

市政机构改革初期所提出的纲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张城市自治，以排除州立法部门对市政的过分干预；第二，加强城市行政部门、尤其是市长的权限，以遏制城市老板通过市议会干预市政；第三，城市选举实行超党派原则，并与州一级选举分别进行，尽量减少城市政府的政治色彩，以杜绝城市老板倚仗党派势力操纵市政；第四，起用专门人才主管城市行政事务，按企业管理的模式对城市实行科学管理。总之，改革的焦点在于从根本上取缔城市老板及其帮派势力，代之以由"有才干的

企业家管理的、经济与有效能”的城市政府。[①]

80年代中期以后，在各大中城市纷纷涌现出许多由大企业主、银行家、大商人等组成的改革组织，如企业家俱乐部、市民俱乐部等，连许多商会也成了改革性组织。到1896年，全国共有此类改革团体200多个。[②] 在这些团体中较为突出的是芝加哥市民联盟，该联盟曾在1896和1897年两次市政选举中获很多席位，在议会中占优势，便利了改革的进行。在这些改革团体的推动下，改革纲领部分地得到实现。1888年，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最先实行了超党派的市政选举。[③] 与此同时，这些改革团体还推举一些企业家竞选市长，以市长职位为阵地展开改革，号称“强市长”。这些市长大都侧重机构改革，在扩大城市自治权、加强城市行政部门权力和提高行政效率方面都作了一定的努力。如布法罗市长格罗弗·克利夫兰屡次施行否决权，否决了党派机器操纵下的市议会通过的很多法案，被人们誉为“否决市长”。他的做法受到改革派的嘉许，后来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并当选。[④] 在这方面较有作为的市长还有纽约市长塞恩·洛，旧金山市长詹姆斯·费伦等。另外，也有某些市长试图进行某些社会改革，代表人物为底特律市长黑曾·平格里，克利夫兰市长汤姆·约翰逊，特利多市长塞缪尔·琼斯。他们所进行的社会改革主要是赋税改革、市内交通改革和公用事业收归政府所有等。

市政机构改革运动在19世纪末已初步展开并持续发展，但步调很不一致，就其所取得的直接成果而言也很有限，而且很不

---

① 塞缪尔·海斯：“进步运动时期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纲”，载《太平洋西北季刊》，1964年10月号。

② 查尔斯·格莱布编：前引书，第371页。

③ 杰伊·古德曼：前引书，第133页。

④ 威廉·温特：《美国城市的政治组织形式》，纽约，1969年，第71页。

巩固。这固然是与后来声势浩大的进步运动尚未全面展开、以致市政改革势孤力单有关，但从运动的本身来看，也有其局限性。这明显表现在：领导改革的大资产阶级热衷于如何从城市老板手中夺取市政权力，而对城市中下层人民摆脱困境的要求都不屑一顾，更不肯与社区改良运动联合起来。他们所提出的城市自治、超党派的市政以及赋税平等之类改革纲领对移民、劳工、少数民族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它们丝毫没有涉及他们亟需解决的住房、就业等问题。相反，城市老板却千方百计地拉拢这些人地两生的移民，部分地解决了他们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甚至在移民与土生白人发生矛盾时，城市老板还出面调停，俨然成了移民的“保护人”。相形之下，移民们出自对城市老板的感激，宁愿让他们当权，也不愿响应市政机构改革派的空洞口号。因而每逢市政选举，改革派所得选票大部来自富有者阶层居住的选区，而在贫困者集中的选区却得票寥寥。他们的改革成果当然也就很难保持下去。市政机构改革运动发展得比较缓慢而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城市老板的权势盘根错节，在州、市两级都有支持他们的政党机器，而且市政腐败与州一级政府的党派专权有着密切的关联。费城的改革最能说明这个问题。80 年代，该市改革派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方罢黜城市老板麦克梅内斯，可是，州共和党老板马修·奎伊随即又把戴维·马丁安插进去，改革成果毁于一旦。[①] 由此可见，仅仅推举几个改革派市长或进行某些枝节改革，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如欲摧毁城市老板的政治基础，必须在体制上予以彻底改革，而且这种改革应与州的改革同步进行。

1894 年，全国 46 个改革团体的代表在费城集会，商讨联合

---

① 布莱克·梅克尔维：前引书，第 96 页。

起来进行改革的问题，翌年组成了“全国市政同盟”。这标志着市政机构改革运动已发展到全国规模。该同盟成立后，协助各市建立改革组织，出版探讨改革的刊物，并派代表赴欧洲、主要是英国考察，借鉴其市政管理经验，推动了改革的深入发展。1898年，该同盟又制定“城市章程范本”，主张加强城市行政部门的权力，推广“强市长”的经验。在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又出现大量探讨改革的论著。这些论著无一例外地主张将企业管理模式试用于市政机构，并提出很多具体措施，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纲领。而且，进入20世纪后，进步运动逐渐在州和联邦政府中形成一股强大的攻势，有力地带动了各个方面的改革。在以上诸因素的作用下，市政机构改革取得了较大进展，新的体制开始确立，城市委员会制和城市经理制相继应运而生。

〔社会福音运动及各派教会对城市问题的态度〕　面临八九十年代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和社会动荡的局面，美国各派教会已无法置身世外了。为了保持对下层群众的影响，各派教会不得不放弃它们不干预社会事务的传统，转而致力于城市改革。

新教是最先起来探讨城市问题的。这一教派在美国传播时间较长，具有很大影响。从传统上讲，新教主张当个人面临不幸时，应努力进行“个人自救”，教会不应干预。但是，到19世纪末，美国已成为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方面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残酷的生存竞争之中，整个社会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个人自救”的说教对人们、尤其是下层教徒已失去说服力；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而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等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对传统的基督教义构成尖锐的挑战。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交叉作用下，人们对基督教逐渐失去信仰，教徒数量锐减。这种情况使很多新教首脑人物忧心

忡忡。现实表明，原有的教义已无法适应正在经历着剧烈变革的社会的需要，亟需改变。在这种形势下，社会福音运动应运而生了。

社会福音运动的信念是：人生于"一个罪恶的社会，这一事实乃是产生深重罪恶的根源"，解救办法是耶稣下凡"建立一个新的环境"，来"拯救难以管教的人们，改造罪恶的社会"，因此教徒应成为社会改革者。这种信念被概括为"教会的社会信条"。[1] 这些改革教义的思想在七八十年代已初露端倪，后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福音运动，至90年代达到高潮。参加这场运动的教士，一般可分为两派：自由派教士只主张工资、住房和劳动条件的某些改革；而激进派教士则不仅主张改善劳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且反对联邦政府实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甚至宣称要改变全国的企业体制以拯救人类。其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华盛顿·格拉登和沃尔特·劳申布施，他们的代表作分别为《实用的基督教》和《基督教社会的危机》。这些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对社会福音运动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八九十年代后，福音派教士纷纷走出教会大门，筹建各种慈善机构，开办各种神学讨论班，开设社会基督教和社会伦理学课程。在这些活动中，最有影响的是"救世军"组织。它是1878年由英国卫理公会牧师威廉·布思在伦敦首创，1880年传入美国。救世军的宗旨是帮助城市中信教甚至不信教的贫穷居民。它向社会呼吁："溺水者需要（救援的）绳索，而不是空洞的宗教说教"。[2] 为此，救世军专设"贫民窟支队"，深入贫民窟集中区，创办医院和贫民救济所，组织儿童俱乐部，建立各种社会救

---

① 《美国大百科全书》，1980年，第25卷，第127页。

② 查尔斯·格莱布等：前引书，第236页。

济机构等。福音派教士还创建大批学校，并大力发展青年组织。在他们的倡导及组织下，50年代创立的“基督教男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均有较大发展，至1897年时会员分别达到26万和3万余人。社会福音运动的不断深入，逐渐消弭了教派之间的分歧。进入20世纪后形成了全国性组织“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将社会福音运动推向一个更有组织的阶段。

社会福音运动的很多主张无论对当时的城市改革，还是对美国宗教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强烈影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中很多主张“在30年代的‘新政’立法中得到体现”,[①] 也决非偶然。但是，社会福音运动并未得到新教各个派别的一致响应。如浸礼会、卫理公会等主要由熟练工匠、富裕农场主乃至大企业主所组成的教派，依旧主张个人对罪过负责，宗教不干预社会事务。对城市改革的这种消极态度当然与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有直接关系。如石油业大亨洛克菲勒就是个有名的浸礼会长老；股票市场大亨丹尼尔·德鲁是位狂热的卫理公会教徒。至20世纪初，随着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日益发展，社会福音运动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逐渐失去号召力。

社会福音运动的局限性，更突出地反映在新教对美国的其他教派持排斥态度，尤其是对美国另一大教派天主教所持的敌视态度上。19世纪后期，正是美国天主教徒急剧增加的时期。1860年时美国天主教徒为300万，到1895年已达1250万之多。[②] 在80年代以后涌入美国的大批“新移民”中，除犹太教徒外，大部分是天主教徒，而这些天主教徒多半都很贫穷。他们来到美国后，纷纷涌入城市。美国的天主教会不同于各派新教，它在传统

① 威廉·哈里斯等编：《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纽约，1975年，第2549页。

② 西德尼·阿尔斯特罗姆：《美国人民宗教史》，纽黑文，1972年，第827页。

上关心穷苦教徒的需要。内战以前，天主教在东北部城市中曾进行过慈善活动，内战后，这种活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其他城市。天主教不仅开展慈善救济活动，而且创办学校，开设英语课程等，旨在帮助移民能更快地适应美国的城市化环境。但这些活动却引起某些新教首脑人物的猜忌，他们惟恐天主教徒通过这些活动控制城市，进而影响全国。再加上当时出现的民族纠纷，新老移民间的矛盾等因素，反天主教的恐怖活动日趋表面化。1887 年组成的“美国保护协会”，就有意利用这些矛盾，排斥打击天主教会及其教徒，因此天主教的慈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

在宗教领域所展开的社会改革，虽然主要是慈善活动和某些宣传鼓动，但宗教界能够正视现实，摆脱传统教规束缚，不同程度地参与社会事务，这本身在教义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而且对城市改革具有推动作用。

〔*妇女参政权运动和禁酒运动*〕　19 世纪下半期的美国妇女，已逐渐成为整个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走出家门，到户外工作。在内战后到 19 世纪末这段时间，女子参加工作的人数急剧增加，其增长速度超过男子，也超过了妇女总人口的增长速度。1870 到 1900 年间，妇女人口总数上升了 48.7%，而妇女参加工作的人数则跃增了 64%。[1] 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妇女进入大学和专科学校学习。内战后，为女子专设的学校相继涌现，如瓦萨学院、威尔斯利学院、史密斯学院、布赖恩·玛尔学院等。许多州立学校也取消了对妇女的限制，到 1900 年，全国 80%的学院、大学以及专科学校都接受妇女了。而且，又出现一些男女合校的私立大学。这就为妇女提供了较充足的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妇女们参加工作和享受高等教育，开

---

① 格伦·波特主编：前引书，第 991 页。

阔了眼界，增强了社会参与意识，同时也产生了改善自身在社会中地位的要求，因此，大量妇女投身到19世纪末的改革洪流中，如社区改良运动即是以妇女为主体的改革。在改革活动中，妇女们日益意识到争取参政权的必要性，并为此进行了持久不懈的努力。

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斗争，起步于40年代，但当时参加斗争人数少，影响有限。八九十年代后，才开始形成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斗争，并涌现出一些著名的领袖人物，苏珊·布劳内尔·安东尼即是突出的一个。安东尼于1820年生于马萨诸塞州亚当斯市一个笃信教友派的家庭。内战时期，她是反奴隶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内战后，全力投入妇女参政权的斗争。当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授予所有男性公民选举权时，她曾力图使妇女享有同样权力，但未成功。后来，她与著名女权运动领导人伊利莎白·卡迪·斯坦顿合作，在纽约出版了《革命》周刊，主张妇女应享有选举权、对自己财产支配权、以及离婚后对子女的监护权等，并为此到全国各地游说，争取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但是，对于如何争取妇女参政权，安东尼和其他女权领导人之间存在很大分歧，以致形成两大派别。以安东尼和斯坦顿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通过联邦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实现妇女参政权，她们于1869年5月组成全国妇女参政权协会。以露西·斯通和朱利亚·W·豪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以各州宪法修正案形式实现妇女参政权更为可行，她们于同年11月另组美国妇女参政权协会，并出版《妇女杂志》。这种组织上的分歧极大地削弱了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力量。再加上当时社会变动，问题纷杂，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因此妇女参政权的斗争进展较迟缓。直到1890年，这两大组织才联合起来，组成全美妇女参政权协会，并将两派主张结合起来，提出以联邦宪法修正案或各州宪法修正案两条途径去

争取妇女参政权。斯坦顿为该协会首届主席。两个组织的联合增强了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声势和实力，因而获得较明显进展。至19世纪末，已有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爱达荷州等授予妇女以选举权。

很多妇女在争取参政权的同时，也积极投入禁酒运动。当时最活跃的禁酒组织是1874年组成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该组织建立之初，其纲领较温和，仅仅试图诉诸于社会道德的力量来实现禁酒。1879年弗朗西斯·韦拉德出任主席后始有较大变化。她不赞成搞单纯的禁酒斗争，而主张与其他方面改革运动实行广泛的联合。此后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支持妇女参政权斗争、服饰改革、人民党运动，甚至劳工运动。结果，该组织声誉日增，到1890年，会员已达16万人。[1] 当时致力于妇女、儿童、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改革的某些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的影响，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改革。

当然，这一时期的妇女参政权运动和禁酒运动还处于初期阶段，未取得十分明显而巨大的成就。但这些运动已达于全国规模，并且形成有组织的斗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都为20世纪的进一步改革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

〔市内交通及市政建设其他方面的改进〕　由于城市勃兴所产生的客观要求和市政特许权的刺激，市政建设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尤其是在市内交通方面。

19世纪上半期，各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有轨马车”。这种马车在铁轨上行驶，车厢很长，一般可载40个乘客，最多可容纳74人。但这种车在市中心区行驶颇为不便，尤其在上、下

---

① 罗伯特·凯利：《美国过去的形成》，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86年，第421页。

班高峰时，往往车辆堵塞，影响交通。尽管如此，因一时还未出现更好的交通工具取代它，直到80年代仍在应用。

60年代，有人试图将蒸汽机车应用于市内交通，但因这种机车车体庞大，不宜在市区街道上行驶，于是出现了"高架铁路"的构想。1867年，纽约市架设第一条高架铁路。这种"火车"通常是由一辆小型蒸汽机车牵引四个车厢，运载能力较强。八九十年代，芝加哥、堪萨斯等城市相继建造了一些高架铁路。

70年代，人们又发明了"缆车"。这种车也是在铁轨上行驶，通过车下悬浮的钢缆绳进行操纵。它的速度相当于有轨马车两倍以上，而且适于爬坡，在旧金山这样的山城尤为适用。1873年旧金山市率先使用缆车，随后也有一些城市采用之。

然而，高架铁路和缆车均有缺陷，或是造价昂贵，或是使用不便，不宜大规模推广。城市交通的重大技术突破是电力的应用。80年代，电机的发明为电力的应用开辟了广阔途径。不久，安那波利斯市一位工程师弗兰克·J·斯普拉格成功地设计出有轨电车，并进行了远程输电试验。1887年，他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建成美国第一条市内电气化铁路，即有轨电车。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与改进，有轨电车的造价下降且效能提高，很快在各城市风行起来。1890年，全国已有51个城市使用了有轨电车，5年后，全国的有轨电车系统达850条，线路总长度达1万英里。[①]有轨电车的出现使有轨马车大为逊色。1890年，在市内铁轨线路总长度中，有轨马车尚占69.7%，到1902年陡降至1.1%，而有轨电车所占比例则高达97%。[②]尽管这时的有轨电车还有许多尚需改进之处，但它和以前的市内交通工具相比，在基本造价、

① 查尔斯·格莱布等：前引书，第160页。

② 查尔斯·格莱布等：前引书，第160页。

安全性能、运载能力等方面均居明显优势，所使用的动力也由马力和蒸汽变为电力，因此，它的发明及其应用是城市交通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

除市内交通以外，市政建设在照明、通讯、建筑以及桥梁架设等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改进。爱迪生发明白炽灯后，最早被用于室内照明。如 1884 年，芝加哥全市住房都采用了电灯照明。1897 年，电弧光灯问世，取代火苗跳跃不定的汽灯而成为户外照明的主要用具。八九十年代后，电报和电话也进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领域，极大地便利了城市内部以及各城市间的信息传递。

在建筑方面，集中供热系统和钢架结构建筑法先后于七八十年代试行，标志着建筑水平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高层建筑得以风靡一时。如芝加哥开始以其成群的十余层高的摩天大楼而名噪一时。

城市间的频繁往来，也刺激了桥梁的架设。到 1909 年，全国共架设了长度在 500 英尺以上的桥梁达 365 座。这些桥梁，不仅架设速度快，而且技术水平高超。如 1883 年落成的“纽约——布鲁克林大桥”，长达 1 英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悬桥。[①]

总之，由于种种因素的刺激，市政建设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就总体而言，仍有众多庞杂的问题亟待解决。诚如有的美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这一时期城市虽有改进，“但仍保留了许多丑恶和野蛮的特色”。[②] 八九十年代所展开的城市改革运动，虽步履艰难，但毕竟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从而为 20 世纪更大规模的改革开辟了道路，拉开了进步运动的序幕。

---

① 老阿瑟·施莱辛格：前引书，第 89 页。

②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等：前引书，第 2 卷，第 269 页。

第十章

19 世纪后期美国的对外政策

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年代，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为美国从大陆扩张转向海外扩张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它在对外政策方面也作了重要的改变。为了适应商品输出、争夺势力范围的需要，美国抛弃了它的孤立主义传统，日益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它一方面利用门罗主义作为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排挤英国势力的工具，以实现它独霸拉丁美洲的野心。另一方面积极扩充海军实力，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进行频繁的侵略扩张，以夺取新的领地和势力范围。1898 年，它发动了美西战争，接着控制了古巴，霸占了菲律宾，兼并了夏威夷群岛，从而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行列。

第一节　美国海外扩张的背景

〔美国经济增长与海外市场争夺〕　美国的对外扩张是它的经济发展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在美国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随着美国工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美国进口商品激增，出口

商品则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同时，美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内战前，美国进口制成品，出口小麦、棉花等粮食作物和原料；到19世纪后期，出口项目开始把纺织品、农具、机械、铁路设备等制成品包括进去，进口项目列入了羊毛、砂糖、咖啡、铜、石油和橡胶等与新兴工业有关和城市居民需要的物资。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出口总额1870年为39,277万美元，1880年为83,563万美元，增长了100%以上。对外贸易长期存在的入超局面，在70年代中期以后基本上得到扭转，逆差变为顺差。美国的对外投资在70年代初只是个别情况，这是因为那时美国尚无过剩资本，但资本外流的情况已经开始出现。80年代末以后美国的资本输出虽然有限，但已变得经常了，主要是投向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其中墨西哥和秘鲁都是最早吸引美国资金的国家。

1873、1882、1893年的三次经济危机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反映，表明美国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与市场相对不足的尖锐矛盾。但是直到西部边疆"消失"之前，美国的企业家大多是全神贯注于他们的国内事业。19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津贴仍然为数甚微，它宁愿靠保护关税促进国内开发。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能冲淡美国日益增强的对外扩张的势头。1878年，纽约的一些企业家便曾催促国会拨款扩充美国的国外通讯设施。1879年，美孚石油公司开始向国外倾销产品。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远西部轮船公司、兰德麦克来尼公司和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等，都向国外派出了常驻代表，有的还在国外建立了分支机构。尽管有些美国商人开始时缺乏良好训练，经商不顾时令季节，不研究市场的需要，加上语言不通，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远不如英、德等国商人。但是在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商业活动已经遍及世界各地。除了加拿大和欧洲这些传统的市场

外，还有太平洋的萨摩亚和夏威夷以及拉丁美洲、远东和非洲。美国早在70年代就谋求打开刚果的门户，随后参加了1884年在柏林召开的刚果问题国际会议，渴望非洲成为它自由扩张的场地。此外，连人迹罕至的北极也受到美国的注意，甚至有人急于要在北极建立战略据点，并把这种倡议叫做“光荣”的竞赛。

美国急于扩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它的经济实力与它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极不相称。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1%；而它在世界贸易中则占第3位，落后于英国和德国，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在对外投资方面，它更是远远落在英、法、德诸国之后。[1] 改变这种状况，就成为19世纪末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更重要的是，当美国步入世界舞台时，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已经霸占了可以瓜分的绝大多部分殖民地，而德国、日本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加入了列强角逐之列。因此，美国的扩张活动一开始即面临着严峻形势。尽管美国国内市场尚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但它已不能等待国内市场饱和之后再去强占海外市场。“美国之鹰”渴望展开它已经丰满的羽翼，在19世纪末的国际角逐中去占据一席之地。

〔*为海外扩张制造舆论*〕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界、军界、商界以至舆论界的大批要人，都宣扬极端的沙文主义，主张推行以武力为后盾的扩张主义对外政策。著名的海军战略学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声称：“至少有1/3的机械和农产品超过我们的需要，我们必须输出这些产品，或者驱逐生产这些产品的

---

① 库钦斯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研究》，三联书店，第45、41、42、93页。

人。"[1] 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约翰·米勒认为："现在已到了这样的时候，国家繁荣，到处兴建制造业，因而需要寻求新的市场以保持我们的工厂开工。"[2]

许多城市工商企业组织，更是对追求海外市场表现了极大热情。当时纽约已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该市商会年会曾热烈讨论了推动对外贸易问题，作出了相应决议，并向政府提交了请愿书。其中特别反对英国对拉丁美洲贸易的垄断，担心美国的排华最终会影响它在远东的经济利益。纽约商会和运输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还通过决议，建议大西洋沿岸城市共同讨论它们一致关心的商业问题。与此同时，商业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有影响的代表刊物有《美国投资》、《制造业和建造业者》、《铁路时代》、《美国出口商》和《钢铁时代》等，这些杂志常常鼓吹政府应当帮助工商业者去开拓国际市场。1885 年的一期《钢铁时代》强调，商人和制造业者需要"鼓舞性"的政策，政府应当不惜以武力去为商人开拓市场。"有枪才能旅行"[3] 的观念，已为这些杂志所习用。另有一家商业杂志认为，"我们的对外贸易进行得'很好'，可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得更好。我们拥有肥沃的土地、良好的气候、精力旺盛的人民等优势以及世界上最完善的交通系统，为什么要落在后面呢?""美国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工厂和金融中心，也可成为世界的谷仓。"[4]

美国政府在推动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

---

① 查尔斯·S·坎贝尔：《美国对外关系的转变（1865—1900)》；纽约，1976 年，第 109 页。

② 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编：《美国外交的形成》第 1 卷，芝加哥，1962 年，第 339 页。

③ 米尔顿·普雷瑟：《冲出美国：1865—1890 年外交关系研究》，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1 年，第 24 页。

④ 米尔顿·普雷瑟，前引书，第 33 页。

用。海斯总统的国务卿威廉·M·埃瓦茨遴选一批具有从事工商业经验的人出任驻外领事，要求这些领事每月提供一份驻地的详细经济情报，其中包括工商业活动、银行活动以及金融、税收、交通和劳工等方面的信息。有的经济情报还分析了某些美国商品在海外滞销的原因，提出了怎样做广告，鼓吹在海外设立工商企业和银行的分支机构，甚至建议开办永久性商品展览机构等等。美国驻外人员提供的准确经济情报，深受美国国内工商企业主、各地商会和经济刊物的欢迎，大大推动了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

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是直接关系到美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件大事。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党和共和党围绕关税问题展开的长期斗争，反映了企业界内保护主义者和自由贸易鼓吹者之间的激烈矛盾，而美国政府的更迭，也使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状况。自由贸易主义者认为，高关税势必带来国外对美国海外经济活动的敌视；保护主义者则强调，低关税会使便宜的英国货物泛滥美国市场。后来一些开朗的保护主义者提出一项折中办法，即互惠贸易。互惠贸易成为日后美国对加拿大尤其是对拉丁美洲大力推行的政策，它既是美国扩大市场的手段，又是用来“对抗欧洲在这个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的影响。”[①]

〔“新天定命运”说〕　“天定命运”说认为美国人在北美大陆上进行的扩张和征服乃顺应上帝赋予的使命。在19世纪上半期，这种“天定命运”说主要反映了美国种植园主的扩张要求：除向美国西部扩展外，还对邻近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扩张活动。内战后，由于奴隶制度的垮台，“天定命运”说也随之沉寂

① 米尔顿·普雷瑟，前引书，第33页。

了。

随着美国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对外扩张的要求不断增长，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天定命运”说又盛行起来，人们称之为“新天定命运”说。它反映了美国工商企业家的扩张要求。他们的扩张活动不仅限于毗邻美国的国家和地区，而且还致力于夺取海外领地和扩大势力范围。“新天定命运”说同早期“天定命运”说相比虽然同是宣扬宿命论，却多了一些哲理依据。其中主要的是种族优越论。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美国的种族优越论也是甚嚣尘上。有的学者以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依据，力图证明盎格罗—萨克逊种族的优越性是不可争辩的，它注定是要负起“文明的传播者”的任务的。[①] 有些传教士则把宗教活动与经济扩张结合起来：在海外传播福音中开拓市场，在开拓市场中传播福音。在传播福音中，他们把美国人说成天定的选民，是被上帝挑选来领导落后民族的基督教徒。因此，美国“有能力把它的制度传播于全人类，把它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地球。”[②] 这就是“新天定命运”说的核心。

“新天定命运”说的另一种依据是地缘政治学。有的美国扩张主义者，如布鲁克斯·亚当斯就极力宣扬地缘政治，说美国必将控制亚洲，并且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他认为，俄国和日本是美国在争夺亚洲角逐中两个危险的对手，因此，美国应加剧和利用俄、日两国的矛盾，使它得以在广阔的亚洲地区居于支配地位。为了说明美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他还运用西方历史的发展加以论证。在他看来，“世界文明的一些中心，都是随着经济财

① 参看本书第11章第1节。

② 转引自J.W.普拉特：《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巴尔摩尔，1936年，第6页。

富和边疆提供的机会环绕地球向西伸展，并且这条伸展的路线是显而易见的：从地中海沿岸地区通过西欧到大不列颠，然后横越大西洋到北美大陆。”[①] 他所说的世界文明中心，实际就是统治世界中心，按照他的逻辑，美国注定成为统治世界中心。

〔海军复兴与马汉战略论〕 复兴海军即建设现代海军，是美国对外扩张的必要条件，也是美国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海军，是一支由142艘过时的木质结构船只组成的舰队，没有一艘铁甲舰，其中较大的适于远航的只有12艘，并且都已服役多年。实际上，这是一支速度很慢、攻击能力很差、在战争中难以取胜的舰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设现代海军，整个80年代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热烈讨论。参议员约翰·摩根抱怨说：“美国政府的政策一直处于踌躇不前的困境，这是因为没有一支巨大的舰队提供可供使用的力量。”[②] 海军部长威廉·惠特尼等海军官员认为：“很明显，有强大海军才能有成功的外交。”根据同样的认识，他们认为“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立场而没有强大海军的支持，就是招致灾难。”[③] 从拉瑟福德·海斯开始直到本杰明·哈里森的几届总统，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支持建设强大海军的。曾两次出任国务卿的詹姆斯·布莱恩更是积极致力于建设大海军，鼓吹不断扩大建设海军的必要性。于是，要求美国“有一支比得上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海军，”“建设海军，直到用完美国国库最后一块美元”[④] 这样的呼声，就甚

---

① 转引自丁则民：《“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载《美国历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第508—509页。

② 威廉斯编：前引书，第338页。

③ 威廉斯：前引书，第338页。

④ 威廉斯：前引书，第343页。

嚣尘上了。

在美国复兴海军的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后来被称为美国“现代海军之父”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马汉毕业于美国海军最高学府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其后长期在美国海军中任职。内战后，随着美国海上扩张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他又率舰驰向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各地进行活动。后来他以海军上校身份出任海战学院讲师，致力于海军史和海军战略的研究和讲授。马汉是美国著名的海军战略家和海军史学家，也是著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马汉的海军战略思想的代表作有1890年问世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和1892年发表的《制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年)》。在这些著作中，马汉特别详细地考察了英国在17、18世纪同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争夺霸权的多次重大海战，研究了英国建立强大繁荣的“日不落帝国”的历史。他指出英国的繁荣强大归根结蒂是因为那时英国掌握了制海权，建立了地球上第一流的和最强大的海军。因此，他认为，制海权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是国家繁荣和富强的物质因素中的首要因素。“历史的钥匙……就是制海权”。①

马汉认为美国拥有成为世界上海军强国必须具备的一切条件。他说这些条件是：（一）居于直接通向海洋的地理位置；(二）拥有深水良港的延伸海岸线以及流经肥沃农耕地带的巨大河流等自然结构；(三）沿海地区人口的适当分布；(四）具有从事航海和开发海上资源的足够人力；(五）具有经商才能的民族秉赋；(六）奉行明智政策的政治结构。

---

① 威廉斯：前引书，第341页。

马汉强调海军是进攻的武器。他认为美国海军不应仅限于保卫美国边疆，还必须能够在任何地方保护美国商业，并强大到足以采取主动行动。只有强大海军才能重创敌人，取得海上的统治地位，促进美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他还认为美国要变成海军强国，除了必须建立起世界上第一流的海军外，还必须在靠近美国的水域建立战略基地，在世界海洋的关津要道上建立据点和夺取殖民地。他在鼓吹向太平洋和加勒比海扩张时，特别强调美国需要据有夏威夷的珍珠港，萨摩亚的帕果帕果这样的加煤站和开凿沟通两洋的巴拿马运河。这就是他勾画的美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适应复兴海军加速对外扩张的需要，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883 年，美国国会通过拨款以建造 4 艘现代铁甲舰的议案，1885 年，海军部决定在新港举办海战学院，1886 年开始建造的战列舰“缅因”号于 1890 年建成下水。从 1890 年起，美国开始大力建造第一流战舰，到 1900 年共建造了 15 艘一流战列舰和 5 艘装甲巡洋舰。随着美国海军实力的增强，美国海军实力在世界各国中由 1880 年的第 12 位上升到 1895 年的第 5 位，到 1900 年进而上升到仅次于英、法两国的世界第 3 位。在 1898 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就是靠这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海军打败了西班牙。

第二节　美国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

〔染指朝鲜的最初步骤〕　在远东，美国从鸦片战争起就参加了侵略者的行列。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正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周边的国家也日益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犯。美国在 1853 年派马修·佩理少将率舰打开

了日本门户，之后便以日本为踏板来到朝鲜。打开朝鲜门户被美国当局看作是它的“海军在内战和美西战争之间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1]

1866—1871年，是美国侵略朝鲜活动的第一阶段。开始时它出动武装商船，继则派出海军舰只，敲打朝鲜的大门。1866年，在天津的美商结伙20多人，乘坐武装商船“谢尔曼将军号”于7月闯入大同江直至平壤，一面要求朝鲜通商和供应船上需用的粮食，一面测量水位，侦察地形，企图盗掘平壤王陵埋藏的宝物。朝鲜政府仅同意提供粮食，但拒绝通商。于是，美国这艘帆船竟炮轰江中往来的朝鲜船只，但却遭到朝鲜军民有力的还击，结果该武装帆船被焚毁，船上人员亦全部死亡。“谢尔曼将军号”事件后，另一个美国人F. 琼金斯于1868年组织了一个100多人的“勘查队”，乘美船“中国号”侵入朝鲜。他们沿用“谢尔曼将军号”故伎，去忠清北道盗劫陵墓，甚至策划盗取陵墓中的国王尸骨用以胁迫朝鲜订立通商条约。结果也可耻地失败了。

在美国海盗船只侵朝活动接连失败后，1871年美国派它驻中国公使F. 镂斐迪偕同其驻华海军司令J. 罗杰斯率军舰5艘，以调查所谓“谢尔曼将军号”事件为由，于5月间闯入汉江，企图偷袭汉城，迫使朝鲜订立通商条约。驻守汉江朝鲜军队被迫开炮阻止美舰前进。在双方发生炮战时，美海军陆战队750人强行登陆，屠杀了大批朝鲜军民。但在朝鲜人民坚决反对下，以镂斐迪为首的美国侵略者，到7月初不得不偃旗息鼓，从朝鲜撤退出去。

1876年2月，日本政府靠炮舰政策强迫朝鲜签订了所谓《朝日修好条约》，即《江华条约》，规定开釜山、仁川、元山等

---

[1] 普雷瑟：前引书，第220页。

港为商埠，日本在朝鲜享有治外法权等特权。这件事更加推动美国急于闯入朝鲜。1878年美国政府决定派遣海军准将罗伯特·薛斐尔（即舒费尔特），乘海防舰“台康德罗加号”去朝鲜执行任务，这就开始了美国侵略朝鲜的第二阶段。

薛斐尔是一个很顽固的扩张主义分子，他坚持“美国是太平洋的开拓者，”“从未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失去信心。”[①] 同时他汲取了前段强迫朝鲜开埠通商遭到失败的教训，这一次采取了借助日本和中国斡旋的办法。1880年春，薛斐尔到达日本，打算由日本驶往朝鲜釜山。由于日本对薛斐尔使命怀有戒心，担心美朝通商会损害它在朝鲜的优势，因而拒绝在薛斐尔和朝鲜之间进行调解，只允诺把薛斐尔要求晋见朝鲜国王和谋求缔结通商条约的信件转交朝鲜官员。但是薛斐尔信中所提的要求遭到朝鲜断然拒绝。

薛斐尔遭到失败后，转请清政府向朝鲜说项。他以日本在远东的扩张相威胁，说朝鲜如不与美国缔约，便可能完全为日本所控制。这种说法果然打动了李鸿章。他遂劝说朝鲜与美国通商以牵制日本以及俄国对朝鲜的野心。在清政府敦促下，朝鲜于1882年5月与美国订立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即“仁川条约”。

〔“仁川条约”与美日合谋〕　“仁川条约”是不平等条约，除规定朝鲜开放3个港口、保护美国人通商自由外，美国人还享有治外法权，并规定朝鲜课征进口税不得超过货物价值的10%。此外还把1884年“中美望厦条约”提出的“利益均沾”原则搬到朝鲜，规定嗣后凡朝鲜让与其他国家的权益，美国官民应一体均沾。这项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给美国开辟了一条扩大

---

① 普雷瑟：前引书，第222页。

扩张活动的途径。条约还规定：由于其他国家对朝鲜的不公正行动和压迫引起的纷争，美国得进行“斡旋”。这一条款给日后美国反对中国援助朝鲜，支持日本侵略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美国之所以确认朝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无非是要排除中国给予朝鲜的援助，除掉它侵略朝鲜道路上的一大障碍。美国把“仁川条约”的缔结看作一大胜利，说它“预示着太平洋地区很快就会成为美国商业领地，”[①] 吹捧它是“美国对外政策积极形象的惟一范例。”[②] 1883 年以后，英、俄、德、法等国都效法美国的“范例”，相继同朝鲜订立了类似朝美条约的不平等的双边条约。

“仁川条约”开辟了美国侵略朝鲜的新阶段。此后，它一面对朝鲜进行经济渗透，一面反对传统的中朝关系，支持日本的侵朝活动。不久，美国烟草、砂糖、石油等商品便涌入朝鲜市场，美商还强行向朝鲜推销4,000 支来福枪，高价出售过时的陈旧船只。此外，美国还夺得了种种经济权益，包括仁川至中国上海和釜山至日本长崎的海上航线开辟权，云山金矿勘探权、郁陵岛森林采伐权和王宫电灯架设、电站修建权。切斯特·阿瑟总统也说：“朝鲜现在正在引起（美国）关心对外贸易发展的人们的注视。”[③]

1873 年，美国还以在朝鲜外籍人中传教的名义，取得在朝鲜传教的权利。1884 年以后，美国传教士大量涌入朝鲜。他们最初以汉城为中心进行活动，后来扩展到京畿道、平安南道和咸镜道等地。有些传教士以办教育和慈善事业为名，宣传“西方文

---

① 普雷瑟：前引书，第 22 页。
② 普雷瑟：前引书，第 223 页。
③ 金熙一：《美国侵略朝鲜史》（日译本），东京，昭和 47 年，第 50 页。

明"，也有的直接为美国的经济扩张进行活动。

这个时期假日本之手扩大侵略朝鲜，已经成为美国的基本策略。以实现朝鲜"独立"为名的"甲申政变"就是在美国支持下演出的丑剧，其目的就在于勾结日本反对中国。朝日"江华条约"缔结后，日本扶植朝鲜卖国势力组成开化党。1884 年（甲申年），日本在美国支持下，利用法国进攻安南挑起中法战争之际，唆使开化党首领金玉均、朴永孝等人以鸿门宴方式发动政变，杀害反对投靠日本的显要大臣多人，并劫持国王妄图夺取政权，但终因朝鲜人民的反对和中国军队的介入，"甲申政变"失败了，朴永孝等人纷纷逃亡美国。参加政变的日本侵略军，也被中国军队赶出汉城。但是，不久日军增援部队在仁川登陆，中国因陷于中法战争，被迫于 1885 年 4 月同日本签订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离朝鲜，日后必要时，经过会商，双方均有出兵朝鲜的权利。

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的不断扩大，是同美国的支持分不开的。以查尔斯·李仙得这个先后出任过美国驻厦门领事和日本外务省顾问的扩张主义分子为首，一大批美国人充任朝鲜内政、外交、军事乃至海关的顾问，任意摆布朝鲜国王，致使"美国在汉城的势力很容易地居于其他各国之上。"[①]

〔对华侵略的种种手段〕　早在内战前，美国便注意到太平洋彼岸的"非凡帝国"中国的巨大贸易潜力，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贸易。"[②] 进入 80 年代时，美国国务卿威廉·W. 埃瓦茨更为兴奋地宣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具有不可限量的前途"，并断言由中国出口"到欧洲诸国的贸易，将要由（美国）我们的

---

① 转引自卿汝楫：前引书，第 389 页。

② 普雷瑟，前引书，第 214 页。

贸易及金融体系来控制。”[①] 美国在19世纪后期正是抱着这样的野心，或在欧洲列强侵略中国时趁火打劫，或支持日本侵略中国，或直接通过它派往中国的官员、商人和传教士等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中美“天津条约”和“利益均沾”原则，使美国在中国获得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缔结的其他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取得了新的巨大殖民利益：它不仅可以派出公使常驻北京，还可以利用大批新开口岸，使其商业势力由沿海各省伸入到长江上游；有关通商、海关和税率的各项规定，给美国货物倾销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传教士得到由通商口岸自由进入内地传教的权利和外国人游历内地的自由，更加便利了美国侵华活动；准许华工出国的条款，后来给美国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美国传教士在侵略中国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美国来华的传教士1845年为20人，1898年猛增到1,500人左右，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侵略中国的规模和速度。这些传教士深入到一般白人足迹不到的中国内地，他们除了宗教活动外，还从事各种职业，包括经营商店、工厂、建立诊疗所和学校等，广泛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情报。各地教堂经常包揽诉讼、破坏中国司法主权；各地教士不断制造事端，勒索赔偿，强夺民产，甚至在通商大埠为美国占据大块租界地。上海美国租界就是由教士滋事强占的。19世纪60年代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传教士的侵略活动，导致各地教案迭起，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和斗争。

假手日本侵略中国是美国在华扩张的又一手段。1872年，日本在美国支持下监禁琉球国王，废除了琉球对中国的“宗藩”

---

① 转引自卿汝楫：前引书，第36页。

关系，1878年进而废除琉球国王，把琉球并入日本，改为日本冲绳县。同时美国根据马修·佩理1854年同琉球缔结的“美国琉球条约”继续保有自由使用琉球土地的权利。这样，日美两国就把琉球变为它们靠近中国海岸的活动据点。

台湾是美国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就曾企图染指的地方。为了侵占台湾，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广泛搜集了关于台湾港湾、地理、交通、居民和海防的情报。1872年日本开始策划侵占台湾时，美国驻日本公使积极为之出谋划策，李仙得还亲自赶往日本，把台湾的领海图、地图等方面情报资料交给日本。1874年日本出兵进攻台湾时，美国陆海军官多人参加战斗，李仙得还参加了指挥。后来，由于清政府派出2万军队去台湾迎战日本侵略军，加上岛上居民奋勇抵抗，日本才被迫撤出其侵略军，并派官员来中国谈判。这时，美国驻天津领事不仅替日本探听中国态度，还胁迫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否则日本“必不退兵，且将决裂。”[①] 结果，中国在同意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之后，才暂时保持了对台湾的主权。

中日甲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美国假手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战争爆发前，中国鉴于日本蓄意制造战争，曾两次请求美国政府会同其他列强出面调停，但都被美国拒绝。它声称严守中立，不能进行干涉，并诡称它看不出日本要诉诸战争。战争开始后，中中从朝鲜败退，打算言和，英、俄、法、德各国也有意进行调停，美国仍以不拟干涉为借口拒绝参与。因为它认为“中国遭到败北，直到它的皇室受到威胁为止，都是有益的事情。”[②] 后来在中日议和中，美国极力反对欧洲列强参与调解，力图独自左右

---

① 卿汝楫：前引书，第366页。

② 卿汝楫：前引书，第202页。

中日和谈。“马关条约”关于允许外国在中国兴办工业、开矿、修建铁路等条款，也是美国协助拟定的。经过这次和议，美国获得了它在中国一直谋求但未得到的殖民权益。

甲午战争后，美国怀着极大野心参加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1895—1898年，美国对华商品输出由360万美元增加到近1,000万美元。美国还在甲午战争结束前，就制订了在中国兴办银行、修筑铁路和开矿的计划，并打算占有大沽港和三沙湾。为取得芦汉、津镇、粤汉等铁路的修筑权和给予中国贷款，美国同欧洲列强展开了剧烈的争夺。由于美国在总的力量对比中尚处于不利地位，故其许多计划落空。但美国终以对中日马关议和有“功”，在1898年4月从清政府初步取得粤汉铁路承造权；随后乘机于同年9月提出了旨在挤进中国、夺取地盘的“门户开放”政策。

〔购买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　阿拉斯加在18世纪末沦为俄国殖民地。它是北美洲连接远东、日本路程最短的交通要道，也是19世纪后期美国对外扩张中最早获得的一块领土，而今成为美国在北太平洋的战略要地。

1867年3月，俄国为了加剧英美之间的矛盾，也为了取得一笔收入，派官员到美国洽谈出售阿拉斯加问题。当时美国国务卿威廉·西沃德是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他在同俄国谈判时，开始时出价500万美元，后以720万美元的代价同俄国在一夜之间达成了购买阿拉斯加的协议，并且急不可待地于翌日凌晨在协议书上正式签字。实际上，美国以每平方英亩1.2美元的代价买到了这个巨大的半岛。

那时在美国，只有少数渔民希望得到出入阿拉斯加海港的权利，一部分加利福尼亚商人谋求在那里从事毛皮贸易的特权，而多数人对阿拉斯加是一无所知的。西沃德签订购买阿拉斯加协议

后，立即在国内引起一片反对声，说阿拉斯加是“西沃德的冰箱”，认为“没有必要（因购买阿拉斯加）去激怒英国人”，批评这是“一笔糟糕的交易”，“一个异乎寻常的错误”。

但是西沃德顽强地争取了许多国会议员的支持。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雄辩家。在西沃德的支持下，萨姆纳狂热宣传占有阿拉斯加既可以提高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消除俄罗斯君主制对北美的威胁，又能防止英国抢先占有这个地方以加剧它对美国的威胁，并增进美俄两国的友谊以对付共同的敌人英国。结果参议院接受了西沃德的扩张主义立场，1867 年 4 月和 7 月，参众两院分别都以多数票通过了这项协议。

阿留申群岛是阿拉斯加和俄国堪察加半岛之间的弧形列岛，绵延约 200 公里。1867 年美国购买阿拉斯加时，包括这群岛在内。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总面积为 155.8 万平方公里，购买这两个地方使美国版图扩大近 1/3。西沃德在其国务卿任内，还在太平洋获得了一群有战略价值的小岛——即中途岛，它们于 1867 年 8 月为美国海军所占据，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前哨阵地。

〔争夺萨摩亚群岛〕　争夺和侵占萨摩亚群岛，是美国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在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侵略活动之一。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是通往西太平洋的路标。美国政府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为适应捕鲸业发展的要求，曾派出科学考察团到这里进行考察，但是直到内战前萨摩亚群岛并没有引起美国的重视。内战后，在美国海军搜寻逃往海外南部同盟私掠船的活动中，才使美感到有在这里设立一个加煤站的必要，以发展它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海上交通运输。1869 年，横贯北美大陆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建成，促进了美国经由西海岸同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贸易，萨摩亚因而更加引起美国的重视。1872

年，美国海军军官在萨摩亚登陆，取得帕果帕果港建立海军基地的特权，此后美国便积极谋求对萨摩亚的控制。1877年5月在萨摩亚升起美国国旗，这是美国企图在此建立保护国的标志。1878年，美国迫使萨摩亚在华盛顿签订了一项条约，确认美国在萨摩亚群岛东部的主要岛屿土土伊拉岛的帕果帕果港建立加煤站的权利，美国人在萨摩亚享有领事裁判权；条约还规定萨摩亚同任何其他国家发生纠纷时美国得进行调处。这个条约是美国对萨摩亚政策的基石。

当时同美国争夺萨摩亚的有英国和德国。在美国—萨摩亚条约缔结后的第二年，英、德两国也强迫萨摩亚接受了同样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和美国同样的殖民特权。实际上，这时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不具备单独控制萨摩亚的实力，而萨摩亚这个小小的群岛，实则时刻都处在大国争夺的阴谋之中。当地的波利尼西亚居民备受欺凌和侮辱，并在殖民主义者的挑动下陷入了血腥的内部冲突和混乱。1887年夏，美国国务卿托马斯·贝阿德在紧迫的形势下邀请英、德两国驻华盛顿使节讨论萨摩亚问题。德国差不多是和美国同时登上国际舞台参加瓜分世界的活动，因此美、德两国在萨摩亚狭路相逢，竞争尤为激烈。当时德国对萨摩亚的贸易比美国多。德国在会上坚持在贸易中占优势的大国应当控制这个群岛。英国为削弱美国在萨摩亚的地位，采取了支持德国的立场。美国为同英、德两国抗争，打出了“尊重”萨摩亚自主权的旗号。结果英、美、德三国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由于达不成任何协议而破裂了。

随后，德国寻衅对萨摩亚宣战，驱逐了受到美国支持的萨摩亚国王，另立它自己的傀儡。贝阿德抗议德国破坏萨摩亚的现存秩序，同时在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片战争叫嚣，表示决心保护美国在萨摩亚的殖民权益。国会立即通过决议，拨款50万美元保护

萨摩亚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另外又拨款 10 万美元用于建设帕果帕果港。这时萨摩亚的上空战云密布，一支英国舰队、3 艘德国战船和 3 艘美国战船都停泊在帕果帕果以西的阿皮亚港，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不过，当时德国并不想为萨摩亚同美国发生公开对抗，遂采取主动行动邀请英、美代表到柏林重开关于萨摩亚问题的谈判，但直到柏林会议前夕，萨摩亚的局势仍然是爆炸性的。幸而 1889 年 3 月 16 日飓风袭击阿皮亚港，英国舰队仓皇逃离，美国和德国舰只大部被毁，人员伤亡惨重。这才使局势化险为夷，避免了美国同它的竞争者之间的战争。

讨论萨摩亚问题的柏林会议于 1889 年 4 月 29 日开幕。由于美、德两国战舰都已被暴风摧毁，会议气氛反而有所改善，各方都出人意料地表现出和解态度。6 月 14 日，会议达成协议，决定恢复萨摩亚国王名义上的统治，而岛上的一切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均被置于英、美、德三国领事的共同控制之下，萨摩亚人民则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美国和英、德两国又勾结起来，使萨摩亚处于美、英、德三国的共同保护之下，但这并不是它们争夺萨摩亚的终结。美西战争之后，1899 年英、美、德三国又达成新的交易：英国退出对萨摩亚的争夺，作为补偿，德国承认太平洋上的东卡岛和所罗门群岛的一部分为英国属地；以西经 171 度为界的西萨摩亚群岛归德国所有；包括土土伊拉港在内的东萨摩亚群岛为美国所有。这样，美国和德国就实现了对萨摩亚群岛的最后瓜分。

〔*兼并夏威夷群岛*〕　夏威夷群岛是太平洋上比萨摩亚群岛更为重要的通往西太平洋的交通枢纽，被美国看作是它商业的前哨基地，也是太平洋上美国海防的第一线。这个群岛是英国人在 18 世纪发现的。继英国之后，法国和美国的殖民势力也相继而来，成为英、法、美三国觊觎的地方。但是直到 19 世纪前期，

由于殖民国家的相互牵制，谁也未能独占夏威夷群岛。70年代后，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从夏威夷退了出去，英国由于在世界许多地方遇到有力的挑战，随着夏威夷王位继承斗争中亲英势力的失败也退出了对夏威夷的争夺。惟独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自以为成了太平洋上一支新兴的力量，试图插足夏威夷，对后来美国兼并夏威夷的活动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在夏威夷的外国殖民者中为数最多的是美国人。他们主要是充当土人酋长顾问的传教士、经营甘蔗的种植园主和商人等。进入80年代，这些美国人已掌握了夏威夷经济的命脉。当时，美国国务卿、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詹姆斯·布莱恩就提出美国在夏威夷群岛有优先利益，反对其他殖民国家插手于夏威夷事务。他说："夏威夷群岛不能并入亚洲体系。一旦它放弃独立地位，根据自然法则和政治上的需要，必然要并入美国体系，而且必须并入美国体系。"①

在兼并夏威夷的活动中，美国外交官员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同夏威夷签订了3个条约，但都因为没有能满足美国统治集团的扩张野心被国会拒绝了。到1875年，当时的国务卿汉密尔顿·菲希终于迫使夏威夷接受了适应美国扩张意图的所谓互惠条约，规定降低双方关税，夏威夷不得割让领土给其他国家。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准许夏威夷生产的糖免税进口。这个条约促进了夏威夷制糖业的发展，到1877年至1887年的10年里，糖产量增加4倍。然而由于夏威夷的糖大部向美国输出，结果使夏威夷在经济上大大增加了对美国的依赖性，这也是美国兼并夏威夷的重要一步。1887年修改1875年条约时，美国又取得在夏威夷群岛瓦胡岛的珍珠港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从而使这个群岛进一步

---

① 日本国际研究会编：《美国的太平洋政策》，东京，昭和17年，第8—9页。

落入美国手中。

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兼并夏威夷的活动进入最后阶段。1890年美国通过的麦金莱关税法有力地促进了兼并夏威夷的进程，这项税法宣布免除糖的进口税；同时为保护国内制糖业，联邦政府决定给美国糖厂以每磅2美分的补贴。这样一来，夏威夷的糖在美国市场上不仅为得到补贴的美国国内制糖业所排挤，还受到古巴、爪哇和巴西糖的竞争。结果夏威夷糖价暴跌，使夏威夷的美国糖厂主和甘蔗种植园主受到很大打击。他们认为，只有使夏威夷同美国合并，才能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麦金莱关税法关于免除糖税的规定，是有利于美国扩张主义者兼并夏威夷群岛的措施，它推动夏威夷岛上的美国糖业利益集团发动了旨在使夏威夷与美国合并的政变，策划了历史上所说的“糖的阴谋”。[①]

1891年，热爱独立的夏威夷女王李留奥卡拉尼即位。她在夏威夷群岛土著居民的支持下，反对夏威夷与美国合并，反对由白种人操纵制定的1887年宪法，响亮地提出了“夏威夷是夏威夷人的”[②] 口号。1893年1月，李留奥卡拉尼女王发布敕令，宣布废除1887年宪法，同时颁布新宪法。新宪法扩大了王权，削减了白种人控制的立法会议的权利和外国人的特权，规定一切白人除和土著妇女结婚者外均被剥夺选举权。

在麦金莱关税法实施后，岛上美国种植园主、商人和传教士等，在美国驻夏威夷公使约翰·史蒂文斯的支持下，于1月16日发动所谓“革命”——反对夏威夷政府的政变。这一天，美国船只“波士顿”号上的150名武装人员，以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为名，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登陆，迫使李留奥卡拉尼女王退位，成

---

① 托马斯·贝利：《美国人民外交史》，纽约，1964年，第429页。

② 托马斯·贝利：前引书，第430页。

立由殖民主义者组成的临时政府，建立了所谓共和政体。接着于1月19日派出一个由4名美国人和1名英国人组成的所谓“夏威夷代表团”，赶往华盛顿策划夏威夷与美国正式合并。

史蒂文斯是这次政变的积极支持者。他在麦金莱关税法实施之后便鼓吹对夏威夷“实行坚决果断的合并措施”。[①] 政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又越权承认了殖民主义者的所谓“革命”政权，宣布夏威夷为美国的保护国。他还打电报给美国国务院说：“夏威夷梨子现在完全成熟了，这是美国采摘的黄金季节。如果不迅速实行合并，这些（夏威夷）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很可能使夏威夷成为英国殖民地。”[②]“夏威夷代表团”到达美国时，由新任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接待，他也是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1893年2月14日，他和“夏威夷代表团”签订了美国合并夏威夷群岛的条约，并急忙于哈里森总统离任前两周送请参议院批准。

但是，兼并夏威夷的条约在美国国内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响，特别是由于哈里森的继任者克利夫兰总统的反对，在一个时期内被搁置了起来。扩张主义者要求批准这项条约，指出如果美国不取得这个群岛，英国或日本就“可能取得它反对美国”。反对这项条约的主要是民主党人，他们认为这项条约是“糖业大王”制造出来的，要求彻底揭露兼并夏威夷的阴谋，质问“为什么要急忙丢开久经考验的孤立主义政策开始卷入……帝国主义纠纷呢？”又说：“拥有复杂居民的夏威夷到头来能成为（美国）一个州吗？”[③]

以反对扩张相标榜的克利夫兰反对废黜夏威夷女王。他就任

① 转引自祖波克：前引书，第197页。
② 贝利：前引书，第430页。
③ 贝利：前引书，第431页。

总统后，立即于3月9日从参议院撤回等待审议的1893年条约，并特派参议员詹姆斯·布隆特为全权代表，去夏威夷调查推翻李留奥卡拉尼的政变的真相。布隆特刚到夏威夷，便要求参与政变的美军回到他们的船上去，命令降下檀香山政府大厦上的美国星条旗。布隆特的调查报告认为，夏威夷的多数居民反对夏威夷与美国合并。他断言没有美国援助，檀香山的政变不会成功；而没有史蒂文斯事先作出的给予支持的保证，政变根本不会发生。接着，克利夫兰由夏威夷召回史蒂文斯，并责成新任美国驻夏威夷大使与被废黜的李留奥卡拉尼和政变当局接触，以恢复夏威夷女王的王位。

克利夫兰所以把兼并夏威夷群岛一事搁置起来，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分歧，主要是美国国内糖业利益集团反对兼并夏威夷。但是，夏威夷糖业集团和美国扩张主义者是不肯退让的。前者指责克利夫兰干涉夏威夷“内政”，拒不交出政权；后者则在美国国内对克利夫兰展开猛烈攻击。就连克利夫兰的民主党阵营中，也有人反对李留奥卡拉尼复位。他们说，民主党从来没有复辟君主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克利夫兰只得把夏威夷问题提交国会。在国会讨论中，有的批评克利夫兰解决夏威夷问题的方式超越了他的权力，也有的对克利夫兰表示支持。1894年2月以后，众、参两院先后通过了关于夏威夷问题的决议。众议院谴责史蒂文斯的活动，参议院认为美国不应干涉夏威夷群岛的内政，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进行干涉。这就是说美国国会既没有立即接受兼并夏威夷的1893年条约，也没有要求恢复1893年政变前的状态，实际上是承认了政变所造成的局面。1898年4月，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终于在战争歇斯底里的气氛中于7月7日由国会两院联合决议，经麦金莱总统签署后实现了对夏威夷的兼并。

第三节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扩张及其与英国在这一地区的角逐

〔觊觎未来的洋际运河〕　在中美洲地峡地区开凿运河，一直是美洲人民的长期愿望。但是，地峡地区有关国家难以单独承担开凿运河的巨额资金和技术，这就给大国的介入造成了机会，而且引起了英、美、法各国在这一地区的争夺。随着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兴起，西进运动迅速推进，美国国内修建中美地峡运河的呼声日益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曾在 19 世纪中叶，分别同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签订了条约，以取得日后在这两国中任何一国领土上修建洋际运河的权利。

然而，美国企图开凿洋际运河，必然要与在中美洲拥有很大势力的英国发生冲突。根据 1850 年美、英缔结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双方曾约定在运河建成后，共同确保运河中立，并保证运河向所有国家开放。后来美国把这个条约看成是它修建和单独控制运河的主要障碍，因而力图废除该约。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后，由于对外扩张的需要，美国为修建洋际运河问题加紧了与英、法的争夺。

美国同法国的争夺，主要是围绕包括资金、技术在内的运河开凿问题进行的，同英国的争夺主要是牵涉到废除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问题，而一切争夺最后都是为了达到控制和独霸运河的目的。1879 年，由苏伊士运河的创办人菲迪南·德雷塞普任董事长的一家法国公司，从哥伦比亚取得在巴拿马开凿运河的权利，德雷塞普本人还到美国进行大量活动，贿买某些政客和院外集团的说客，谋求支持或至少不反对法国开凿运河的活动。海斯总统鉴于这一形势，于 1880 年 3 月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发表了一

项强硬的声明。他说美国“力图建筑一条由它控制的运河，它不能同意将此控制权让给任何欧洲国家或国家的联合。”[①] 海斯还强调这条运河实际将是“美国海岸线的一部分。”[②] 这个声明是对法国谋求开凿运河的活动作出的反应，同时也标志着美国争夺运河的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美国争夺运河的主要对手是英国。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1850年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关于双方确保运河中立化的规定越来越不能适应美国的需要，因而它力图在海斯声明的基础上，改变这项条约。在1881—1883年间，美国就这一条约问题同英国进行了频繁的交涉。布莱恩国务卿在1881年下半年连续三次照会英国，要求对这一条约作重大修改。布莱恩照会说这项条约是在30年前的特殊形势下缔结的，现在这一形势已不复存在；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迅速发展以及美国东西两岸交通往来的需要，已使运河区实际成为美国海岸线的一部分。因此，决不能保证运河对美国或哥伦比亚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实行中立，美国“不能允许任何触犯我们在美洲大陆的权利……的条约永久存在下去”，“美国首要的要求是强调它控制运河通路的权利”。[③] 弗雷德里克·弗里林海森接替布莱恩任国务卿后，继续同英国进行交涉，他在1882—1883年间两次照会英国，重申美国立场，并明确指出，门罗总统提出的欧洲国家不得干涉美洲事务的思想就来自英国政府的建议。

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的中心思想，就是保证运河中立化。在

---

① J.D.理查逊：《总统咨文及文件汇编，1789—1897年》，10卷册，华盛顿，1907年，第7卷，第585页。

② 朱利叶斯·W.普拉特等：《美国外交政策史》，伦敦，1980年，第148页。

③ 鲁尔-J.巴特利特：《美国外交的历程，美国对外关系史文件与资料》，多伦多，1964年，第393页。

美国实力尚弱的时候，保证运河中立化正好适应美国的需要，借以防止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独占未来的运河。随着美国实力的加强，它对运河问题的立场有了很大的变化：它既把运河区看作美国海岸线的一部分，那就势必否认运河的中立地位，进而排斥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势力，谋求独霸运河区，以适应它对外扩张的需要。这当然是英国所不能接受的。英国对布莱恩和弗里林海森的历次照会都报以冷淡态度，它坚持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不仅涉及特定的运河，而是规定了英美两国共同确立的对所有连结两洋的水道的普遍原则。英国不但反对对这项条约作重大修改，甚至主张以这项条约为基础制定一个所有海洋国家参加的协定。英国指责美国把运河区当作自己的海岸线势必威胁到中美洲国家的独立。它还提醒美国说，既然在缔约谈判时不论美国政府和批准该约的参议院都没有认为门罗宣言是缔结该约的障碍，现在美国就不应当说它违反门罗主义了。

当时美国要求废除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独霸运河的心情急如星火，但却被英国泼了冷水，因而连续交涉三年都没有结果。1884 年，弗里林海森虽然同尼加拉瓜又商订了一个条约，规定由美国在尼加拉瓜境内修筑一条运河，置于美、尼两国共同保护之下，美国则保证尼加拉瓜的领土的完整。但是这样并不能改变美国在争夺运河问题上所处的不利地位。1885 年克利夫兰就任总统后，立即从参议院的议事日程中撤出美尼条约，并在致国会的咨文里声明地峡交通不应为任何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是因为美国国内反对这一条约的舆论日益增强，而且克利夫兰政府也不愿为此与英国发生纠纷，只得暂时收回美国独霸地峡的要求。直到20 世纪初，由于英国同其他欧洲列强在中近东、远东和南非的争夺激化，美国争夺运河的活动才取得胜利，英国终于同意废除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把兴建和管理巴拿马运河的权利让给美

国。

〔美国对古巴的侵略活动〕　　从19世纪初期以来，美国一直怀有兼并古巴的野心。内战以后，美国忙于南部的重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因而暂将兼并古巴的问题搁置起来。但是，美国仍然密切注意古巴岛上的局势，以便抓着有利时机实现其侵略野心。在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十年战争（1868—1878年）期间，美国进步人士同情古巴起义者，要求美国政府承认起义者为交战的一方，从而使起义者能公开地从美国购买武器装备，但美国扩张主义者却反对承认起义者为交战的一方。结果，美国政府采取了所谓“中立”的立场。1873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在海上俘获了一条属于古巴人所有的武器运输船，即“弗吉尼厄斯号”，并将53名船员处决。西班牙殖民当局的这一行动引起美国公众极大的关注，因为该船悬挂美国国旗，有些海员是美国人。为此，美国和西班牙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直到后者归还该船并对处决人员的家属偿付赔款才缓和下来。

在十年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古巴的野心日益增长，加强了它对古巴的侵略活动。这是因为（一）美国对古巴的经济渗透日益增强，到1893年美国人在岛上种植园、矿场和铁路的投资达5,000万美元，美国与该岛贸易达到1亿美元，而且美国主要依靠古巴提供的蔗糖；[①] 在修建中美洲地峡运河的工程即将提上日程时，古巴在加勒比海的军事战略地位更重要了。

在西班牙殖民当局专横统治下，古巴人民于1895年再次掀起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固然是西班牙殖民当局残酷压榨造成的，也与美国关税政策的调整有关。根据1890

---

① 雷·A. 比林顿和马丁·里奇：《1865年以后美国历史，附有问答》，托托瓦，新泽西，1981年，第105页。

年麦金莱关税法，美国对进口蔗糖实行免税，这就鼓励了岛上蔗糖种植园的扩大。但是不久，美国于1894年又制订了威尔逊—戈勒姆关税法，其中规定对进口的古巴糖征收40%的关税。这样，古巴刚刚扩大的蔗糖生产就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许多蔗糖种植园和制糖厂纷纷解雇工人，从而更加重了古巴人民的苦难。

在这次反抗西班牙专制的起义中，古巴人采取了游击战术：化整为零，声东击西，使西班牙殖民军疲于奔命。西班牙殖民当局苦于抓不到真正的起义者，竟决定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起义者，把成千上万的农民赶入集中营。集中营有如死牢，条件极其恶劣，被囚禁的人们大批死于饥饿和疾病，仅哈瓦那一省，就死了5万人。有关岛上殖民当局残酷杀害无辜的报道激起了美国公众极大的义愤。进步人士要求美国政府承认古巴的革命政府并给它以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援助，而亨利·洛奇和老罗斯福等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则希望美国对西班牙开仗，以便兼并古巴，把它变为美国的保护国。威廉·赫斯特和约瑟夫·普利策主办的《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日报》竞相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报道古巴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以煽动沙文主义情绪，制造发动战争的舆论。实际上，代表垄断资本集团的美国政府，只想颠覆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而不愿古巴人民取得胜利和真正独立。

1896年4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尼照会西班牙，建议由美国调解西班牙与古巴起义者之间的冲突，但为西班牙所拒绝。于是，美国遂以帮助古巴人摆脱西班牙的压迫为名，准备发动夺取古巴的战争。这种战争鼓动随着麦金莱总统的上台而加强了。这位以主张“古巴独立”的政纲而当选的总统就职后，即对西班牙殖民者魏勒在古巴残暴的恐怖统治提出抗议。在古巴投资的美国银行家和企业家也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以恢复该岛的和平。尽管麦金莱总统把自己装扮成古巴人民的保卫者，实际上他的主

要目的是在保护美国在古巴投资者和糖厂老板的利益。

在美国日益加强对古巴的干预情况下，西班牙后退了，首先把魏勒从古巴召回，接着答应改变它的集中营政策，保证给古巴人更大的自治权利等。但是，1898 年 2 月发生了美国战舰“缅因号”爆炸事件，结果该舰在哈瓦那港沉没，260 人丧生。于是，麦金莱在美国扩张主义者鼓动下，便利用这一爆炸事件，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对西班牙宣战。

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美国不仅加强对古巴的侵略活动，而且积极插手拉丁美洲国家的纠纷，甚至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以扩大它在那一地区的影响。

〔美国插手拉丁美洲事务及其与智利的纠纷〕　19 世纪 80 年代，拉丁美洲国家间的重大纠纷有：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边界争端；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边界争端以及秘鲁、玻利维亚同智利的边界争端。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争端是欧洲国家出面调停的，而没有由美国仲裁。这引起了美国国务卿布莱恩的不满，因为他认为纯属美洲的事务是理应同华盛顿商量并由它仲裁的。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争端中，美国表面上同情较弱的危地马拉，要求墨西哥作出让步，但是墨西哥拒绝了美国的干预，结果美国既没能给危地马拉帮助，反而招致了墨西哥的反感。美国插手秘鲁、玻利维亚同智利的争端，也引起智利长期对美国的仇视，成为 19 世纪末美国同拉美国家一系列纠纷中的突出事件。

1879—1883 年，智利侵占玻利维亚和秘鲁在太平洋沿岸沙漠地带的硝石矿藏，又拒绝交纳硝石生产税，以致在三国之间引起了一场新的战争，即通常所说的“太平洋战争”，亦称“硝石战争”。秘鲁和玻利维亚都没有战争准备，也缺乏在沙漠地带作战的能力；智利则有一支经过良好训练的陆军和实力较强的海军。

战争开始后，智利在陆地和海上两个战场上都取得了胜利：既占领了玻利维亚沿海大片领土，还攻占了秘鲁首都利马。于是，布莱恩趁机对这场战争进行斡旋，并以维护拉丁美洲和平和稳定为名，反对战胜国智利提出的领土要求，以维护该地区的领土现状。但是，美国的斡旋活动却为智利所拒绝。这反映了美国同智利背后英国殖民势力的矛盾，因为智利硝石的开采大部为英国资本家所控制。

1891 年，美国和智利之间又出现新的摩擦。这一年年初，智利发生内战，亲英国的议会党发动政变，把得到美国支持的巴尔马塞达总统赶下台。不久，议会党政府派遣一艘轮船“伊塔塔号”前往美国圣迭戈装运军火，但为美所扣留；当该船逃出港口驶返智利时，又为美国派出的军舰所截获。这一事件，连同美国驻智利公使馆允许巴尔马塞达人员政治避难事件，使掌权的议会党宣布美国驻智利公使为不受欢迎的人。这样，美国与智利之间的龃龉就日益加剧。同年 10 月，又发生美国“巴尔的摩”号在智利度假的海员遭到袭击的事件，结果两名美国海员被害，17 人受重伤，另有多人遭到智利警察的拘禁，因而两国关系更加紧张。

对于美国海员遭到袭击的事件，美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哈里森总统宣布：智利的“这种侮辱，对美国海员是一贯的。”① 他要求智利立即赔偿美国的损失，并且威胁说：“如果这些正当的希望落空，”“我将以特别咨文提请国会注意这件事，以采取可能必要的行动。”② 智利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和威胁，两国

---

① A.T. 沃尔韦勒：“哈里森、布莱恩和 1889—1893 年的美国外交政策”，转引自威廉斯：前引书，第 359 页。

② 贝利：前引书，第 417 页。

关系因而更加恶化，大有爆发战争的危险。

1891年冬，美国和智利都在狂热地准备战争，哈里森的战争政策得到国会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为了煽动战争歇斯底里，美国政府还把一名在智利被害的海员的遗体，停放在曾经停放林肯遗体的费城独立大厅供人参观。智利则从德国购买了枪支，并说它的海军已作好待命出发的一切准备。但是由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所持的立场，形势变得对智利愈来愈不利。智利的宿敌秘鲁采取积极支持美国的态度，甚至提出割让钦博特给美国作为永久海军基地。阿根廷也是同智利边界争端发生过战争的国家，它一面命令海军准备战争，一面表示它可以向美军提供牛肉和其他供应品。巴西的新共和政府由于刚刚得到美国的承认，对美国和智利的纠纷则采取中立的态度。

在实力对比和国际形势显然都对美国有利的形势下，1892年1月21日美国政府向智利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智利为“巴尔的摩”号事件向美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威胁说，如果美国的要求遭到拒绝，美国“除了决定停止同智利政府的外交关系外，没有别的选择”。[①] 在美国巨大压力下，智利终于在1月26日被迫屈服。它向美国道了歉，还给美国受伤海员和死者家属赔偿75,000美元。美国虽然在这场纠纷中胜利了，但是却加深了智利对美国的仇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勾销了布莱恩在第一次泛美会议上所取得的为数不多的成果。

〔第一次泛美会议〕　加强西半球合作的泛美思想，在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时期，曾得到所有拉丁美洲革命领导人的热情支持。但是，19世纪后期美国所鼓吹的泛美主义，却与上述的泛美思想根本不同。它是美国排挤欧洲国家、加强对

① 贝利：前引书，第418页。

拉丁美洲各国经济和政治控制的工具。美国认为，没有哪一个市场“是能够跟拉丁美洲市场相比的，或者是能够给美国带来更大利益的。”① 但是在门罗宣言发表后的60年里，它对欧洲国家向拉丁美洲的扩张却始终无力抵御，直到80年代美国才积极干预拉丁美洲的事务，同欧洲列强、主要是英国展开角逐。

19世纪80年代，英国控制了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对外贸易，这使它在政治上也处于强有力的地位。美国同拉丁美洲贸易则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年年都有很大的逆差。更使它不能容忍的是，它每年要从拉丁美洲买进100万美元的原料，而拉丁美洲国家则用这笔收益进口欧洲制成品。当时，美国同欧洲列强——特别同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竞争主要是争夺商品市场。美国力主召开泛美会议，开展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所谓新姊妹关系的活动，就是为了给她的商品出口创造有利的条件。

1881年12月29日，美国国务卿布莱恩向18个美洲国家发出1882年在华盛顿召开泛美会议的邀请。但是，由于秘鲁同智利的战争所引起的南美国家的紧张局势，以及美国国内反对干涉智利内政的政治斗争，美国撤销了这一邀请。不过，召开泛美会议仍是美国统治集团的迫切要求，在克利夫兰总统任期即将届满时，国会两院于1888年通过法案，决定授权总统召开泛美会议，随即向拉丁美洲国家再次发出请柬。

哈里森总统执政后，一度去职的布莱恩又回到国务院任职，主持了1889年10月2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届泛美会议。除多米尼加外，当时17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都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布莱恩对会议作了精心安排，他先是发表了恭维到会代表的

---

① 转引自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近代史纲》，下册，三联书店中译本，1977年，第724页。

欢迎词，然后热情邀请他们前往美国各大城市参观、游览，所到之处，都给予盛情的接待。布莱恩企图用这样的活动方式显示美国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实力，宣扬泛美主义以抵制欧洲的影响，从而给会议第二阶段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定下调子。

11月18日，泛美会议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在会上提出讨论的问题有：建立关税同盟并统一海关章程；实行货币同盟，在贸易往来中实行统一的支付手段；统一度量衡制度；制定专利权保障法；建立解决美洲国家争端的仲裁法庭。其中布莱恩最急切谋求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实行关税同盟，二是建立国际争端仲裁机构。他认为，解决这两个主要问题，不仅有助于维护和平，防止南、北美洲再次发生战争，而且还可以“培植同所有美洲国家友好的商业关系，极大地增加美国出口贸易……使我们（的国家）得以有力地同欧洲制造业国家相抗衡。”[①]

在泛美会议上，布莱恩的倡议虽然得到许多国家的“赞许”，实际上统统没有能实现。会议只是表示了支持订立双边贸易的倾向，同意设立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其任务只是交换经济情报。为此，设常设机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于华盛顿，后改称泛美联盟。

第一次泛美会议的召开，是美国对英国在拉丁美洲优势的“尖锐的挑战”，[②] 也是美国伸向拉丁美洲的“一条臂膀”。[③] 布莱恩在会上提出的一系列倡议，则是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扩张的纲领，它受到拉丁美洲国家巧妙的抵制以及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有力反对，最后遭到失败。会议的结果，在美国国内也招致了批

---

① 普拉特等：前引书，第157页。
② 福斯特：前引书，第338页。
③ 福斯特：前引书，第339页。

评。但是，泛美会议终于由多年的空谈变成了现实，泛美主义从此变成了在美国控制下的有组织的活动。会议期间，布莱恩给予拉丁美洲国家代表的友好接待，掩盖了美国扩张野心，也多少消除了它们对北美巨人的恐惧心理。

〔委内瑞拉边界争端与门罗主义的发展〕　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插手后，成为美国与拉美关系冲突中的另一突出事件，也是它同英国在拉丁美洲的一场重要角逐。从此，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霸权主义的同义语。

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位于南美大陆东北端，濒临大西洋。从委内瑞拉境内的主要河流奥里诺科河入海处以东至英属圭亚那的埃塞奎博河以西的地区，自1814年英国领有圭亚那一部分后，双方就存在着边界纠纷。有争议的这片崎岖的丛林地带对委内瑞拉保卫奥里诺科河口的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后来由于这一地带发现了金矿，双方的争执更加尖锐起来。英国曾多次试图由它单方面划定边界线，但都为委内瑞拉所拒绝。委内瑞拉一直坚持以英属圭亚那境内的埃塞奎博河为界。

80年代美国插手拉丁美洲事务后，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端进入了新阶段。委内瑞拉在边界纠纷解决无期的情况下，1882年决定诉诸国际公断，多次向美国指控英国在边界问题上的蛮横立场，促请美国本着“不朽的门罗精神”进行调解，给以仲裁。美国则把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端当作它涉足拉丁美洲的大好时机，一再敦促英国作出让步。委内瑞拉由于确信在同英国的争执中会得到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因而于1887年毅然断绝了同英国的外交关系。同年，美国正式提出愿协助双方解决争端进行仲裁的建议，结果被伦敦拒绝。这意味着英、美在拉丁美洲斗争的激化。

在克利夫兰总统第二次任职时期，美国在委内瑞拉已拥有重要殖民利益，美国资本家不仅已经取得奥里诺科河下游和三角洲地带大片领土的租让权以开采黄金，还正在加紧勘探委内瑞拉境内的石油产地，这就更加促使美国以支持委内瑞拉反对侵略为名，不断攻击英国。实际上，美国就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所展开的宣传运动，日益暴露出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扩张野心。《纽约论坛报》指责“英国垂涎并试图夺取”委内瑞拉领土。① 共和党的青年参议员亨利·洛奇在《北美评论》著文指出：如果允许英国“取得委内瑞拉领土，就不能防止它得到整个委内瑞拉或其他任何南美国家，……门罗主义的最高权威必须建立，并且立即建立——如有可能使用和平手段，如果需要使用武力。”② 1894 年，前任美国驻委内瑞拉公使，当时担任委内瑞拉在华盛顿的宣传员的威廉·斯克罗格斯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英国对委内瑞拉的侵略，门罗主义受到考验》，呼吁美国应对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采取强硬立场。

1895 年 5 月，理查德·奥尔尼出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尼的任命表明：曾以反对扩张相标榜的克利夫兰总统，在同英国的斗争中转而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他认为，“坚持门罗主义是他的职责。”③ 1895 年 7 月 20 日，奥尔尼向英国发出了一份关于委内瑞拉问题的照会，表明“这一争执涉及美国的名誉和利益，因此它对这一争执之长期悬而未决不能熟视无睹。”④ 他在照会中坚持美国有权干预这项争执，以支持委内瑞拉维护其领土的完整。

---

① 纳尔逊·布莱克：“克利夫兰的委内瑞拉政策”，载威廉斯，前引书，第 367 页。

② 贝利：前引书，第 440 页。

③ 威廉斯：前引书，第 371 页。

④ 转引自祖波克：前引书，第 178 页。

照会的大部分是关于门罗主义对这一争执的适用问题，它在阐述美国同其他南美国家的特殊关系时强调指出："美洲国家，无论南美国家，或北美国家，由于地理相邻，天然的同情感，类似的政府结构，在政治上和商业上都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友。如果容忍任何一个美洲国家被一个欧洲国家征服，形势自然会完全改观，并且意味着完全丧失它们同我们的天然关系带来的好处。"① 因此，奥尔尼在照会中宣告："不仅欧洲国家不应干涉美洲事务，而且任何欧洲大国这样做都将被看作同美国利益相抗衡，并引起美国的反对。"② 奥尔尼照会在阐述门罗主义时，进一步强调："现在美国是本大陆的主人，它的意旨就是它干预所涉及的问题的法律"③，"这是因为除了所有其他原因外，美国的无限资源加上它的隔离开来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环境的主宰者，实际上是任何或所有其他国家都无法击败的。"④

奥尔尼照会对门罗主义所作的新的诠释，已公然把它变成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服务的美国侵略政策的工具，并宣告它是欧美关系应当遵守的原则。美国以其发展起来的实力为后盾的这个原则与它主宰拉丁美洲的野心结合起来，其作用和影响就远远超出了委内瑞拉边界问题的范围。它不仅是美国干涉委内瑞拉边界问题的根据，也是美国妄图独霸拉丁美洲的宣言。

但是，英国对奥尔尼照会表示了极大的蔑视。英国海军立即在英属圭亚那作了军事部署，并以此作为对奥尔尼照会的回答。英国政府根本不理会美国政府等待答复的焦急心情，迟在 4 个月后，才由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正式复照美国。他在复照中明确指出，美国用新奇的办法来扩充和发展门罗主义，但在当前的情况

---

①② 戈德温编：《美国外交政策文件摘编》，纽约，1959 年，第 192 页。

③④ 戈德温编：前引书，第 193—194 页。

下是没有理由使用这一主义的，而这一主义尤其不能适用于英国和委内瑞拉的边界争端。因为他认为这一边界争端根本与美国无关，它只是英国领地的边界问题，“而这块领地在委内瑞拉共和国出现之前长期属于英国国王。”总之，英国的复照表明它不承认门罗主义是国际法，不承认门罗主义适用于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边界纠纷，也不接受美国对这场纠纷进行仲裁。

由于英国拒绝仲裁，两国关系仍陷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克利夫兰总统在 1895 年 12 月 17 日致国会的咨文中，表示不能容忍欧洲国家在拉丁美洲的扩张。他说一个欧洲国家占领与我们毗邻的一个美洲共和国的领土，“这正是门罗总统所说的‘危害我们的和平与安全’的行为。”[①] 他进一步说，由于英国拒绝将争执交付仲裁解决，美国有责任采取措施，以决定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之间的边界。因此，他建议国会组织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责成它对边界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查，并在最短期内提出报告。克利夫兰威胁说：“在调查后，我们认为属于委内瑞拉领土的任何部分，被英国占领或在其上行使管辖，我认为美国的责任就在于把它当作对美国权利和利益的侵犯，给以全力的抵抗。”[②] 他还表示，在他提出这一建议时，完全了解他所承担的责任和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

克利夫兰充满火药味的咨文，煽起了美国举国的战争狂热。国会对克利夫兰咨文表示热烈欢迎，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拨款 10 万美元给边界调查委员会。纽约市警察专员部长官西奥多·罗斯福表示：他“相信这个国家需要战争”，并说：“我宁愿战争快些

---

① 巴特利编：前引书，第 350—351 页。
② 巴特利编：前引书，第 350—351 页。

到来。”[1] 许多内战时的老兵表示愿意提供他们的服务，当时美国 26 个州的州长保证支持总统的立场，爱尔兰人全国联盟则保证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动员 10 万志愿人员。

美国的态度虽然咄咄逼人，但是它却没有采取有力的备战措施，实际上是恫吓多于行动。在克利夫兰咨文提出后，美国海军进行了战争准备，把它的 2/3 舰只集中到拉丁美洲。但是，英国也不想打仗。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国内反战力量的活动，他们认为为了几千平方英里蚊虫丛生的地区去同美国人打仗是不可思议的。下院 354 名议员在一份致克利夫兰和美国国会的同意仲裁的信件上签了名，800 名英国工人通过决议要求政府接受仲裁，英国作家给美国发出的呼吁也要求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更重要的是英国资本家已在美国有巨大的投资以及当时英国同法国和俄国在北非和中近东的矛盾加深，尤其同德国在南非的争夺日趋激化，都使英国政府不仅不能轻率地同美国破裂，而且必须致力于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这就促使英国在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中的僵硬立场发生急剧变化。

美国的边界调查委员会成立后，奥尔尼把它的活动通知英国和委内瑞拉，要求它们接受这个委员会可能给予的“帮助”。英国不仅同意了这一请求，甚至连以前将边界问题交给国际法庭解决的要求也表示同意。由于英国态度的转变，英国和委内瑞拉的代表于 1897 年 2 月在华盛顿正式签订了一项解决争议的协定，并把这一边界争端问题提交仲裁法庭公断。1899 年 10 月，仲裁法庭在巴黎作出最后裁决，决定各方控制 50 年以上的争议区不列入仲裁范围，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最后边界线大体按舍恩

---

① 贝利：前引书，第 444 页。

伯克线[1] 划分，只是将这条线东侧北端接近奥里诺科河河口地区和南端的一部分地区划给委内瑞拉，其他部分则划归英属圭亚那。

根据国际法庭仲裁的结果，委内瑞拉在领土上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即得到了奥里诺科河河口及其三角洲地带，但大部分争议地区却判给了英属圭亚那，而美国也为此作了较大的让步。但是，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不是委内瑞拉在边界划定方面的得失，而是解决这场纠纷的方式，即英国在美国以及其他国际斗争的压力下，终于改变态度，接受仲裁以解决边界争端的方式。这实际上等于英国承认了美国在拉丁美洲事务上的特殊地位，默认了美国在拉丁美洲推行的门罗主义。这是 19 世纪末期美国和英国在拉丁美洲的一场意义重大的较量。通过这场较量，美国迫使英国退却，因而逐渐在拉丁美洲占了上风。从此，它更积极致力于推行门罗主义，把它作为在拉丁美洲建立霸权的工具。

---

① 舍恩伯克线是 1840 年英国人罗伯特·舍恩伯克在现场勘查后所划定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的边界线。

第 十 一 章

19 世纪后期美国的思想文化

19 世纪后期美国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对它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也使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改变。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各种社会思潮应运而生。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新的社会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复杂变化的社会生活为作家、艺术家们展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新的创作天地。

内战以后，美国民族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亨利·詹姆斯这样不但在美国、而且在欧洲产生巨大影响的哲学家；产生了雄踞美国文坛近半个世纪、享誉世界的文学巨擘马克·吐温；诗歌、绘画、雕塑、建筑等各个艺术领域人才迭出，教育、新闻等事业蓬勃发展。到了 20 世纪初，这个建国只有 100 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以其具有鲜明特色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艺术殿堂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风行及对这一思潮的批判〕　1859

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在整个西方思想界引起了一场革命。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应运而生了。内战后，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经过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宣扬，传入了美国，一时成为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

斯宾塞是19世纪后期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试图用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学说去解释人类社会。他认为，人类社会内部不同集团、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生存斗争"，其结果也必然是"适者生存"。在他看来，经过这种长期的斗争，就能产生由一批体力最强、智力最高的人组成的"美好富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罪恶和不道德都将消灭，"利他主义"将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从这种立场出发，斯宾塞反对一切社会改革方案，认为改革只能干扰社会的自然演进。他蔑视穷人，把穷苦大众说成是不适于生存的人。他宣扬：弱肉强食、"自然选择"，劣等人要让位于优秀者。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这种学说迎合了19世纪后期美国所流行的那种冒险投机和无情竞争的精神，为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和资本家剥削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约翰·菲斯克是斯宾塞的追随者，积极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在一些著作中使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法则解释社会现象，把国家、民族、阶级之间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荒谬地归结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他进而宣称"经过自然选择，美国已经成为优胜的国家，已经表明适于生存的美国人自然地合乎逻辑地应统治弱者，即不适于生存的人。"①

---

① 威廉斯编：前引书，第1卷，第332页。

著名牧师、美国福音派教会联盟总干事乔赛亚·斯特朗是与非斯克齐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披着宗教的外衣，宣扬种族优越论。1885年，他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我们的国家》，其中把美国人说成是天定的选民，是被上帝挑选出来领导落后民族的基督教徒。他写道："这个种族（指美国人——作者）具有不可超越的能力，它背后拥有一切数不尽的财富力量。我们应该希望它成为伟大的自由、纯正的基督教和最高的文明的保存者。这个种族显示某些非常的进取特性，足以把它的制度传播于全人类，把它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地球。"①

其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大肆鼓吹种族主义的"理论"，认为只有盎格鲁－萨克逊种族才是"优秀种族"，它"为了文明的利益"，有责任干涉其他民族的事务。②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喧嚣一时之际，一些进步学者对之起而抨击，其中最著名的是社会学家莱斯特·沃德。沃德反对流行的那种认为自然与社会现象均非人类所能控制的理论。他断言，科学所带来的所有实际利益都是人类控制自然的结果。在他看来，无论从自然科学还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人类的职责就是支配、控制自然，而决不是仿效自然和听任自然的摆布。所以，他批评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他进一步指出，垄断剥夺了许多人成功的机会，一个代表所有人利益的民主政府，应制定促进社会福利的立法和计划，并对剥夺经济机会的垄断采取严厉制裁的措施，以保证实现真正的个人主义。

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单一税论"倡导者亨利·乔治③

---

① 转引自J.W.普拉特：《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巴尔摩尔1936年，第6页。

② 威廉斯编：前引书，第332页。

③ 参看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也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批判。乔治在他的主要著作《进步与贫困》一书中批判斯宾塞贬损人的价值，在某些方面把人类降到比动物还低的地位。他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人发财而另一些人却在受苦。因此，他反对斯宾塞所谓"适者生存"的原则，认为社会进步取决于人类协作和社会平等，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人的创造力；不平等现象盛行之时，人类协作即告中止，文明也就随之衰落。

也有一些学者对种族优越论进行抨击，认为这种"理论"是把达尔文关于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原则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种族关系，其目的在于宣扬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优越论，并以此为依据建立美国霸权的"理论"，进而为美国统治集团侵略和奴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行动辩护。

〔改革理论家及其代表作〕　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总财富因而激增，但伴随经济进步的却是贫富差别愈加悬殊，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卡内基、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和摩根等金融巨头家财巨万。他们在美国家庭总数中仅占1%，而年收入竟占全国总收入的10%以上。这些富豪们穷奢极欲，夸豪斗富，一掷千金；而千百万穷苦工人、农民终年劳碌，其所得却不足以温饱。在纽约及其他大城市，富豪们华邸旁不远处就是肮脏破烂的贫民窟，有的人目睹这种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痛感于种种社会弊端，开始探求改造社会的途径。前已介绍过的亨利·乔治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位。

与亨利·乔治同时，美国出现了一位更富于想像力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爱德华·贝拉米。1887年，贝拉米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回顾》。在这部乌托邦型小说中，他虚构了一个与当时倾轧争斗的美国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未来理想社会。这个社会根除了战争、贫困、犯罪和疾病，没有军队和监狱，既安宁又美好。

在他的理想社会中，“全国工商业不再由少数属于私人的、不负责的大公司或辛迪加，以追逐私利为目的任意经营，而由一个惟一代表人民的辛迪加来经营，为全国人民谋福利。也就是说，国家组织成为一个大的企业公司，所有其他公司都被吸收进去。它代替了一切其他资本家，成为惟一的资本家。它是独一无二的雇主，吞并了以前所有的较小的垄断组织，成为最后一个垄断组织。它的利润和各种结余都由全体公民共同享受。”① 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行政管理和生产管理是统一的，政府和官员的主要职能是指挥和监督生产。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社会，在贝拉米看来，可以依靠社会舆论和人类健全的理智，以及人类合群的和慷慨的本性来实现，“根本没有任何暴力行动……只能采取辩论的方式”。② 贝拉米依靠道德原则和所谓“人类健全的理智”进入一个新的理想社会，这只能说是十足的幻想。

〔实用主义哲学及其创始人詹姆斯〕　实用主义是生长在美国土壤上的一个哲学流派。19 世纪 70 年代，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最早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到了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把实用主义加以发挥和系统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从而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曾被人喻为美国实用主义“神圣家族”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其中詹姆斯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

詹姆斯出身于纽约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研究宗教和哲学的作家，与当时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拉尔夫·爱默

---

①② 爱德华·贝拉米：《回顾，公元 1887—2000 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4 年，第 47—48 页。

生等人过往甚密，詹姆斯因而从小就受到他们的影响。1869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后在该校教授解剖学和生理学等课程，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改教哲学和心理学，成为这两门学科的教授。他早期的研究领域是心理学。1890 年，他发表了《心理学原理》，这不但是一部心理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在这部著作中，詹姆斯反对斯宾塞的宿命论，认为人类进行思维的目的在于“帮助改变世界”。他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类的创造力，反对那种把人看成是完全听任环境摆布、成为周围环境塑造而成的机器的观点。詹姆斯认为，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有它自己的意志，这种意志虽然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但同时又反作用于环境，人类就是在这种与环境不停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生活，而不是听任外界力量摆布的生物。

1907 年，詹姆斯出版了他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实用主义》。这部书奠定了他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真正奠基人的地位。实用主义的核心是它的真理观。皮尔斯提出过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基本概念，认为一个陈述的真理如能被实验所证实，它就是有意义的。詹姆斯把这一思想加以发挥，把观念的真理性同观念的客观效用等同起来。在詹姆斯看来，真理的意义不过是使试验与经验圆满地联系起来。所以，“对于实用主义者，真理成为经验中各种各样确定的、有作用价值的类名。”[①] 所谓使经验（包括观念）与试验圆满地联系起来，就是概念会给生活带来好处，“只要我们相信一个观念对我们的生活是有益的，它就是真的。”[②] 詹姆斯特别用这种信条去论证宗教信仰的真理性。他说：“如果神学

---

① 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9 年，第 38 页。

② 詹姆斯：前引书，第 41 页。

的各种观念证明对于具体生活确有价值，那么，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在确有这么多的价值这一意义上说，这就是真的了。”例如，在一个人相信了上帝以后，“上帝这个名称至少会给你一种精神上的休假日的好处。”[1] 所以詹姆斯把真理和有用直接等同起来，认为“‘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在詹姆斯看来，人类之所以把追求真理当作首要任务，其原因就在于它对人类生活具有这种明显的好处。这样一来，在詹姆斯这里，真理不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成了“有效用”、“能满足我的需要”的同义语。只要符合这一标准，那么即使是宗教甚至谎言也都具有真理的性质。

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哲学。它强调人的创造性，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或逻辑出发，主张通过考察其实际效果来检验一切理论和学说。这些主张不但符合美国人那种求实的价值观念和进取精神，也适应了那种复杂多变、不断开拓、剧烈竞争的美国社会生活的要求，所以，实用主义成为一种与以往那种深奥难解的经院式哲学不同的、“入世”的哲学，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各种改革的理论基础，其影响所及，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历史等各个领域和学科。从这方面的意义来讲，实用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它所宣扬的那种极端功利主义、竞争冒险和为获得“效果”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的自私与残忍精神，迎合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和当时的时代风气，所以很快为资产阶级中的各个阶层所欣然接受，流行一时。实用主义哲学否定真理的任何客观内容，把效用、功用当作真理的惟一标志和准绳，把真理看成是纯粹人为的主观的东

---

① 詹姆斯：前引书，第104页。

西，这事实上是混淆了真理与谬误、事实与谎言的界限，所以具有明显的反科学的一面。

〔杜威的“工具主义”及其影响〕　继詹姆斯之后，约翰·杜威又进一步发展了实用主义哲学。杜威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他 1878 年毕业于佛蒙特州立大学，做过中学教师。1882 年又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先后在密歇根、明尼苏达、芝加哥、哥伦比亚等大学任教。杜威起初是个理想主义者，后来受詹姆斯著作的影响，在 19 世纪 90 年代转向实用主义，并把实用主义的一般原则推广到政治、文化教育以及道德等各方面，同时还在詹姆斯的“有用即是真理”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他自己的“工具主义”。“工具主义”否认理论思维的意义，把一切科学理论归结为“经验”，认为它们只是个人应付环境的“工具”，同时把一切概念、学说统统视为假设，都看成工具。在杜威看来，它们同其他工具一样，其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所造成的结果中显现出的功效。因此，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真理，并不在于它是真是假，而在于它有效无效。显然，杜威这种真理观是同詹姆斯一脉相承的。

杜威虽然接受了“有用即是真理”的真理观，但他反对坐在书斋内把哲学作为单纯的学术来研究，而是认为哲学必须同人的生活和社会现实发生联系，以促进社会目的的实现和政治行动的发展。在杜威看来，使哲学与教育结合起来，是实现上述目的与促进发展的最好方式，而且可以发挥哲学的最大推动作用，因为教育是塑造人的理智和情感倾向的全过程，是与每个人发生关系的事。所以他认为通过普遍的教育活动，便能把实用主义哲学所宣扬的世界观与思想方法灌输给人们，使它发挥最大效用。杜威否认把生产关系看成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基础的观点，他认为社

会是由具有最初的人性（诸如本能、习惯等）的个人结合而成的，社会既然只是人性的组合，因此教育在改进社会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要使社会进步，只需采用发展人性、刺激智慧的教育方法，使社会改革通过教育的方法而不是通过斗争来实现。为了检验和实践他的哲学理论，杜威一面通过创办实验学校等活动实践自己的教育理论，一面撰写大量教育论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如关于教育的本质，他提出了“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等著名观点。杜威的教育理论不乏革新与合理之处，对欧美的现代教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把教育看成是改造社会、推动人类进步的惟一手段，反对任何社会革命，这在客观上无疑起到了维护垄断资本统治的作用，所以，垄断资产阶级对他的哲学体系大为赞赏，他本人被誉为“哲学家中的哲学家”，“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哲学中体现了美国人的理想”，还被说成“是美国人民的顾问和导师”。

〔维布伦的新思想〕　在进化论的冲击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19 世纪后期美国的经济、法律、宗教以及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明显变化，总的趋势是一切从现实需要出发，改造或摒弃陈腐的思想观念，以新的思想和方式解释历史和对待现实，以适应新的社会要求。

在这一时期，尽管亨利·乔治和贝拉米等人提出了具有很大吸引力的社会改革的主张，但在各大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从这种思想出发，财富的不平等被说成是刺激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竞争则是满足个人需要的最好方式，能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而且只有在不受任何控制的社会中，自然的经济法则才能最好地发挥作用。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向这种传统思想

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他们严厉批评经济上自由放任政策，主张政府应合理地运用其权力来改善社会。1885年，在理查德·伊里领导下，美国经济学会成立了，宣布支持政府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在承认工业社会中个人主动精神存在的同时，该学会又明确指出，自由放任的信条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道德上是腐朽的。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美国近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维布伦曾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密苏里大学任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他写了《为什么经济学不是进化的科学?》、《有闲阶级论》和《企业论》等著作，批判当时流行的"正统"的经济学理论。维布伦认为社会是一个复合体，人的生活和行为相互影响并可归纳为几种类型。社会和人的行为类型都在不断变化，但这种变化在有限的范围内能够加以预测，所以他力图建立以研究"制度"的演进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体系。维布伦主张在经济学研究中运用数量及统计研究的方法，这种归纳法对后来的经济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维布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他还把伦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领域。他说百万富翁不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他们对社会毫无用处。他对"商业"与"工业"两者间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前者所关心只是利润，因而是反社会的；而后者关心的是组织工艺的生产过程，因而是有益于社会的。总之，维布伦在他的著作中为当时许多改革者提供了他们经常反对"掠夺性的财富"、不在地主所有制和利润制度的理论依据。

〔特纳及其"边疆假说"〕　在历史学领域内，19世纪末有一支异军突起，这就是特纳及其创立的"中西部学派"。弗雷德里克·特纳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一生著述不多，但它的理论在美国史学界居支配地位达30多年之久，对美国资产阶级史

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893年，特纳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历史协会上宣读了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的论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这篇论文系统地阐述了西部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它不但奠定了特纳“边疆假说”的基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美国资产阶级史学的转折点：美国历史的注意重心开始从美国历史的欧洲起源（“生源说”）转向结合美国实际，开始从北美大陆东部转向西部。人们开始把“移动的边疆”视为理解整个美国历史、解释美国发展独特性的钥匙。特纳所说的边疆，指的是任何时候介于该大陆已被拓殖的地区与人迹未到的地区或印第安人地区之间的地带。就美国而言，指的就是存在着广大“自由土地”的西部。他说：“这条一直向后退缩的自由土地的边疆是美国发展的关键”。他认为这条由于殖民地人群的推进而不断向西移动的边疆，是“原始与文明、自然状态与制度、野蛮与教化、初步与复杂的会合点，”在两者遭遇的地方，边疆就对双方起了使它们发生新陈代谢的变化的作用，但前者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后者。这个过程表现为人征服了自然和文明的到来。这样，就在原来仅仅是“单纯的和无生气的大陆”上，不断向前推进的边疆留下了“一个复杂的神经系统”，即逐渐成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这整个进程不但使人和制度摆脱了对欧洲的依附，而且促进了人和制度的“美国化”。用特纳自己的话来说，美国就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与独特的地理因素接触”后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特纳还强调指出美国边疆的特点，认为它明显地有别于欧洲的边疆，后者是一条穿越稠密人口的设防边界线，而前者在19世纪末以前一直处于一片“自由土地”的边缘。因此，他认为“自由土地”的存在及其开发——“西进运动”——在美国历史中具有独特的决定性意义，它说明了美国历史的发展，这

种历史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扩张。因为征服自然以及新的地域已成为美国人的“天定命运”。[1]

特纳历史观的提出，使19世纪美国史学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独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写了很多历史著作，但他们中多数人都认为美国制度只不过是欧洲制度的延续，因此往往用“生源说”来解释美国历史的发展，而本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特殊条件则大都被忽略了。针对这种情况，特纳独树一帜，认为不能用“生源说”来阐述美国历史，而必须结合美国的具体条件来加以阐述，这就使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前进了一大步。其次他结合美国实际，提出西部开发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这使他抓住了美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特征。在他之前，虽然也有人提出开发西部的重要性，而就这个问题提出系统性的理论他是第一人。

特纳的历史观中，也有很多谬误和矛盾之处。例如，他把印第安人世代生息的广大美洲土地说成是“无主土地”或“自由土地”，这就把美国向西部扩张的“西进运动”中印第安人遭受驱赶和屠杀的悲惨遭遇轻易抹去了。特纳也夸大了西部开拓及其对美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似乎它是不受资本主义规律制约的、世界文明史上不同寻常的特殊现象。特纳强调说，美国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是建立在边疆不断扩展的基础之上的，西部“自由土地”的存在为东部的工人和贫穷农民提供了谋生和发财致富的机会，形成了“社会安全阀”，使美国的社会矛盾不断缓和。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工农运动日益高涨的19世纪后期，这种“安全阀”理论迎合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因为它在广大工人中传播了摆

① 以上特纳论点参阅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载于杨生茂主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年。

脱贫困的幻想，涣散了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同时，19世纪末边疆消失后，特纳所鼓吹的美国对外扩张乃"天定命运"说，也适应了美国统治集团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需要。

第二节　教　　育

〔*内战后初期的美国教育*〕　内战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城市人口的激增，原有可利用的教育机构、设施和传统的教育形式都远远不能满足和适应时代的需要，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内战结束后的最初10年间，美国的国民教育仍相当落后。据1870年的统计，当年年龄在10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总数竟达600万，占全部人口的1/5左右。在这个以民主制度自诩的国家里，全国800多万选民中，有160多万人甚至不认识他们自己所投选票上的名字。当时全国5—18岁之间的学龄儿童和青年有1,200多万，其中将近一半的儿童和青年（540多万）是在得不到任何学校教育的情况下成长的。① 而南方的教育更不发达。战后的南部满目疮痍，教育事业也遭到极大破坏：教师奇缺，财力枯竭，各州无力提供教育经费，大部分学校都已关门。加上内战后南部有近400万解放了的黑人获得公民权，但他们中很少有人受过最起码的教育，所以黑人教育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直到1876年，能够就学的黑人儿童仍然是极少数。② 所以，尽管内战后南部各州都把"人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一原则写进了州宪法，但教育事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因而这一原则未能付诸

---

① K.L.瓦塞尔编：《美国教育社会史》，芝加哥，1965年，第2卷，第38页。

② 瓦塞尔编：前引书，第2卷，第23—24页。

实现。

面对教育极端落后这种状况，从70年代起，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开始大力发展公共教育事业，投入了巨额资金。1870年，用于公共教育事业的开支为6,300万美元，1910年超过了24,000万美元。在此期间，普遍义务教育得到迅速的发展。1870年，在全国公立小学注册的学生总数是680多万，到1900年猛增到1,500多万。在此期间，在校注册的中小学生在全国5—17岁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57%上升到72%以上。文盲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由1880年的17%下降到1910年的7.7%。①

这一时期中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也相当快。1870年，美国只有160所公立、私立中学，在校学生只有8万多人，到1880年，公立中学便猛增到800所，学生有11万人，1890年达到2,500多所，学生20多万。到了1900年，已经有6,000所中学和51万在校中学生。②

在内战前，美国的师范教育很落后，全国只有12所培养教师的学校。内战以后，随着普遍义务教育的发展，对教师的需求量激增，教育逐渐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对师资力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各州开始竞相建立教师学院，到1900年，全国每州都至少有一所师范学院。在许多著名的大学中，如芝加哥、哈佛、哥伦比亚、斯坦福以及其他大学，都建立了教育学院。③ 与此同时，为了改革过去那种陈旧落后的教育，以适应新的工业社会的需要，教育开始被认为是一门科学而引起重视与研究。通过埃德加·希尔顿和威廉·哈里斯等一些教育家的不懈努力，许多外

---

① 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前引书，第306页。

② 戈登·C. 李：《当代美国教育》，纽约1957年，第161页。

③ 理查德·柯伦特等著：《美国历史》，第2卷，纽约1979年，第533页。

国著名教育家的理论被介绍进来。1882 年，还建立了以研究教育科学为主旨的全国赫巴特协会。

〔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　内战结束后，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迫切需要，于是教育成了日益被人们重视的事业。旧的大学得到迅速改造与扩大，新的各类高等院校广泛地建立起来，学校为更多的青年提供了求学的机会。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体系上，都为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

联邦政府对教育的大力支持和赞助，是 19 世纪高等教育振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措施，是莫里尔法的实施。贾斯廷·莫里尔是佛蒙特州的众议员，他坚持认为受教育是美国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极力主张联邦政府拨出公共土地以支持普通学校和大学。他认为这样做不但符合宪法赋予政府的权力，而且会促进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消除文盲，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内战之前，高等教育一直被看成是私人或宗教团体的事业，政府从来不加干预和资助。1862 年，林肯总统签署了由莫里尔倡议，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莫里尔法。这一法令的实施，使联邦政府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莫里尔法规定，按各州在国会中代表的人数，凡是有参议员或众议员一人，联邦政府便拨给该州 3 万英亩公共土地，各州可出售该项土地，把所得款项作为教育基金，支持建立农业学院或机械技术学院。这项法令实施后，共有1,300 多万英亩公共土地转到各州手中，先后成立 69 所“土地赠予”学院（即用出售联邦赠地所得款项建立的学院），西部许多州也因此建立了州立大学。[1] 1892 年，国会又通过第二个莫里尔法，规定联邦对每一所土地赠予学院提供年度

① 莫里森等著：前引书，第 2 卷，第 310 页。

拨款，并使南部各州得以建立类似的学院。莫里尔法是美国历史上关于教育的重要立法，对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一些大企业家和金融巨头从他们所攫取的巨额剩余价值中拿出一部分款项，以慈善事业的形式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量私人捐赠，这种私人捐赠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1867年，一个住在英国的美国商人乔治·皮博迪捐赠200万美元，建立了皮博迪教育基金，用以发展南部的教育。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这种私人捐赠的巨额资金陆续涌来。以哈佛大学为例，1869年对它的私人捐赠就约达200万美元。其他如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一大批私立大学，都在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下获得发展。对于这些原有大学来说，这些捐赠为它们提供了巨额经费，使他们有可能聘请高水平的教师，添置图书和仪器设备，扩大学校规模，使学校达到更高的水平。与此同时，又创办了许多私立大学。1868年，靠电报业起家的百万富翁伊兹拉·康奈尔出资创办了康奈尔大学；1875年，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创办了范德比尔特大学；1876年，巴尔的摩的大银行家和铁路巨商约翰斯·霍普金斯创办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885年，铁路富商利兰·斯坦福创办了斯坦福大学；1891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赠款3,400万美元，建立了芝加哥大学。这些大企业家与金融巨头捐赠巨款兴办高等教育，固然使高等学校可以培养和输送工业化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同时可借此表明他们对公共事业的关心，从而改变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缓和社会各阶层对他们积聚大量财富的不满情绪。用钢铁大王卡内基的话来说，这种私人捐赠是现实社会中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消除剂”和贫富之间的“调合剂”。从1881年起，他就赠款或提供建筑物建立了许多公

共图书馆。正是从这一时期起，私人对教育及其他公共文化事业的捐赠逐渐成为风气。时至今日，私人基金会在美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仍起着重要作用。

〔高等教育改革的进展〕　19 世纪后期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和大胆创新。与欧洲相比，内战前美国的大学不但数量少、规模小，而且教育思想、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都非常落后。

在 19 世纪后期，有一大批美国人陆续从当时教育先进的德国和英国学成回国，其中一部分人后来成为富有强烈进取心和改革精神的新型教育家，给美国沉闷闭塞的高等教育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鲜空气。他们中有的担任了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老牌私立大学的校长，有的主持了密歇根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刚具雏形的州立大学。这些年轻的校长们不但大胆学习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教育理论、方法和经验，而且勇于创新。他们筚路蓝缕，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和中坚力量。

这些新型教育家为大学制定了新的办学方针，即一所大学既要传播知识，还要创造知识，这就需要有一支由学者组成的教师队伍。这些教师既要在课堂上传授新的知识，又能以其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因此，是否具有专门知识就成为聘任教授的标准。大批新型教师被吸收进大学，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也被德国的讲授讨论法所取代。1869 年，曾在德国学习过的 35 岁的化学家查尔斯·埃里奥特出任哈佛大学校长。在他的领导下，这所美国资格最老的大学成了改革的开路先锋。埃里奥特敏锐地意识到内战和工业化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对哈佛大学的组织结构、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把它改造成了适应新的社会需要的新型大学。他打破过去那种僵化的课程设置，在哈佛首先实行了选修课制，即开设范围广泛的各

类课程，供学生自由选择。此举一出，哈佛成了其他大学群起效法的楷模。他预见到美国社会发展的长远需要，恢复了哈佛大学的法学院和医学院，建立了管理学院，使它们建立在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与埃利奥特同时，在亨利·巴那德和安德鲁·怀特等杰出的教育家的不懈努力下，哥伦比亚和康奈尔等大学也蓬勃发展起来。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培养研究生制度也从国外移植进来。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在 1871 年和 1872 年成立了研究生院，并在研究生中实行讨论班制度（即习明纳尔）。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成绩最突出的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这所大学的创办宗旨是以培养研究生为主。在校长丹尼尔·吉尔曼的领导下，这里培养出了一批后来在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及政界等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人才。到 20 世纪初，各个大学普遍成立了研究生院，注册的研究生总数超过 5 千人。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另一个突出成就就是为了满足新的社会需要，各种类型的专业学院开始发展起来，如哈佛法学院，霍普金斯医学院，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建筑学院，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和芝加哥教育学院等等。这样，高等教育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培养出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各种专门人才。事实证明，这些专业学院培养出的各类专业人员在职业能力上远胜于各个行业中那些没受过专门训练、只凭经验工作的人。与此同时，随着平等意识的增强和妇女运功的兴起，妇女作为“二等公民”的地位开始有所改变，建立了许多新的女子学院，大部分州立大学先后实现了男女同校，妇女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明显增加。相比之下，种族歧视等因素使广大黑人仍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1892 年第二次莫里尔法颁布后，美国也陆续成立了一些黑人学院，但入学黑人数目与其人口总数相比是微不

足道的，对绝大多数黑人来说，接受高等教育在当时只能是一种梦想。

第三节　文学艺术

〔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　美国民族文学的最初繁荣是在19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形成了生气勃勃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产生了华盛顿·欧文、费尼莫尔·库柏、拉尔夫·爱默生、纳撒尼尔·霍桑等优秀作家，并以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创作达到了高峰。到了19世纪后期，由于内战的严酷现实和战后美国社会深刻巨大的变化，新一代的作家开始以批判的目光更严肃地看待社会，更真实、更深刻地表现现实人生，文学潮流自然而然地转向现实主义。

在美国首倡现实主义文学的是小说家和批评家威廉·豪威尔斯。豪威尔斯极力反对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小说，认为小说的主要作用是教诲，而不是娱乐，所以应采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写作。他心中的“现实主义”是“不多不少地忠实于所描写的对象”。豪威尔斯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了近40部长篇小说，但几乎没有什么传世之作。他早期的作品主要表现中小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是他的代表作。书中把一个靠剥削矿工而暴发的资本家拉帕姆写成是一个靠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诚实人，称颂他为了不失信用而宁肯自己破产，具有崇高的道德。到80年代后半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阶级矛盾愈加尖锐，豪威尔斯作品中的暴露因素有所加强，开始谴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风气败坏和道德沦丧。1889年，他写了长篇小说《时来运转》，反映了当时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接触到了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但他把阶级

斗争看成是“观点上的分歧”。1894年和1907年，豪威尔斯又先后发表了《从阿特鲁利亚来的旅行家》和《穿过针眼》两部空想小说，鼓吹通过“公民投票”而产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豪威尔斯是美国作家中宣扬“美国例外论”的代表人物。他曾说：“谁在美国写出一部像《罪与罚》那么悲惨透顶的小说，谁就在说谎，犯了错误，”因为“充分享受生存权利的美国人，生活在一个与俄国完全不同的世界，说的是另一种语言，呼吸的空气纯洁而又活跃，前途光明灿烂”，因此“我们的小说越是描写生活微笑的一面，就越能表现美国”。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作品的主要倾向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其创作方法则被称为“微笑的现实主义”。

到19世纪90年代，有一批优秀的青年小说家脱颖而出。这些青年作家以描写城乡中下层人民生活为主，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他们目光敏锐，手法大胆，在作品中揭露垄断资本统治下丑恶痛苦的现实，对垄断资本排挤和盘剥中小资产阶级表示强烈义愤，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城乡穷苦劳动群众表示深切同情。这些作家触到了时代的脉搏，写出了活生生的美国社会，他们之中最突出的是哈姆林·加兰、斯蒂芬·克莱恩和弗兰克·诺里斯。

加兰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农村，他目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贫富悬殊现象，痛感于广大农民在垄断资本的盘剥下，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悲惨状况，写了许多描写边疆农村生活的作品。在小说集《大路》（1891）中，他以边疆农民们为主人公，用强烈的愤懑和真切的同情写出了他们艰辛劳苦的农庄生活。作者写道，在他重访达科他农村时，“那些孤零零的农舍突然进入视野，看上去如同野兽的洞穴，人们过的那种毫无色彩、毫无乐趣的生活使我心中刺痛，……大自然风光秀丽，一如从前，但云霞日影无法掩藏这里人们的穷困。”农民们“就像落在糖锅里的苍蝇，

……越是挣扎，越容易把腿挣断。”在后来的作品中，加兰放弃了现实主义，改而宣扬民族主义和乔治的“地产单一税”主张，使他作品的思想性受到了损害。

〔现实主义文学对垄断资本的揭露〕　90 年代以后，美国文学开始更深刻揭露垄断资本所造成的罪恶与弊端。1901 年，弗兰克·诺里斯发表了他的优秀长篇小说，即《小麦史诗》的第一部《章鱼》。在这部小说中，诺里斯以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农村为广阔的背景，真实生动地描写了西部中小农场主同垄断资本（指铁路公司）之间尖锐冲突和生死斗争。作者用极其热情的语言赞美土地，赞美西部农民纯朴自然的性格和生活。但贪婪残忍的铁路公司巧取豪夺，力图抢走铁路沿线农民们苦心经营、赖以生存的农场，因而农场主们被迫联合起来同铁路公司斗争。铁路公司控制了州的政治、经济权力，法院也站在它们一边，农场主们无法与其抗衡。最后铁路公司竟强行没收农场，同农场主发生了流血冲突，结果农场主失败，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作者站在中小农场主一边，满怀义愤地控诉垄断资本家的罪恶。铁路资本好像一条巨大而凶恶的章鱼，触手伸向四面八方，所及之处，任何人也难以摆脱。作者把农场主同铁路公司之间的斗争看成是小麦所代表的“善”同铁路公司所代表的“恶”之间的斗争，相信善终将战胜恶，并设计了一个铁路公司经理失足落入小麦堆中不能自拔，最后被“淹死”的结局，实际上表现了人们在强大的垄断资本面前无能为力的情绪。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城市也迅速兴起，城市不但成为工商业中心和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象征。有位青年作家无情揭开了这层“繁荣”的帷幕，大胆暴露出 19 世纪末期城市生活中最悲惨、黑暗和丑恶的一面，这个作家就是斯蒂芬·克莱恩。他的第一部小说《街头女梅吉》（1893），

取材于纽约贫民窟的生活。女主人公梅吉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最后因不堪忍受这种痛苦生活而自杀。作者揭露了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人们的悲惨处境，表明妇女沦落并非是因为道德堕落，而是社会逼迫所致。这本小说因为揭了资本主义的疮疤，写成后竟找不到地方出版，克莱恩只好自费印行。克莱恩的其他作品还有描写南北战争的长篇小说《红色英勇勋章》（1895）和许多短篇小说。克莱恩的作品风格独特，观察敏锐，富于色彩感，表现力较强。他赋予写实小说和短篇小说以特有的形式，对后来的海明威、福克纳、斯坦贝克等著名作家都有影响，被看成是美国现代小说的创始人。克莱恩只活了29岁，如果天假以年，也许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还出现了一个重要作家和评论家亨利·詹姆斯。他是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弟弟，他一生中写了许多小说和大量文学评论，他的题材领域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而基本主题则是年轻的美国同古老的欧洲新、旧两个大陆之间的对立，象征两种道德观念的冲突。亨利·詹姆斯的主要作品有《贵妇人画像》、《波士顿人》、《卡萨玛西玛公主》、《鸽翼》、《使节》、《金碗》等。詹姆斯对美国资产阶级上层的生活及思想情绪极为熟悉，而且往往持批判态度；但对下层人民所知甚少，而且怀有精神贵族的偏见。他无视道德品质的社会根源，很少描写社会环境；他的政治态度也很保守，甚至在作品中讥讽、嘲笑进步的民主运动。詹姆斯在西方评论界备受推崇，有人说他是“描写优美的良知的史学家”。他对文学的主要贡献是对小说艺术进行了新的尝试，如采用“意识中心”这种新的叙述技巧、对人物心理和意识进行细致分析等，这对后来的“现代派”作家如托马斯·沃尔夫等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认为是英美现代主义小说的先声。

〔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出生于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4岁时，他全家迁居密苏里州的汉尼巴尔，他在密西西比河岸边这个小镇上度过了短暂的童年。12岁丧父后，马克·吐温便开始独立谋生，先后做过印刷所学徒、排字工人，在密西西比河的轮船上当过舵手（他的笔名马克·吐温就是水手术语，意为"水深两㖊"），去西部淘过金，当过新闻记者等。艰难动荡的生活使马克·吐温形成了坚毅、幽默、豪放的性格，丰富的经历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他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自1865年发表了成名作《卡拉韦拉斯县著名的跳蛙及其他故事》后，他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了多部长篇小说和许多短篇及政论，他的创作是19世纪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尖锐讥讽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和无情揭露19世纪后期美国的政治腐败是马克·吐温作品的一个突出特色。在短篇小说《竞选州长》中，他把竞选活动中政客们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谴责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惜使用一切最肮脏卑鄙的手段。在短篇《田纳西的新闻界》中，马克·吐温用荒诞夸张的手法，尖刻讽刺了美国报界中那种耸人听闻和尔虞我诈的恶劣风气。1873年，他和另一位作家查尔斯·沃纳合写了长篇小说《镀金时代》，揭露国会议员们贪赃受贿，政府机关和投机家沆瀣一气，追逐暴利、搜刮民财的罪恶勾当，针砭当时弥漫全国的投机风气。马克·吐温尖刻地把19世纪后期这个资本主义"繁荣"时代称为"镀金时代"，而根本不是什么"黄金时代"。从此，"镀金"成了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的标记。

小说《王子与贫儿》写的是王子与贫儿阴错阳差，身份颠倒后遭受的不同经历，作者借用历史题材谴责专制暴政，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热爱。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美国佬》

一书中，则使用荒诞手法，让一个 19 世纪铁匠出身的美国人汉克·摩根倒退到 6 世纪的英国去生活，用现代人的眼光观察英国社会，抨击封建制度和教会专制。1883 年，马克·吐温还发表了他重访密西西比河所写的随笔《密西西比河上》，以出色的抒情笔调描绘大河的自然景色，回忆当年的舵手生活，体现了作者对自由的向往。

1884 年，马克·吐温发表了他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作者通过小说主人公哈克贝利·费恩逃出家庭、追求自由的流浪生活，满怀深情地描绘了密西西比河上的迷人景色，展示了一幅广阔的美国社会的图画，并对一切黑暗和丑恶进行鞭挞。在小说中，作者对黑人表示深切的同情，赋予他们平等的人格和高尚淳朴的心灵。小说主人公哈克那种冲破一切束缚，在大河上任意漂流、不顾一切去追求自由，去开拓新天地的精神，正是美国劳动人民开发西部时期那种坚毅、乐观、追求自由和新生活的拓殖精神的写照。作品真实强烈地体现出了美国人民的民族性格和时代精神。这部小说风格雄浑豪放，语言清新淳朴、活泼自然而又富于变化，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是马克·吐温现实主义技巧的高峰。

到了 90 年代，马克·吐温写了《败坏哈德兰堡的人》和《三万元遗产》等短篇小说，嘲笑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金元崇拜，突出金钱对人们的腐蚀作用，讽刺的笔调更加辛辣尖刻。同时他还写了许多尖锐的政论文章，抨击美国政府所推行的反动的内外政策。

马克·吐温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中，是一位具有强烈民主思想和斗争精神的伟大作家，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山峰，他的作品对美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惠特曼与迪金森的诗歌〕　19 世纪后期，美国著名诗人

首推沃尔特·惠特曼。他是从浪漫主义诗歌向现实主义诗歌过渡时期的领袖。他生于纽约长岛一个工人家庭，只上过5年学，后来做过印刷厂学徒、小学教师、报社记者和编辑等。青年时期，他沿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旅行到新奥尔良，又溯流而上经芝加哥、大湖区，顺哈得孙河返回。沿途所见所闻为他的著名诗歌集《草叶集》提供了思想启示和创作素材。

1885年《草叶集》第一版问世后，一直不断增订再版，前后共出了12版之多。最后收入的诗歌有400多首，其中最长的一首，即后来被称为《自己之歌》的那首诗，共1,336行。这首诗是作者最重要的诗歌之一，基本上体现了他毕生的主要思想。诗中多次提到草叶，说它象征着一切平凡、普通的东西和平凡的普通人。诗以纽约的街道和长岛的海滩为背景，描绘了铁匠、木工、船夫、筑路者和拉纤者等各劳动阶层的生活。这首《自己之歌》实际上就是美国发展、成长的一种艺术写照。

惠特曼不仅以独特的方式歌颂新生的美国生活，对于美国的民主理想、个性的发展以及普通人的快乐、自助的精神，也都满腔热情地加以颂扬。《我听见美国在歌唱》一首诗刻画出美国人在新大陆用自己的双手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生动情景，读来令人振奋。对于边疆西移、版图日益扩展的美国，他感到极大的欢欣鼓舞。

在诗歌写作方面，他挣脱了英国诗歌格调的传统，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自由，因而开创了美国诗歌写作的新格律。他的“自由体诗”不仅被誉为美国独立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成为“美国文艺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现代美国诗歌以至西方诗歌都有深远的影响。

埃米莉·迪金森是美国“镀金时代”另一杰出的抒情诗人。她出身于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有名望的律师家庭，从小就受到正统

的宗教的教育。她从 30 岁起，便开始写诗，但她深居简出，不与外界接触，在平静而孤独的生活中埋头写诗，留下诗稿1,700多首，但在她生前只有 7 首诗被朋友从她的信件中抄录出发表，所以她的诗歌实际上不为当时人所知。她死后，出版了多卷的诗集，对美国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

迪金森喜欢读爱默生的诗歌和散文，受到爱默生反对权威、崇尚直觉的观点的影响，以致使她与正统的宗教感情发生冲突。她的诗歌主要写高傲的孤独、对宗教追求的失望、死的安祥等，反映了她复杂的心理状态。她和惠特曼都是"镀金时代"杰出的诗人，但在诗歌内容方面两人是不同的。惠特曼注视外部世界，而迪金森却着意探讨人的内心。在诗歌写作的技巧上，两人也迥然不同。惠特曼以其无所不包的"事物、地方与人的清单"式诗句而著称，而迪金森所表述的却是准确、简明的短小精悍的诗句。

迪金森认为，诗人的责任在于运用突出的具体的意象表现抽象的思想。她虽然深居简出，但对 19 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并非一无所知。她的诗歌也带有时代的气息。从她的一些诗歌中，可以看出她对"镀金时代"的物质主义和世态炎凉的抨击。

〔交响乐队的建立和爵士音乐的出现〕　在 19 世纪后期，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来自"音乐之乡"——中欧和东欧国家移民的增多，美国爱好音乐的风气日盛，人们对交响乐队日益增长的兴趣就说明这种发展。1878 年，在德裔音乐家利奥波德·达姆罗施的领导下，纽约交响乐协会组成了。1881 年，波士顿交响乐队在芝加哥乐队指挥西奥多·托马斯支持下也建立起来。接着，芝加哥、辛辛那提和匹兹堡的交响乐队也先后组建了。

这些交响乐队主要演奏欧洲作曲家的作品，有时也演奏一些

美国乐曲，颇受听众的欢迎。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尔常采用美国的主题谱曲，为交响乐队提供了一些美国乐曲。但是浪漫主义作曲家埃塞尔伯特·内文比起麦克道尔更为当时美国人所熟知，因为他谱写了一些为美国人所喜欢的像“玫瑰园”那样的小型乐曲。

同时，一种纯粹美国本地的音乐形式——爵士音乐[①] 也出现了，它是从新奥尔良和孟斐斯等城市黑人民间表演艺术演化而来的，通常用“爵士乐”和“慢四步爵士舞曲”的旋律表现出来。这种音乐具有活泼欢快和放纵的特点，后来日益受到美国人的欢迎，成为美国通俗音乐的主流。

黑人歌唱家也为美国音乐传统添加了黑人的圣歌。菲斯克大学黑人民歌歌唱家和汉普顿学院黑人圣歌歌唱队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受到热烈欢迎。

〔民族绘画的成长〕　美国绘画艺术走上民族化道路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那时，一代新的画家开始以浪漫的手法描绘自然风光，富于想像的美国风景画派即所谓“哈得孙画派”逐渐形成了。19世纪美国的风景画大师是乔治·英尼斯。他从小自学作画，后来受法国巴比松派画家的影响，逐渐形成自己的画风。他的风景画布局合度，剪裁得体，画意内涵，用色也极为丰富，技法质朴而精美。英尼斯特别见长于绘画中倾注感情，描绘稍纵即逝的风景中的光和云，摇曳不定的风景，炫目华丽的落日余晖或神秘宁静的月夜风景。他的主要作品有《在格林伍德下面》、《风偃雨息》、《秋天的早晨》、《度过风暴》、《月亮东升》和《蒙特克莱的冬晨》等。

美国民族绘画艺术的真正形成和繁荣是在19世纪后半期，这

---

① 这个词的来源出于非洲的“jazz”一词，它是埃及以西的北非海岸的当地名称。

一时期出现了两个最优秀的画家，就是被称为 19 世纪美国艺术中并立的两座山峰的温斯登·霍默和托马斯·埃金斯。他们的油画创作把美国现实主义传统风格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立了摆脱欧洲影响的正宗画风。

霍默几乎没有受过系统的美术教育，靠自学成功，是一个地道的美国画家。霍默早期的作品主要是描写战争、黑人生活的风俗画，他以纯熟的手法描绘马克·吐温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新世界的地方生活，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美国气息，因此有人说他的风景画和风俗画是“在美国的水中受洗礼的。”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后，他开始抛弃风俗画和插图而潜心专攻风景画的创作。霍默是 19 世纪美国最杰出的水彩画家，他的作品使美国的水彩画从气派小、不自然、充满陈旧气氛的绘画效果里挣脱出来，而代之以笔力雄健、明亮新鲜和优雅的色调。霍默以其毕生的精力描绘雄伟的自然，刻画坚毅、淳朴、勇敢善良的美国人民。他的风景画作品中几乎都有人物形象，而且几乎都是猎手、渔夫、黑人、农妇、战士、救险队员等劳动人民的形象。他画中的人物不是风景的点缀，环境也不只是人物的陪衬，而是人物与环境有机地结为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整体，相得益彰，浑然天成，使作品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霍默极其热爱大海，表现大海的奇伟壮阔和人同海洋、同大自然的顽强斗争是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如油画《救生索》(1884)、《夜雾将临》(1885)和《遇难信号》(1900)等作品，画风刚健雄壮，笔触遒劲阔大，色彩对比强烈，具有扣人心弦的力量。到了晚年，他全力描写大海，为了取得准确真实的效果，他有时会为了一个景色的再现而等上几年。他拒绝全凭记忆作画的方法，为了观察暴风雨的磅礴气势，他甚至搬到海边茅屋去居住。这种对大自然的酷爱和献身精神，造就了他的纪念碑性的、富有英雄气概的作品。霍默的其他主要作品还有《扬鞭》、《营火》、《海岸》、《猎人与狗》等。

同霍默相比，托马斯·埃金斯也继承了内战前美国绘画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但他更偏重于描绘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有时把绘画对象隐藏多年的性格特点都挖掘出来，以致许多人甚至不愿请他画像。埃金斯受过系统的学院式美术教育，并在巴黎等地学习研究。但他在教学和创作上，却反对艺术学院公式化的"美"，坚决主张真实地反映生活。他在宾夕法尼亚艺术学院任教时，曾坚持要在男女合班的素描课中画全裸的男模特，因而遭到学院"权威"们的攻击及社会上清教徒式的宗教人士的责难，而埃金斯却以辞职表示了决不妥协的精神。埃金斯的代表作《格罗斯大夫的临床教学》(1875)充分表现了他这种向保守观念挑战的精神。他以严格的写实技巧，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画的虽然是血淋淋的外科手术的场面，却使人感到冷静的科学力量与求知和救人的热情。此后，埃金斯又作了许多肖像画，其中有医生、乐师、画家、僧侣、歌星和女演员、商人及普通妇女，这些作品都朴质无华，毫无修饰，有如浑金璞玉。由于他的肖像画朴直不讳，常常招致抱怨。埃金斯坚信自己的艺术主张，努力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肖像画都是以深远的性格描写见长，他对于生活的敏锐感受和他作品所具有的地方色彩，使他成为19世纪末美国杰出的却不受人欢迎的肖像画家，但他的大量作品却被珍藏下来。

〔雕塑与建筑〕　内战之前，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大型的纪念碑性雕塑作品，但很少有建筑雕刻。内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崛起，许多城市都创办了一些艺术学院，建立了博物馆，同时也兴建了很多广场、纪念堂等纪念性建筑，于是雕塑和建筑几乎同步发展起来。但就建筑雕塑而言，战后10年内只有对假古典主义的意大利雕塑的摹仿，而没有产生比较高水平的纪念碑性作品。1876年费城举行的美国建国百年展览会是美国雕塑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标志着美国雕塑艺术已经从罗马冷酷的假古典主义转到巴黎

生动的浪漫主义。19世纪美国雕塑艺术的两个杰出代表人物是奥林·沃纳和奥古斯塔斯·圣—郭登斯。沃纳的作品明朗，富于感情，优美而妩媚。圣—郭登斯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雕刻家之一，他把美国的雕塑提高到世界水平，在美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表现手法奔放自由，对于人物的刻画真实生动，把自然的动作同千锤百炼的轮廓结合在一起。圣—郭登斯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塑立的《法拉格特纪念碑》是他的成名作，这个纪念碑的人物性格刻画异常生动出色，结构严谨，为美国纪念碑创作树立了榜样。1887年，圣—郭登斯为芝加哥林肯公园所雕塑的林肯纪念像，获得了极大成功。他巧妙地安排明暗对比，手法灵活生动，使这位伟大政治家朴实机敏的形象在现实主义和夸张的手法中得到更加深刻的鲜明的处理。有人认为这座雕像"征服了人们的想像力，成为合众国最著名的纪念碑"。圣—郭登斯其他重要的作品还有纽约的谢尔曼将军铜像，以及他在首都华盛顿为亨利·亚当斯夫人制做的墓碑雕像《神的世界》等。《神的世界》被认为是圣—郭登斯最重要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与圣—郭登斯同时，还有一位卓有成就的雕塑家丹尼尔·弗伦奇。弗伦奇于1850年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先后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法国巴黎学习雕塑。他的作品手法细腻、刀法自如，曾多次在国际展览会上获奖。弗伦奇一生勤于创作，为美国大都市、大学、纪念堂、博物馆留下了许多精美的纪念像。他的主要作品有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美国民兵》、哈佛大学的《约翰·哈佛纪念像》、米尔顿的《战争纪念碑》、华盛顿的《林肯纪念碑》、华盛顿林肯纪念堂的《林肯坐像》以及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塑像》等。其中华盛顿林肯纪念堂的《林肯坐像》，可以说是弗伦奇的代表作：林肯端坐在宽大的椅子上，两臂高高抬起，平搭在两侧扶手之上，身材瘦削但挺拔岸然，面容清癯，神情刚毅，目光微微俯视，沉思之中流露出隐隐的忧虑。塑

像的整个造型像一座雄伟峭拔的山峰，又像一匹蹲伏于峭崖之上，背负青天，振翮欲飞的雄鹰。作者把这位深受美国人民爱戴、质朴坚毅、胸怀博大的政治家的精神面貌真实地刻画出来了。

内战结束后的10多年间，美国的建筑艺术没有什么创新，更谈不上风格与特色，只是盲目模仿古典和照搬国外，修了许多摹仿中世纪的假哥特式的公众建筑，其特点是粗俗华丽，但华而不实。不过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两位杰出的建筑师，就是亨利·理查森和理查德·亨特。理查森试图把罗马建筑术移植到美国，没有成功，但他设计的建筑却因为具有一种完整性而大受欢迎。他的主要作品有波士顿的三一教堂和哈佛大学的奥斯汀堂。与理查森同时，亨特把法国文艺复兴风格介绍到美国，摹仿法国式大别墅或宫廷式的城镇房舍，为美国的富豪们建造了许多乡间别墅。

19世纪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都要求能适应其需要的新的建筑物，如车站、仓库、商场、办公大楼、博览会场等。这些建筑的要求同陈旧的建筑观念、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等等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旧的建筑学所不能解决的。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了城市的急剧膨胀和人口剧增，各种商业、工业等类机构的出现和扩大等因素导致城市地价暴涨，所以人们开始寻求在尽可能小的占地面积上获得尽量大的建筑空间，大企业和大的商业、金融业等机构也需要大型建筑，把其所属机构相对集中起来，以提高效率、加强竞争。在这种时代的需要推动下，加上新的建筑材料（如钢铁、玻璃、钢筋混凝土）和新发明（如电梯）的出现以及相应的结构科学的发展，在19世纪末期，一种崭新的建筑形式——摩天大楼应运而生。著名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领导了这一新的潮流。他设计的主要建筑有纽约州布法罗的保险大楼和芝加哥的斯科特百货商店。摩天大楼是美国的一大发明，也是建筑史上的一次突破。这种建筑形式适应了高速发展

的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大城市的需要，在充分利用新的建筑材料和空间的前提下，提供了尽可能大的利用空间，具有较大的实用性。但早期的摩天楼式样单调，而且争先恐后向高度发展，几乎遮天蔽日，使城市中的人们几乎整天生活在阴影之中。沙利文还为芝加哥国际博览会交通大楼设计了入口——“金门”。沙利文设计的金门借鉴了古代凯旋门的形式，但线条洗练简捷，整个建筑稳重而不呆板，富丽而不粗俗，古典美中透出现代气息，是融古代、现代风格于一炉的杰作。

19世纪后期美国历史大事记

1860年

11月6日	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
12月20日	南卡罗来纳州首先宣布脱离联邦。

1861年

2月8日	南部7个蓄奴州代表集会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宣布成立“美利坚诸州同盟”，简称“南部同盟”。
3月4日	林肯就任总统。
4月12日	南部同盟军攻占萨姆特要塞，内战爆发。
7月16日—21日	联邦军队在布尔河畔马纳萨斯首战失利。
7月25日	国会授权总统召集50万志愿军。
8月30日	约翰·弗里蒙特将军在密苏里州颁布“解放奴隶”的命令。
9月11日	林肯撤销弗里蒙特关于“解放奴隶”的命令，并于同年10月将其免职。
10月21日	联邦军队在鲍尔斯高地败北。
10月24日	丹佛至萨克拉门托电报线接通，传递第一份跨越大陆的电报通讯。

11月　美英之间因“特伦特事件”而出现战争危机，12月，危机以美国让步而告结束。

1862年

2月15日　尤利塞斯·格兰特率联邦军攻陷多纳尔森堡。

3月10日　联邦政府颁布禁止军队追捕和引渡逃奴的法令。

4月25日　联邦军队攻克南部贸易中心新奥尔良。

5月20日　林肯政府颁布“宅地法”。

6月5日　美国在外交上承认利比里亚和海地两个黑人国家。

6月6日　联邦海军占领田纳西州孟菲斯。

6月26日—7月2日　联邦军队在“七日战役”中失败。

7月1日　国会通过成立“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法案；国会同时通过累进所得税法案。

7月2日　林肯签署“莫里尔赠予学院土地法”。

9月22日　“预备解放奴隶宣言”发表。

9月17日　南部同盟军在安提塔姆战役中被击败。

12月1日　林肯在国情咨文中建议对解放奴隶以补偿并向国外移迁黑人。

1863年

1月1日　林肯政府发表《解放宣言》。

2月24日　亚利桑那准州成立。

2月25日　国会通过《关于国民银行体系的法案》。

3月3日　国会通过《征兵法》；国会建立国家科学院；爱达荷准州成立（包括现今爱达荷、蒙大拿和怀俄明3个州）。

4月20日　林肯宣布作为战时措施成立西弗吉尼亚州（6月20日正式成立）。

5月14—23日　格兰特攻克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并猛攻维克斯堡。

5月28日　第一个黑人志愿军团队加入联邦军队作战。

6月20日	第一个国民银行在费城成立。
7月1—4日	联邦军队取得葛底斯堡大捷。
7月3日	格兰特率军攻陷维克斯堡，联邦军队得以控制整个密西西比河。
11月19日	林肯发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
11月23—25日	联邦军队查塔努加大捷。
12月8日	林肯向国会提出《关于大赦及重建宣言》。

1864年

2月至3月	联邦军队为西南部探矿者开路占地而与阿巴齐族和纳瓦霍族印第安人发生冲突，后来印第安人被迫迁往保留地。
2月24日	国会通过《关于全面征召黑人入伍法案》。
3月12日	格兰特被任命为联邦军总司令。
4月4日	法国在墨西哥扶植傀儡政权，美国众议院决议谴责。
4月8日	参议院通过联邦宪法第13条修正案。
5月7日	威廉·谢尔曼率军进攻佐治亚州，开始“向海洋进军”。
7月4日	国会通过《移民法》，并成立联邦移民事务局。
7月8日	国会通过《韦德—戴维斯法案》。
10月31日	内华达州作为第36州加入联邦。
11月8日	林肯再次当选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为副总统。
11月29日	联邦骑兵队在科罗拉多准州屠杀印第安人500余人。
12月21日	谢尔曼大军攻克萨凡纳，完成“向海洋进军”。

1865年

1月31日	众议院通过联邦宪法第13条修正案，并送交各州批准。
3月3日	国会通过成立自由民局的法案。同日，国会对各州银行纸币征税10%。

4月3日	联邦军队攻克南部同盟“首府”里士满。
4月9日	罗伯特·李率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美国内战结束。
4月14日	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遇刺，翌日逝世，约翰逊就任总统。
5月29日	约翰逊发表《大赦宣言》；南部各州开始制订迫害黑人的“黑人法典”。
10月	埃利斯托岛黑人争取土地的武装斗争获胜。
11月18日	塞缪尔·克莱门斯以笔名马克·吐温发表第一部小说《卡拉韦拉斯县著名的跳蛙》。
12月18日	第13条修正案在29个州得到批准，奴隶制在全国成为非法。
12月26日	国会两院组成“联合重建委员会”。

1866年

4月9日	国会通过《公民权利法案》。
5月	三K党在田纳西州普拉斯基建立。
6月16日	国会两院通过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
8月20—25日	全国劳工同盟在巴尔的摩成立。

1867年

3月	国会通过《与印第安人建立和平法》，并组成“和平委员会”，以结束对印第安人的战争。
3月1日	内布拉斯加作为第37州加入联邦。
3月2日	国会通过共和党激进派的《重建法案》，规定对南部诸州实行军事管制，授予黑人选举权，在南部各州成立新的政府。
3月30日	美国政府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4月9日获得参议院批准。
8月28日	美国海军占领中途岛。

12月4日　奥利佛·凯利等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创建“农民协进会”(格兰其)。

1868年

2月24日　众议院提出弹劾约翰逊总统议案。

3月30日　参议院组成特别法庭，受理弹劾约翰逊案。

3月—4月　“和平委员会”分别与南、北部印第安人部落首领达成“协议”，迫使印第安人迁往指定的两个保留区。

美国引进“西门子——马丁炼钢法”（敞炉式炼钢法)。

5月26日　约翰逊总统被宣布无罪。

7月28日　第14条修正案获得30个州批准而生效。

美国与清政府代表团在华盛顿签订“中美续修条约”(即“蒲安臣条约”)。

12月25日　约翰逊总统宣布无条件赦免南部叛乱者。

1869年

2月27日　国会通过联邦宪法第15条修正案。

3月4日　格兰特就任美国第18届总统。

3月18日　国会决定以黄金偿付国债，赎回绿背纸币。

4月13日　格兰其在华盛顿特区召开首届年会。

5月10日　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联合太平洋铁路在犹他州普罗蒙特里接轨。

9月1日　全国禁酒党在芝加哥成立。

12月9日　劳动骑士团成立。

1870年

1月10日　约翰·洛克菲勒创办美孚石油公司。

3月30日　宪法第15条修正案获得29个州批准而生效。

5月13日	国会通过《强制法案》，授权联邦法院强制实施第15条修正案。
12月10日	怀俄明准州立法给妇女以选举和担任公职权。

1871年

3月3日	国会设立文官制度改革委员会，乔治·柯蒂斯为首任主席。
4月20日	国会通过《三K党法案》，即第二个"强制法案"。
7月8日	纽约市"特威德集团"贪污案被揭露。
10月8—10日	芝加哥市遭受特大火灾。

1872年

3月1日	国会立法设立黄石国家公园。
5月1日	自由派共和党人在辛辛那提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5月22日	国会通过《大赦法》，恢复全体南部公民的公民权。
6月10日	自由民局结束工作。
9月4日	莫比利尔公司舞弊案被揭露。
9月14日	英美就内战中海事损失进行国际仲裁。
11月5日	格兰特再度当选为总统。

1873年

2月12日	国会通过《铸币法》，限制银币铸造量。
3月3日	国会通过《育林法》。
4月14日	最高法院声称公民权来自州宪法，为南部诸州剥夺黑人权利制造根据。

1874年

马克·吐温与查尔斯·沃纳合著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发表。

3月11日　　威斯康星州通过第一个管制铁路的《格兰其法》。

11月3日　　民主党在内战后第一次控制国会众议院。

11月18日　　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成立。

11月24日　　J.F.格利登获得发明铁蒺藜专利权，解决了西部农场修筑栅栏的关键问题。

11月25日　　绿背纸币党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成立。

1875年

1月14日　　国会通过《恢复硬币支付法》。

1月30日　　美国与夏威夷王国缔结贸易互惠条约。

1月—6月　　宾夕法尼亚州煤矿工人大罢工，遭到镇压。

5月1日　　“威士忌集团案”被揭露。

10月　　达科他西部黑山地区出现淘金热。

1876年

3月7日　　亚历山大·贝尔获得电话发明专利权。

5月10日　　纪念独立百周年博览会在费城开幕。

6月25日　　苏族印第安人与联邦军队在达科他的小大角地区激战。

8月1日　　科罗拉多作为第38州加入联邦。

11月7日　　总统选举中发生海斯与蒂尔顿之争。

1877年

3月2日　　两大党在南部问题上达成“海斯——蒂尔顿妥协”。拉瑟福德·海斯当选为美国第19届总统。南部重建结束。

3月3日　　国会通过《荒地法》。

4月24日　　最后一批联邦军队撤离新奥尔良。

7月17日　　宾夕法尼亚铁路工人罢工。

7月23—26日　　加州各地发生排华浪潮。

1878年

2月19日　　托马斯·爱迪生获得留声机发明专利权。

2月22日　　绿背纸币劳工党在俄亥俄州托伦多成立。

2月28日　　国会通过《布兰德—艾利逊购银法》。

11月5日　　民主党在46届国会的参、众两院居多数。

1879年

5月7日　　加州通过禁止雇用华人的州宪法条款。

10月21日　　爱迪生发明白炽电灯（翌年1月27日获专利权）。

1880年

“中美续修条约”签订，承认美国有权整理、限制华工前往美国。

3月　　美国贝尔电话公司成立。

3月24日　　社会福音运动在费城建立“救世军”。

10月　　全国农民联盟（即“北方联盟”）在芝加哥正式成立。

11月2日　　共和党詹姆斯·加菲尔德当选总统。

1881年

2月10日　　布克·华盛顿在亚拉巴马州创办塔斯克基学院。

7月2日　　加菲尔德总统在华盛顿车站遇刺，9月19日去世。

8月2日　　塞缪尔·冈珀斯脱离劳动骑士团，在匹兹堡成立工会联合会。

9月20日　　切斯特·艾伦·阿瑟就任美国第21届总统。

1882年

1月2日　　美孚石油公司组成由9人董事会控制的托拉斯。

5月22日　美国迫使朝鲜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即“仁川条约”）。

5月6日　国会通过“排斥华工法”，规定10年内禁止华工入境。

9月4日　爱迪生在纽约珍珠街建立第一座中心电站。

1883年

1月16日　国会通过“彭德尔顿文官法”。

3月3日　国会批准建造3艘钢甲巡洋舰。

3月24日　纽约至芝加哥第一条长途电话开通。

9月8日　北太平洋铁路建成，是为第二条横贯大陆铁路。

1884年

1月1日　马克·吐温发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6月27日　联邦政府建立劳工统计局。

8月5日　在纽约港举行自由女神像奠基典礼。

11月4日　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当选总统，两党重新开始轮流执政。

1885年

2月26日　国会通过《合同工法》，禁止契约劳工入境。

8月10日　美国第一条市内有轨电车线在巴尔的摩建成。

8月至9月　西部各州发生排华浪潮。

1886年

5月1—4日　美国约3千万工人为实现八小时工作日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1889年第二国际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5月3—4日　芝加哥发生“秣市惨案”。

7月1日　联邦最高法院在“沃巴什案”中禁止各州政府管制铁路。

8月　亨利·乔治参加纽约市长竞选。

12月7—8日　美国劳工联合会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成立，冈珀斯任主席。

1887年

2月4日　国会通过《州际商务条例》，并设立州际商务委员会。

2月8日　国会通过《道斯法案》，规定把属于印第安人部落的土地分配给部落成员个人。

3月3日　国会通过《哈奇法》，对农业教育和科研予以津贴。

1888年

6月13日　国会将联邦劳工局改为独立的劳工部。

11月6日　共和党人本杰明·哈里森当选总统。

1889年

2月9日　农业部（1862年成立）升格为内阁的正式部。

10月2日　第一次泛美会议在华盛顿召开。

11月　南达科他、北达科他、蒙大拿、华盛顿作为第39至42州加入联邦。

12月　农民联盟在圣路易斯召开大会。

1890年

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首位。

美国人口普查局总监宣布，西部拓居的边疆线已消失，标志美国西进运动告一段落。

联邦政府设立移民局。

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出版。

5月2日　俄克拉何马建立准州。

7月2日　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7月3—10日	爱达荷和怀俄明作为第43、44州加入联邦。
7月14日	国会通过“谢尔曼购银法”。
10月	国会通过“麦金莱关税法”。
11月1日	密西西比州通过一项州宪法条款，要求选民交纳人头税和接受文化测验。
11月—1891年1月	西部印第安人与联邦军队发生“鬼神舞战争”，为印第安人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抗。

1891年

3月3日	国会通过“保留森林法”，建立13个国家森林保护区。联邦成立11个上诉巡回法院。
5月18日	全国农民组织在辛辛那提集会，决定组建人民党。
7月31日	爱迪生发明电影摄影机。

1892年

2月22日	人民党在圣路易斯成立。
4月19日	J·杜里埃试制成功美国第一辆单缸汽车。
5月5日	国会决定将“排华法案”延长10年。
7月1—9日	霍姆斯台德钢铁工人罢工。
7月2—5日	人民党通过著名的“奥马哈纲领”。
11月8日	民主党人克利夫兰当选总统。

1893年

1月17日	美国策动夏威夷政变，迫使夏威夷女王李留奥卡拉尼退位。
3月—10月	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后经济萧条达3年之久。
5月10日	世界博览会在芝加哥开幕。
6月20日	尤金·德布斯建立产业性美国铁路工会。
7月12日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宣读

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

8月7日　克利夫兰总统撤销“谢尔曼购银法”，民主党陷入分裂。

1894年

3月17日　中美缔结关于禁止华工移居美国的条约。

3月25日—5月1日　雅各布·柯克西发动“向华盛顿进军”。

5月—8月　普尔曼工人大罢工，联邦军队前往镇压。

5月　全国市政同盟在费城成立。

8月28日　国会通过《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削减部分关税率并征收所得税。

1895年

5月15日　全国复本位联盟在盐湖城召开大会。

7月20日　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重申美国关于拉美事务的“门罗主义”立场。

9月18日　布克·华盛顿在亚特兰大棉业展览会上发表著名演说。

10月12日　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在尼亚加拉瀑布城建成第一个发电网。

12月17日　克利夫兰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就英属圭亚那同委内瑞拉的边境纠纷，声称美国有权干涉拉美事务。

12月　德里昂建立社会主义行业与劳工联盟，奉行“双重工会”政策。

1896年

1月4日　犹他作为第45州加入联邦。

1月21日　美国制造商全国联合会成立。

5月28日　最高法院在“普莱塞控弗格森”案中，提出“分离但平等”原则。

7月22日	人民党与民主党合并，共同推举威廉·布赖恩为总统候选人。
10月1日	邮政部建立乡村免费邮递制度。
11月3日	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当选总统。

1897年

3月2日	克利夫兰总统否决关于对移民进行文化测验的立法。
6月15日	美国社会民主党在芝加哥成立。
7月7日	国会通过《丁格利关税法》，平均税率高达57%。

1898年

	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夺得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群岛，并迫使古巴成为美国的保护国。
5月12日	路易斯安那州制定“祖父条款”，剥夺大多数黑人的公民权。

1899年

9月6日	国务卿约翰·海发表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1900年

10月	劳联领导集团参加全国公民联合会。

主要外文参考书目

艾伦，詹姆斯（Allen，James S.）

《美国改造时期》（*Reconstruction*，*The Battle for Democracy*，*1865—1877*，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1973）

安德鲁斯，韦恩（Andrews，Wayen）

《简明美国史词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2）

贝莱，托马斯（Bailey，Thomas A.）

《美国人民外交史》（*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Prentice-Hall Inc.，1974）

贝林、戴维斯等（Baily，B. and Davis，D. et al）

《伟大的共和国》（*The Great Republic*，*A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Massachusetts，D. C. Heath and Co.，1981）

巴特利特，鲁尔（Bartleet，Ruhl J.）

《美国外交记事，美国对外关系史文献与资料》（The Record of *American Diplomacy*，*Documents and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Toronto：Alfred. A. Knopf，1964）

比尔德夫妇（Beard，Charles & Beard，Mary）

《美国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7）

比米斯，塞缪尔（Bemis，Samuel F.）

《美国外交史》(*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50)

比林顿，雷(Billington, Ray A.)

《向西扩张，美国边疆史》(*Westward Expans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4)

博德纳，约翰(Bodnar, John)

《迁徙的移民，都市化美国的外来移民》(*The Transplanted: A History of 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布尔斯廷，丹尼尔(Boorstin, Daniel J.)

《美国人：建国历程》(*The Americans: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5)

博耶和摩莱斯(Boyer, R. O. & Morais, H. M.)

《未发表过的劳工故事》(*Labor's Untold Story*, New York: Cameron Associates, 1955)

伯切尔，R. A.(Burchell, R. A.)

《向西扩张：美国历史文献》(*Westward Expansion: American Historical Documents*. London: 1974)

卡洛，亚历山大编(Callow, Alexander B.)

《美国城市史：附有评论的论文集》(*American Urban History: An Interpretative Reader with Commenta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 Pr., 1973)

坎伯尔，查尔斯(Campbell, Charles S.)

《美国对外关系的转变，1865—1900年》(*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865—1900*. New York: Harper Colophen Books, *1976*)

钱得勒，小阿尔弗雷德(Chandler, Alfred D. Jr.)

《战略与结构：美国工业企业史上的篇章》(*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Enterprise*, Cambridge: Mit Pr., *1962*)

《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中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1977*)

《美国华人的历史》(*The Chinese of America*,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1*)

科克伦和米勒(Cochran, Thomas C. & Miller, William)

《企业时代:工业美国社会史》(*The Age of Enterprise: 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1*)

科尔,查尔斯(Cole, Charles A.)

《不可抑制的冲突,*1850—1851*》(*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 1850—1851*, New York: Scholarly Pr., Inc., 1971)

康马杰,亨利编(Commager, Henry S.)

《美国历史文献》,第一卷(*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1 New York: Aphleton-Century-Crofts, 1962)

《美国历史简明词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Scribner's Charles, Sons, 1983)

库利治,玛丽(Coolidge, Mary R.)

《中国移民》(*Chinese Immigration*, New York, Ayer Co., Pubs, Inc., 1909)

库尔特, E. M. (Coulter, E. M.)

《美利坚南部同盟诸州,1861—1865 年》(*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1861—1865*. Texas: La State Univ. Pr., 1950)

《重建时期的南部,1865—1877 年》(*The South During Reconstruction, 1865—1877*,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47)

柯伦特,理查德(Current, Richard N.)

《人所不知的林肯》(*The Lincoln Nobody Knows*, New York: Greenwood House, 1958)

柯伦特,理查德等(Current, Richard N. & Williams, T. & Freidel, Frank)

《美国历史》,第 2 卷(*American History*, *vol*. 2 *Since 1965*, New York: Knopf, Alfred A., Inc., 1979)

丁内尔斯坦,伦纳德等(Dinnerstein, Leonard et al)

《美国人的种族:外来移民与同化史》(*Ethnic Americans: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82)

杜波依斯，威廉（Du Bois, William E. B.）

《美国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Atheneum Pubs., 1965）

杜甘，M. A.（Duggan, M. A.）

《反托拉斯与最高法院》（*Antitrust and the US. Supreme Court*, New York: Federal Legal Publisher, 1981）

杜勒斯，福斯特（Dulles, Foster R.）

《美国劳工史》（*Labor in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Herlan Daridson Inc., 1955）

邓宁，威廉（Dunning, William A.）

《内战与重建论文集》（*Essays o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Ayer Co. Pubs., 1965）

方纳，菲利普（Foner, Philip S.）

《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2卷（*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 Inc, 1947—1955）

富兰克林，约翰·霍普（Franklin, John Hope）

《内战后的重建》（*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Civil Wa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1）

《从奴隶制到自由：美国黑人的历史》（*From Slavery to Freedom: A History of Negro Americans*, New York: Alered A. Knopf Inc., 1980）

加拉蒂，约翰（Garraty, John A.）

《1870年—1890年美国社会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 Society, 1870—1890*. Columbia Univ. of South Carolina Pr., 1968）

格韦尔，韦斯利（Gewehr, Wesley M.）

《美国的文明——美国历史》（*American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57）

吉布森，阿雷尔（Gibson, Arrell M.）

《美国印第安人：从史前到现在》（*The American Indian: Prehistory to Present*, Mass.: D. C. Heath and Co., 1980）

格莱布，查尔斯编（Glaab, Charles N.）

《美国城市史文献》（*The American City: A Documentary History*, Illiois: Dorsey, 1963）

格莱布与布朗（Glaab, Charles N. & Brown, A. T.）

《美国城市史》（*A History of Urban America*, New York: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983）

戈德温，罗伯特（Goldwin, Robert A.）

《美国外交政策文献摘编》（*Reading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 Pr., 1959）

戈德温，L.（Goodwyn, L.）

《人民党时刻：美国农业反叛简史》（*The Populist Moment: a History of Agrarian Revolt 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 Pr., 1978）

格林，康斯坦斯（Green, Constance M.）

《美国城市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American Cities in Growth of the N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57）

格罗勃，杰拉尔德（Grob, Gerald N.）

《工人与乌托邦》（*Workers and Utopia*, Quadrangle: The New York Times Co., 1960）

哈克，路易斯（Hacker, Louis M.）

《美国传统的形成》（*The Shaping of American Tradition*, Columbia Univ. Press, 1947）

哈克与肯德里克（Hacker, Louis M. & Kendrick, Benjamin B.）

《1865年以来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65. New York: F. S. Crofts, 1949）

哈特，艾伯特编（Hart, Albert B.）

《当代人讲述美国历史》，第4卷（*American History told by Contemporaries*, *vol*. 4.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64）

希克斯，约翰（Hicks，John D.）

《人民党的反叛：农民联盟和人民党史》（*The Populist Revolt：a History of the Farmer's Alliance and the People's Party*，Univ. of Minnesota Press，1931）

海迪，拉尔夫与海迪，穆迪尔（Hidy，Ralph W. & Hidy，Mudiel E.）

《大企业的先驱，1882—1911年》（*Pioneering in Big Business 1882—1911*，New York：Harper & Row，1955）

霍夫斯塔特，理查德（Hofstadter，Richard）

《改革时代：从布赖恩到罗斯福》（*The Age of Reform From W. J. Bryan to F. D. Roosevelt*，New York：Random House，1955）

霍夫斯塔特，理查德等（Hofstadter，Richard et al）

《1865年以后美国共和国》（*The American Republic Since 1865*，Englewood Cliffs：P-H，1959）

胡根布姆（Hoogenboom，Ari）

《取缔分赃制：文官改革运动史1865—1883年》（*Outlawing the Spoils：A History of the Civil Service Reform Movement 1865—1883*，Illinois：Greenwood Pr.，1961）

杰克逊与舒尔茨编（Jackson，K. T. & Schultz，S. K. ed.）

《美国历史上的城市》（*Citie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72）

詹宁斯，沃尔特（Jennings，Walter）

《合众国经济进步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Thomas Y. Crowell Co.，1926）

琼斯，埃利奥特（Jones，Eliot）

《美国托拉斯问题》（*The Trust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Th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1928）

琼斯，马尔德温（Jones，Maldwyn A.）

《外国移民》（Immigration），载波特，格伦（Porter，Glenn）主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第3卷（*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vol*. 3.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0）

《美利坚南部同盟代表大会议事录1861—1865年》（*Journal of the*

Congress of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1861—1865. Washington: Kraus Reprint Co, 1968)

凯勒，莫顿（Keller, Morton)

《国家事务：19世纪末美国社会生活》（*Affairs of State: Public Life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 1977)

李，戈登（Lee, Cordon C.)

《现代美国教育》（*Education in Modern American*, New York: HB & W, 1957)

利夫赛，哈罗德（Livesay, Harold C.)

《塞缪尔·冈珀斯与美国有组织的劳工》（*Samuel Gompers and Organized Labor in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8)

马隆，杜马编（Malone, Dumas)

《美国传记词典》，第5卷（*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vol*, 5, New York: Scribner, 1961)

马库斯，R. O.（Marcus, R. O.)

《老大党：镀金时代的政治结构 1880—1898 年》（*Grand Old Party: Political Structure in The Gilded Age* 1880—1898. New York: 1971)

麦克唐纳，威廉（McDonald, William)

《合众国历史法规选，1861—1898 年》（*Select Statutes of United States History, 1861—1898*, New York: 1922)

麦基特里克，埃里克（McKitrick, Eric L.)

《安德鲁·约翰逊与重建》（*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梅克尔维，布莱克（Meckelvey, Blake)

《1860至1915年美国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America, 1860—1915*. New York: 1962)

米勒，乔治（Miller, George H.)

《铁路与格兰其法》（*Railroads and the Granger Laws*, Madison: Univ. of Wisconsin Pr., 1971)

米切尔，埃德温（Mitchell，Edwin V.）

《美国政治百科全书》（*An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Greenwood，1946）

摩尔根，H. W.（Morgan，H. Wayne）

《从海斯到麦金莱：1877—1898年全国党派政治》（*From Hays to McKinley: National Party Politics 1877—1898*，New York：Syracuse Univ. Pr.，1969）

莫里斯，塞缪尔等（Morison，Samuel E. et al）

《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第2卷（*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vol*. 2. New York：Oxford Univ.，1980）

莫里斯，理查德（Morris，Richard B.）

《美国历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Harrper & Row Publishers，1976）

迈尔斯，古斯塔夫斯（Myers，Gustavus）

《美国大财阀发家史》（*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 Chicago：Charles H. Kerr，Publishing，Co.，1936）

内文斯，阿伦（Nevins，Allan）

《为联邦而战》（*The War for the Unio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9）

奈，卢瑟尔（Nyer，Russel B.）

《中西部进步政治：它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研究，1870—1958年》（*Midwestern Progressive Politics：a History Study of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1870—1958*，Michigan Univ. Pr.，1959）

奥尔森，詹姆斯（Olson，James S.）

《种族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2卷（*The Ethnic Dimension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St. Martin's Pr.，Inc.，1979. Two vols.）

奎特，霍华德（Quint，Howard H.）

《美国社会主义的形成》（*The Forging of American Socialism*，New York：The Bobbs-Merrill Co.，Inc.，1964）

兰德尔和唐纳德（Randall, J. G. & Donald, David）

《内战与重建》（*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Boston : D. C. Heath and Co,. 1961）

兰德尔，J. G.（Randall, J. G.）

《总统任期内的林肯》（*Lincoln the President*, New York : Dodd Mead & Co., 1945）

雷贝克，约瑟夫（Rayback, Joseph G.）

《美国劳工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Free Pr., 1966）

里斯，雅各布（Riis, Jacob A.）

《那一半人怎样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57）

罗杰斯，丹尼尔（Rodgers, Daniel T.）

《工业化美国的职业准则 1850—1920 年》（*The Work Ethic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50—1920*. Chicago : Univ. of Chicago Pr., 1979）

普雷瑟，米尔顿（Plesur, Milton）

《冲出美国，1865—1890 年外交关系研究》（*America's Outward Thrust, Approaches to Foreign Affairs, 1865 - 1890*,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Dekalb, 1971）

波拉科夫，基思（Polakoff, Keith J.）

《美国历史上的政党》（*Political Parties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 John Wiley & Sons, 1981）

波特，格伦（Porter, Glenn E.）

《全国政党纲领集，1840—1968 年》（*National Party Platforms 1840—1968*, Cambridge, Mass., 1972）

《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0）

《1860—1910 年大企业的兴起》（*The Rise of Big Business, 1860—1910*, New York : Harlan Davidson., Inc., 1973）

普拉特，朱利叶斯（Pratt, Julius W.）

《美国外交政策史》（*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1980）

桑德堡，卡尔（Sandburg, Carl）

《战争年代的林肯》（*Abraham Lincoln, The War Yea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39）

施莱辛格，小阿瑟（Schlesinger, Arthur M. Jr.）

《美国政党史》，第2卷（*History of the U. S. Political Parties, vol. 2*, New York :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73）

施莱辛格，阿瑟（Schlesinger, Arthur M. Sr.）

《1878—1898年间美国城市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City, 1878—1898*. New York : Macmillan, 1941）

西格与古利克（Seager, Henry R. & Gulick, Charles A. Jr.）

《托拉斯与公司的问题》（*Trust and Corporation Problem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29）

香农，弗雷德（Shannon, Fred A.）

《美国农民运动》（*American Farmer's Movements*, New York : Anv, Vann-Rein, 1954）

《农场主的最后边疆》（*The Farmer's Last Frontier*, New York :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45）

西蒙斯，A. M.（Simons, A. M.）

《美国历史中的社会势力》（*Social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 The Macmillan Co., 1922）

斯科考洛耐克，斯蒂芬（Skocoronek, Stephen）

《建设一个新的美国：全国性行政管理能力的扩大1877—1920年》（*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Cambirdge: Univ. Pr., 1982）

史密斯，佩奇（Smith, Page）

《战火的考验》（*Trial by Fire*, New York : 1982）

索厄尔，托马斯（Sowell, Thomas）

《美国种族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 Basic Books, Inc., 1981)

斯坦普，肯尼思 (Stampp, Kennith M.)

《重建时代，1865—1877 年》(*The Era of Reconstruction, 1865—1877*,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斯特恩，菲力普·范多朗 (Stern, Philip Van Doron)

《林肯的生平与著作》(*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braham Lincoln*,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40)

塔夫脱，菲力普 (Taft, Philip)

《冈珀斯时代的劳联》(*The A. F. of L. in the Time of Gompers*, New York :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57)

泰勒，C. C. (Taylor, C. C.)

《农民运动 1620—1920》(*The Farmer's Movement 1620—1920*. New York: Greenwood, 1954)

托马斯，布林利 (Thomas, Brinley)

《外来移民在经济方面的积极贡献》(*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 by Immigrants: the Economic Aspect*) 见哈里·N·沙伊贝 (Harry N. Scheiber) 主编《美国经济史选读》(*United States Economic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New York : Alfred A. Knopf, 1964)

特纳，弗雷德里克 (Turner, Frederick J.)

《美国历史中的边疆》(*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76)

恩格尔，欧文 (Unger, Irwin)

《绿背纸币时代，1865—1879 年》(*The Greenback Era, 1865—1879* Princeton Univ. Pr., 1964)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cus)

《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代到 1970 年》，2 卷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2 vols.)

瓦萨尔，雷纳编（Vassar, Rena L. ed.）

《美国教育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vol*. 2,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 1965）

瓦特，哈罗德（Vatter, Harold G.）

《工业成熟的趋势，1860—1914年美国的经济》（*The Drive to Industrial Maturity, The U. S. Economy, 1860—1914*, Connecticut : Greenwood Press, 1975）

沃德，戴维（Ward, David）

《城市与移民：19世纪美国变化的地理》（*Cities and Immigrants: A Geography of Change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 Pr., 1971）

韦尔，诺曼（Ware, Norman J.）

《1860—1895年的美国劳工运动》（*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0—1895*,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 1929）

沃纳，山姆（Warner, Sam B.）

《一轰而起的城市：美国城市史》（*The Urban Wildernes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ity*, New York : 1972）

怀特，伦纳德（White, Leonard D.）

《共和党时代，1869—1910年行政史研究》（*The Republican Era :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1869—1901*, New York : 1978）

威廉斯，霍尔（Williams, R. Hall）

《决定的年代：19世纪90年代美国政治》（*Years of Decision: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1890's. New York: *Random*, 1978）

威廉斯，T.（*williams*, T.）

《林肯与激进派》（*Lincoln and the Radicals*, Madison : Univ. of Winsoons Pr., 1941）

威廉斯，W. A.（Williams, William Appleman）

《美国外交的形成》，第1卷（*The Shaping of American Diplomacy*, *vol*. 1.

Chicago：Rand McNally & Co.，1962）
伍德沃德，W．E．（Woodward，W．E．）
《新编美国史》（*A New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38）
耶洛维茨，欧文（Yellowitz，Irwin）
《1850—1900年工业化与美国劳工运动》（*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1850—1900*，New York：Kennikat Press，1977）

索　　引

（按汉语拼音字母为序）

A

B

D

E

F

G

H

J

K

L

N

P

R

S

T

W

X

再版后记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第一版发表于1990年6月，屈指算来至今已10年有余。主编丁则民教授，也是笔者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导师，为该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从编写人员的选定、全书的布局谋篇、观点体例和行文风格等都进行了认真的筹划与督导。各章的执笔者，无论对该章内容熟悉程度如何，都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再深入一步，发表了数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后，才动笔写就。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曾专门召开3次审稿会，还多次征求美国权威学者的意见。至于具体执笔人员展开的各种讨论，则已无法用次数衡量。之后，又经丛书的两位主编认真审阅，几经推敲与反复修改，方定稿付梓，“历时8年始成书”。这本书和后来陆续出版的其他各卷一起构成我国在美国历史著述方面最厚重、并具有一定权威性的通史类论著，得到国内美国研究同行们的首肯和好评。

借此次再版之机，本当再事雕琢，以求锦上添花，可惜业师于去岁不幸病逝，未能如愿，成为本书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病榻之前，业师嘱本人代笔，委以重托。但因时间久远，各章执笔者已多有变动，无法一一联络，本人不敢、也无力独自对整个书

稿妄加改动。所幸本书问世后，在业师的带领下，东北师大美国研究所同仁仍继续拓展相关研究，对这一时期的土地关系、矿业开发、铁路业、畜牧业、农业、城市化乃至摩门教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层次的探讨，有很多新的认识可资借鉴。所以，根据总主编和责任编辑的建议，本人趁此次再版的机会，将印刷和行文上的重要纰漏剔出，同时，以后记的形式对书中某些问题进行补充或修正，以尽可能丰富我们对这段时期美国历史的全方位认识。

首先要修正的是本人执笔的第九章“城市的大规模兴起与市政改革”。由于城市化在当时是一个新领域，本人前无借鉴，驾驭整体的功力也很有限；又由于本人的硕士学位论文选取的是美国中西部，对中西部有偏爱，因此在书中笔墨略多，论述也确实有一定深度；相比之下，对西部的论述却是一带而过。后来，笔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专门选取西部城市化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我在该文中提出，尽管同中西部相比，西部城市化的整体水平，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同步程度，在全国所占比重等方面并不显要，但不可否认的是，西部城市化作为工业化时期边远地区城市化而有其典型意义和独特的研究价值，理应占有一席之地。现在看来，这个认识确有必要在本书再版时加以补充。

那么，如何认识西部的典型意义呢？西部位于美国经济区划的边缘地带（periphery，也可称边远地区），它与位于美国核心地区（core）的中西部城市化道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分属两种不同的区域开发和城市化类型。中西部地区所经历的是典型的传统模式，其顺序大致为：农业开发或矿业开发—工业化—城市化。在此过程中，农业地区的乡镇发展为小城镇，原有的小城镇上升为小城市，小城市则进一步成为大中型城市或地区性中心城市，

属常规性逐级递进。相比之下，西部城市化沿着一条与中西部截然不同的道路而发展：其一，绝大部分城镇是西部开发的先导和主体；其二，西部的主要城市均呈跳跃性发展。

微徵史实，可以看出，西部城镇确实是西部开发的先导。绝大部分城镇，无论是矿业城镇还是铁路城镇，都兴起于毫无人烟的莽莽荒原之上，超越了农业开发阶段。同样有意义的现象是，西部城镇不仅是西部开发的先导，而且一直是西部开发的主体。其直接表现是，西部人口稀少，但城市化比例却很高，而且城市化速度很快。就整个西部而言，从1860到1910年间，城市人口总数由600万增加到4200万，城市化比例由20%增长到4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7%）。其中，山区各州为40.7%，太平洋沿岸各州则高达56%。作为美国经济中尚未开发的边缘地区，用50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城市化，这种速度无疑是相当快的。

单纯从城市化发展速度看，西部和中西部都很快，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即中西部各级城镇发展较为均匀，逐级递进；而西部在小城镇兴起的同时，大城市发展更迅速一些，几个地区性中心城市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小城镇——一般城市—地区性中心城市等几次过渡，阶段性不明显。譬如，旧金山由40年代末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村落发展到1890年的30万人口，成为西部居统领地位的大商埠，在全国大城市中名列第九。落基山东麓的丹佛，发展势头也很猛，1860年时在地图上还找不到它，到1900年其人口已达到13.4万人。有鉴于此，有的美国史学者把旧金山和丹佛称为“速成式”城市（Instant Cities）。洛杉矶比它们兴起的时间稍晚，到1910年，人口也达32万，成为在规模上仅次于旧金山的西部大城市。所以说，西部各地区性中心城市的发展进程，较其他地区的同类级别城市迅速得多，带有跳跃性特

征。

西部开发之所以会形成上述局面，一方面是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西部山地居多、交通不便、人烟稀少，难以同时进行全面开发。其自然经济又属矿产资源型，不宜发展大规模的多样化经济，而开发之初所必需的主要是经济联系功能较强的中心性“支点”，作为沟通东部与西部腹地的“桥头堡”，而不是以分散和渐进性发展为特征的农业经济，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走中西部式的城市化道路。另一方面，这种以城市为先导的开发只有在工业化时期才有实现的可能。如西部开发的第一步——采矿业的发展就需要大量矿冶设施及先进的钻探采掘技术。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美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东向西，依次进行。19世纪后半期开发的重点是在西部，中西部则是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中西部在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中心的同时，也和东北部一道，带动着西部的开发。这除了资本西移外，也包括劳力和生产生活资料向西部的大量转移，从而便利了城镇的“超前”性发展。以城市为先导，当然并不是城镇的普遍兴起，而只能是有重点地进行，亦即走“点”状城市化的道路。这最充分地反映在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丹佛等西部四个地区性中心城市的兴起过程中。它们都是19世纪后期由小城镇一跃而为地区性中心城市的。以城市为先导，当然也不是不发展农业。西部城镇超越农业开发阶段，径直进入城市化阶段，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它的进一步发展仍有赖于周围农业地区的开发。在城市经济初步完善后，具备一定实力，可为农业地区提供了农用设备、资金和技术，又使农业的迅速开发成为可能。诚然，如果没有西部城镇的刺激，西部迟早也会进入农业开发阶段，但未必会这样快，有这样大的规模。

可以看出，美国西部与中西部在城市化的总趋势上是一致

的，但在具体途径与形式上均有诸多不同之处，反映了处于美国经济核心区和边远地区截然不同的城市化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并不是在简单重复东部城市化的模式，而是开辟了一条有自身特色的边远地区城市化道路。

在19世纪后期的美国历史上，横贯大陆铁路的铺设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可惜本书相关内容篇幅嫌少，而且分散在几个小章节，不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关于铁路，可以有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但至少有两个方面是需要列为专题的：其一，联邦政府的土地政策与横贯大陆铁路的铺设；其二，铁路业率先走向垄断。

19世纪后期，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乃至整个美国历史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铺设了多达五条横贯大陆铁路，即：联合太平洋—中央太平洋铁路（1869年）；北太平洋铁路（1883年）；圣菲铁路（1885年）；南太平洋铁路（1887年）；大北铁路（1893年）。这五条大铁路，总长7万英里，并附有无数条支线，深入到西部腹地，对西部开发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当时，美国东部还处于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很多方面都需要资金和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在西部广袤的地域上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无疑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当然有很多因素，但它与美国联邦政府土地政策的直接关系是不可忽略的。

根据1862年《太平洋铁路法案》，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二公司可得到400英尺宽的路基用地，以及建立车站、仓库、水站、临时工房、机车器械工厂、某些铁路建筑物等必需的土地。更重要的是，每修筑1英里铁路，就可得到沿线两侧各5个以间隔方式划分的地块（每个地块1英里见方，等于640英

亩)。这些地块可由铁路公司自行处置。为刺激新开发地区铁路铺设，该法规定在尚未建州的地区土地赠予数量加倍。另外，每修筑1英里铁路，铁路公司可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具有明显政策倾斜性的贷款：在平原地区为1.6万美元，丘陵地带为3.2万美元，山地为4.8万美元，以保证铁路线的均匀分布。这些政策使铁路公司获得了大量土地，从1850年到停止土地赠予的1871年，国会赠予各铁路公司的土地总计约1亿英亩以上，再加上西部各州赠予的数千万英亩的土地，各铁路公司所得的土地近1.8亿英亩（此数字在美国史学界存在争议，但其数量无疑是非常可观的)。

铁路与土地相结合所产生的各种效益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两者相加之和。土地凭铁路之便而增值，成为铁路公司的巨大财源，铁路公司则通过种种途径，促成土地增值。其途径之一是直接出售土地，对象主要是移民。各铁路公司均出动大量人马奔赴东部乃至欧洲各国，通过各种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游说，西部已有城镇为了自身的发展，也力图吸引移民，这与铁路公司的作法异曲同工，来自美国东部和欧洲的移民纷纷西迁，结果，铁路公司的土地不仅销路看好，而且售价飙升。

除直接向移民出售土地外，铁路公司还专设一些城镇开发公司，自行设计与创建城镇，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铁路城镇。通过这种途径，城镇中的地价增值幅度远远高于一般土地，铁路公司获利翻番；另一方面，城镇新兴，必然吸附大批人口，铁路的客货运输量也将相应增加，不啻一举两得。在铁路城镇创建过程中，诱人的投机利润使土地投机商们趋之若鹜。其中除部分投机商受雇于铁路公司外，还有一些专门在铁路沿线，寻求机会，伺机而动。他们或者与铁路一道，或者赶在铁路铺设之前，选址建镇，有时买下数个地块乃至全部地块，待价而沽，从而形成西部

城市化中的特有现象：镇址投机（Townsite Speculation）。据一位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著名镇址投机商在其传记中的记述，他曾计划建造一条横贯大陆的城镇线，像“城市公路”一样，把旧金山和波士顿联为一体。这种说法尽管有些夸张，但毕竟明显地反映出铁路公司是何等地热衷于建造铁路城镇。

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双赢”。城镇的创建和镇址投机，在经济上的直接后果是铁路公司得到最大的实惠。如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创建的本顿城，地块收入即为 1.7 万美元。另如北太平洋铁路在北达科他创建的詹姆斯敦，那里售价高达 2700 美元的地块，在该城未建前仅为 25 美元。但从美国政府方面来讲，它所预留的与铁路交叉分布的地块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增加了政府的岁入。更重要的是，铁路铺设带动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带动了西部的大规模开发，成为 19 世纪后期美国经济起飞的支撑力量。

当然，这一政策也产生了始料不及的消极后果，这种慷慨的土地赠予，使铁路部门转瞬成为一个空前庞大的“土地帝国”，从而操纵了西部的经济命脉，造成很多社会矛盾。所以，铁路成为大量中小企业主和农场主抨击的主要对象。这是产生下一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个问题就是，铁路在 19 世纪后半期在美国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中所扮演了独特的角色。美国的第一个垄断组织形式——普尔就是首先出现在铁路业，换句话说，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序幕是由铁路业拉开的，而且在后来的反垄断斗争中，铁路公司几乎是众矢之的，所以铁路业的这一侧面也值得费些笔墨交代。

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较，铁路有其自身特点，这些特点使铁路成为最易受自由竞争影响和损害的企业，正因如此，走向垄断就是一个不得已但又很自然的选择。不过，在东部，铁路公司之间竞争激烈，往往是头破血流，两败俱伤，西部却并没有发生东

部那样的运费战，倒是最先采取了合作的方式：铁路普尔，这也是耐人寻味的。其原因之一是因为西部铁路从修建伊始就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如资本匮乏、股票掺水等，经济实力不稳，轻易不敢开启运费战；另一原因是美国刺激西部铁路铺设的土地政策和贷款政策使铁路在西部远远超过人口的移动，铁路线过剩，运输量不足，供大于求。权衡之下，类似东部那样的无限制的竞争对铁路公司往往是得不偿失，容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一些明智的铁路公司为避免在竞争中与对手同归于尽，便采取普尔作为变通办法。此外，西部地区资源分布不均匀，气候土壤也有很大的优劣差异，结果，铁路在这些地区的竞争，自然也相对集中，也是普尔得以较早产生的原因。

虽然普尔作为一种初级组织形式在全国普及，并且在减少竞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它本身所无法克服的一些缺陷注定了它的寿命是不会长久的。与其他经济部门不同，美国铁路业中未能出现独霸全国铁路的一个或几个铁路巨头，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垄断组织系统的任务就由来自铁路外部的力量、即以摩根为代表的银行家们来完成。银行资本以 1893—1897 年经济危机为契机介入铁路经营管理。不久全国铁路系统由四大垄断公司控制的局面形成，美国铁路业成为垄断程度最高的部门之一，并且采用垄断组织的最高形式控股公司，形成所谓的铁路大帝国。银行资本介入铁路经营管理，是美国金融资本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银行资本在铁路业获得巨大成功后，又以此为手段进一步操纵其他经济部门的命脉。可以说，银行资本插手铁路并获得成功标志着金融资本操纵国家经济生活的开始。

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是此时期历史发展的主线，自然也是该书的重头戏。该书在此方面的总体把握也确实下了很大工夫，但主要限于论及工商业部门的垄断，如再对铁路这一最具有美国特

色的部门而且也是垄断最早出现的部门加以论述，当可更为全面。

19世纪美国历史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西部开发。西部开发，是一部带有史诗性的历史现象，它对美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美国的西部开发就没有现代美国。但是，在我们为美国西部开发的令人目眩的辉煌成就所折服时，往往会忽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西部开发过程中的失误现象，这些失误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到19世纪后期开始凸显。因此，如果说在上一卷（《美国的独立与初步繁荣》，该卷主要论述19世纪上半期）里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在本卷中则是不可回避的。诚然，对于此问题，书中有所涉猎，但与对铁路的论述一样，非常分散，重视程度很不够。

美国西部开发中的失误现象似在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得比较突出：

第一，开发活动对西部土壤和自然植被的破坏。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农业、畜牧业、伐木业这些第一产业的不当开发对西部土壤、植被的破坏最为严重。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相当普遍。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农业生产的三要素中，西部土地最多也最便宜，而资本和劳动力恰恰都是最昂贵的。因此，农民都尽可能少用劳动力和资本，在增加或保持土壤的肥力方面，却从来都是漠然置之。天长日久，这种粗放式经营的结果，造成了土壤肥力流失，有机物减少，土地板结的恶果，难以恢复，大片平原沃土变成沟壑纵横的不毛之地。

砍伐树木，开荒种地，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从殖民地时期就是如此。到美国内战前，西部边疆的拓荒者已经一路滥砍到了明尼苏达州，南部则跨过了密西西比河。破坏植被的祸首还有畜

牧业。畜牧业到19世纪后期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成了大平原地区的主导产业，它的兴盛是以草原植被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在大平原畜牧业流行“散放”式放牧，破坏植被的速度极快。到20世纪30年代大平原地区出现沙尘暴，与这一现象有其内在联系。

第二，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这主要体现在中西部的加工工业和西部采矿业。早期城市发展，就根本没有考虑防治污染问题。后来的远西部采矿业开发，先是淘金热对地表的破坏，山体裸露，后是大型采矿机械以及提炼矿产品排出的废水废气和用于分解矿物的一些化学药剂的残余，都对环境产生了破坏。匹兹堡的钢铁冶炼业曾称雄全美，是遐迩闻名的“钢铁城”，为美国工业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同时钢铁业也使这座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匹兹堡的上空经常烟雾弥漫，被戏称为“黑城”。以至于人们常把匹兹堡与英国的曼彻斯特相提并论。在匹兹堡的大型工业企业的内部，可谓管理井然有序，效率颇高，但在整个匹兹堡的市政建设与管理上，却呈现典型的无政府状态。三四十年代匹兹堡投巨资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可谓亡羊补牢，对当时其他城市产生很大的警示作用。但回过头来看，若没有19世纪的放纵行为，后来改造的代价就会小得多。

第三，资源浪费。在采矿业的初级阶段，大量采矿者都是受黄金的诱惑来到矿区，他们只对金银感兴趣，因此不管是在淘金热还是在其后的浅层开采中，他们对于和金银相伴生的其他矿物质如石英等都弃之如履。同时，很多浅层露天矿因无法再采掘到金银而被放弃，一旦被放弃，就很难再进行深层采掘，因此，这些露天矿井之下埋藏的矿藏就长眠于地下了。由于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因此这种失控的大肆开采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在铁路铺设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铁路公司为独吞地产投机所带来的好处，往往置现有城镇于不顾，单独建设新的城镇。如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西部终点站避开西雅图建造塔科马，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夏延而绕过矿业综合性城市密西西比河以西第二大城市丹佛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铁路公司为所欲为，如入无人之境。这样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鲜有其匹。至于铁路公司后来成为西部庞大的土地帝国，颐指气使，成为垄断业巨头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更是尽人皆知的，这在当时就是美国中下层群起而攻之的对象，劣迹昭彰，读者自可鉴别，无须今天再费笔墨赘述，只是把它与西部开发的失误结合起来分析，多了一层历史思考的视角和感悟。在房地产开发中，更是充满了泡沫经济现象。在恶性竞争的驱动下，很多开发商不顾实际，热衷于“镇址投机”，或有意炒作，结果出现大量闲置的地块或镇址，很多成为人迹罕至的“鬼城”（Ghost town）。这些地点最后只剩下一个功能：赚取今天怀有猎奇心理的游客的门票费。

我们当然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要求历史，苛求一个世纪前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但有些是本应能够避免的，就应该做客观分析了。如果再从吸取经验教训的角度看，我们今天的边远地区开发应该、而且也可以完全避免这些失误。换句话说，我们有后发的优势可资利用。但利用这个优势有个前提，那就是要准确认识美国西部开发的失误究竟有哪些，这些失误哪些是人为的，哪些是难以避免的，哪些是边远地区开发必然伴随的副产品。

19 世纪后期美国史是一部恢弘的历史画卷，还有很多领域尚待进一步发掘。业师后来在此领域做了大量的深入探求，同时还指导学生作了大量研究和资料搜寻工作。这些研究成果，当可丰富我们对 19 世纪后期美国史和美国西部开发的认识和了解，

希望感兴趣的读者查找相关刊物阅读。我们作为先生薪火的传人，负有的使命之一就是在此方面继续加倍努力，将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学术界同仁，方可告慰业师的在天之灵。

王旭

2002年7月于厦门大学